

ISSN 1673-1670
CN 41-1377/Z

平顶山学院学报

PING DING SHAN XUE YUAN XUEBAO

JOURNAL OF PINGDINGSHAN
UNIVERSITY



中国·平顶山

ISSN 1673-1670



4

2023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4 期(总第 196 期)

双月刊

第 38 卷(1986 年创刊)

主 编：郑东丽

副 主 编：陈富志 张秋芳

责 任 编 辑：翟卫青 王彦江

李智萍 赵岩洁

雷 鸣 朱忠良

英 文 译 校：蒋领敏

思想政治

新时代革命文化的四重价值 王志立(1)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三个着力点 杨伟民(7)

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 王黎明(12)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 户英杰(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研究述评 赵佳源(22)

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内涵、价值与路径 赵志勋(27)

语言·文学

《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补考十六则

——以作家生卒年为中心 朱曙辉(33)

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俗语词考释六则 杨小平,蒋玲玲(38)

中国藏黑水城元代汉文法律文书校读拾遗 王 阳,马 雨(45)

论《茶馆》的经典化 吉开金(49)

历史学·哲学

唐代军人家属配偶问题初探 刘啸虎,焦 烨(55)

《帝王略论》中的先秦及秦朝帝王论 刘治立(60)

再论中晚唐五代都虞候城市治安权

——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	肖雷鸣(66)
晚清福建学政沈源深《劝学浅语》刍议	王夏刚,赵聪聪(71)
近代废止中医案破产缘由探析	曾 浩(78)
论庄子生命观的三重维度	陈 健,张宗明(84)

河南地域文化

论元结表状公文的写作特色及价值	周贤斌(89)
中原城市群的早期形成探究	张 勇(95)

教育学·心理学

空间正义视角下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高 灿,黄爱教(101)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	林 娜,康雅莹(108)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个体中心的视角	王童谣,吴 航(114)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孔令丽(123)

版权声明	(113)
------------	-------

MAJOR CONTENTS

Common Value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 WANG Liming(12)

On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HU Yingjie(17)

Sixteen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s in *General Catalogue of Collected Works of Individual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Collections of Poems and Proses in the Qing Dynasty*:
 Centered on the Year of Birth and Death of the Writers ZHU Shuhui(33)

Explanations on Six Colloquial Words in the Government Archives of Nanbu County in the Qing Dynasty YANG Xiaoping, JIANG Lingling(38)

On the Servicemen’s Dependents and Wives in the Tang Dynasty LIU Xiaohu, JIAO Ye(55)

O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Qin Dynasty Emperors i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Emperors* ...
..... LIU Zhili(60)

On Du Yuhou’s Urban Security Power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Analysis Based on Spatial Perspective XIAO Leiming(66)

On the Writing Features and Value of Yuan Jie’s Official Documents ZHOU Xianbin(89)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arly Formation of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
..... ZHANG Yong(95)

Research on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al Equity from the View of Spatial Justice
..... GAO Can, HUANG Aijiao(101)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Self-compa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 LIN Na, KANG Yaying(108)

新时代革命文化的四重价值

王志立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 河南 郑州 451000)

摘 要: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文化自信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中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革命文化对社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具体呈现为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积极发挥革命文化的四重价值。

关 键 词:革命文化;中国文化;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01-06

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42},并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43}。文化自信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也包括对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必须充分发挥革命文化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革命文化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因素。

一、革命文化的科学内涵

革命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根据新的历史境况做出的推进与创新,是理论积累和文化实践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革命文化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标识,是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资源。

(一)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革命文化有时被称为红色文化。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这样的文字和

事物:红星、红歌、红旗、红色影视、红色旅行和红色故事等。红色类似于人体新鲜血液颜色,中国人常常赋予其希望、热情、勇气、创造、奋斗和牺牲的象征意义。这种特殊的色彩及其象征意义,与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时代特点和精神气质形成完美的“同构”关系。中国人运用红色来形容自己最美的文化,红色文化的称呼本身就是中国人民的文化创造。

1.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基因。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基因,通过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立场的阐述,为共产党人理想人格塑造提供精神指南。例如,革命文化展示了对生死问题的价值判断,强调“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2]。革命文化的生死观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永生。革命文化赞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忠诚的精神风貌,反对那种“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极端个人主义。革命文化推崇“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与“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相统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完善、自我净化的内在力量^[3]。革命文化独特的精神基因,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方向及理想道德,指引着全体共产党人的行为目标及人生方向,是带领中国人民为崇高共

收稿日期:2023-01-10

作者简介:王志立(1971—),男,河南省淮滨县人,政治学博士,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与领导科学研究。

产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

2. 革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精神基因的革命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中华民族反抗侵略、追求独立富强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凝聚而成的。革命文化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在革命斗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出现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形成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构成革命文化的独有标识与精神体系。革命文化通过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内核,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优质基因^[4]。革命文化源于革命实践又引领革命实践,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让革命文化成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武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革命文化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革命文化对革命前的思想准备、革命中的思想指导及革命后的精神引领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3. 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得以形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立起来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注入新鲜血液。革命文化孕育了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精神品格,革命文化通过不断发展和完善,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5];革命文化贯穿中国共产党从领导革命到长期执政的奋斗历史,有效印证时代精神的历史渊源;革命文化蕴含中国共产党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一精神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得到传承和发扬,起到文化传承和精神引领的功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革命文化为源头,继承了革命文化所彰显的崇高境界与道德情操,对新时代赓续红色血脉、发扬革命精神、弘扬时代精神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

(二) 革命文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精神动力

1.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艰苦奋斗精神。革命文化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奋斗精神是革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无产阶级的奋斗精神和中华民

族的自强精神,有效呈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精神^[6]。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推动了革命精神的升华,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理论家,无时无刻不在继承和发扬革命时期的奋斗精神。

2.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革命文化深刻阐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法宝,是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的灵魂,为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引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逐渐积累了群众路线、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以及三大纪律、三大优良作风等法宝和经验,为革命文化发展壮大提供理论土壤。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革命文化展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人民立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只有始终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定不移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真正发挥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作用^[7]。在革命战争时期,敌众我寡和敌强我弱是经常面对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构建起命运共同体,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最终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 革命文化是新时代最美的精神底色

1. 革命文化实现了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革命文化的首要特征是鲜明的政治性以及彻底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形成的革命文化时刻从人民立场出发,在不同的革命时期开展不同的革命任务。鲜明的政治性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原则,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政治保障。在革命战争年代,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革命成功的保障,为革命文化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方向。革命文化的发展根基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革命文化的创造者和践行者,是革命文化的主体。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性的根本内容,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革命文化充分展现了政治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

2. 革命文化凸显了阶级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政治性与阶级性在革命文化中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明确的政治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革命文化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在工农联盟基础上不断把革命推向前进。革命文化是全新的革命思想和价值理念,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文化体系,严格区别于资本主义文化、封建文化、官僚文化以及其他各种反动文化。革命文化在革命实践中成长,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展现出革命文化鲜明的革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继续前进。

3. 革命文化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有效实现了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历史性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8]。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结合中国革命、历史和文化等多种要素,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革命文化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百年奋斗形成的重要经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支撑和实践保障。

4. 革命文化表明了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实现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积累创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革命文化,给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中国革命文化不仅展现了鲜明的民族特性,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标识,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与世界先进文化进行沟通交流,展现出开放性特征。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不断沟通交流的结果,是民族性和开放性的统一。民族性是革命文化的历史根源,开放性则为革命文化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新的动力。

二、革命文化的政治价值

人类社会在持续演进中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

现代文化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基础上,反过来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革命文化通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和先烈鲜血的浇灌,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心骨、精气神和发动机。

(一)为党的长期执政奠定文化根基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必须进行文化建设,并通过社会文化对社会存在能动的反作用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交流借鉴。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进行革命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充分发挥革命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随着文化对综合国力提升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革命文化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革命文化蕴含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导向,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二)为人民的政治认同提供价值资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人民幸福、民族独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方针政策都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换言之,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理念、组织架构以及价值观的认同和支持^[9]。革命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文化根基,有效实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功能,具有显著的人民性特征,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革命文化为丰富中华文化、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内生之路。革命文化的研究与开发需要政府、社会的大力推动,同时需要借助各种文化形式吸引人民群众的参与,为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提供丰富的价值资源。

(三)为新时代政治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对党执政理念的贯彻落实具有重要影响。革命文化倡导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导向,对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经过历史进程的沉积,革命文化发挥作用方式渠道发生了变化,革命文化所处的政治关系也有所不同,但革命文化的精神引领作用一直都在。革命文化有效实现了对人民群众价值理念的正确引导,

形成了全社会较为统一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形成了党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认可拥护党的党群关系^[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革命文化在政治发展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作用。

三、革命文化的经济价值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革命文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必然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属于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形成的革命文化具有显著的社会主义性质。革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and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一致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奠定了基调。

(一) 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革命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革命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引领方面。革命文化的理想信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奋斗精神,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形成了特定的经济思维方式和经济行为方式,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运行模式的建立完善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革命文化可以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法治、科技和效率等观念,能够调动其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11]。

(二) 推进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

革命文化主要在革命战争时期得以形成,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极其重视经济建设和物质生产,因此革命文化中具有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革命文化经济价值的实现需要建立在文化的需求与开发、相关文化产品的制作和文化产品传播的基础上^[12]。反过来,革命文化相关文化产品的开发、制作和传播又可以极大促进经济发展。革命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可以通过文学艺术、文化教育、音像制品以及休闲旅游等形式来呈现。革命文化产业只有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才能构建独特的文化产业链,焕发产业活力,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四、革命文化的社会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革命文化在凝聚思想、引领方向、形成共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营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 凝聚社会思想共识

革命文化具有强烈的体验性与教化性,对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凝聚勤俭节约、爱国奉献、改革创新等思想共识。革命文化不仅能够有力纠正少数人贪图物质享受的不良倾向,还能够引导人们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生活习惯。老一辈革命人士在极其艰苦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不畏艰险、锐意进取、艰苦奋斗的精神,展现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的爱国情怀。革命文化蕴含的伟大革命精神和深刻历史内涵,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让人们牢记革命先驱的奉献精神,在树立人生远大志向的过程中,传承中华传统美德、革命文化理念与伟大爱国情怀^[13]。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基础上形成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形成时代精神等过程中,革命文化起到凝聚社会思想共识的作用。

(二) 引领社会发展方向

革命文化展现特定历史阶段的精神理念,同时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革命文化的内在理念是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具有知识性、经济性、先进性、革命性和导向性,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国内外格局的发展演变中,文化和价值观呈现多元性发展趋势,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时有出现,影响了人们对社会发展前途的理解。在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人民为了理想信念英勇奋斗,人们明确意识到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革命文化对于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大力量,要深入挖掘具有代表性的革命英雄人物的相关事迹并进行广泛宣传,发挥其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同时,要积极宣传普通群众的先进事迹以展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激发人民群众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体能动性。革命文化基于榜样力量吸引人、感化人、塑造人,有助于人们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认清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三) 形成社会价值导向

革命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头,能够引领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革命文化倡导社会主义道德观、重视科学技术发展、重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重视革命英雄人物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捍卫;革命文化倡导榜样的力量,通过榜样等多种方式,让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历史、认识英雄,形成情感上的感化、行动上的指导,形成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14]。革命文化的体验性和教化性能够陶冶情操、实现精神升华,革命文化蕴含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以及爱国情怀,对激发群众的爱国精神,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革命文化的文化价值

革命文化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文化形态,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爱国情怀、自强不息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

(一) 革命文化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

革命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较大影响,如老子提出统治者要实现治理长久就需要顺应民意,“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认为统治者应提倡德政,提出节用爱民、使民以时,“因民之利而利之”;孟子对民本思想进行了系统化阐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荀子进一步丰富了民本思想,把君喻为舟,把人民群众喻为水,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具有丰富而深刻的“重民”思想,但毕竟都不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范畴^[15]。古代民本思想强调维护社会等级秩序而采取“重民”“利民”“顺民”等政策,基本上都围绕着明君、良臣、顺民三者的关系而转动。中国共产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民本思想的升华,打破了明君、良臣、顺民关系模式。作为先锋队党同群众保持血肉

联系,坚持群众路线。革命文化从“得民心者得天下”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实现了对重民思想的超越;从“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了对利民思想的超越;从“听政于民”到“群众路线”实现了对顺民思想的超越,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主体论、人民主权论及人民利益论的精神内核。

(二) 革命文化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支柱,是动员人民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勇于奋斗的精神旗帜。革命文化彰显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在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艰苦环境中,革命文化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以工农兵斗争生活为主题的戏剧、音乐、美术等文化作品,彰显爱国情怀,鼓舞革命斗志。革命文化以爱国主义为主线,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革命文化作品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艰苦处境与激昂的革命热情,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拯救危难中的国家与民族。革命文化通过展现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不断努力奋斗,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三) 革命文化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强不息精神

《周易》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赞美天道刚健中正的品格。中华民族在天人合一理念中能动进取,“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在遵循天道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提升人的德行,实现君子崇效天而“自强不息”^[16]。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精神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不断创造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篇章。中国自强不息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胜枚举,文王被囚羑里而演《周易》、司马迁耻遭宫刑而写《史记》、李时珍不辞辛苦写成《本草纲目》。自强不息精神深深印记在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构成中华民族的基本社会心理,在革命文化中得到凸显。革命文化秉承“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精神,发扬自强不息精神,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应具备与敌人斗争到底的气魄、自力更生的自信以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依赖于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不断开拓进取、锐意拼

搏,领导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革命文化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

革命文化蕴含深刻的革命精神,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新时代新征程需要弘扬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革命精神具有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等诸多方面。开拓创新精神来自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感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开拓创新,创造了伟大而悠久的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思想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开拓创新精神。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挥开拓创新精神,在极其艰苦的历史环境中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开拓创新精神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维护稳定社会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六、结语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重视文化建设,发挥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要充分重视革命文化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头,赓续革命文化血脉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革命文化来源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实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升华,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力量,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应有之义。新时代充分发挥革命文化的四重价值,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重要作用。对此,必须充分挖掘革命文化的内在价值,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激发其生机活力,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足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004.
- [3] 任平. 全球文明秩序重建与中国文化自信:延安红色文化的当代意义[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6(3):5-16.
- [4] 邓显超, 邓海霞. 十年来国内红色文化概念研究述评[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29-39.
- [5] 黄虚峰. 红色文化资源产业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J]. 红色文化资源研究, 2016(1):134-139.
- [6] 孟玲云. 文化自信视野下红色文化的培育[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4):62-64.
- [7] 梁伟凤. 基于文化自信的福建红色文化发展维度[J]. 福州党校学报, 2017(5):70-72.
- [8] 邱小云. 红色文化自信的宣示[J]. 红色文化学刊, 2017(1):80-82.
- [9] 李霞. 论红色文化传播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策略[J]. 红色文化资源研究, 2017(2):42-50.
- [10] 耿玉娇. 文化自信视阈下红色文化的价值探析[J].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2):47-50.
- [11] 李智. 红色文化为文化自信筑基[J]. 人民论坛, 2018(13):136-137.
- [12] 许婕, 叶文亮. 红色文化对提升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价值[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8(10):91-94.
- [13] 渠长根, 闻洁璐. 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综述[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64-67.
- [14] 任文刚, 马兆兴, 罗海英. 文化自信背景下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J].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30-33.
- [15] 梁培林, 靳晓斌, 韦凤. 国家治理视阈下红色革命精神的价值弘扬[J]. 广西社会科学, 2020(4):29-34.
- [16] 李强. 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及传播路径[J]. 社会科学家, 2020(7):153-156.

(责任编辑:朱忠良)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三个着力点

杨伟民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党建教研部,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坚持好运用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对此,需要把握好三个着力点:坚持“四个联系”,“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矛盾,化解风险挑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国内伟大而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坚定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征程。

关 键 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场;观点;方法

中图分类号: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07-05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关于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18-19}理论创新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做到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1]19-21}。实践是理论的来源、目的和发展动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着眼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需要把握好三个着力点即坚持“四个联系”领悟“三个逻辑”、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坚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

一、坚持“四个联系”,领悟“三个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联系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联系我们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具体实践,联系国际环境深刻变化,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2]。坚持“四个联系”,深刻领悟“三个逻辑”,对于认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展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历史征程具有重要意义,是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之必然之义。

第一,坚持“四个联系”,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历史逻辑。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有唯物史观的历史视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自有规律可循。中华民族经历悠久的历史,创造出辉煌的文明,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却遭受了巨大劫难。无数仁人志士忧心于国家的深重灾难,欲尽匹夫之责,各种义举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这些方案因未能顺应历史规律和民心民意而以失败告终。人们追问: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引领?随

收稿日期:2023-03-06

作者简介:杨伟民(1974—),男,河南省临颍县人,法学硕士,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党建理论、政党政治理论研究。

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顺势而兴。中国共产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业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十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百年奋斗,取得无数重大成就。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前进的指导思想、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先锋队和领路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具有真理性和正确性。这一历史逻辑昭示世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建设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强大中国。

第二,坚持“四个联系”,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理论逻辑。这一逻辑揭示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然趋势和生机活力。理论是人类在历史演进中,对社会发展和文明成果的规律性概括和体系化总结。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开辟社会主义新天地的科学理论,是被历史证明且仍在被证明的真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在前进旗帜上。在前进道路上,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又发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形势环境的严峻性复杂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艰巨性,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奋发有为的精神勇气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创立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中来,又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的百年奋斗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奥秘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胜利前进的思想精神源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四个联系”,领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永葆生机的理论逻辑。

第三,坚持“四个联系”,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实践逻辑。实践逻辑是干事创业的成功之道,实践是真理之源,是真理之树常青的沃土,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进行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36},“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135}。实践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列宁曾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4]。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实践是成功的起点、过程和助推器。没有实践,就创造不了历史、创建不了理论,人类就要失去生存条件,社会就会失去发展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持续实践中不断创造伟大奇迹,中国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也曾走过弯路、遇过挫折,但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伟大的实践和斗争中越发坚强和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先进理论指导变革性实践,取得众多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坚持“四个联系”,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年来党和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走过极不寻常的道路,能够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面对世界大变局能够胸有成竹、保持战略定力,这些充分证明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是十分生动的、卓有成效的。坚持“四个联系”,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实践逻辑,可以验证理论与实践、奋斗与成功、斗争与胜利、谋划与行动、

目标与实干的辩证关系,深刻领悟其中的实践逻辑,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行稳致远。

全面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需要深刻领悟党的百年奋斗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理论逻辑,中国长期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逻辑。三种逻辑辩证统一、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共同蕴涵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当代中国的社会演进、世界发展的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并时刻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坚持“四个联系”,深刻领悟“三个逻辑”,全面、系统、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才能更好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新征程中不断团结奋斗。

二、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以全新视野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作出了回答。

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要求。“问题”的实质是矛盾,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世界事事处处时时存在矛盾;矛盾同时具有特殊性,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相互转化。主次矛盾都有其主方面和次方面,这两个方面也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转化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同一性使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共同存在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斗争性使双方相互区别、相互排斥、相互作用,此消彼长,使矛盾统一体不断变化和发展。矛盾的自我运动、自我展开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据

和动力。把“问题”置于唯物辩证法的视野下进行观照,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进步的方法论依据。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是具有战略定力的重要根据,需要重点解决格局不完善、发展质量不高短板弱项问题。党的二十大关于“问题”的论述,鲜明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具体运用。

第一,要增强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密切相关,要敢于面对问题、正视问题。问题来自现实生活和具体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通过实践来进行。敢于面对问题、正视问题,就要认识到问题是矛盾普遍性的呈现,是客观存在的,幻想不产生问题、不出现矛盾只能延误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敢于面对问题、正视问题,就要有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决心,不能掩饰问题,企图绕过问题、躲避问题会对党和国家发展事业造成负面影响。敢于面对问题、正视问题,就要有不怕不惧不避讳问题的勇气和胆识,要有下定决心解决问题的定力和能力。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和“天职”就是站在时代潮头带领群众解决问题、战胜困难。问题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和宗旨的应有之义,增强问题意识是每个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具备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这是需要警惕和克服的。

第二,要坚持问题导向。问题的出现是时代通过问题向人们发出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信号,一些重大问题的出现往往警示和提醒人们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推进社会历史发展,创造文明成果。对于一些小范围内、少数地方、少数人中出现和存在的问题,也需要保持清醒和关注,分析其本质、关注其发展方向以及可能出现的结果。有时看似小的问题却有可能逐渐演变为全局性的大问题。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就是要看到问题存在的客

观性,察觉问题而知民意,解决问题而得民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工作上的一种职责、指向、重点,要把解决问题作为我们工作成效的一把尺子,问题发生在哪里,我们就出现在哪里、奋战在哪里。

回答并指导实践以解决问题,是向理论创新提出迫切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20}理论的根基在于实践,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奋进新征程我们面临的问题艰巨复杂,解决问题的难度很大,对理论创新的要求也必然非常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必须聚焦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聚焦改革发展稳定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问题以及国际大变局中加速演进的重大问题,需要对这些问题时时予以高度关注、深度研究、科学预判,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不断解决这些问题是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

第三,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必须发扬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秉承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理念,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前仆后继,不怕艰苦,不怕牺牲,英勇向前,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取得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毅前行。党的二十大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五个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1]26-27}。斗争精神就是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底气、骨气、志气,是不怕鬼、不信邪、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问题是拦路虎、绊脚石,你不动手清除它不会自动跑掉,解决问题离不开斗争精神。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多用智慧找出妥善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战胜强敌的好策

略好办法。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有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全党必须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1]28}“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的论断,对我们胜利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中的关键是“主动”,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要勇于担当、积极进取。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要在战略上保持主动态势,要时刻关注、分析、预判时局变化和动向趋势,做出有效应对方案,不要消极观望、被动应付、临渴掘井。

第一,主动识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60}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和平进步力量不断壮大,同时逆和平发展主流的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单边主义也十分猖獗,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确定和部署从现在起的中心任务,继续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主动识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好、运用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敏锐感知各种变化,积极探索变化的本质和规律,做出预测预判,积极应对。唯物史观是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判断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要不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国内外局势

的变化发展,化危为机,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第二,主动应变。主动识变是为了主动应变,在对国内外局势变化发展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和预判后,就要把握时机,积极参与局势的变化发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努力做到有备无患、未雨绸缪。当今世界风云变幻,需要保持足够的定力和敏锐,对于各种情况要早做准备,在“变”来临之前闻“变”不惊,在“变”来临之际不至于措手不及。有些“变”具有消极性、破坏性、突发性,需要及早准备应变,避免造成被动和损失。有效的应变预案可以让我们临危不惧、从容应对,进而转危为安、化危为机,引导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这要求良好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第三,主动求变。物质世界普遍联系、永恒发展,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歇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发展变化是绝对的必然的,即使某个事物处于平静期、稳定期,那也是矛盾运动过程中因各方相互制约而产生的暂时平衡状态。因此,与其消极待“变”、被动生“变”,不如积极求变。积极求变不是企图改变事物运动的规律,不是拔苗助长,而是积极创造必要条件,抓住恰当时机,促使事物矛盾运动向好的方面转化。在关乎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等重大问题上,决不能消极回避和莽撞硬碰,必须坚持原则,坚守底线,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备战,危中求机,化危为机。“风高浪急”时对“突变”“巨变”的抉择是艰难的,需要深刻领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坚持好、运用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如果说“主动识变”体现的是高瞻远瞩,“主动应变”体现的是整体素质和基本功,那么“主动求变”则要求具备卓越的战略谋划能力和高超的战略驾驭本领。这要求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和实践品格,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系统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底线思维能力和创新

思维能力。

四、结语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在全面学习上下功夫、在全面把握上下功夫、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要深刻领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坚持好、运用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联系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联系我们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具体实践,联系国际环境深刻变化;要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要坚持主动识应变求变,主动化解重大风险,增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坚定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历史征程。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 [2] 习近平. 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J]. 求是,2023(2):4-9.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列宁.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3.

(责任编辑:朱忠良)

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

王黎明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着生态危机、资源危机以及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 同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存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极端民族主义等思想。要想克服这些难题, 人类的主体意识必须觉醒, 并转变思维方式, 求同存异, 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解决这些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指向, 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人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形成了共同的价值, 这是一种开放包容、共享共建的价值, 是一种真实的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倡者, 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要勇于担当责任, 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中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关 键 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主体意识; 共同利益; 共同价值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670(2023)04-0012-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60}的主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共产党人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 谋求本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理论前提就要从价值哲学层面来阐释其理论基础。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与主体

当今世界局势是“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 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2]。面临如此多的挑战, 老路子很难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于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一) 全球性问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

人类社会现在面临生态危机、资源危机、核战争威胁、大规模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 这些问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 人类要想长久生存下去, 就

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宇宙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共有一个家园, 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 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是唯一选择^[3]。这就是人类面临的现实, 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园, 当生态问题演变成全球生态危机时, 仅靠个别国家的努力是无法达到目标的。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资源危机、粮食危机等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战争阴影仍在笼罩着人类。还有一些新兴事物如人工智能的快速崛起, 引起人们高度警惕, 有人甚至提出“人工智能威胁”。虽然这种认识并不一定准确, 但也警示我们要重视人工智能可能出现的不良作用, 需要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技术、伦理等方面的限制与约束。

全球性问题主要源于一些不利于人类和平共处和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 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归结为价值观问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极端个人主义等所秉持的价值观是自我利益至上, 只承认自我个体存在, 不承认整体及系统, 用个人权利遮蔽人类整体的权利, 由此造成一系列问题。人类是一个整体,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要解决个体与类的矛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基于共同价值的基础, 同时允许个

收稿日期: 2022-12-28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3-ZZJH-379);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一般课题(2021YB0038)

作者简介: 王黎明(1978—), 男, 河南省巩义人, 哲学博士,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哲学研究。

体合法合理价值需求的满足。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价值主体意识的觉醒

人类面临全球性问题,需要人类价值主体意识的觉醒,需要站在“人类”立场上考虑人类的长远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从儒家大同理想到康德的“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中西方哲人都在探索人类如何避免战争,如何避免相互屠杀的狼与狼的状态,从而能够和谐相处。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维度上可以追溯到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这部不朽的经典中,他们豪迈而又肯定地为人类社会指明方向:“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人类生存状态的设想,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在他们那个时代这是没有条件来实现的。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的不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由意识、目标变为行动。对此,需要进一步厘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哲学上的理论基础。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基于共同价值的形成

“人类”是作为区别于其他自然物存在的一种“类”存在,是由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所组成的“集合”。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类主体”,并不是抽象的“一般主体”或“主体一般”,而是一个具体的特殊。或者说,“类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不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而是特殊与特殊、具体与具体的关系。“类主体”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力量”或“优越性”,它必须尊重其他主体的利益。一个主体,不能因为其是主体的最高层次,就可以否定其他主体的相对独立性和特点,就认为人类主体的标准是唯一合理的标准。

(一)人类共同主体及其价值共同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的,它有自己特定的权力和责任范围,而且在很多方面都能显示出具体的存在。作为所有主体的最大共同体形式,人类主体突出的是人类属性的共同性。无论个人之间的

差别有多大,阶级、阶层、民族、种族等之间有多大差异,他们都还毕竟属于人这个最大的类属,差别体现的是人的不同存在方式。人在基本需要、实践活动结构、对事物的感知、思维等方面都会有共同的内容和规律,这也是不同的人能够相互沟通和理解的基本前提。当人类面临生态危机、资源危机、核威胁等各种威胁和挑战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展示出强大力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可以进行探讨协商,商量如何去解决这些共同面对的难题。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要面临具体问题、处理具体事务,它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指向,各国相互借鉴、平等交流、互利共赢。

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主体需要建立在一种基本的共同价值基础上,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共同主体尚未真正形成,主要体现为没有形成一个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权力与责任统一的现实主体——“类主体”或共同主体。这个共同主体必须具备最高形态,必须是多样化主体形态中的最高综合,而不是各种主体形态的机械总和。共同主体所依据的共同价值要立足于一定的共同利益。各个不同主体的利益不同,必然造成社会主体价值观的多元化,表现为现在的人类主体还不是有机的共同主体,共同主体是一个大的团体,同时也是个现实的、具体的主体,这个人类主体是因为共同利益而走到一起来的。共同利益成就共同主体,共同主体具有共同价值。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如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和平发展,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追求之所在。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可能性

人类之所以需要并能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因为人类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即人类为了长远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可能性。

1. 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62}生态危机、核威胁、资源危机等,这不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单独应对的,需要“人类”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各国政府为了共同发展,同时也为了自己的发展,政府间或者国际组织间达成某种共识,从而形成共同价值。“命运”之“命”对于人类来说,是生存,“命运”之“运”是发展,当涉及人

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命运”问题时,人类就可能建立起命运共同体。

2. 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的现实必然性:世界秩序的变化。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多极化、文化发展多元化是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一种客观存在。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阻碍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都是以发达国家为核心来制定规则的,因此会最大限度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发达国家掌握着话语权,经常肆意突破和践踏为维护世界秩序确立起来的《联合国宪章》的一些原则。人类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共同难题时,现实利益的需求使大家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走出人类面临的困境。目前切实可行的就是,各个民族国家探索成立各种跨国组织,在这些组织内部,通过相互合作来解决全球问题。虽然各个民族国家在价值观、利益追求方面都有差异,但是面对全球问题不能搞对抗、冲突,而交往、对话和合作才是解决之道。我们不能只看到同中有异,更应该看到异中有同,通过成立国际性协调组织,求同存异或求大同存小异。当今时代,文化多元化、文明多样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在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贡献力量。人类已经生活在地球村,文明多样发展、文化多元共存是今天的基本现实。所以,中国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

3.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全球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细化,让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有了物质基础。过去的时代,只有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如部落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等,这些利益都属于局部利益,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是为了人类整体的利益。今天,由于全球化深入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这为共同利益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135},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5]55},这是不同的人有共同价值观的学理依据。从文化发展角度来看,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及其共同体内部孕育着朝向普遍性方向发展的文化突破趋势,这为价值共同体奠定了文化因子。中国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论述、大同世界构想、西方现代文明等都具有某种突破自身文化范围而趋

向普遍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或普遍性。从学理上说,这是因为我们同属于“人”这个类属,是会思维有理性的动物,不管一个人属于哪个地域、种族、民族,具备什么信仰、文化等各种差异,但只要是“人”,就必然受“人类”这个类属关系的决定,受人类这个共同物种的“共同尺度”所决定。人不是离群索居的动物,而是生活在共同体之中的。马克思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5]199}既然人类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才能获得自由,那么在这个共同体中由于长期的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共同的价值标准,个人就有义务来接受它。在今天这个地球村时代,人类交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各种“国际惯例”“国际法则”反映的就是这种共同的价值标准或价值秩序。

三、共同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

价值不仅具有现实性、具体性,还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是一种共识价值。“所有的共识价值包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都是以承认彼此的特殊价值为前提条件的,因而都是相对的、发展的、变化的,都会随着条件、范围、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不是绝对的、永恒的、凝固不变的。”^[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基于一定的共同价值来进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基础的共同价值具有开放包容、共建共赢、真实有效等独特性质。

第一,共同价值是一种开放包容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7]3}。“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地域而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和参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开放包容,尊重多样文明,注重平等对话。

第二,共同价值是一种共建共赢的价值。人类在现实性上的生存样式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站在人类整体立场上,以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纽带,倡导共建共赢共享,切中世界人民发展的基本诉求。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

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7]3}。

第三,共同价值是一种真实有效的价值。共同价值以多元主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为基础,是多元主体价值的汇合点,因此是一种真实的价值,而不是虚幻的价值。共同价值在真实性基础上,必须能够有效应对和解决国际社会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的一种特殊形态。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要经历人的依赖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阶段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人类发展历程不是直线进行的,而是经历从群体为本位到以个体为本位,再到以自觉的类为本位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将共同体区分为原始的“自然共同体”、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虚假的共同体”以及未来自由人“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基于社会共同体而达到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联合体”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人类更广泛的自由即人类解放。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就实践主体来说来自从自觉个体走向有组织的联合,这种联合在人类实践中得以完成,彰显人的社会本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发展形势的规律性把握,必将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提供理论支撑。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展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是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不断凝聚共同的价值目标,需要遵循“和而不同”的价值原则,需要各国共同承担责任,需要中国人民积极担当。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不断凝聚共同的价值目标。人们之所以追求价值共识的原因就是因为存在着价值差异,没有价值差异也就无所谓价值共识。在当今世界,每个国家、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样就会产生价值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尽量消解这种价值冲突,通过主体间的有效协商来解决这些价值冲突,从而达成价值共识。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关系一旦确立,便不可能退回到个别主体全

面主宰的阶段,而需要强调主体间的合作共赢意识、理解宽容精神,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挑战。”^{[1]63}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遵循“和而不同”的价值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尊重差异,求同存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基本道德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上要以和谐理念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要善于吸收其他优秀文明中的精华,在相互交流中实现兼收并蓄,共同进步。解决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需要集中全人类的智慧,需要各个国家、地区的广泛深入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世界格局。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主体都要承担起责任。无论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下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说:“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适应形势变化,广纳良言,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合作为动力,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合作是必然选择,各国要加强沟通和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8]

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国人民积极担当。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中国人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担当精神,中国人民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

百花园。”^[8]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将会作出更大贡献。

五、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展示了中国智慧,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对整个人类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1]63}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许多国家的接受和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我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致力于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8.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38.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汪亭友. “共同价值”不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J]. 红旗文稿,2016(4):8-10.

[7] 习近平. 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8] 习近平. 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 (2016-09-03) [2022-12-15].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3/c_129268346.htm.

(责任编辑:朱忠良)

Common Value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ANG Liming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human society is faced with a series of global problems including serious ecological crisis, resource crisis and the threat of nuclear war. Additionally, hegemonism, power politics and extreme nationalism are prevalent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human beings must awaken their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change their way of thinking,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setting aside differences, and address thes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roblems by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uided by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mankind, it emphasizes harmony amidst differences and aims to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On the basis of common interests, human beings have developed common values which are open, inclusive, collaborative and real. As an advocate of the community, China should shoulder its responsibilities and contribute its wisdom and strength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common interests; common values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

户英杰

(平顶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36)

摘 要: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生动概括。作为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价值、理论、制度和实践等方面表现出多重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是人民意志的真正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力和实践创新的生动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了国家各项制度之间的协同性和一致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致力于全链条和全过程的民主实践,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公共事务的集中体现。

关 键 词: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主权;民主参与;显著优势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17-05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最新发展成果。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视察时首次提出“全过程民主”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提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1]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再次成为反复提及的重要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2]37}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世界上并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民主模式。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唯物史观基础、中华文化渊源、丰富理论内涵和现实政治意蕴。和西方民主相比,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价值、理论、制度和实践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迈向新台阶的必由之路。

一、价值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体现人民意志

民主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用来描述雅典城邦的政治体制。民主在古希腊语中意味着公民统治。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我们看到,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所有

的人依法都是平等的;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3]195}伯利克里表达了民主的两条基本涵义:第一,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而不是少数人的统治;第二,雅典城邦所有公民政治平等,所有管理职位都对公民开放。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大多数人”是指拥有财产的成年男性,与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民群众具有重大区别,我们的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其本质是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

古希腊人对民主褒贬不一,大力推崇者以伯利克里为代表,严厉批评者也不在少数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大力推崇贤人政治,把民主政治批判为“堕落的政体”,亚里士多德提倡混合政体,把民主制视为“变态政体”。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民主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制度追求的重要目标。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地位不断被抬高,但并没有实现“大多数人的统治”,而成为少数有钱人对大多数普通公民的政治统治。现代民主由参与式民主转变为代议制民主。熊彼特认为民主是“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4]396},民主成了精英获取选民选票,进而获得统治合法性的手

收稿日期:2023-01-25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24-ZDJH-411)

作者简介:户英杰(1986—),男,河南省汝州市人,政治学硕士,平顶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段,亨廷顿提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5]6}。古希腊雅典民主关于大多数人享有统治权力的假定被相反的假设所替代,统治权被少数精英所掌控,民主异化为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大多数人只在名义上保留对国家的管理权。

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关键在于国家权力是否真正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中,即人民是否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马克思说:“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6]恩格斯说民主是“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7]。列宁说:“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8]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内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逐步构建起一整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并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一部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探索、形成、发展人民民主的奋斗史。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人民”不是有名无实的选民,而是不分职业、年龄、地域、性别、民族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共同掌握国家权力。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生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保护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2]3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和归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更好激发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更好体现人民的意志,更好保障人民的权利。全体人民都能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享国家权力、共建伟大事业、共享发展成果。

二、理论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创新发展

理论要想保持生命力和创造力,就要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和丰富自己,否则就会因为封闭而成为僵化的教条。习近平强调:“要萃取历史精华,推动理论创新,更好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9]好的理论就是不断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间的理论。人民所需要的民主理论,不是高高

在上评判他人的标准,而是能够更好为人民解疑释惑、回应群众诉求、指引未来实践的“善治”理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实现飞跃,历经坎坷而依然保持活力和创新力。

从古希腊民主制诞生到16世纪,民主从来都不是各国政治学家讨论的理论热点。17、18世纪,随着英国、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相继完成,创建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体系,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行为进行合法性辩护,按照资本主义经济逻辑追逐自由、平等的要求设计新的政治制度,成为这一时期欧美政治思想的主题。洛克提出限制政府权力、保证人民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式民主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贡献。美国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建立“代议制政体”,这与古希腊纯粹的民主政体有了重要区别,代议制连同分权制衡成为美国建国的主要政治理念,美国建国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一次重大尝试。19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约翰·密尔发表《代议制政府》,构建出一套代议制民主理论,民主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美国前总统林肯赞美民主,把美国体制视为民主政体,把南北战争中北方的胜利视为自由民主的胜利。民主理论的创新,资本主义实践的发展,加上欧美等国在对广大亚非拉国家进行商品输出的同时也输出了自由、民主等政治理念,资本主义自由式民主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具有支配性的主流意识形态。20世纪,西方现代民主的理论创新出现停滞,理论上的“多数原则”与现实中的“精英统治”形成强烈反差。二战之后,达尔提出多元民主理论,试图修补少数精英和多数大众之间的鸿沟,可是民主实践却面临重重困境,西方现代民主开始成为过去式民主,其虚伪性逐渐显露。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真实的民主,并不断在实践中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因素,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实践,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中国波澜壮阔政治舞台上发展和实践的历史。习近平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10]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中把民主视为“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的自由产物”,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都有对民主的精彩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民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俄国具体国情,提出民主集中制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全面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一次重要创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11]¹⁴⁴,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1]¹⁶⁸的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再次迎来重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为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与时俱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养料,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生机活力的生动体现。

三、制度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12]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竞争的重要内容。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之治”成为当今世界政治领域中的一道风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建立国家秩序、调节社会关系、保障人民权益等诸多方面,都展现出强大的优越性和有效性,中国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可以说,“中国之制”成就了“中国之治”。

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属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这一制度源于欧美,最早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国建立。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开始走出欧美,向全世界扩散。1971年,塞缪尔·亨廷顿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建立视为民主

化的第三波浪潮。可是有学者研究发现:从1974—2013年这40年的数据来看,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民主巩固国家、转型国家和民主受挫国家的比重分别大约占到三成、四成和三成^[13]。这一数据表明:在很多国家拥抱西方民主制的同时,也有同样多的国家正在遭遇民主困境。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民主情况来看,制度运转机制正不断被自由主义民主的对抗式特性所阻滞,民主质量显著下降,民主效能日渐式微。不同政党之间激烈竞争,从政府到议会、从联邦到各州,各个领域均在成败之间进行着二选一的角逐,其关系是“执政一在野”的“对抗性”模式,政党之间围绕选举展开激烈竞争。通过竞争,国家试图提升政府和社会运转效率,可事实上党争民主往往演变为零和博弈的“囚徒困境”,不断上演一届对着一届干的闹剧。理想中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议会掌管立法权,行政机关掌管行政权,法院掌管司法权,三者各司其职、相互协作、相互制衡,理论所构建的权力制衡目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往往难以实现,导致政府运行成本高、效率低。

国之兴衰系于制,民之安乐皆由治。民主应该成为表达各方观点和展现不同诉求的平台,应该成为融入群体智慧、协调人民利益的机制,应该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主体地位的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对抗式民主,而是协作式民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饱含“和”的智慧,中国历来重视“以和为贵”,全过程人民民主就体现了“和”的思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者、倡导者、践行者,党对相关制度安排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民主集中制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中相得益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证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充分的合作和协商,通过汇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形成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避免政党之间无序竞争带来的恶性争斗和无谓消耗。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途径,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全过程人民民主秉持“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政理念,从战略全局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出一系列发展目标和规划,并确保这些目标和规划“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变”^[14]。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各项制度、各个部门之间相互支撑、相互配合,人民群众的真实意志统一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政治制度运行的协同性、一致性和高效性。

四、实践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民主实践的全链条和全过程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一种冷冰冰的政治制度,而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和公共事务的真实实践过程。古希腊民主中民众不仅参加选举,还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管理。伯利克里说:“我们的普通公民,虽长年累月地忙于劳作,但是仍可以对邦国大事作出公平的裁断。”^[3]¹⁹⁷ 罗伯特·达尔说,雅典公民能够召开公民大会并直接决定法律以及政策,而公民参与并不仅限于公民大会,也包括对城邦管理的积极参与^[15]。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但普选权在发达国家中的落实则是最近的事情。19 世纪初的英国大约仅有 4.4% 的成年公民拥有投票权,到了 1928 年才最终落实 21 岁以上成年男女公民的普选权^[16]¹⁹⁰。美国 1971 年才通过第 26 条宪法修正案,规定 18 岁美国公民可获得投票权,各州起点不一的选举资格终于实现了统一^[16]¹¹⁸。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观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坚持大多数人普遍参与的民主实践。

人民代表是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利益,表达人民意愿,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人民代表以自己所代表的人民群众的意愿为依归,而不是单纯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使职权。在熊彼特看来,西方民主政体仅仅意味着选民选择政治家的过程和权利,对于提案、立法等相对专业性政治活动则属于议会和政府,已经和选民无太大关系^[4]⁴²⁴。亨廷顿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序言中,借熊彼特之口说:“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强有力的决策者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这样的选择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5]⁵⁶ 西方政治学家将选举等同于民主,投票成为民主评价的事实标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只是选举的工具,并没有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精彩概括,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继承发展。我国第一部宪法不仅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明确规定了包含知情权和监督权在内的广泛民主参与权。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参与民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也得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通过制度建设、法律保障和党员带动示范等多项举措进一步完善民主参与链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17]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保障人民群众选举权的同时,通过各种制度和机制实现人民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参与,确保人民民主的过程完整性和时间持续性,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决策就是要将公众参与纳入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确保决策的科学化和正当化;民主管理就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促进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民主监督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监督党和国家的权利,确保在决策、执行、落实等各个环节都能听到人民的声音。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让民主日常化、生活化,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身边,实现了民主持续性与全天候运行”^[18],不仅要保障人民的选举权,而且要保障人民在政治过程中的参与权、管理权。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构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在缔造社会主义政治新文明。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对西方民主的照搬照抄,而是价值理念、理论创新、制度保障、实践程序等多方面的全面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能够有效保障我国各项政治制度之间的协调一致,能够有效保障人民群众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的实现,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认识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显著优势,对于增强中国式民主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发展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仍处于起步阶段,其理论构建需要不断完善,其显著优势有待于在民主建设中进一步发掘,有待于不断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优势。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1(14):4-14.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M]. 徐松岩,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4]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吴良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 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刘军宁,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81.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M]. 北

京:人民出版社,1957:664.

[8] 列宁. 列宁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1.

[9] 习近平. 以史为鉴察往知来 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N]. 人民日报,2022-09-27(1).

[10]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2).

[1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 求是,2020(1):4-13.

[13] 包刚升. 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体转型与治理绩效(1974—2013)[J]. 开放时代,2017(01):76-95,5-6.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1.

[15] 罗伯特·达尔. 民主及其批评者[M]. 曹海军,佟德志,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1-12.

[16] 包刚升. 民主的逻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7]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N]. 人民日报,2021-10-15(1).

[18] 董树彬.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色与优势[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2):76-87,146.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2.

(责任编辑:朱忠良)

On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HU Yingjie

(School of Marxism, Pingdingshan University, Pingdingshan, Henan 467036, China)

Abstract:Democracy is the common value of all humanity, but its forms are diversified.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s an epitome of Chinese-style democracy. As a new political pattern, different from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has multiple advantages in terms of value, theory, system and practice. It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majority rule and represents the people's will; it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democracy theory, embodying the vitality of Marxism in theory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m in practic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ensures the synergy and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various systems of the country, manifesting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adheres to the whole chain and process of democratic practice and is a concentrated manifestation of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Key words: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people's sovereignty;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 advantages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研究述评

赵佳源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 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有利于应对新时代文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学界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等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总结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等体现规律性的结论,并从唯物史观、社会实践、时间维度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价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体现为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党性与人民性、物质与精神、继承与创新、民族与世界等关系问题,学界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热度和深度,加强研究的系统性和创新性。

关 键 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22-05

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42-4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极其重视文化建设,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揭示了我国文化发展规律,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进行广泛研究,从不同视角探索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梳理这些规律对于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意义,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党性与人民性、继承与创新、民族与世界等关系问题。学界从不同视角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

第一,从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的视角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学者们关注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建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认为这些是对文化发展规律正确认识的结果,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反映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吸收各国先进文化成果进行创新,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要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3]。依据这些内容,学者们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主导,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要坚持兼收并蓄和创新发展相结合、“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相统一、文化产品创作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协调。这些规律性结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紧密相关。

有学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出10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以人为本、“三个面向”和“三个内在属性”有机统一、重在建设与多管齐下相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科学方法、不断创新、党的领导^[4]。有学者总结出5条规律:坚持党的领导、把推进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建设反映世界性

和时代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现代化社会中的作用、积极推进文化创新和文化繁荣^[5]。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但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内容上是一致的。

第二,以历时性与共时性为坐标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解决好历时中的“新”“老”问题、共时中的“中”“外”问题。这种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立足于现实与未来的关系问题展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性吸收。这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精神的具体应用,符合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国际先进文化成果。随着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把握鲜明的时代性、深厚的民族性、渐进的积累性、广泛的群众性这四条规律^[6]。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学习西方国家文化建设先进经验、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和网络文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建立评价体系^[7]。

第三,在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中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这一研究视角重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关系问题,提出文化建设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反作用,先进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中国选择了“一手抓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道路,既符合文化建设规律,又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8]。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学界还存在其他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如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等视角进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不是单层次的,而是多层次、立体性的结构,具有机制化、制度化、常态化特征,学界对此提出有机统一规律、变迁规律、两翼结构规律和三维功能规律^[9]。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反映人的本质,要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关系密切,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就要密切联系这些路线方针政策,从中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内涵。

第一,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4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同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由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体现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基本规律的深刻把握,需要长期坚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坚持这一方针的基础上,要不断探索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时代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反对“一切向钱看”和精神产品商品化倾向,要以社会效益为准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条内在规律^[10]。

第二,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现规律性内容,阐明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1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其中第一步目标中就包括“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1]24}。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1]43-44}。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44}。

第三,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45-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是深化对当前文化建设规律和文化发展内在规律认识的必然结果^[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道德思想、深广的天下情怀等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规律,学界还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例如,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成熟把握,根本的一条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其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重要体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当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当代价值主要在于,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启示和方向,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原则,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和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等原理得到进一步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批判性思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实践

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是提高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水平。社会和谐稳定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成立足现实,从社会意识层面创造社会的和谐稳定,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改革创新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引导动力,文化体制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保障动力,三种动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14]。社会历史动力系统理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能动性,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邹广文从思想意识、价值诉求、文化实践、文化发展四个层面对党的文化建设规律进行分析^[15]。四个层面的规律主要体现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反作用,这些规律发挥作用必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历史价值。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沉积下来的精神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深刻的历史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奠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步形成,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正式形成并不断完善发展。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重要文献,有学者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党的文化建设思想进行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分析,总结出党的文化建设思想经历从抽象到具体、从被动到主动、从自觉到自信的过程^[16]。这些过程凝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内容,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历史价值。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展望

学界持续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产生丰硕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启示。总体来看,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采取不同的研究视角,总结出多种规律,提出一系列价值。学界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展开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方针

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表达,认为研究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可以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重要启示,有利于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能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尽管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仍存在需要加强的地方。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热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当前研究成果相对较为分散,许多研究论文和专著的影响仍然主要局限于学界内部,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没有形成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普遍关注。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热度需要进一步提高,需要更加精炼细致、深入准确地进行研究,需要进一步区分“文化建设经验”与“文化建设规律”,使人们清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积极参与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度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对党的重要文献进行宣传是一个重要领域,需要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观点和重要政策。宣传论文和著作数量较多。在此基础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需要对党的重要文献进行深层次解读,需要进行具有学理性、深刻性和创新性的思考和总结,这种研究目前还较为欠缺。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应该开阔视野、着眼长久,更加深入地观察和思考。许多学者自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可以结合自身感受进行深度研究,对文化建设的脉络和走向进行学理分析,总结规律提出建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系统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目前研究仍然具有单一性特征,相对缺乏系统性的逻辑分析。许多学者从社会实践、党的方针政策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对与其他领域关联性、系统性的研究仍较为薄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政府管理、市场运行紧密联系的,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系

统研究,需要关注政府、市场、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位置和作用,如何让不同主体形成良性互动、凝聚强大合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性还在于一元指导思想和多元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又具有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加以解决的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需要在世界民族文化交流借鉴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必须充分关注这一背景,总结出系统性规律,以利于从其他民族和国家中借鉴发展经验和文化要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43}“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二为”“双百”“双创”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内容。学界研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加强系统性、创新性的研究。学界研究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国际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科学认识文化的结构和功能,尊重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实践中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领导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格局。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呼唤对文化建设规律性的探索,这是中国学界肩负的历史使命。学界需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这一主题,

提升研究的深度、广度、系统性和创新性,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中国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9: 138.
- [3] 宋紫, 谭献民.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规律[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5): 53-57.
- [4] 吴丽萍. 把握文化建设规律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3): 120-122.
- [5] 颜晓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之维[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9: 405.
- [6] 郑志飏. 科学发展观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350-352.
- [7] 李君如. 文化建设的规律与途径[N]. 哈尔滨日报,

2011-11-16(10).

- [8] 陈辉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158.
- [9] 王资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规律探讨[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5(10): 122-127.
- [10] 刘奔.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 自觉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J]. 中国社会科学, 1997(6): 52-61.
- [11] 孙成武.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29.
- [12] 李元旭. 中华文化立场论的多维度探析[J]. 广东社会科学, 2020(4): 73-81.
- [13] 汤恒. 文化自信的来源及价值[J]. 红旗文稿, 2017(18): 4-9.
- [14] 蓝晓霞.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动力探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4): 79-82.
- [15] 邹广文. 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所形成的规律性认识[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1-6.
- [16] 刘旺旺.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文化思想变迁论析: 基于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分析[J]. 党政研究, 2020(4): 45-52.

(责任编辑: 朱忠良)

O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O Jiayua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6,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law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onducive to coping with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n recent year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extensive researches and discussion have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laws of socialist 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between synchronicity and diachrony, and between economic advancement and cultural progress. It is concluded that w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ss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reach the goal of build China into a country with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and adhere to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addition, its significance and value are also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cial practice and time dimension. The law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reflected i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party spirit and national character, material and spirit,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which require further study in depth, systematicness and innovativeness.

Key words: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law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status

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内涵、价值与路径

赵志勋

(平顶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36)

摘 要:党的二十大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需要不断探索其实现路径。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是一种哲学上的自我扬弃,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发展的,是一种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的革命精神和实践行为。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内生动力,为推进社会革命提供了伟大引领。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的路径主要有:以深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为载体,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治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为推进自我革命提供根本保障。

关 键 词:内涵;价值;路径;自我革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27-06

自“觉醒年代”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始终贯穿党的历史。书写“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密码在于党始终推进自我革命,从而能够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从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伟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两个大局”的各种风险挑战,党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进行自我革命,重拳反腐,“打虎”“拍蝇”“扫黑”“除恶”,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书写世界发展史上的人间奇迹。随着时代变迁、环境变化,习近平从“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的辩证统一出发,鲜明提出“两个革命”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实践,有效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基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1],党的二十大进一步阐明并强调了党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不仅是党理论创新、理论自觉的鲜明体现,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而且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探索其实现路径。

一、新时代党推动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

依据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革命主要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是狭义革命,狭义革命是指社会形态的根本性改变,武装夺取政权是其主要形式;第二层是广义革命,泛指一切主动变革世界的重大集体性行为,是涵盖人类社会诸领域的社会革命;第三层是指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自我革新,党的自我革命主要属于这种革命。因此,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革命是一个正向、积极的概念,一般指的是政治的、社会的剧烈而彻底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借用革命意涵,在自我建设中形成具有独特内涵的自我革命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涵意蕴得到进一步充实和提高,党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鲜明的品格,是激发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本真状态的内在动力,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支撑和动力支持,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具有深刻内涵,党推进自我革命是哲学上的自我扬弃,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发展的。

收稿日期:2022-12-21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3-ZZJH-243);平顶山学院思想政治研究项目(PXY-SZYJ-202106)

作者简介:赵志勋(1971—),男,河南省洛阳市人,法学博士,平顶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党的自我革命是哲学上的自我扬弃

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2]唯物辩证法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哲学根据。第一,唯物辩证法是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方式,客观事物内在包含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因素逐渐丧失,否定因素逐渐增加,事物最终走向灭亡,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于是,世界不断变化、事物永恒发展。因此,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以永葆生机活力。第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一种革命性的运动。事物内部矛盾的运动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是事物对自身的否定,是一种自我扬弃。辩证否定性内在决定了“两个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辩证否定造就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批判精神,革命批判精神不仅对社会革命有效,对于自我革命同样有效。第三,人类解放事业作为一个辩证否定和革命扬弃的过程,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价值目标和基本模式。人类解放事业要求革命者只有进行自我革命,才能实现彻底的社会革命,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就需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3]。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辩证否定过程,党的自我革命是一种辩证否定,是内部发起的自我扬弃。党的自我革命通过“否定——肯定——否定”三个阶段达到一个新阶段,需要积极清除不正确思潮的影响、铲除影响肌体健康的不良倾向,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思想、组织、作风和肌体上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勇于承认错误,在自我扬弃中不断前进。

(二)党的自我革命是一种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的自我革命精神

党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精神状态和政治勇气。习近平多次把党的自我革命解读为一种自我革命精神,党的自我革命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和长期执政语境中,主动进行自我审视、主动解决自身问题的自我革命精神。“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4]⁵³¹

党的自我革命作为一种永不懈怠的自我革命精神,是一种主动进行自我革新的政治勇气。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意味着党勇于进行自我变革,意味着“革”自己的“命”,体现刀刃向内的大无畏精神。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看,自我净化就是通过过滤杂质、排除毒素,保证党的肌体健康;自我完善就是坚定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自我革新就是直面各种问题和矛盾,彻底消除损害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因素;自我提高是指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理论学习,以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第二,从党的形象上看,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理论品质和实践本性,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政党形象,同时也是具有伟大斗争精神的执政党形象。第三,从政治角度看,党的自我革命是要保持警惕性、增强主动性、探寻规律性。保持警惕性是说作为一个百年大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容易自我松懈和自我膨胀,导致党的革命性特征被侵蚀,需要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纠错;增强主动性强调党亟须通过主动作为打破利益藩篱、革除体制之弊、消除腐败毒瘤;探寻规律性是说党在自我革命进程中不断探寻自我净化的规律,习近平多次谈到著名的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对”问题,意在强调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路径所在。

(三)党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发展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挥先进意识形态的政治引领功能、思想引领功能和文化引领功能。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始终掌握社会发展基本趋势的先进政党理论。党的自我革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上不断反思和纠偏,从而实现从不成熟不完善到逐步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作为一种先进政党理念,党的自我革命蕴含丰富内涵:在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党的自我革命深刻反映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在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中党的自我革命是指以“自我革命”的革命性和实践性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永葆党的组织、党的肌体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党的自我革命要求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引领伟大社会变革,并在社会变革实践中促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5]。

党的自我革命具有故鼎新、守正创新的科学内涵:第一层是守正,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政治方向和实践方向,继承党的优良革命传统;第二层是革故,要破字当头、先破后立,不断反思发现并修正错误,针对党内出现的自身功能失调、政治生态污染等问题,通过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的自我革命精神进行整治;第三层是鼎新,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要求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实现更高层次的自我革命。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中,自我革命在党的建设布局中地位不断呈现出上升性的演进态势^[6]。党的自我革命能够有效激活革命精神元素,通过思想上不断反思和纠偏,实现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良性互动,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

二、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作为拥有党员人数最多的世界第一大党,肩负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一)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

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体现追求科学性和追求人类解放的人民性的内在统一,对此党必须不断进行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实事求是的科学性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面对矛盾和解决矛盾时,必须进行自我革命并推进社会革命以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追求人类解放的人民性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人民推翻社会旧制度的过程中必须进行自我革命,以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政治勇气进行自我建设,进而才能领导人民清除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精神品格、最大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

能力。“以问题为导向修正错误,是党自我革命精神的首要体现,是从严管党治党自觉性的充分彰显,也是党足够自信的标志。”^[7]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以解决各种问题、推进各项事业,只有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不断与时俱进,才能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勇于提升自己和超越自己,才能在不断否定自己中进一步发展自己,从而永葆生机活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党的自我革命作为党百年奋斗的主要历史经验予以坚持,把党的自我革命上升到关乎政党兴衰存亡的高度,深刻揭示了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

(二)党的自我革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内生动力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大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服务于“锻造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伟大目标,是新时代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基本方针的全面落实。党的自我革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内生动力,党的自我革命侧重于从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性出发,引领党不断开辟实现自我超越和崇高使命的广阔前景。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内在相通性:党的自我革命主要是通过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解决自身问题,永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为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根本条件;全面从严治党内含锤炼自身、降解杂质、从严管党治党的根本要求,凸显自我要求之严格,凸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担当。全面从严治党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等方面贯彻落实党的建设各项举措,对于一个有着庞大组织体系和众多党员的大党来说,需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需要一种有内在驱动力的自我革命精神。

(三)党的自我革命为推进社会革命提供伟大引领

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离不开领导核心集体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引领社会革命向前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在引

领社会革命过程中大力倡导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基于新的历史方位,从国家长治久安和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2017 年 10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并列提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4]67}2018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4]71}。为顺利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这是党的自我革命必要性之所在。党和人民事业的新发展向党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党在时代变革中适应新的要求,领导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前进道路上,社会革命必然会出现更多挑战,必然向党提出更高要求,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党以自我革命精神建设好自身,从容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自我革命作为党的独特优势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必要条件,提供了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进行自我革命,而且能够在自我革命引领下不断推进社会革命。

三、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现实路径

党的自我革命既有理论性也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决定认识,因此实践性更为重要更为关键。从实践层面看,党推进自我革命就是在辩证否定中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适应时代要求、人民意愿,不断完成党的历史使命。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现实路径主要有:以深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为载体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加强思想建设、加强组织建设、加强政治建设、优化干部队伍,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通过制度体系建设,为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

(一) 深入开展集中教育活动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形

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了一系列党内集中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内集中教育突出政治性、思想性、常态化,从思想、政治、组织、纪律、作风、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自我学习、自我革命。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建立常态化机制。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以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为切入点,以密切联系群众为目标,出出汗、红红脸、排排毒,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重点解决县处级以上“关键少数”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突出“严”的精神和“实”的作风,树立廉政、务实、为民的执政理念。“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聚焦问题,实现解决自身问题的常态化和制度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党史学习教育要求增强历史主动性,永葆艰苦奋斗的历史主体意识。党的二十大后,党中央决定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进一步增强全党开展自我革命的历史自觉性和历史主动性。

(二) 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努力、全面推进,需要不断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优化干部队伍,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第一,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是人心工程、灵魂工程、信仰工程,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思想建设主要解决共产党员的思想和作风问题,是党自我革命的有效途径。加强思想政治建设,需要彻底解决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理想淡薄、生活腐化、作风浮躁等问题,牢固树立宗旨意识。一是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

治信仰本色,要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捍卫“两个确立”,自觉在思想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和时代性,要赋予政治信仰以新的时代内涵。三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信仰建设,直面“四个考验”,对时代之问做出被人民公认、被历史检验的真实回答。四是增强政治信仰的现实性和有效性,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面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思想政治素养。

第二,增强自我完善能力。党的自我革命是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自我完善能力的过程。广大党员干部不断自我完善,党的组织也相应得到了自我完善。加强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可以为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净化政治生态,健全并严格执行“三会一课”等各项组织制度,着力解决部分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夯实党的组织力和领导力。

第三,增强自我革新能力。严格遵守党章和相关规章制度,改革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不断随时代发展而革新党内体制、制度和机制,形成科学有效、完备成熟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自我革命需要从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领导等方面加强建设,实现党的自我革新,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与活力。

第四,增强自我提高能力。广大党员干部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决定性因素,实现新时代党自我革命的关键环节是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不断推进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领导干部管理制度建设、领导干部淘汰制度建设和领导干部作风制度建设。党的自我革命要通过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优化党的队伍结构,增强党的执政本领,实现党的自我提高^[8]。对此,要适应新时代要求,提高党员干部思想素养、优化党员干部知识结构、拓宽党员干部政治视野、增

强党员干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斗争本领;要重视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年龄结构;要在基层一线、在重大困难考验中甄别干部、提拔干部,大力提拔任用年轻有为、作风优良的好干部,增强各级党组织的自我提高能力。

(三)推进制度体系建设,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既要有自我觉悟、自我约束的内生压力,又要有制度约束的外部规范,要构建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对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进行了顶层设计,为推进自我革命制度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共产党“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9],有力推进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落地生根。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10]

四、结语

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常态化推进、可持续发展,要用“平常之法”吸纳“非常之法”,要经得住“阵痛”、忍得住“剧痛”,要注重集中治理与常态治理相结合、组织推动与个人主动相结合,尽可能减少祛病疗伤剧痛之成本和代价。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人民立场,胸怀崇高理想信念,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党的坚强领导,需要党以永远在路上的“赶考”精神持续深入推进自我革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41.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4.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5.

[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5] 王伟光. 勇于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

显著标志[J]. 求是,2022(1):42-48.

[6] 任晓伟,杨非非. “自我革命”概念的理论生成及其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整体布局中地位的演进[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5):39-45.

[7] 赵秀华. 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2):45-53.

[8] 张乾元,冯红伟.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三重逻辑[J]. 求实,2019(5):4-15,109.

[9]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7.

[1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5-66.

(责任编辑:朱忠良)

The Connotation, Value, and Path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in the New Era

ZHAO Zhixun

(School of Marxism, Pingdingshan University, Pingdingshan, Henan 467036, China)

Abstract: A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is emphasized as the second answer to jump out of historical cycle. It has profound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and value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quiring further research on its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self-revolution is a kind of self sublation;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self-revolution is the advanced ideology of the CPC in the new era. Self-revolution represents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practical behavior to carry out the thorough and self-targeted rectification. The Party's self revolution is the genetic code for the CPC to remain vigorous for a hundred years, th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Party to maintain vitality,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overall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and the great guid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revolution. The basic path to promote self-r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are to take concentrated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the Party as a carrier,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build all-round and systematic organizations, create an advanced political system to realize self-purification, self-improvement and self-innovation and provid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self-revolution.

Key words: connotation; value; path; self-revolution

《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补考十六则

——以作家生卒年为中心

朱曙辉

(宿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是迄今为止收录清代作家、作品最为齐备的两部清代文学文献目录专著,然而书中对王陶、晏善澄、徐澍、何琳、许鲤跃、罗秉政、苏廷煜、孙煦、陈从潮、吴昭融、姚颐、瞿绍坚、黄模、周鹤立、胡枚、俞国鉴等16位作家的生卒年记载存在阙漏,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证。

关 键 词:《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作家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33-05

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1](下文简称“《总目》”)和柯愈春主编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2](下文简称“《提要》”)两书均著录清代别集4万余种,随书附录版本信息及作家生平,是迄今为止收录清代作家、作品最为齐备的两部清代文学文献目录专著,也是清代文史研究必备的重要工具书,嘉惠学林,功莫大焉。然而由于清代文学体量之庞大远超前代,而且前期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导致这两部学术巨著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有待后来者不断递修增补之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作家生平信息的考证。众所周知,作家研究是作品研究的基础,作家的生平行迹是对作品主题思想解读、艺术成因探析的研究根基,而作家的生卒年更是研究作家生平行迹的一个关键性的时间坐标。《提要》与《总目》两书中作家生卒年信息目前尚有较多空缺之处,笔者仅就近年在研究中发现的16位作家的生卒年问题加以考证,以期有助于这两部重要的文史研究工具书进一步趋于完善,也为推进清代作家研究的深入添砖加瓦。

一、生卒年补考

(一)王陶

王陶,字孟公,号黄雪居士,江苏华亭人,有《王孟公诗稿》传世。《提要》832页与《总目》66页

均收录王陶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王陶著《王孟公诗稿》卷首王陶自序云:“今年五十有九矣。”^{[3]435-436}此文落款时间为嘉庆二年(1797)。本年王陶“五十有九”,逆推其生年应为乾隆四年(1739)。《王孟公诗稿》卷首附姚培咏《王孟公先生传》记云:“嘉庆癸亥中秋,(王陶)将蜡屐矣。未几,患痢,阅三月,疾大渐。谓其弟子祁曰:‘……’语毕而逝,得年六十有五。”^{[3]436-437}嘉庆癸亥为嘉庆八年(1803),王陶卒于此年。卒年65岁,亦可逆推其生年为乾隆四年(1739),与前文考证相符。由此可知,王陶生卒年为1739—1803。

(二)晏善澄

晏善澄,字准五,号薇东、述园,江西上高人,有《述园遗稿》传世。《提要》861页与《总目》1803页均收录晏善澄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晏善澄所著《述园遗稿》书后附录其曾孙晏履中所作《显考薇东府君行状》,文中记云:“先府君姓晏氏,讳□□,字准吾,一字秋渠,号薇东……府君生于乾隆五年庚申十一月初三日戌时,卒于嘉庆十七年壬申七月二十五日亥时,享年七十有三。”^{[4]475-478}据此可知晏善澄生于乾隆五年(1740),卒于嘉庆十七年(1812)。另,晏善澄《述园遗稿》卷三《己巳暮春有感》诗中有句云:“不觉

收稿日期:2023-01-10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20D149);安徽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gxgj2021007);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研修项目(gxgnfx2022076)

作者简介:朱曙辉(1983—),男,河南省洛阳市人,文学博士,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浮生七十春。”^{[4]446}“己巳”为嘉庆十四年(1809),本年晏善澄 70 岁,逆推其生年亦应为乾隆五年(1740),与前文推断相符。由此可知晏善澄生卒年为 1740—1812。

(三)徐澍

徐澍,字瀛洲,号溪南老农,浙江嘉兴人,有《溪南老农诗钞》传世。《提要》813 页与《总目》1863 页均收录徐澍著作,未记其生卒年。《清代人物生卒年表》^[5](下文简称《生卒年表》)642 页记载徐澍生卒年为“乾二二——道一一(1757—1831)”。

今案:张廷济《竹里耆旧诗》组诗中有《徐瀛洲》一首,诗题下自注云:“名澍,号溪南老农,年七十五。”诗后附录张廷济所撰徐澍《墓志》云:“君讳澍,字瀛洲,姓徐氏。国学生,嘉兴县里仁乡新行里人……生于乾隆廿二年丁丑十二月廿五日……卒于道光十一年辛卯十一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五。”^[6]据此可知,《生卒年表》中记载的“乾二二——道一一”无误。然而查《二十史朔闰表》可知,农历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二月二十五日已经是公元 1758 年 2 月 2 日^[7],所以徐澍生卒年应为 1758—1831。

二、生年补考

(一)何琳

何琳,字友珉,号韵仙,浙江宁波人,有《雪石居诗稿》《官梅阁诗稿》传世。《提要》1498 页与《总目》930 页均收录何琳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徐时栋《烟屿楼诗集》卷六有《咸丰癸丑,余年四十。明年正月朔,忽从子舟得韵仙除夜见贻诗,灯下走笔奉酬,抚时感慨,情见乎词》诗,中云:“始觉初论交,倏经年十四。君已五十一,我亦四十岁。”^{[8]134}本诗后附录何琳作《癸丑十一月二十五日徐十三柳泉四十生日,后十余日大会亲朋,立兄子为后,诗以话旧,并志其事,凡六十韵》,其中也提道:“忆昔岁庚子,与君交始结。我年卅有八,君年二十七。”^{[8]135}“庚子”为道光二十年(1840),是年何琳 38 岁,据此则其生年为嘉庆八年(1803)。据上引徐时栋与何琳两人诗可知,何琳比徐时栋年长 11 岁。据陈励《皇清内阁中书柳泉徐君墓志铭》,徐时栋“卒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

八日,年六十”^{[8]528}。同治十二年(1873)徐时栋 60,由此可知其生年为嘉庆十九年(1814)。何琳较之年长 11 岁,则何氏生年为嘉庆八年(1803),这也与前文中的推断相符。其卒年待考。

(二)许鲤跃

许鲤跃,字春池,安徽桐城人,有《春池文钞》传世。《提要》1011 页与《总目》614 页均收录许鲤跃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许鲤跃《春池文钞》卷十《先室杨孺人权厝志》文中提道:“孺人与余生同年……孺人生于戊辰年三月初八日亥时。”^{[9]840-841}“戊辰”为乾隆十三年(1748),据此则许鲤跃生年为乾隆十三年(1748)。《春池文钞》卷十有《殷石琴先生六十寿序》,文中标明写作时间为“嘉庆十年十一月之十有一日”,文中提及:“后二岁,余亦行年六十矣。”^{[9]790}嘉庆十年为 1805 年,此年许鲤跃 58 岁,由此逆推,亦可证其生年为乾隆十三年(1748)。其卒年待考。

(三)罗秉政

罗秉政,字春卿,江苏清河人,有《三壶山吏诗钞》传世。《提要》1013 页收录罗秉政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罗秉政《三壶山吏诗钞》书后附录有其友人潘庭筠所作跋文,文中记云:“癸亥岁,余讲学于淮,访其小三山房。适春卿归自楚,年二十八,以余一日之长,执弟子礼焉。”^[10]“春卿”为罗秉政之字,“癸亥”为嘉庆八年(1803),此年罗秉政 28 岁,则其生年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其卒年待考。

(四)苏廷煜

苏廷煜,号虚谷,安徽蒙城人,著有《鸿居诗集》。《提要》940 页收录苏廷煜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周鹤立《匏叶庵诗存》卷八有《甲戌七月二十有四日,予以忧去蒙。诸同官暨绅士饯予于北郊外,深情款款,予方呜咽不能言,怆然而别,榜人既发,即景言怀,得诗四章,寄苏虚谷教授、赵地山孝廉崇谦、张瀛士明经登鳌与邦人之赠行者,自题于秋水放舟图后》诗四首,其三有句云:“鸿杖从容汉三老。”句后自注云:“苏虚谷教授解组还乡,八十有六……先后来送,扶杖潸然。”^[11]“虚谷”为苏廷煜之号,苏为蒙城人,而周鹤立正是从蒙城去职,

可知其诗题中的“苏虚谷教授”正是苏廷煜。“甲戌”为嘉庆十九年(1814),本年苏廷煜“八十有六”,逆推其生年为雍正七年(1729)。其卒年待考。

(五) 孙煦

孙煦,字育万,号石楼,湖北汉阳人,有《石楼诗钞》传世。《提要》1175页与《总目》630页均收录孙煦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孙煦号石楼,汉阳人。范锴晚年寓居汉阳,与孙煦交往颇密。范锴《苕溪渔隐诗稿》卷六有《八月廿二日,孙石楼七十初度,赋诗自述,二律皆用杜句冠首,同人咸和祝之》诗^[12],本诗编年为“己亥”,即道光十九年(1839),此年孙煦70岁,逆推其生年为乾隆三十五年(1770)。其卒年待考。

(六) 陈从潮

陈从潮,字瀛士,号韩川,福建福安人,有《韩川文集》传世。《提要》966页与《总目》1264页均收录陈从潮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陈从潮《韩川文集》卷七有《与朱梅崖先生书》,文中云:“今年三十有七矣。”文后自注:“此书作于乾隆乙未岁。”^{[13]595}乾隆乙未为乾隆四十年(1775),本年陈从潮“三十有七”,则逆推其生年为乾隆四年(1739)。《韩川文集》卷八有《先妣附圻志》,文中记载其母“其生以康熙甲午年四月二十六日酉时……年二十六而生从潮”^{[13]604}。康熙甲午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陈从潮之母生于此年,“年二十六”正是乾隆四年(1739),亦可佐证前文的推断。由此可知陈从潮生年为乾隆四年(1739)。其卒年待考。

(七) 吴昭融

吴昭融,字朗叔,浙江归安人,有《璧堂诗集》传世。《提要》765页与《总目》902页均收录吴昭融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吴昭融《璧堂诗集》卷四有《丙午七月五十初度》诗^{[14]693},“丙午”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本年吴昭融50岁,逆推其生年为乾隆二年(1737)。吴昭融《璧堂诗集》卷八有《丁卯除夕枕上口占》六首,其四云:“七旬有二明朝是。”^{[14]720}“丁卯”为嘉庆十二年(1807),诗中所谓的“明朝”自然指本年除夕过后的嘉庆十三年(1808),彼时吴昭融72岁,则逆推其生年亦可知为乾隆二年

(1737),与前文所推相符。由此可知吴昭融生年为乾隆二年(1737)。其卒年待考。

(八) 姚颐

姚颐,字震初,号雪门,江西泰和人,有《雨春轩诗草》传世。《提要》779页、《总目》1692页与《生卒年表》591页均记姚颐卒年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生年空缺。

今案:姚颐《雨春轩诗草》卷五有《送少宗伯程海苍师归养四首》,其四有句云:“公登黄甲我生年。”句后自注:“公己未登第,颐以是岁生。”^[15]“程海苍”为清代铅山人程岩(号海苍),“己未”为乾隆四年(1739),由此可知姚颐生年为乾隆四年(1739)。

三、卒年补考

(一) 瞿绍坚

瞿绍坚,字梦香,江苏常熟人,有《吹月填词馆剩稿》传世。《提要》1111页与《总目》2460页均收录瞿绍坚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清代吴县曹楸坚为瞿绍坚友人,曹氏《昙云阁诗集》中有多首与瞿绍坚往还的相关诗作。查《昙云阁诗集》卷二有《哭瞿三梦香绍坚十一首》,最后一首诗后自注云:“送君殁后即有钱唐之行。”^{[16]432}据此则只要查明曹楸坚离开常熟赶赴杭州的时间即可确定瞿绍坚的去世时间。今查《昙云阁诗集》卷二有《醉司命辞在常熟瞿三梦香家作》,诗句云:“岁惟戊辰月嘉平,细腰腊鼓村村鸣……神归好语太瘦生(自注:梦香自号),勿学曹生狂态天所惩。”^{[16]428}“戊辰”为嘉庆十三年(1808),“嘉平月”为腊月之别称,可见本年腊月曹楸坚在常熟瞿绍坚家与其诗酒唱酬。同卷中本诗之后编排有《亡妇百日》诗,题下自注云:“己巳正月初三日,余在常熟。”^{[16]429}“己巳”为嘉庆十四年(1809),由此可知次年正月初曹楸坚尚在常熟。《亡妇百日》诗后间隔一首为《雨中游西湖即事放歌》诗,诗云:“我到钱塘之二日,欣然放棹金牛湖。轻阴弄春曳丝雨,两峰秀色青模糊。”^{[16]430}可知嘉庆十四年(1809)春曹楸坚已至杭州。《雨中游西湖即事放歌》诗后一首为《慧云寺看残梅》诗,诗中有句云:“吾山绝顶探香雪,天井十里红霞妍。”句后自注云:“正月同梦香、若溪观梅,邓尉、天井红

梅最盛。”^{[16]430}邓尉、天井均在苏州城南,为观梅胜地。由此可知,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曹楫坚还曾同瞿绍坚一道在苏州观赏梅花,之后才离苏赴杭。综合上列几首诗歌所提供的信息,曹楫坚在这一时段的行迹已颇为清晰:嘉庆十三年(1808)腊月,在常熟瞿绍坚家与其诗酒相会,嘉庆十四年(1809)年初尚在常熟,正月同瞿绍坚一道在苏州观赏梅花,本年春赶赴杭州。结合前文中曹楫坚所提到“送君(瞿绍坚)殁后即有钱唐之行”,可知瞿绍坚卒于嘉庆十四年(1809)春。另外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十九有《哭瞿梦香》诗^[17],编年为“屠维大荒落”,也即“己巳”,也可从另一侧面佐证瞿绍坚卒年为嘉庆十四年(1809)。其生年待考。

(二) 黄模

黄模,字相圃,号书崖,浙江钱塘人,有《寿华堂诗集》传世。《提要》895页与《总目》1999页均收录黄模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张云璈《简松草堂文集》卷五《寿华堂诗序》云:“戊寅冬,书崖黄先生捐馆之逾月,予适引疾自湘南归里。嗣君俊人梓遗诗方竟,因以示予,并属以弁简之言。”^[18]“戊寅”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书崖”为黄模之号,《寿华堂诗》为黄模之诗集。张云璈为黄模门生,且受其家人嘱托为其诗集作序,他的记载理应可信。黄模之子黄土珣所作的《北隅掌录》卷下“秋江采鱼图题跋”中亦记载道:“嘉庆季年,先君子见背。”^[19]这里的“嘉庆季年”与张云璈所记的嘉庆二十三年(1818)相符,故可确定黄模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其生年待考。

(三) 周鹤立

周鹤立,字仲和,号石甫,江苏吴江人,有《匏叶庵诗存》传世。《提要》1002页收录周鹤立著作,未记其生卒年。《总目》1480页与《生卒年表》518页均记载周鹤立生年为乾隆三十年(1765),卒年空缺。

今案:陈文述为周鹤立旧交,《颐道堂集》卷二十五有《汉阳题周石甫匏叶龕》《孤山梅花石刻歌为周石甫作》等诗。陈文述《颐道堂集》卷二十九中有《将至汉皋连夕家人置酒相饯赋此留别》《汉口水灾纪事》《武昌夜雨赠刘默园观察》等诗,本卷诗编年为“辛卯”,即道光十一年(1831),由此可知本年陈文述身在汉口,而周鹤立晚年正居于汉阳。同卷中有《古迹诗二首和石甫》^{[20]342},可知本年陈

文述曾在汉阳与周鹤立诗歌唱和。《颐道堂集》卷二十九另有《挽周石甫大令即题匏叶庵诗集》诗^{[20]348},由此推断周鹤立卒于本年。由此可知周鹤立卒年为道光十一年(1831)。

(四) 胡枚

胡枚,字梁园,浙江石门人,有《石友山房诗集》传世。《提要》983页与《总目》1569页均收录胡枚著作,未记其生卒年。

今案:梁章钜《枢垣记略》卷十八记载:“胡枚,字梁园,浙江石门人。乾隆乙卯进士,嘉庆四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户部郎中。”^[21]姚文田《邃雅堂文集续编》有《胡梁园诗序》一文,开篇云:“老友胡梁园农部以嘉庆丙子冬没于京师。”^[22]胡枚官至户部郎中,与姚文中的“农部”称号相应。“嘉庆丙子”为嘉庆二十一年(1816),据此可知胡枚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冬。其生年待考。

(五) 俞国鉴

俞国鉴,字玉衡,号澄夫,江苏泰州人,有《樵月山房诗文集》传世。《提要》1143页与《总目》1644页均记载俞国鉴年五十二卒,未记其生年。

今案:曹楫坚《昙云阁诗集》卷三有《哭俞三广文国鉴五首》,其二中自注曰:“去岁四月,澹怀之金陵,五月余北上,八月于廷奉讳奔山左。”^{[16]453}“于廷”为宋翔凤之字。宋翔凤《朴学斋文录》卷四《先府君行述》中记述其父“没于道光元年八月七日”^[23],与曹楫坚诗中“八月于廷奉讳奔山左”的说法一致。由此可知,曹楫坚《哭俞三广文国鉴五首》自注中所用的“去岁”一词指的是道光元年(1821),本诗应写于道光二年(1822)。曹楫坚《哭俞三广文国鉴五首》其三云:“见我涕泗垂,沈疴料难遣。别君至维扬,旦暮可相见。谁知五日中,与君不复面。”句后自注曰:“予因君事以三月晦日赴扬,迨初五日归,而君即于是日寅刻损馆。”可知曹楫坚挽诗写于俞国鉴去世的当年,所以推定俞国鉴卒于道光二年(1822)四月初五。此诗中还自注道:“令兄可楼于二月二日辰刻过予剧谈,病发而归,即以是日殁。”今查曹楫坚《昙云阁诗集》卷四有《哭宫春岩锡龄》诗,其中有句云“前年哭俞三,兄兄弟其次”,句后自注道:“可楼之逝,先澄夫两月。”^{[16]461}“澄夫”即俞国鉴之字。而《昙云阁诗集》卷四《甲申十月将自泰州归里录别八首》之三

中提到“春岩新逝”^{[16]462},可知《哭宫春岩锡龄》诗正写于“甲申”,即道光四年(1824),而其中提到的“前年”,也与前文据俞国鉴《哭俞三广文国鉴五首》中推测出的俞国鉴卒于道光二年(1822)相吻合,故此可以断定俞国鉴确实卒于道光二年(1822)。其生年待考。

参考文献:

- [1]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 [2]李灵年,杨忠.清人别集总目[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 [3]王陶.王孟公诗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4]晏善澄.述园遗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5]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6]张廷济.桂馨堂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61.
- [7]陈垣.二十史朔闰表[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197.
- [8]徐时栋.烟屿楼诗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54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9]许鲤跃.春池文钞[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0]罗秉政.三壶山吏诗钞[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0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44.

- [11]周鹤立.匏叶庵诗存[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45.
- [12]范锴.苕溪渔隐诗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63.
- [13]陈从潮.韩川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4]吴昭融.璧堂诗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5]姚颐.雨春轩诗草[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78-379.
- [16]曹楫坚.昙云阁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5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7]孙原湘.天真阁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4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2.
- [18]张云璈.简松草堂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4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70.
- [19]黄士珣.北隅掌录[M].光绪九年丁氏嘉惠堂刊本.
- [20]陈文述.颐道堂诗选[M]//续修四库全书:第150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1]梁章钜.枢垣记略[M]//续修四库全书:第7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5.
- [22]姚文田.邃雅堂文集续编[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73.
- [23]宋翔凤.朴学斋文录[M]//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98-402.

(责任编辑:雷鸣)

Sixteen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s in *General Catalogue of Collected Works of Individual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Collections of Poems and Proses in the Qing Dynasty*:

Centered on the Year of Birth and Death of the Writers

ZHU Shu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uzhou College, Suzhou, Anhui 234000, China)

Abstract: *General catalogue of collected works of individual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collections of poems and proses in the Qing dynasty* are by far the most complete bibliographic monographs on literature in terms of writers and works in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re are some errors and omissions about the year of birth and death of the writers in these two books. These writers include Wang Tao, Yan Shancheng, Xu Shu, He Lin, Xu Liyue, Luo Bingzheng, Su Tingyu, Sun Xu, Chen Congchao, Wu Zhaorong, Yao Yi, Yu Guojian, Qu Shaojian, Huang Mo, Zhou Heli, Hu Mei. Thus, this paper makes some researches on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 *General catalogue of collected works of individuals in the Qing dynasty*; *collections of poems and pros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writers

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俗语词考释六则

杨小平, 蒋玲玲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摘 要:以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为材料,选取档案中意思费解的“奔叩”“车煎”“串底”“地脉”“嚼”“引张”六则俗语词,根据语境及相关文献,对上述六则俗语词进行考释,分析造词理据,以冀消除南部县衙门档案阅读障碍,并对《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等大型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有所裨益,补充未收录词条及义项。

关 键 词: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俗语词;考释

中图分类号:H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38-07

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以下简称《南部档案》)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宣统三年(1911),时间跨度256年,涉及政治、军事、司法、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按照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盐房、承发房八房分列。《南部档案》是南部县和其他各县衙门共同形成的活动记录,主要文体形式有朝廷诏旨(抄件)、上级官府札令、同级官署咨函、本县衙署官文、民间状结契约等,不仅对历史学、法学、档案学有重要意义,对文献学、语言学、文字学等学科领域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南部档案》现保存于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档案数量众多,有18186卷,计84010件,其中俗语词数量巨大。《南部档案》中出现的“奔叩”“车煎”“串底”“地脉”“嚼”“引张”六则俗语词意思费解,易造成阅读障碍。现对上述六则俗语词进行考释,以冀对《南部档案》的解读、研究以及对大型辞书的编纂修订有所帮助,补充未收录词条及义项。所引《南部档案》标明题名并括注目录、卷次、件次,以便核考。

一、奔叩

(1)《为具禀张华仕等贿通盐吏把持隘口不许民盐贩卖事》:“蚁等禀明前任于主,移催四次,不至南厂买盐,蚁等奔叩大宪奉批札行南部,移催各州县飭商赴厂配盐,先行具覆,商等藐批违抗,蚁等

于道光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禀明。”(《南部档案》4-374-1,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2)《为具禀张华仕等私乱盐法不赴厂配盐事》:“因奸商不赴厂配盐,道光四年十月二十日,蚁灶民等奔叩大宪札行南部,移催各州县飭商赴厂配盐,先行具覆,道光五年蒙大宪将案据报奏部。”(《南部档案》4-374-2,道光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3)《为再禀张华仕等私乱盐法贿通盐吏事》:“因商等违例不遵,道光四年十月二十日,蚁灶民等奔叩大宪札行南部,移催各州县飭商赴厂配盐,先行具覆。”(《南部档案》4-374-3,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4)《为具告张绍朴等欺藐不遵私乱盐法事》:“谁知伊等逞刁,目无王章、欺藐不遵,于四年,蚁等奔叩制宪札行南部县,移催各州县,飭商赴厂配盐,先行具文覆。”(《南部档案》4-376-1,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按:“奔叩”一词令人费解,《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均未收录。

《说文·夭部》:“奔,走也。”^{[1]21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夭部》:“奔,走也。走者,趋也。”^[2]古人对走路的动作区分得很细,地点不同则行路动作不同。《尔雅·释宫》:“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之行,堂下谓之之步,门外谓之之趋,中庭谓之之走,大路谓之

收稿日期:2022-08-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YY176);西华师范大学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中心项目(DAWXC2205);西华师范大学区域文化研究中心项目(QYYJC2218)

作者简介:杨小平(1972—),男,四川省南充市人,文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俗语言、训诂、敦煌文献研究;蒋玲玲(1998—),女,四川省广安市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俗字俗语、写本研究。

奔。”^[3]“奔”,《汉语大词典》共收录七义,第一义为“急走,跑”^{[4]3260}。《辞源》(第三版):“奔,急走。”^{[5]983}进而引申为“急切、迫切”。

《正字通·口部》:“叩,苦候切,音寇,问也。又稽顙曰叩首。”^[6]《辞源》(第三版):“古时行礼俯首到地叫叩头,简称叩。”^{[5]649}《汉语大词典》中,“叩”有“叩头”之义,由此引申为“请求、乞求”。“奔叩”似为“迫切求助”。在《汉语大词典》中检索有关“叩”的词条时发现,有一词条为“叩阍”,即“吏民因冤屈等直接向朝廷申诉”^{[4]3480}。“阍”即“守门人”,代指朝廷官员。

例(1)中,“蚁”即“小民”,百姓在官吏面前的卑称。“蚁”作主语,“奔叩”为谓语,后跟宾语“大宪”。“宪”,官名,清时指朝廷委驻各行省的高级官吏。清代称巡抚、藩司、臬司为三大宪。三大宪的职责分别是:巡抚主管一省军政、民政、吏治、刑狱、关税、漕政等;藩司主管一省民政与财务;臬司主管一省司法。结合辞书及文献语境,“奔叩”应为“平民急切乞求官方做主”。

例(2)、例(3)中,“灶民”指以煮盐为业的人。“蚁”与“灶民”连用,同位短语作主语,表明自己的职业。灶民请求大宪做主,让南部县饬令盐商赴厂配盐,行销盐斤。例(4)中,“逞刁”即“耍无赖”,因张绍朴等人无赖放刁、目无法纪,特乞求大宪做主,使其赴厂配盐。

“奔叩”在清代及以后文献中也有用例,多与官名搭配使用。

(5)(清)常明修、杨芳灿纂《四川通志》:“值采太使者横恣,时行冒死力争,为所中伤。羁泸五年,泸老稚奔叩关下,事得白。”^[7]

(6)李峰《苏州通史》:“二十八年春,康熙帝南巡至苏州,杨宾偕弟杨宝泣血奔叩行在,愿身率妻子代父戍。上驻攀问之,以其罪名重,非祖制,不允。”^[8]

(7)龙泽江、傅安辉、陈洪波《九寨侗族保甲团练档案》:“虽有七旬严父,受惊卧榻难起,仅存继母吴氏不得抛头露面。负罪奔叩大人台前做主,电察情节。倘蒙笔下超生,德延宗桃,阴阳感戴无穷。”^[9]

(8)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第5辑·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蚁等壮愚无知,即奔叩臬、府两宪,蒙批回府。乞叩青天大老

爷台前做主,正其夫额,惩其役索,蚁顶公侯万代。”^[10]

例(5)中,泸州老少请求“关下”做主,“关下”即“守关的官吏”。例(6)中,“奔叩”也可与地点搭配使用。“行在”即“天子巡行所到之地”,此处代指天子。例(7)中,供状人因父亲卧病在床、母亲不能出面,遂主动伏法,特此恳求“大人”做主。例(8)中,“乞叩青天大老爷台前做主”可佐证“奔叩”即“平民急切乞求官方做主”。例(7)、例(8)均为现代人整理的明清档案,具体时间不详。

二、车煎

(1)《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募卖事》:“如果实有其事,伊叔兆麟何不控要盐井,兼之道光三年何中明将伊每年半载井期出卖董廷才故父董文道车煎,伊叔姪每年仍煎地脉一月无异。”(《南部档案》4-375-1,道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2)《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募卖事》:“蚁故父周仕明与何白祥故父何中明伙佃胡守礼胞叔胡兆麟地土,开凿盐井六眼,现已漏毙两眼,目下只得活井四眼车煎。”(《南部档案》4-375-1,道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3)《为具禀陈大川等毁坏厂廊私造假约事》:“蚁等应遵谕断,易敢禀复取戾,缘嘉庆二十一年,蚁国寿等故绝胞叔罗仕明以伊四百余串钱盐井,作钱二百串,出当与陈大川父陈良明车煎,凭中系蚁四胞叔罗仕安眼同仕明亲笔书立当约付据,约内注明限随井完。”(《南部档案》4-378-1 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按:“车煎”一词,意思令人费解。《汉语大词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均未收录。

例(1)中,今人整理撰写的档案题名中的“募”为讹写,由档案整理者混淆了部件“力”和部件“夕”所致。“募”有“招募、募集”之义,“募卖”一词与文献语境不符,“募”应作“募”。“募”也作“募”,二者皆为“寞”的异体字,有“寂静、无声响”之义,这里引申为“悄悄、偷偷”。“募卖”即“悄悄变卖”,在没有知会相关利益者的情况下变卖东西。例(1)何中明的盐井,每年有一半日期应归董文道“车煎”。例(2)中,“伙”即“打伙”,在西南官话中表示“合伙”。“伙佃”即“共同租佃”。周仕明与何中明伙佃胡兆麟之地,开凿盐井,进行“车

煎”。以上例证,“车煎”均为动词,且与盐相关。

《汉语大词典》:“车,泛指用轮轴旋转的工具。”^{[4]13703}《后汉书·宦者传·张让》:“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11]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12]《中华字海》:“车,用轮轴来转动的器械或机器。”^{[13]1353}“煎”,《汉语大词典》释义为“熬煮”。

根据清代盐业背景可知,早期盐井提取卤水方法与普通吃水井的提水并无不同,由于时代进步,冲击式凿井法广泛应用,人们发明了便于提取井下卤水的工具——汲卤筒,将卤水提出井底的动力就是天车。天车,为盐场中用于提捞法采卤的杉木捆扎井架的称呼。天车上下各安装定滑轮,通过汲卤绳连接,以牛力拉动提取卤水^[14]。“卤水”即“含盐量大的井水”。结合辞书释义及文献语境,“车”为“天车”,此处活用为状语,“车煎”即“用天车取卤水熬煮”。

《南部档案》中,“车煎”与“煎烧”用法十分相似。

(4)《为胡守礼具告陈文魁等霸煎募卖事》:“不料陈文魁将井眼卖与董洪道之子董廷才煎烧,小的才来案具告的。”(《南部档案》4-375-2,道光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5)《为陈大川具告罗国寿等糟辱凶殴陈大川母使之自缢事》:“嘉庆二十一年,小的外公罗秀之子罗仕明将盐井十眼当与小的故父陈良明煎烧,当价钱二百千,外有廊厂器具在内,现有当约,约内注明竹漏帮限,有罗仕明承认。”(《南部档案》4-378-3,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十日)

“煎烧”是制盐的一个重要环节,将卤水倒入锅中,大火熬煮,水分蒸发之后,从而得到盐晶。例(3)与例(5)出自《南部档案》同一卷不同件号的文献,皆关于罗仕明与陈良明的盐井纠纷。例(3)中,罗仕明将盐井出当与陈大川父陈良明“车煎”,当价二百串;例(5)中,罗秀之子罗仕明将盐井十眼当与陈大川父陈良明“煎烧”,当价钱二百千。以上材料,可以表明“车煎”与“煎烧”用法相同,词义近乎相同。

“煎烧”也见于明清其他文献中。

(6)(明)朱廷立《盐政志》:“盖因各处兴贩满道,煎烧蔽野,所谓私盐真而官盐杂,私价轻而官价重,利之所在,人必趋之。”^[15]

(7)(清)丁宝楨《四川盐法志》:“户部议略:

煎盐灶户按井煎烧,其井或在山中,或在平地,或在水边,大约各井相隔,非比居民稠密,可以编作保甲也。”^{[16]1023}

(8)(清)王定安《两淮盐法志》:“而煎烧盐斤,以一昼夜为火伏,灶户临煎,向本商领取旗号,火举则扬,火息则偃,垂为定例,又有往来巡查之人,用防熄火之后私煎。”^[17]

“车煎”一词,目前只在《南部档案》中发现,在其他明清文献中暂未发现使用。

三、串底

(1)《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大斗私盐店害民事》:“至蚁等背米一斗,亦勒入伊店搗量,每斗定打行米三合,卖将伊等钱文一百只有九十八文,每千又扣串底钱文。”(《南部档案》4-370-1,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2)《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大斗私盐店害民事》:“王政安等常至吴思荣店内卖米买盐,因市规每钱一千均用九八,又扣串底钱八文,向来买米照依市规,买盐独用足钱,以致王政安与吴思荣等口角控。”(《南部档案》4-370-1,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3)《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大斗私盐店害民事》:“经卑职讯明,断令嗣后无论买米买盐,凡用钱文,一概每千均用九八到底,不许再扣串底,亦不许卖盐独取足钱,取具各遵结在案。”(《南部档案》4-370-1,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4)《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大斗私盐店害民事》:“马洪仁不依,与吴思荣们争角,就告在县。蒙案下断令无再扣串底也,不许盐店独要足钱,取结究案。”(《南部档案》4-370-1,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按:“串底”一词,意思令人费解。《汉语大词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均未收录。

《汉语大词典》:“串,量词。旧时制钱一千文之称。”^{[4]623}《近代汉语词典》:“串,量词,制钱一千文。”^{[18]254}孔尚任《桃花扇传奇》二十出:“亏了一个赵吏目,纠合义民,捐钱三百串。”^{[19]138}清代的官制铜钱,每串钱有一千文整,皆用麻绳穿起,称为钱串。

《中华字海》收录“底”义为“根基,基础”^{[13]516}。《汉语大词典》:“底,底子;基础。”^{[4]4624}《辞源》(第三版):“底,最下的部分。”^{[5]1344}

例(1)中,“擣”在西南官方中为“量,测量物体的多少”。“擣”与“量”在此为同义连用,表示测量米的多少。买家以米换盐,一百文只得九十八文,少两文钱,于是控诉卖盐商家私扣“串底”钱文,“串底”为与钱有关的名词。例(2)中,“足钱”即“十足钱,足额的铜制钱”,“九八”即“九八钱”。清代货币以银为本位,制钱(铜钱)为辅币。制钱单位为“串”“贯”或“吊”,一千文(个)为一串,以麻绳穿之,两百一束,五束一串。一串规定有一千文,实则不然,市面流通制钱实际每百只穿九十八文,此为“九八钱”。还有制钱每百只穿九十六文或九十九文,称九六钱或九九钱。档案中旧规买盐用足钱,足钱不扣串底,非足钱需扣串底。例(3)中,买卖大米使用九八钱,需扣除“串底”再行交易。例(4)中,官府下令,交易盐、米时一概使用市规九八钱文,不许单独索要足额钱,也不许私扣九八钱的不足部分,即“串底”。

因此,结合传世文献及文献语境,“串底”即“一串钱中不足一千文的部分”。

“串底”一词,并非《南部档案》独用,也见于清代及其他时期文献。

(5)(清)程德炯《陵川县志》:“又西夹道夫二名,每夜量加煤炭钱二文,岁支钱八十一千文,尚有余钱一千文,除串底钱三百二十四文,下剩钱六百七十六文,以为岁修窝铺贴换更锣之费。”^[20]

(6)(民国)黄佩兰修、王佩箴等纂《涡阳县志》:“查丁漕科征,原以银为本位,自折钱便民之说行,始以每钱二千作银一两,核收正耗平余一两三钱五分,须交钱两千七百元,以市通用九七四制钱,每千补串底钱二十六文。”^[21]

(7)(民国)龙云、周钟岳修纂《新纂云南通志》:“嗣后各属采买积谷,应一律用钱出入,不准再行折银。所扣串底,一并算明,归入正款造报。”^[22]

(8)(民国)李佩恩修、张相文纂《泗阳县志》:“以上各项收入,除洋河厘金外,凡在城市经行买卖者,无论何种,均照九九串底。”^[23]

例(6)中,市用钱为九七四制钱,九七四即一千文只有九百七十四文,每千要补“串底”二十六文,这部分钱文数量正是一千文中不足的部分,可佐证上文对“串底”的释义。

四、地脉

募卖事》:“况南部复兴厂,凡佃地凿井,地主止煎地脉,日期或一月、或二十四天,成规久定,人所咸知。”(《南部档案》4-375-1,道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2)《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募卖事》:“嘉庆年间,蚁故父周仕明与何白祥故父何中明伙佃胡守礼胞叔胡兆麟地土开凿盐井六眼,现已漏毙两眼,目下只得活井四眼车煎,每年地主止烧地脉,日期一月。”(《南部档案》4-375-1,道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3)《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募卖事》:“如果实有其事,伊叔兆麟何不控要盐井,兼之道光三年何中明将伊每年半载井期出卖董廷才故父董文道车煎,伊叔姪每年仍煎地脉一月无异。”(《南部档案》4-375-1,道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4)《为胡守礼具告陈文魁等霸煎募卖事》:“小的父亲周仕明与何白祥父亲何中明伙在胡守礼地内开凿盐井三眼,胡守礼每年煎烧地脉一月,历年系小的与何白祥各煎五月半日期。”(《南部档案》4-375-3,道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按:“地脉”一词容易误解。《汉语大词典》将“地脉”释义为“地下水”。《西游记》第二八回:“烟波荡荡接天河,巨浪悠悠通地脉。”^{[4]2770}《辞源》(第三版):“地脉,指地下水。水流像人身血脉,故称地脉。”^{[5]811}《近代汉语词典》:“地脉,指泉水。”所引例证唐孟云卿《放歌行》:“地脉日夜流,天衣有时扫。”^{[18]373}以上辞书将“地脉”释义为“地下水”“泉水”,但上述释义无法合理解释《南部档案》中“地脉”的词义。

上述用例均出自《南部档案》八房中的盐房,“地脉”与“煎”“烧”“煎烧”等词搭配。由例(1)只能“煎”地脉一个月或二十四天、例(2)止“烧”地脉一月可知,“煎”即“烧”。例(4)中,“煎”与“烧”同义连用,构成“煎烧”一词。“煎烧”在《南部档案》中义为“熬煮”,是制盐的步骤之一,故“地脉”应该与“盐”相关。周仕明与何中明伙佃胡守礼的土地,开凿出盐井三眼,约定地主胡守礼煎烧一个月地脉,剩下十一个月由陈文魁和何白祥均分煎烧,这里的“地脉”似为“盐井”。辞书将“地脉”释义为地下水,盐井亦是地下的盐水,与地下水相关,因此《南部档案》用“地脉”代指“盐井”。

“地脉”也作“地脉井”,在由当代人整理的清代文献中可见。

(1)《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

(5)吴斌、宋平、邱岳、秦双星《盐业纠纷解决研究·以四川近现代盐业史料为中心》:“立杜卖地脉井日份基址契约人王好泉,情因负债无偿,愿将地名周家冲公共业内派分盐井基址二眼,弟兄串名王三福,出佃与颇永庆捣铨海源井、海流井二眼,每眼基址横宽十二丈,顺宽十六丈为界。”^{[24]81}

(6)吴斌、宋平、邱岳、秦双星《盐业纠纷解决研究·以四川近现代盐业史料为中心》:“兹将下剩地脉日份一天,并基址股份在内,自央中证,一并扫卖与颜永庆名下承买铨办推煎管业。”^{[24]84}

例(5)中,“杜卖”即“出卖、出售”,“日份”即“日期”,王好泉出售盐井及煎烧日期。

五、嚼

(1)《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大斗私盐店害民事》:“历年以来,伊等嚼索贫民均家,伊等私设情真,伊场店每日有千余银买之利,有四十余千钱之肥利。”(《南部档案》4-370-1,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2)《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大斗私盐店害民事》:“迫蚁以私店嚼民等情,具控南部县案奉批,既打行盐,又取行钱,重复得利,难免把持。”(《南部档案》4-370-1,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3)《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大斗私盐店害民事》:“实非县主之不仁,委遭蠹书之朦弊,伊等并无引税,私设行规。国有明条,例有悠规,下则苛嚼贫民,上则显干王章。”(《南部档案》4-370-1,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4)《为武生肖联陞等具告书役宋仕杰等浮收盐课案飭南部县唤齐人证查究事》:“县主偏执,伊旧欺上嚼下,藐违府祖断案,不准公举并首派催,自封投柜,且比从前更甚。”(《南部档案》4-383-5,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按:“嚼”字,字面普通而义别,容易误解。《康熙字典》:“本作噍,齧也。疾略切,噬嚼也。”^[25]《汉语大词典》:“嚼,剥蚀。”引例证宋真山民《朱溪涧》诗:“雪融山脊岚生翠,水嚼沙洲树出根。”^{[4]3961}《辞源》(第三版):“嚼,喻剥蚀。”^{[5]770}按照辞书的释义,“嚼”也指“受风力、水力、冰川、害虫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山川草木由此遭到的侵蚀和剥蚀”。此释义无法合理解释《南部档案》中“嚼”的意义。

例(1)中,马洪仁控告吴思荣私开盐店,趁机“嚼索民众”,“嚼索”作谓语,“嚼索”的对象为贫

民。“索”为索要、索取义,“嚼”在此处应与“索”词义相近。例(2)中,“行钱”即“行费”,从事某一行业需缴纳的费用,金额与盈利数额有关。吴思荣等人“嚼民”的具体行为包括:买卖运销食盐、专揽盐店、垄断当地盐业市场、抽取行费。“嚼”在此处有“剥削”义。例(4)萧联陞、敬心德等人指控宋仕杰、严会川受县令保护“欺上嚼下”。“欺”有欺骗、欺负义,有贬义色彩。“欺上”与“嚼下”并列,可见“嚼”词义相近。结合辞书及文献语境,“嚼”应为“剥削、欺压”义,“嚼”的对象多为百姓。

“嚼”即“欺压、剥削”,清代及以后文献中可见。

(5)(清)曾王孙《清风堂文集》:“比奉钧差至县,始知本役不自悔祸,反控经承胡名佐并黄捷等在台,其盘踞侵粮、蠹国嚼民之情状,有不待照而自露者。”^[26]

(6)(清)许瑶光修、吴仰贤纂《嘉兴府志》:“盖厂夫之设,原系蠹役巧立名色,科派乡民,设立以后,相仍十余年,每年安享三十六两之工食,又皆无赖棍徒,倚恃蠹役为腹心,作恶嚼民,诚有如按臣示内所称者。”^[27]

(7)(清)余缙《大观堂文集》:“其初入也,任其饱餐,既而果腹不能去,卒复为群蜂所食,颇似婪吏嚼民,终为怨家仇恨所毙者。”^[28]

(8)王卡、汪桂平《三洞拾遗》:“凡蒙君纵恶、欺上嚼下之罪,概不准赦;凡受贿陷民之罪,概不准赦;不能以道事君之罪,照例坐究不赦。”^[29]

例(5)中,“蠹国嚼民”即损害国家,剥削民众。例(6)中,“厂夫”由“蠹吏”成员组成,其摊派力役,索取钱财,无恶不作。“作恶嚼民”即作恶多端、欺压百姓。

六、引张

(1)《为具稟将酌改县丞巡检分驻地方一资稽查盐务事》:“前因卑县城内设有同知衙门尚司盘验引盐,稽查私贩,该大使于查核井灶之外,别无所事。且卑县先年盐井较少,盐不敷配,各州县引张纷纷改配,更无所用其清查。”(《南部档案》4-368-1,道光二年五月十九日)

(2)《为具稟将酌改县丞巡检分驻地方一资稽查盐务事》:“此时即将引张全行撤回,亦不能居奇长价,况一经定价,凡遇米炭昂贵,灶户必藉。工本不敷,停不煎烧。”(《南部档案》4-368-1,道光二年五月十九日)

(3)《为奉令各盐商持引赴南部县厂采配盐以疏积滞而杜漏私事飭各州县》:“历年照办在案,兹该灶户雷光熊等以盐多积贮,请飭将改代引张撤回,赴厂采配呈奉。宪台批,经盐茶道行据各县查明各商均以改配年久,民不喜食,南盐若令撤回改配,恐误税食。”(《南部档案》4-377-2,道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4)《为奉令各盐商持引赴南部县厂采配盐以疏积滞而杜漏私事飭各州县》:“应将达县、大竹、渠县、昭化、广元、营山等县引张准其改代,系为疏引裕课起见,应请俯如所请办理。”(《南部档案》4-377-2,道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按:“引张”一词,意思令人费解。《汉语大词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均未收录。

《汉语大词典》:“引,重量单位。宋以后盐或茶运销时以‘引’为计量单位,每引规定的斤数,不同时期和地区各不相同。”^{[4]5157}《辞源》(第三版):“引,重量单位。元代有茶引,明清有盐引,每引规定斤数,历代不同。”^{[5]1384}

《汉语大词典》:“张,量词。”^{[4]5190}“张”,《辞源》(第三版)将其释义为“量词”^{[5]1394}。

我国古代制盐过程复杂,制盐和销盐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民办官办、民制民销、民制官销、民制官卖商运、国家专卖等^{[30]101}。中国古代,根据盐法政策生产、运输、行销并按时纳税的盐称为官盐;如若未经官府允许,私自生产、运输、贩卖的盐,则被称为私盐。《南部档案》中的“引张”,即盐商取盐贩卖的合法凭证。盐商缴纳购盐费用且按照当时盐税制度纳税之后,即可得到凭证,凭引张取盐贩卖。清代盐业制度中,盐引是国家财政的极为重要的来源之一,属于有价证券,可在市场流通。

引张的盐斤配额不是一成不变的,据当地产盐情况而定。若出现盐不敷配的情况,官府会改配别厂,以疏引课。例(3)中,据文献前文可知,先年因该厂柴薪价贵,产盐不敷采配,经大竹、达县、渠县、昭化、广元、营山各县盐商改配别厂。现南部县产盐积贮,满足采配额度,遂请求将“改代引张”撤回。

按照运盐通道的差异,“引”分为“水引”和“陆引”。官方核对井灶产盐数量之后,估算销地食盐人数,按情况分配食盐数量。根据运送距离的远近,计划水路、陆路行运盐斤,配定行销水引、陆引的张数,发交岸商运卖。从清代文献记载可知,因

水、陆引张额定盐斤数量不同,需缴纳的盐税也有所差异。《四川通史·清卷》:“水引每张配盐五十包,每包重二百斤,共重一万斤;陆引每张配盐四包,每包重二百斤,共重八百斤。其征税标准:水引每张课银三两四钱五分,陆引每张课银二钱七分二厘四毫。”^[31]

(5)《为奉令各盐商持引赴南部县厂采配盐以疏积滞而杜漏私事飭各州县》:“本司覆查南部县盐厂额配保宁府属之阆中、苍溪、通江、南江、巴州、广元、昭化、剑州,并顺庆府属之南充、仪陇、蓬州、营山,绥定府属之达县、大竹、渠县、太平,龙安府属之平武等十七州县,共水引一百六十八张,陆引七千二百八十一张。”(《南部档案》4-377-2,道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6)《为具禀张华仕等贿通盐吏把持隘口不许民盐贩卖事》:“且奸商等把持各隘口,反指南厂为私盐,不许贩卖,水陆引张尽配犍为切,从前原系暂拨,今日久假不归,害灶民等四百三十六眼煎盐无行,待毙课税。”(《南部档案》4-374-1,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除《南部档案》外,“引张”也多见于其他的清代文献中。

(7)(清)崔澄寰修、王嘉会纂《续修隰州志》:“今该州县一旦改食土盐,应将何处土盐,何人领缴,引张如何发卖纳税,亦必声叙明白,均应飭令该州并属另查确切妥议叙详通报。”^{[32]113}

(8)(清)崔澄寰修、王嘉会纂《续修隰州志》:“查原食土盐之汾州府应销河东引张,例系每年春季由该管厅州赴运库总领分给各属,按季配销土盐,将引截角缴销。”^{[32]119}

(9)(清)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应配水陆引张,分行不产盐之成都、华阳等县,与产盐之简州等厅、州、县、卫、所共一百三十八处,应分水引四千三百四十九张,陆引五万九千八百七十三张。”^{[16]304}

(10)(清)丁宝桢《四川盐法志》:“至粤省盐觔,系由黔省之丙妹地方运至古州埠内,听黔贩接买营销,其引张亦由粤商在粤省缴销。”^{[16]400}

参考文献:

-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881.

- [3]郭璞.尔雅[M].永怀堂本:80.
- [4]罗竹风.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 [5]何九盈,王宁,董琨.辞源:第三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6]张自烈.正字通[M].清康熙二十四年清畏堂刻本:260.
- [7]常明修,杨芳灿.四川通志[M].清嘉庆二十一年木刻本:711.
- [8]李峰.苏州通史:人物卷:中:明清时期[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238.
- [9]龙泽江,傅安辉,陈洪波.九寨侗族保甲团练档案[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6:125.
- [10]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第121卷[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312.
- [1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537.
- [12]王先谦.后汉书集解[M].民国王氏虚受堂刻本:1771.
- [13]冷玉龙,韦一心.中华字海[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4]陆强.栖境与家园之营造诗意家园[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7:37.
- [15]朱廷立.盐政志[M].明嘉靖刻本:155.
- [16]丁宝楨.四川盐法志[M].清光绪刻本.
- [17]王定安.两淮盐法志[M].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875.
- [18]白国维.近代汉语词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 [19]孔尚任.桃花扇传奇[M].清康熙刻本:138.
- [20]程德炯.陵川县志[M].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205.
- [21]黄佩兰,王佩箴.涡阳县志[M].民国十四年铅印本:103.
- [22]龙云,周钟岳.新纂云南通志[M].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5947.
- [23]李佩恩,张相文.泗阳县志[M].民国十五年铅印本:566.
- [24]吴斌,宋平,邱岳,等.盐业纠纷解决研究:以四川近现代盐业史料为中心[M].成都:巴蜀书社,2012.
- [25]张玉书.康熙字典[M].清末上海同文书局增篆石印本:214.
- [26]曾王孙.清风堂文集[M].清康熙四十五年曾安世刻本:85.
- [27]许瑶光,吴仰贤.嘉兴府志[M].清光绪五年刊本:2735.
- [28]余缙.大观堂文集[M].清康熙三十八年刻后印本:192.
- [29]王卡,汪桂平.三洞拾遗:第12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5:653.
- [30]向洪,李广岑.古今中国解疑丛书:经济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01.
- [31]吴康零.四川通史:清卷[M].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384.
- [32]崔澄寰,王嘉会.续修隰州志[M].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责任编辑:雷 鸣)

Explanations on Six Colloquial Words in the Government Archives of Nanbu County in the Qing Dynasty

YANG Xiaoping, JIANG Lingl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China,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subject of the yamen archives of Nanbu County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aper selects six colloquial words, such as “Benkou”, “Chejian”, “Chuandi”, “Dimai”, “Jiao” and “Yinzhang”, which were almost inexplicable in meaning.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six colloquial words are studied and explained, and the reasons for word formation are analyzed, so as to eliminate the reading barriers of yamen archives in Nanbu County.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ompilation and revision of large dictionaries such as *Chinese Dictionary*,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Lexicon (3rd Edition)*, and *Varieties of Chinese Dictionary*, and the supplement of the entries and meanings that are not included.

Key words: Qing Dynasty; archives of Nanbu County; colloquial words; explanation

中国藏黑水城元代汉文法律文书校读拾遗

王 阳¹, 马 雨²

(1.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河南 商丘 476000; 2. 商丘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河南 商丘 476000)

摘 要: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收录了数百件元代汉文法律文书。目前已有三家整理本对此批元代法律文书进行了释录,但皆存在一些可资商榷的地方。今从中择取十四则,通过覆核图版、参照异文、细绎文意、训释词义等方法,校勘和补正其中的不足之处,以期展现此批文书的原貌,为相关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关 键 词:黑水城;元代;汉文法律文书;校读

中图分类号:H21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45-04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收录了数百件元代汉文法律文书,由于此批文书多为出土的写本文献,且数量丰富,时代明确,用语通俗,所以此批文书在研究元代的历史、法律、语言文字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极为难得的珍贵语料。

目前,计有三家整理本对中国藏黑水城元代汉文法律文书进行了释录:一是张重艳、杨淑红的《中国藏黑水城所出元代律令与词讼文书整理与研究》(以下简称“《文书整理与研究》”);二是孙继民、宋坤、陈瑞青、杜立晖等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以下简称“《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三是杜建录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以下简称“《汉文文献释录》”)。虽然此三家整理本皆对此批文书进行了精确释录,但是难免百密一疏。今在校读此批文书的过程中,通过覆核图版、参照异文、细绎文意、训释词义等方法,发现整理本在释录方面存在一些可商之处,故从中择取十四则,以为拾遗。如有不当,敬请指正^①。

1. 起□(意)底、雕板底、抄帛[底、填料号]□(底)、家里窝藏着印造底、收买颜色物[料底,俱是同情伪]造,皆合处死。□(外),知是伪钞分使底、□(不)[用钱买使伪钞底,断]一百七下。(M1·0542[F114;W1]《律令条文》)^{[1]672}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12}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483}皆在上举例中第七处“底”后直录作“工”,《汉文文献释录》^{[4]37}则直录作“不”,皆欠妥。

核对图版,第七处“底”后之字写作“𠂔”。该字残缺,仅保留上部形体,无法辨识,可暂时阙录作“□”。《元典章·户部》卷六《造伪钞不分首从处死》载有与上举例内容相同的条文,其作“外,知是伪钞分使底、不用钱买使伪钞底,断一百七下”^{[5]735},据此异文可知,“底”后当为“不”字,而非“工”字。“不”与“𠂔”的残留形体正相合。因此,“底”后之字可校作“□(不)”。又仔细分析文意,若依照图版及异文校作“□(不)”,则“不用钱买使伪钞底”句明显文义不通,疑“不”为衍字。“知是伪钞分使底、用钱买使伪钞底,断一百七下”,意指知道是分别使用伪钞的、用钱购买使用伪钞的,断决一百七下。故“□(不)”字当用衍文符号标示,作“<□(不)>”。《元典章》同一条文中的“不”字也当用衍文符号标示,校作“<不>”。

2. □(南)□□(至)他人房□……□北系官地……□至东□(西)□……(M1·0628[84H·大院内 a6:W64/2853]《官地案残件》)^{[1]770}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90}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566}皆在“他人房”前录作“□至”,并在

收稿日期:2022-1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FFXB061);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CYY026)

作者简介:王 阳(1989—),男,河南省商丘市人,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马 雨(1995—),女,河南省商丘市人,教育学硕士,商丘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助教,主要从事教育学研究。

①关于引文的录文,若图版残缺,不能确定字数者,用“……”标示;若图版残缺,可据异文补充者,用[]号补出;若原文衍字,则用“< >”删除;若原文脱字,则用“〔 〕”补出;若原文倒字,则用“()”校正。

“□”前标缺字符号,《汉文文献释录》^{[4]287}在“他人房”前标作缺字符号,均可商。

核对图版,“他人房”前残存三字,皆仅保留左部形体,分别作“𠂔”“𠂔”“𠂔”。仔细分析文意,知此处应是方位词。又分析后文分别有方位词“北”“东”“西”,那么“他人房”前应该有一个与“北”“东”“西”相对的方位词“南”字。又验之以残存三字的形体,知“𠂔”与“南”字左部形体相合;再结合后文“□至东西□”的“至”字,图版草写作“𠂔”。因“𠂔”与“𠂔”的左部形体相合,故知“𠂔”当是“至”字的草写形体;“𠂔”字难以辨识,可阙录作“□”。因此,上举例中“他人房”前残存三字,可校作“□(南)□□(至)”。

同时,《汉文文献释录》^{[4]287}在“至”后标缺字符号,亦可商。

核对图版,“至”后残存三字。其中,第一字作“𠂔”,明是“东”字;第二字作“𠂔”,该字残存右部形体,结合文意,知其当是方位词“西”字,二者形体正相合;第三字作“𠂔”,该字难以辨识,可阙录作“□”。因此,上举例中“至”后残存三字,可校录作“东□(西)□”。

3. 至廿六日晚,失林于本家□(立)□(地)……
 闫从亮隔墙望见失林,有本人将失林□□(唤叫)……
 于闫从亮根前。(M1·0668[F116·W71B]《失林婚书案卷(4-3)》)^{[1]881}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165}《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646}《汉文文献释录》^{[6]158}皆在上举例中第三处“失林”后录作三字,分别是“呼□□”,欠妥。

核对原件,“失林”后仅残存二字。“失林”后的第一个字作“𠂔”。该字右部残缺,左部残留“口”旁;“失林”后的第二个字残损严重,无法辨识。但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的文书是 M1·0689[F116·W205]《失林婚书案卷(4-3)》,其作:“失林于本家院内立□(地)……墙望见失林,有本人将失林唤叫。”^{[1]917}据此异文可证,“𠂔”当是“唤”字,而非“呼”字,且“呼”后之字当为“叫”字。“唤叫”犹“叫唤”,谓叫,呼唤,呼喊。《封神演义》第六十一回:“马元离了高山,往前才走,只听的山凹里有人声唤叫:‘疼杀我了!’其声甚是凄楚。”^[7]因此,“失林”后当校补作“□□(唤叫)”二字。

4. 若将断出来,□□(我)做□(筵)[会娶你,咱]每两个永远[做]夫妻。(M1·0669[F116·W37]《失林婚书案卷》)^{[1]883}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167}《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648}《汉文文献释录》^{[6]167}皆据图版直录作“永远夫妻”,疑脱字。若录作“永远夫妻”,则文意不顺,且语法不通。疑“永远”和“夫妻”之间脱写“做”字。因为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的两件文书分别是 M1·0668[F116·W71B]《失林婚书案卷(4-2)》和 M1·0667《失林婚书案卷》,其中 M1·0668[F116·W71B]《失林婚书案卷(4-2)》作“若……做筵会娶你,咱每两个永远做夫妻不好”^{[1]880},M1·0667《失林婚书案卷》作“妇人……良为躯……咱每两个永远做夫妻……罢”^{[1]878},此二件文书皆作“永远做夫妻”。据此可证,上举例当校补“做”字。“咱每两个永远[做]夫妻”,意言咱们两个永远做夫妻。

5. 文字系阿兀元娶你□(为)[妾]□(妻),
 □□(婚书)烧了者,等候一二日,我每赴官司告阿兀将你……(M1·0669[F116·W37]《失林婚书案卷》)^{[1]883}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167}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648}皆在“□(为)”后标作后缺字符号,并在后缺字符号之后直录作“妾”,《汉文文献释录》^{[6]167}则在“□(为)”后录作“□妾”,皆不妥。

核对图版,“□(为)”后第一个字残缺,第二个字仅残留下部形体,写作“𠂔”,此当是“女”旁的左部形体。如果单从这个残存的形体来分析,“𠂔”为“妾”字是有可能的。但是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的是 M1·0670[F116·W79]《失林婚书案卷(2-2)》,其载有与上举例内容相关的句子,作“□(这)……[文字系阿兀元]娶你为妾妻,婚□……者”^{[1]885},据此可知“𠂔”亦有可能为“妻”字。因为“妻”与“𠂔”的形体相合,且因为“□(为)”后残存二字,据此可以推知,“□(为)”后残缺的第一个字当是“妾”字,“□(为)”后第二个字“𠂔”当为“妻”字无疑。“妾妻”犹“妾”,指男子在正妻以外娶的女子,如 M1·0666[F116·W71A]《失林婚书案卷》:“见行阿兀状告妾妻失林□。”^{[1]877}《元典章·吏部》卷三《军官依例保举》:“近年以来,军官每并奥鲁官亦将嫡长子、长孙不肯依例保举,觑面皮,将妾妻儿男并不应的弟兄每根底偏向着乱行保举上头。”^{[5]290}此例言军官们并奥鲁官们不保举他们的正妻所生的嫡长子、长孙,却保举他们的妾所生的儿子和不相关的弟兄们。因此,上举例当在“□(为)”后校补作“[妾]□(妻)”。

6. 失林只身前去到小闫□(家)……小闫于房内取出汉儿文字一帋,□(向)[失林]言说:这文书系你的婚书。(M1·0672[F116·W144])《失林婚书案卷(2-1)》^{[1]887}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172}《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653}《汉文文献释录》^{[6]180}皆在“帋”后标作后缺字符号,欠妥。

核对图版,“帋”后还有一字残存,写作“𠂔”,该字残缺,难以辨识。但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的文书是 M1·0668[F116·W71B]《失林婚书案卷(4-2)》和 M1·0670[F116·W79]《失林婚书案卷(2-2)》,此二件文书载有与上举例内容相关的语句, M1·0668[F116·W71B]《失林婚书案卷(4-2)》作“……于房内取到汉儿文字一□(帋),向失林言说……婚书”^{[1]880}, M1·0670[F116·W79]《失林婚书案卷(2-2)》作“有失林只身□(前)[去]……于房内取出元藏□(放)……一帋,向失林言:□(这)”^{[1]885},据此可以推知,“𠂔”当是“向”字,二者形体正相合。且“向”后可据补作人名“失林”。因此,上举例当校补作“□(向)[失林]”。“□(向)[失林]言说:这文书系你的婚书”,意谓小闫向失林说:“这张契约是你的婚书。”

7. 等候一二日,我每赴官司告[阿兀]将你为妾妻,却行□(压)良为躯,……出来时,我做筵会娶你。(M1·0672[F116·W144])《失林婚书案卷(2-1)》^{[1]887}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172}《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654}《汉文文献释录》^{[6]180}皆将“□(压)”后之字校作“□(良)”,不当校而校。

核对图版,写作“𠂔”,该字形体完整,并无残缺,是为“良”字。“良”指平民,“□(压)良为躯”指逼迫平民子女为躯口,如 M1·0668[F116·W71B]《失林婚书案卷(4-2)》:“如今我每烧了者,等候一二日,赴官……兀将你娶为妾妻,却行压良为躯。”^{[1]880} M1·0669[F116·W37]《失林婚书案卷》:“今等候一二日,我每赴官司告阿兀将你……却行压良为躯。”^{[1]883} 因此,上举例当直接录作“良”。

8. 买卖客人脱黑□□(怙木)……失林过房□(与)……木将失林并物货回还到□(岭)□□□□□□□□(北地面,要往回回地)面去。(M1·0673[F116·W32])《失林婚书案卷(3-1)》^{[1]889}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174}《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656}《汉文文献释录》^{[6]185}皆在“到”后直录作“亦”,并在“亦”后标后缺字符号,不确。

核对图版,作“𠂔”。该字残缺,且其残存的左部形体模糊不清,仅有一撇略微可辨。又因 M1·0686[F116·W37]《失林婚书案卷》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其作“□后有脱黑怙木……并物货回还到岭北地面,要往回回地面□(去)”^{[1]912},故据此异文可知“到”后之字当非“亦”字,其应为“岭”字。“岭”字(繁体作“嶺”)左部有一撇,二者形体正相合。且“岭”后所阙数字,亦可据异文补充完整。因此,上举例当在“到”后校补作“□(岭)□□□□□□□□(北地面,要往回回地)”。如此,使得前后两句意义连贯,意指脱黑怙木将失林并货物带回到岭北地面,要前往到回回所居住的地方去。

9. 买卖客人脱黑□□(怙木)……失林过房□(与)……□将失林并物货回还到□(岭)□(北)……面去。(M1·0673[F116·W32])《失林婚书案卷(3-1)》^{[1]889}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174}《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656}《汉文文献释录》^{[6]185}皆在“过房”后阙录作“□”,失校。

核对图版,写作“𠂔”。该字残缺,仅保留左半部分形体,难以判定。又 M1·0686[F116·W37]《失林婚书案卷》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其作“将失林过房与脱黑怙木作义女”^{[1]912},据此异文可知,“过房”后之字当是“与”字。再验之以“𠂔”,二者形体正合。因此,上举例当校补作“□(与)”。

10. 右谨具〔呈〕。至正廿二年十二月,吏:□(贾)……,□(侯)……(M1·0680[F116·W176])《失林婚书案卷(2-2)》^{[1]901}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184}《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668}《汉文文献释录》^{[6]215}皆据图版直录作“右谨具”,疑脱字。M1·0682[F116·W602]《失林婚书案卷(3-2)》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其作“右谨具呈。至正廿二年十二月,吏:贾……,□(侯)”^{[1]906},此二件文书的语句基本相同。由此可证,上举例中“右谨具”后当脱写一“呈”字。“右谨具呈”,谓在文书的右面恭谨详备地呈上所写的内容。因此,上举例当校补作“〔呈〕”。

11. 令人看读□……人文契二帋,却……外有失林合同妾妻(妾妻失林合同)□□(婚书)……

昏。(M1·0683[F116·W48]《失林婚书案卷》)^{[1]908}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189}《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674}《汉文文献释录》^{[6]229}皆在“外有”后依照图版直录作“失林合同妾妻”,欠妥。

如果录作“失林合同妾妻”,那么此句的意义明显不通顺,所以疑“失林合同妾妻”系“妾妻失林合同”的误倒。“妾妻”修饰“失林”,用来说明“失林”的身份是阿兀的“妾妻”,如 M1·0666[F116:W71A]《失林婚书案卷》:“见行阿兀状告妾妻失林□……书等偷递与闫从亮烧□(毁)。”^{[1]877} M1·0677[F116·W185]《失林婚书案卷(2-1)》:“为阿兀状告妾妻失林将本□……书等偷递与闫从亮一同烧□(毁)。”^{[1]895}此二例皆写作“妾妻失林”,可为佐证。因此,上举例当乙正为“妾妻失林合同”,其后残缺的二字可校补作“婚书”。“妾妻失林合同婚书”,意指妾妻失林的合同婚书。

12. 失林与闫从亮一□(同)……夜〔于〕从亮家灶窠内□……毁了当。(M1·0683[F116·W48]《失林婚书案卷》)^{[1]908}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189}《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674}《汉文文献释录》^{[6]229}皆依照图版录作“夜从亮家灶窠内”,欠妥。

虽然此件文书残缺不全,但是依照图版所残留的文字来看,若录作“夜从亮家灶窠内”,则文意明显不通,疑脱字。再结合与此件文书内容相关的一件文书 M1·0674[F116·W45]《失林婚书案卷》,其作“夜于从亮家灶窠□(内)”^{[1]892},据此可知,图版于“夜”后当脱写一个介词“于”。上举例当在“夜”后校补“〔于〕”字。

13. 招伏:是我将文字三昏取□……来,有本人止回付与我文字二昏外,有……从亮用火烧毁了也。将契书一昏……到官,招伏是实。(M1·0685[F116·W246]《失林婚书案卷(2-2)》)^{[1]911}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191}《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677}《汉文文献释录》^{[6]235}皆在“契书”后阙录作“□”,并在“□”后标后缺字符号,欠妥。

覆核图版,“契书”后写有二字,作“”,此二字形混合,以致整理本无法识读,且误释为一个字。仔细审视,“”当是“一昏”二字形体的混合,“昏”上的“一”字较短。故上举例当在“契书”后录作“一昏”二字。“契书一昏”,意指一张契约文书。

14. [至十一月廿三]□(日),失林……红匣儿

内汉儿文字三昏□(付)□□□……藏放。至当日晌午后,失林于井□……有今到官□□□□□(M1·0689[F116·W205]《失林婚书案卷(4-3)》)^{[1]917}

按:《文书整理与研究》^{[2]196}《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682}《汉文文献释录》^{[6]249}皆在“失林”前录作“同”,可商。

核对图版,写作“”。该字的上部形体残缺,仅保留有下部形体。从形体分析来看,“”与“同”字的形体不相合。且上举例在 M1·0668[F116·W71B]《失林婚书案卷(4-3)》亦有相同的记载,其作“至十一月廿三日,失林……放诸杂文字红匣儿内汉儿文字叁□(昏)……至当日晌午后,失林于井上拽水间,有今到”^{[1]881},由此异文可知,“”当是“至十一月廿三日”之“日”字,二者形体相合。且“□(日)”前所缺之字,可据异文校补完成。因此,上举例当校补作“[至十一月廿三]□(日)”。

综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法律文献虽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是由于此批文献残损严重,以致整理者在释录的时候难免会有所疏漏。又由于此批文献的内容大多具有相关性,因此可以将此批文献放在一起,进行相互比勘,以便对此批文献的释录不当之处进行补正,还原此批文献的本来面貌,促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 [2]张重艳,杨淑红.中国藏黑水城所出元代律令与词讼文书整理与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 [3]孙继民,宋坤,陈瑞青,等.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4]杜建录.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5]陈高华.元典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6]杜建录.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7]许仲琳.封神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568.

(责任编辑:雷 鸣)

论《茶馆》的经典化

吉开金^{1,2}

(1.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0; 2. 淮南师范学院 文传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0)

摘 要:《茶馆》作为中国当代戏剧的经典之作,其经典地位是在历史化过程中由政治、文化、文学批评、报刊媒介、舞台表演、大众、文学史、学校教育等因素合力建构起来的。它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从文艺界推崇到大众广泛接受,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国内外《茶馆》热,以及自由多元语境下开放包容的《茶馆》这几个阶段,共同呈现出《茶馆》经典化全貌。

关 键 词:《茶馆》;经典化;合力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49-06

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成为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淘洗也就是历史化的过程,艾略特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说:“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试图做什么,他们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下被看作是经典。”^[1]任何一位作家在世时都难以预言自己的作品能否步入经典行列,任何一部作品都要经过岁月长河的冲刷才能成为经典。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学经典通过不同的机制去获得自己的权威地位。就《茶馆》的经典化而言,它是在一个历史时期通过政治、文化、文学批评、舞台表演、报刊媒介、大众、文学史、学校教育等多元因素共同建构,从而进入经典殿堂实现自己的权威地位。关于《茶馆》的经典化进程,研究界尚未有过系统论述,本文将对《茶馆》的经典化进程进行具体爬梳,试图呈现其全貌。

一、从文艺界推崇到大众广泛接受

在文学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中,有一因素是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力量,童庆炳在《文学经典建构诸要素及其关系》中将其称为“发现人”,对此他阐述道:“发现人就是最早发现某个文学经典的人。发现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不同时代的好几个人。发现人要具备的品质是,第一要有发现的能

力,提出对于作品的新体会和新理解,第二要有较大的权威性,他的这种权威性使他的发现能够推广开来。”^[2]在《茶馆》经典化的过程中也存在宽泛意义上的“发现人”,它是另类的由国家权威刊物所化身。1957 年 9 月初为纪念十月革命 40 周年,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外国文学》推出了“中国文学专号”,刊载了周恩来的亲笔题词和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苏尔科夫的《我们的友谊》、茅盾的《一幅简图——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远景》,接着是中国文艺作品的介绍,有郭沫若的诗歌、老舍的《茶馆》、瞿秋白的杂文和陶渊明、白居易、孟浩然的诗歌等^[3]。1957 年 9 月 5 日《人民日报》对苏联《外国文学》的刊载进行报道,11 月 3 日《文艺报》从第 30 号开辟“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专号”,刊登了戈东的《苏联“外国文学”出版中国文学专号》一文,翔实叙述了文学专号中苏联对中国文学的介绍情况,其中说到老舍的《茶馆》是苏联《外国文学》专刊中唯一的剧本^[4]。毋庸置疑,《外国文学》和《人民日报》《文艺报》这些国家权威刊物对《茶馆》的连续刊载、报道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推介力量,使得《茶馆》从被“发现”而得到文艺界的重视。1957 年 12 月 22 日《文艺报》第 37 期刊载了金受申的《读“茶馆”话“茶馆”》,作者以随感追忆的方式表达了对剧本的喜

收稿日期:2022-12-20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AHSKY2021D185)

作者简介:吉开金(1979—),女,安徽省凤阳县人,文学博士,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爱,高度肯定《茶馆》的场景描写、人物刻画、生活状态与历史的一致。不久,李健吾在《人民日报》1958年1月号发表《读〈茶馆〉话〈茶馆〉》,对剧作的宏大规模到人物的刻画手法以及结构设置都表达了精深看法,肯定《茶馆》是老舍的“力作”“高度造诣”和“重大收获”。李健吾的洞见和权威性在文学场内揭示出《茶馆》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对其经典化起到积极建构作用。1958年初《茶馆》在文艺界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文艺报》1958年第1期刊登了《座谈老舍的〈茶馆〉》。座谈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报》总主编张光年主持,与会者有焦菊隐、陈白尘、张恨水、李健吾、王瑶、林默涵、赵少侯等人。这是《茶馆》经典化历程中具有重要分量的一次会议,文艺界重要人士对《茶馆》纷纷发表看法,进行了高度认可。这次会议发言发表在《文艺报》第一版,篇幅较长,无疑这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诸多权威文艺家对《茶馆》主题意蕴、结构艺术、人物语言、民族风格等方面深刻而独到的评论都具权威性、经典性,句句如星珠串天,处处耀眼。后来者对《茶馆》的阐释很大一部分都被其提出的概念所覆盖包容,许多人都沿此足迹走下去。毫无疑问,这次座谈会为《茶馆》经典身份的认知和经典地位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茶馆》经典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是自下而上,由市井百姓的推崇而渐进文学主流被册封为经典;有的是自上而下,由文学上层的推行而逐渐在平民大众中产生影响,步入经典行列。相应来说,《茶馆》属于后一种方式。1958年3月29日《茶馆》在北京面向大众首演,这意味着《茶馆》由文学上层的认可、推崇而融入世俗大众的认同,将和一般的读者、观众之间广泛建立联系、形成对话,推动《茶馆》广泛传播。从3月29日至4月30日《茶馆》在首都剧场表演了30场,5月份演出11场,表演取得巨大成功。据张光年记述:座谈《茶馆》时对剧作的估计还是不足的,“看了演出,才把人吃惊地镇住了,这是真正的艺术魅力”^[5]。舞台上的《茶馆》是如此灿烂,充满了迷人的光彩,在大众中产生热烈反响。张庚在5月份的文章中谈道:

“老舍先生的《茶馆》最近在北京人艺剧院上演了,很受观众注意,也成了文艺界私人谈话和集会中间的话题,总之,是新近北京文艺方面比较惹人注目的事件之一。”^[6]同时,各大报刊络绎不绝地进行报道评论,如《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大公报》《北京日报》《戏剧报》《北京晚报》等报刊集中涌现《茶馆》的评论文章。这是《茶馆》问世之后引起社会关注较“火”的一个阶段,充分展现了北京人艺舞台表演二度创作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媒介的重要推广力。此时《茶馆》由文艺界的赏识、推广进入另一个层面——一般读者、观众的响应、认同,融入经典建构的大众力量。

由上文可见,《茶馆》在问世之后经过被权威刊物“发现”和推广,进而得到文艺界的重视。金受申、李健吾的评论和《文艺报》举行的座谈会皆表明了《茶馆》在文艺界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而北京人艺卓越的舞台表演又使《茶馆》从文学主流的推崇融入世俗大众,获得一般读者和观众的认同,产生广泛影响。很显然,《茶馆》在此阶段经过报刊媒介、文学批评、舞台表演和社会大众这些因素的合力建构,其经典地位已初步得到确立,尽管它后来遭受严厉批评经历了一段压抑时期,但已深入大众心底,这是《茶馆》为何在新时期一归来就获得立竿见影、潮水般巨大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茶馆》热从国内到国外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潮流的推进,《茶馆》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1979年2月3日北京人艺在纪念老舍诞辰80周年活动中上演了《茶馆》第一幕,时隔一个多月后,3月13日新华社用英文对外播发关于重新上演《茶馆》的报道。《茶馆》从3月份开始公演,这一年一共演了134场,场场爆满。经历了漫长的坎坷岁月之后,原班人马《茶馆》的到来犹如浪潮激荡着人们的情感和灵魂,这不仅缘于北京人艺艺术家精湛的演技,更缘于《茶馆》的包容和历史寓言性。《茶馆》演出在观众中的巨大反响引发评论文章的井喷,这些文章从《茶馆》的导表演艺术、主题思想、结构艺术、人物刻画、剧作风格等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其中引人注意的是1979年《文艺研究》第2

期特别推出了一组有关《茶馆》的评述性文章,共13篇。同时这期《文艺研究》还安排了叶浅予作画、老舍题词的《〈茶馆〉速写》(十幅),封页的第二、第三面是《茶馆》的剧照八幅。《文艺研究》创刊于1979年,是文化部主管、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重要文艺刊物。通过这些可见《茶馆》在国内产生的热度和巨大影响。

《茶馆》的舞台表演不仅引起国内观众的关注,也引起国外戏剧家、影评家、制片人、演出承包商、驻华大使、外国友人不绝如缕的赞誉。他们完全被《茶馆》的舞台导表演、剧作水平震惊,想不到中国竟有如此精妙的话剧艺术,热切地希望《茶馆》能够走出国门,到自己国家、到世界去演出。1980年《茶馆》在外国人士的积极推荐、邀请和人民艺剧院的筹备下,经文化部和中央批准,于9月28日至11月11日开始了西德、法国、瑞士的演出之旅。首演是在西德的曼海姆剧院,演出前几天两场剧票就售完,第二场卖站票。演出很成功,现场反响十分强烈,每幕的开场、闭场均有热烈掌声。10月1日曼海姆剧院举行了《茶馆》访德的记者招待会,出席的记者有:曼海姆图片社玛丽亚·莱茵普法尔茨报马克斯·曼海姆晨报汉茨·海德堡南德意志广播电视台尼克拉、南德意志电台比勒尔等^[7]。从这两次演出成功的实况来看,就可预想《茶馆》此后会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总而言之,《茶馆》在西欧14座城市演出的25场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产生轰动效果。

《茶馆》从西欧出访归来,国内旋即又形成一股热潮。自1980年底《光明日报》《人民戏剧》《人民日报》《文艺研究》《文艺报》等权威刊物接连发表有关《茶馆》西欧之行的报道评论文章,特别是《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又集中推出有关《茶馆》的8篇文章,好似集束手榴弹,威力很大,再次以先前方式营造出一种声势。198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开始连载乌韦·克劳特编辑的《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在西欧》。在这些重要刊物的带动下蔚然兴起《茶馆》的评论大潮,从权威刊物扩展到一般刊物,从以北京人艺艺术家为主体的评述者扩展到更广阔的文艺学术界,涵盖《茶馆》的各个方面,形成一个壮观的景象,一起夯实

了《茶馆》的经典地位。

《茶馆》在国内外产生的热潮和报刊、电视等媒介的大力宣扬,使得《茶馆》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地传播,直接推动了北京人艺1983年赴日演出。应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及话剧界的邀请,北京人艺进行了为期25天的《茶馆》演出活动。毫无疑问,在日本的23场演出也是大获全胜,产生轰动效果。观众反响十分强烈,形成日本的《茶馆》热潮,日本的电视台、报纸杂志等都纷纷对《茶馆》的演出进行报道和高度认可,《茶馆》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话剧。综上所述,《茶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确立了经典地位,除了来自《茶馆》剧作本身的魅力外,还来自北京人艺卓越的舞台表演、文艺界的阐释和报刊媒介的推波助澜,这些因素共同建构起《茶馆》的经典地位,虽然《茶馆》在此时期的传播、接受还没有呈现出一个较为开放、自由、多元的局面,但它在经历多种复杂因素的检验后已呈现出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品质、力量,能够承载历史之重,面向未来!

三、开放包容中的《茶馆》

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开放、动态的过程。如果说一部文学作品完成其经典化,这只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说法,严格地说,任何一部文学经典都永远处在经典化之中,经典化是进行时,不是封闭的,它需要接受当下和未来的检验。《茶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构起经典地位,但其时思想的解放、文学观念的蜕变、批评标准和方法的衍变以及审美趣味的变化等都进行得缓慢。鉴于1985年之后社会、时代和文学都发生重要变迁,影响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因此《茶馆》在进入一个自由、多元、开放的语境中需要经得住新的历史阶段的考验,得到多方认可与推崇,其经典地位才能实现永恒。《茶馆》在新的历史阶段承受了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依然保持活力,散发出璀璨的光芒和不朽的魅力,保持经典的权威地位,表现如下:

(一)《茶馆》阐释的开放性、对话性

文学经典是在同各时代对话中生成的,其丰富的潜能被不断地激发出来,其丰富的价值和意义得

以呈现,它拒绝定论性阐释。在《茶馆》60 多年的存在史中,人们总能随着政治文化流变解读出不同的《茶馆》。20 世纪 50 年代《茶馆》评论者大多从政治立场出发,解读出《茶馆》的主题是埋葬旧时代和表达对新社会的爱,这是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新时期《茶馆》在经历一段历史浩劫之后重新归来,人们开始为其“正名”,这时期《茶馆》的主题解读仍是埋葬旧时代和歌颂新社会。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渐兴起一场“寻根”文化热,寻根作家们纷纷发表了一批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文学作品,例如“商州系列”“葛川江系列”“津门系列”和“京味文学”,当人们对这些文学进行热情关注时,“京味文学”的开山鼻祖老舍及其作品也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与其文化意蕴相关的内容都被挖掘出来和重新解读,比如老舍创作与北京市民世界、老舍创作与北京方言、老舍创作与民情风俗等。当然,作为“京味文学”精品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是研究者们特别关注的对象。这时,《茶馆》文本中所潜藏的文化意蕴浮现出来,得到重视。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不断有研究者沿此路径阐释下去,“五十多年来《茶馆》的演出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8]。进入 21 世纪,有学者借助西方社会学等理论来阐释《茶馆》,于是发现了“市民公共空间”,如李相银、陈树萍在《市民社会的重新发现——〈茶馆〉新论》中指出:“当老舍试图‘叙述三个时代的茶馆生活’时,茶馆便被赋予了‘市民公共空间’的气质。”^[9]由这些我们看到从“埋葬旧时代”,到“文化意蕴”,再到“意在呈现旧时代的‘市民公共空间’”等,人们在一次次“误读”中发现《茶馆》的“新颜”,这呈现了《茶馆》的多义性、开放性和适应时代的活力。

(二)“茶馆派”形成

《茶馆》以原创性力量建立起新的传统——话剧“茶馆派”形成,显示出文学经典的辐射力量和历史传承。20 世纪西方学者布鲁姆认为后辈作家普遍存在一种“影响的焦虑”,那就是先驱的光芒完全笼罩住自己以致自己被光环奴役无法创新,但这种“影响的焦虑”却有利于经典的传承和扩容。换个角度看就是前辈的作家作品能给后世的作家

作品带来多少馈赠和影响,这正是对一部文学经典的检验及其地位的体现。《茶馆》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之一,并且较好地体现了其地位的就是话剧“茶馆派”的形成。20 世纪 80 年代北京人艺剧院的苏叔阳、李龙云与何冀平自觉师承老舍,接受《茶馆》的艺术熏陶和滋养,使得作品在艺术风貌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写北京人、记北京事、说北京话、展现北京的风俗民情,具有浓郁的北京地域色彩。这些剧作以蓬勃的生命力和不凡的创作实绩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反响,声名远扬,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已形成一个成熟的风格流派。在话剧领域对此风格较早进行命名的是 1989 年罗章生的《论茶馆派及其民族特色》,他认为当代话剧领域存在一个“茶馆派”:“其成员是一师三徒,即以老舍为师,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苏叔阳、李龙云和何冀平为徒。”^[10]他们的代表作品都受到了以《茶馆》为代表的老舍剧作的影响。对于这一风格流派中的作家作品,吴祖光等人曾经表示过这样的看法:“苏叔阳同志是已做出成就的不愧为老舍的后继者之中的一位。”^[11]此外,董健、陈白尘、陈辽在谈到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时认为其可以视为《茶馆》的续篇。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和新世纪,话剧“茶馆派”纳入新的活力,《茶馆》的继承者们得到更多关注,如《晁兑胡同》(1993)、《北京大爷》(1995)、《古玩》(1997)、《万家灯火》(2002)等话剧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即使面对当今追捧时尚文化的市场仍然一枝独秀。这些与《茶馆》有着非常相似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的剧作——《茶馆》的继承者们,它们蔚为壮观的存在和散发的魅力都诠释了《茶馆》强大的影响力与穿透力,无可取代。

(三)《茶馆》在文学史中保持权威地位

文学史书写是经典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每个时代都会随着文化变迁和审美趣味的变化对经典进行重估,因此那些多次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就代表着一种权威和地位,体现一种规范和价值。《茶馆》自 20 世纪 80 年代访欧归来后,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不断高扬。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史对《茶馆》的评价、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侧重政治性到审美综合性的过程,然而无论怎样,文学史对《茶馆》都充满了肯定。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和新世

纪,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热情没有消减,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004),以及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2012)等一大批文学史相继亮相,它们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自由开放的语境中,以新的文学史观和艺术标准重新评价文学作品。这时期文学史在评判文学对象时呈现一种自由、多元、冷峻客观的态度,更加切中肯綮。如董健等人在高度评价《茶馆》“以驾驭语言、刻画人物的深湛功力扩大了话剧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边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三大段落之间,并不存在推动情节发展的具体的戏剧的逻辑联系。”^[12]虽如此,《茶馆》在众多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从未发生变化。《茶馆》在文学史上持续、明确的价值评估中生产出自己的经典地位,又一次表明历史的尘埃无法将其淹没。

(四)《茶馆》进入教材

文学经典往往是通过纳入国民教育序列和编入教科书而实现其话语权力和权威地位的,例如历史上儒家经典的确立便是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实现,从孔子定《五经》教授学子到汉武帝时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是明证。《茶馆》从1990年开始被编入中学语文教材,迄今为止语文教材已改版多次,但《茶馆》一直稳居其中,从未落选。甚至当2009、2010年发生有关中学语文教材减少鲁迅的争鸣时,《茶馆》并没有像鲁迅的经典之作那样由于晦涩难懂而遭受质疑。这从侧面有力证明《茶馆》是一部艰深和浅显、雅俗共赏的伟大作品。当然,《茶馆》也一直被编入大学的文学教材和各种选本中,它们都在教育体制中强化了《茶馆》的经典地位,将其经典价值进行凝固。

(五)《茶馆》“热”持续

1985年2月,当上一次《茶馆》热的余温还未散去,北京人艺又接到三方面的盛情邀请:香港邀请《茶馆》1986年赴港演出,加拿大邀请《茶馆》作为首演节目参加“86’温哥华世界博览会”艺术节,新加坡邀请《茶馆》作为压轴戏参加1986年的艺术节。新时期以来,《茶馆》的每一次演出都光彩夺目,每一次演出都倾倒无数观众,每一次演出都

像一颗重磅炸弹带来轰动效应。近年来出现《茶馆》演出的几个新版本,其舞台演出也获得成功。2017年李六乙导演的“川味”《茶馆》在北京、四川、包头、上海等多地上演,受到人们欢迎;2018年孟京辉别开生面导演的《茶馆》在乌镇首演后,又开启了法国、德国等地的巡回演出,获得成功。总之,《茶馆》是中国戏剧舞台、世界戏剧舞台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奇迹般地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之热、90年代之热、新世纪之热,流传后世,经久不衰!此外,《茶馆》还被搬上电视、电影荧幕,被商业运作——《茶馆》异质出现“老舍茶馆”,以及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泰语、俄语等多国语言,成为世界“文化熟知”,这些都扩张了《茶馆》的经典地位,实现经典增值。

综上所述,《茶馆》一路繁花盛开,其多义、多层面的东西被打开,与社会各方面之间形成一个开放对话,价值得到多方面认可,已全面确立了文学经典地位。尽管《茶馆》在未来还要面对新的检验,但一部真正的文学经典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轻易消亡。

四、结语

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化过程,在《茶馆》的经典化过程中政治、文化、文学批评、报刊媒介、舞台表演、大众、文学史、教育等众多因素都参与其中,一起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茶馆》入座经典。对于这些因素,究竟孰强孰弱,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不好做出定论。有的因素可能在这个时期表现得较强些,在下个时期就相对弱些,有的是显性的存在,有的是隐性的存在,但把它们放入历史长河中来看各种因素发挥的力量可能又是平衡的。但目前研究者在论及《茶馆》的经典化时鲜有注意到政治和报刊媒介的重要而积极的建构力量,大多将目光集中于《茶馆》自身的思想艺术魅力和北京人艺卓越的表演艺术。此外,文学经典化过程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言明和照样复制的历史化过程,它不能用一个模式来概括,“我们不妨将经典化过程理解为这样一个相互缠绕穿插的三重机制的协同作用过程:文化生产场生产出对于文学经典的认知,新闻场或大众媒介场通过时间或长或

短的炒作强化了某些文学经典的地位,教育体制则通过教材或教学实践将某些文学经典永久化”^[13]。诚然,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存在这样的机制协同作用,但每一部文学经典都是在独特的历史语境下生成的,其经典化机制的复杂性难以说得一清二楚,正如人们永远难以给经典下一个标准定义一样。我们在《茶馆》的经典化过程中看到的不止三重机制的协同作用,而是远比其复杂得多。

参考文献:

[1] 艾略特. 艾略特诗学文集[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89-190.

[2] 童庆炳. 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71-78.

[3] 中国当代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7 年卷[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594.

[4]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专号(一)[N]. 文

艺报,1957-11-03(30).

[5] 张光年. 光未然戏剧文选[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6] 张庚.《茶馆》漫谈[N]. 人民日报,1958-05-27(7).

[7]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编辑组.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M]. 内部资料,1994:14-40.

[8] 曾令存.《茶馆》文本深层结构的再解读[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5):90-99.

[9] 李相银,陈树萍. 市民社会的重新发现:《茶馆》新论[J]. 戏剧文学,2007(11):30-34.

[10] 罗章生. 论茶馆派及其民族特色[J]. 学术论坛,1989(6):49-54.

[11] 孟繁华. 新时期文学创作评论选[M].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391.

[12] 董健,丁帆,王彬彬.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第2版[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1-132.

[13] 朱国华. 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J]. 文艺理论研究,2006(2):44-51.

(责任编辑:雷 鸣)

On the Canonization of *The TeaHouse*

Ji Kaijin^{1,2}

(1. School of Literature,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00,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00, China)

Abstract: *The Teahouse*, a classic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dramas, earns its classical position because of such combined factors as politics, culture, literary criticism, press media, stage performance, the public, literary history and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ization. For the process of canonization, the *Teahouse*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development stages. It was revered by the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became widely accepted in the 1950s; it gained popularity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and it became open and inclusive in a free and pluralistic context.

Key words: *the Teahouse*; canonization; co-construction

唐代军人家属配偶问题初探

刘啸虎, 焦 烨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唐代前期府兵制时代,原则上军人家属配偶留在原籍,不随军迁移。玄宗之后,依诏军人家属配偶亦可随军,但会面临某些问题。无论是否随军,军人犯法家属配偶连坐,军人战死则朝廷抚恤其家属配偶。以军人身份为纽带,唐代军人家属配偶的生活境况与军人的生活境况紧紧联系在一起。军人离世后,其妻子受周边社会影响,或寡居或选择再嫁。以上情况皆与唐代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 键 词:唐代;军人;家属;配偶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55-05

军人作为一个群体,在唐代社会中殊为独特。唐代前期承袭府兵制,军人平时务农、轮番服役,尚未脱离原有社会而形成独立的集团。唐代中后期府兵制溃败、改行募兵制之后,职业军人团体逐渐出现,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对此《资治通鉴》有言曰:“兵农之分,从此始矣。”^{[1]6753}毛汉光则明确指出,自从大士族在唐代渐渐走向官僚化和中央化,“以军镇为单位的职业军人成为强有力的社会势力”^[2]。唐代军人的生活状况受关注较少^①,而唐代军人家属尤其是其配偶同时拥有女性和军人家属两重身份,更有较大研究空间^②。本文试图对唐代军人家属配偶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努力揭示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唐代社会状况,并分析唐代社会变化给军人家属配偶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一、守家与随军

谷霁光指出,唐代前期各地折冲府的兵源和军

人家室居处皆有一定范围,即“地团”。也就是说,除番上、校阅,卫士基本上不脱离其家乡以及农业生产和本人原来的生活^[3]。府兵卫士番上服役时,家属仍留原籍,不得随军,加之兵户需举室捐业以供卫士所需,故而家中农业生产由军人家属承担。

所谓“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馁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4],唐立国行租庸调制,“庸”“调”所征的布帛原本即由女子产出^③。府兵外出服役,耕种也多经家中妇人之手。有唐一代,妇女参与农业耕种的现象十分普遍。《旧唐书·列女传》载唐太宗时雍州泾阳人杨三安妻李氏,在丈夫公婆皆过世后,带着两个孩子“昼则力田,夜则纺织”^{[5]5140},勉强维持生计。中晚唐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更有吟:“防戍兄兼弟,收田妇与姑。”^{[6]4532}家中男丁离乡从军,农业生产便由姊妹

收稿日期:2023-03-09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YBQ101)

作者简介:刘啸虎(1986—),男,山东省济南市人,历史学博士,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焦 烨(1998—),女,山西省晋城市人,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

①如冯尔康将唐代军户分类至“半贱民等级”,详参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宁欣亦将唐代军人归类为“下级阶层之社会边缘群体”,详参宁欣:《唐五代宋初都市社会中下阶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8页。

②本文以唐代军人女性配偶为主要对象,部分内容涉及其他家属如军人子女等,故统称“军人家属配偶”。相关研究曾论及唐后期兵士家属随军及其衣粮问题,详参方积六:《关于唐代募兵制度的探讨》,见《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10—120页。另有研究主张,魏博牙兵家属随军居魏州城内,家属日常生活供给主要为牙兵所受“给赐”,详参葛焕礼、王育济:《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见《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第157—161页。还有学者指出,藩镇军队中随军家属的生活来源是藩镇给予的“家口粮”、赏赐及官方拨给土地耕种的收益,同时提到健儿家口享有税收优待,详参朱德军:《试论地方性军人集团与唐代中后期的“地方独立化”》,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77—83页。

③李斌城等谈道,从事家务劳动与农业生产是历代以来农家妇女的共同特征。例如隋唐时,除了主持或操持家务,家庭纺织业也由农家妇女承担,因此她们必须在采桑、养蚕、缂丝、纺织等整个工序中投入大量时间。详参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妻子这些军人家属承担。除了耕作纺织,女子还要承担各种生产劳作。如有研究指出,巴峡女性极具特色且普遍的劳动是负水;峡江西部夔州女子多上山背柴薪;江南多莲藕,故江南女子多采莲、采菱等^[7]。更有研究总结道,唐代农家妇女平日除了蚕桑、纺织,还要采拾野菜野果、打柴和舂米,不少山区女子则以砍柴和卖柴为生^{[8]49}。不难想象,唐代前期府兵制下军人外出服役之后,其家属配偶除了日常劳作,还要承担原先男子负担的耕种等重体力活计,劳作繁忙。

在唐代前期,除了最著名的府兵,还有兵募等兵员。其主体为定期差遣,于长期战争不利,且至战争后期,征发之人多不能按时回乡,以致民怨沸腾。开元十年(722),玄宗从兵部尚书兼朔方军节度使张说之言,“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1]6753}。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又在边镇置“长征健儿”^{[1]6829},正式实行募兵制。为稳定军心,保持军队战斗力,使军人在戍守地长期稳定生活,唐廷遂允许军人家属配偶随军,并给田宅。《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天下诸军有健儿”条注曰:“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自今已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9]士兵及随军居住的家属遇到生活问题,则由当地镇守军的兵马使参与处理^[10]。由此,随着募兵制逐渐替代府兵制,军人与家属分离也变为家属随军。

其实及至唐中后期,军队为保障供给、避免粮食转运之劳,仍常在驻地屯田。比如,为防御吐蕃,京城长安西北地区军队以戍卒家庭为单位进行屯田^[11],随军家属需与军人共同耕作以助军需。此即前揭敕书“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的实际反映。从“其家口情愿同去者”亦可知,家属随军并非强制性的。终唐一朝,军人家属随军应未成定制^①。安史之乱后各镇由节度使实际掌控,家属是否随军因各镇情况而异。如上文所述河朔名镇魏博牙兵的家属便随军居魏州城内,且日常生活主要依赖牙兵所受之“给赐”,故魏博牙兵组建后逐渐“父子相袭,亲党胶固”^{[5]4692}。

又有唐末五代时,后唐孟知祥上奏:“遂阆黔夔等州自此差来所屯军都将士等,当府已厚给衣粮,尽令优足。其指挥都头,各随职次,悉以安排。虽因事以在川,固系籍而为国,但念各有家口骨肉在本管军营,居此者已有生涯,在彼者宁无离恋?”^{[12]1102}他请求准许将士家口入西川,后唐明宗却以“(两川)曾经战斗,必有杀伤”“去不相见,住无所依”^{[12]1102}为由拒绝。显然,孟知祥欲把军人家属一并迁入西川,从而更好地控制军队,割据一方。后唐明宗则洞悉孟知祥意图,不放将士家口入川,意在以军人家属为质,警告其勿有反心。反之,禁军家属却随明宗本人一同迁移:“明宗幸汴州,六军家属自洛迁汴,而明宗又欲幸邺都,军士愁怨,大臣颇为言。”^[13]

军人家属配偶随军,一定程度上可安抚军心,但军营之中诸事多有不便,难免引起一些问题。如据《新唐书·崔宁传》:“宁在蜀久,兵浸强,而肆侈穷欲,将吏妻妾多为污逼,朝廷隐忍,不能诘。”^{[14]4706}崔宁本因代宗大历三年(768)平蜀乱知名,后以久镇蜀地而行事愈发嚣张,甚至常有逼奸部下军人家属配偶之事。此类情况并不罕见,又如《新唐书·卢从史传》载:“(卢从史)既得志,浸恣不道,至夺部将妻,而能辩给粉泽其非。”^{[14]4660}卢从史为德宗朝昭义节度副大使,跋扈于本镇,部下军人与家属配偶只能忍气吞声。遇有战事,无战斗力的家属配偶如落入敌手,下场将更为悲惨。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起兵叛唐,颜杲卿与袁履谦举兵相抗,以身殉国。直到至德二年(757)唐军收复两京,史思明以河朔上唐廷,颜杲卿子颜泉明在河北一带访求两人的亲眷,才得以将“转徙贼中,穷窘无告”者数百人送到蒲州,颜真卿“贍给久之,随其所诣而资送之”^{[5]4898}。又有《新唐书·冯河清传》载:兴元元年(784),“浑瑊以吐蕃兵败贼韩旻等,泾人妄传吐蕃有功,将以叛卒孥与资归之”^{[14]4755}。此举虽最终并未得行,但兵败后军人家属配偶的命运之悲惨可想而知。

由上可见,家属随军固然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成为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的后盾,但也会被用以控制和要挟军人,成为其软肋。宪宗元和十二年

①有研究指出,直至宋代家属随军才成为定制,随军家属被称为军属,军属与士兵一起居住于军营,衣粮仰给于官府,生活费用一并纳入国家财政之中。详参张焕焕:《宋代军属研究》,开封: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页。另,宋代禁军在部队换防或“就粮”期间一并家属带去,但军队被调往前线作战或番戍等临时性调动时,家属则留在营地不随军而动。详参王云裳:《宋代军队经营问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2页。

(817)李光颜在郾城击破淮西军,郾城守将邓怀金十分恐惧。董昌龄劝邓怀金投降,并联络李光颜:“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质贼,有如不战而屈,且赤族。请公攻城,我举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14]5185}李光颜依计而行,邓怀金顺势归降。此役中,郾城将士的配偶家属皆被扣为人质,故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迂回请降,以求保护家人^①。这不禁引人思考:唐代后期藩镇节度使在允许军人家属配偶随军时,是否已渊图远算,准备战时以家属为质,从而更好地控制军队,以达到战事预期目的。

二、连坐与褒赏

不论是随军还是守家,若军人违反军令,依据情状不同,军人家属也要受到牵连。唐前期府兵制下,律令中严禁代人应征:“诸征人冒名相代者,徒二年。同居亲属代者,减二等。”^{[15]255}至高宗、武后时期,府兵制溃败,富人以钱代役者比比皆是,此条律令的推行效果自然不尽相同。更严重者,若军人在征战过程中有叛逃之实,家属或有连坐罪责,甚至有性命之忧。《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即载有高宗总章(668—670)年间诏令:“征边辽军人逃亡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并处斩,家口没官。”^{[5]2829}另,军人如“密有征讨而告贼消息”,斩之,“妻、子,流二千里”^{[15]259}。由此可见,唐代为加强对接对军人的管控,对其家属也予以严格的法律约束。

在唐代,政府对军人家属配偶自然也有褒赏。《太平广记》引《抒情诗》“张睽妻”^②条:“会昌中,边将张睽防戍十有余年。其妻侯氏,绣回文作龟形诗,诣阙进上。诗曰:‘睽离已是十秋强,对镜那堪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開箱叠练先垂泪,拂杵调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敕赐绢三百匹,以彰才美。”^{[16]2133}边将张睽之妻侯氏因思念丈夫,写诗呈

天子,希望早日放丈夫归乡。《全唐诗》亦记曰,武宗阅其诗,特敕张睽还乡,并赐侯氏绢三百匹^{[6]8992}。

除了上述特例,在唐代,更常见的是对阵亡军人家属的褒赏。即使在正史中,亦可见对节妇孝女迎尸骨的肯定、褒奖。卢惟清妻徐氏知晓丈夫战死之后,“倍道行至播川,足茧流血,得惟清尸,以丧还,阅岁至洛阳”^{[14]5823}。又有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父兄以防秋卒而戍泾州。元和(806—820)年间,吐蕃寇边,父兄皆战死。王和子听闻噩耗后,“被发徒跣縗裳,独往泾州,行丐取父兄之丧,归徐营葬,手植松柏,剪发坏形,庐于墓所”^{[5]5151-5152}。再有大中五年(851),兖州瑕丘县人郑神佐戍防庆州时战死,其女“乃剪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至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和葬”^{[5]5152}。按照唐代的规定,阵亡军人的尸骨一般要归葬原籍^③,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完全如此。玄宗时刘湾吟征南诏事,就有“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6]2012}之句。当然,军人家属配偶真正能远赴异地迎回军人尸骨者为数很少,军人尸骨仍多遗留于异乡,或由朝廷统一掩埋。如贞观二年(628)四月太宗即“诏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瘞”^{[5]34},贞观三年(629)十二月又“诏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勇夫殒身戎阵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伯乐、褚亮、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为之碑铭,以纪功业”^{[5]37}。尤其是在战场上,唐代通常采取就地殡葬的方式掩埋军人尸体^[17]。大多时候阵亡军人的家属只能收到死讯,而永远无法等到其遗体归乡安葬。

同时,朝廷间或对阵亡军人家属进行优赏抚恤。高宗显庆(656—661)年间,契苾何力镇压铁勒九姓反叛后,“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瘞”,并“蠲护其家”^{[14]4120},即免除死亡军人家属赋税并给予救济。有学者指出,唐代对于战死者家属会免除一

①不仅唐代普通军人家属配偶会遇到如此祸事,将领家属也难以逃脱。如德宗建中((780—783)年间,泗州刺史张伾被魏博节度使田悦围困于临洛,守城日久,城中缺粮,张伾“知事不济,无以激士心,乃悉召将卒于军门,命其女出拜之,谓曰:‘将士辛苦守战,伾之家无尺寸物与公等,独有此女,幸未嫁人,愿出卖之,为将士一日之费’”。详参刘昫:《旧唐书·张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08页。再有安史之乱时张巡苦守雍丘一年,城中粮绝,“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飧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坐视危迫’”。将士不忍食,张巡“强令食之”。详参刘昫:《旧唐书·张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00—4901页。

②又作“张睽妻”。详参彭定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992页。

③关于唐代军人死后归葬问题,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盛会莲指出,唐代法律对死亡将士安葬做了专门规定,实际执行中政府也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但仍与相关规定存在一定出入。详参盛会莲:《唐五代时期政府对死亡将士的抚恤》,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99—104页。李蓉的研究更为详细,其指出:唐代前期,军人尸体由同乡或军队运回;唐代后期,死亡将士尸体由军队或附近州县负责运回家乡;若遇战事紧急,则由军队统一于战地附近以礼掩埋。详参李蓉:《隋唐军事征伐礼仪》,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183页。

定时间的差科,而因在位皇帝不同,优恤赈给亦有不同^[18]。如德宗建中二年(781)九月“壬戌,赐立功士卒帛,禀死事家三岁”^{[14]187}。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平吴元济后,“葬战士,禀其家五年”^{[14]217}。对军人家口的赏赐同样见于诏令。如上元元年(760)肃宗改元赦文曰:“其六军及飞龙闲廐,加赐物。其成都灵武、元从扈从,递加有差。在外诸军,各录赏物。阵亡将士,优加褒赠。行人家口,所在赈给。”^[19]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唐军讨徐敬业之乱,军将成三郎为叛军生俘,宁死不屈,临就义之时向叛军大呼曰:“我死,妻子受荣;尔死,家口配没,终不及我!”^{[5]4876}所谓“妻子受荣”,更可见战死军人家属优赏抚恤之力度。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进讨王承宗前颁诏:“其有城镇将士百姓,守节拒贼,身死王事者,各委长吏,优给其家,仍具事迹闻奏,当加褒赠。”^{[12]626}唐后期各方节度使更多以私财赏军,并恩及军人家属。如宪宗时,鄂岳观察使柳公绰书生治军,“士卒在行营者,其家疾病死丧,厚给之”,士卒归心,纷纷效力,故柳公绰“每战皆捷”^{[1]7708}。

三、改嫁与守节

如前文所述,唐代军人家属随军并未成制度,多有家属配偶没有随军同去,留守等待便成为常态。对于留守家属尤其是军人配偶而言,不仅经济负担加重,而且饱受相思之苦,在感情生活中也要经受考验。

感情方面,如上述张睽之妻侯氏境况者,在唐代后期颇为常见。宣宗时,裴度子裴识初任泾原节度使,发现此地戍守军人常逾期不得归家,即“与立戍限,满者代;亲七十,近戍”^{[14]5219}。遑论战时状态下,甚至多有新婚未过丈夫即从军离乡者。如杜甫《新婚别》即吟道:“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6]2284}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乾元二年(759),唐军在相州之战中失利,损失惨重。撤退过程中,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而保东京,并于河阳周围大举募兵,填补军队缺额。杜甫就是在相州战败、兵荒马乱之际作此诗,以征人妇的口吻诉说战争之下民众疾苦以及对官军作战胜利的希冀。诗中妇人新婚之际送别征人,正是战时环境下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经济方面的考验也很现实,尤其是军人死于服

役征战后,家中失去男丁,家属配偶难免陷入困顿。唐末杜荀鹤有诗曰《山中寡妇》,诗中妇人或许并非军人家属,只是“夫因兵死”,但其困境已令人动容:“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6]7958}丈夫故去后,妇人的境遇由此可见一斑。

唐代军人死后,在以上双重考验下,其家属配偶还有一种选择,即再嫁。高世瑜指出,唐代妇女守寡后再嫁是当时普遍风气,政府为增加人口,还提倡寡妇再嫁^{[8]154}。张国刚认为,孩子年幼、本人年轻是唐代寡妇选择再嫁的一个重要原因^[20]。唐代军人家属配偶再嫁的原因其实更为复杂。《广异记》中记有一则关于唐代军人妻子再嫁的故事:“漳浦人勤自励者,以天宝末充健儿,随军安南及击吐蕃,十年不还。自励妻林氏为父母夺志,将改嫁同县陈氏。”^[21]丈夫还未战死,只是长期未归,妇人便被父母逼迫改嫁,由此不难推测军人战死后家属配偶之境况。当然,唐代军人配偶也不乏主动再嫁者。如《太平广记》引《乾闥子》“孟姬”条载,德宗贞元(785—805)末三原县有孟姬者,丈夫张察为郭子仪手下的兵士。张察死后,孟姬寡居十五年,“忽思茆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16]2924}。

可见,在唐代社会中,不论是被迫还是主动,军人配偶再嫁都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受彼时礼教影响,妇女选择再嫁者仍是少数,绝大部分失去丈夫的女子仍会继续留在婆家侍奉公婆舅姑、抚育幼子。正如前文提到的杨三安妻李氏,在丈夫去世后仍“数年间葬舅姑及夫之叔侄兄弟者七丧”,为太宗所嘉许^{[5]5140}。

四、结语

綜上文可知,唐前期府兵制时代,原则上军人家属配偶留在原籍,耕种纺织,经营日常。至高宗、武后时期,府兵制逐渐溃败,其后募兵制渐趋成型,当兵成为职业,军人家属配偶有愿同去驻地者,可随军而行。军人家属配偶随军一定程度上可安抚军心,成为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的后盾,但也随之带来一些问题,且可以用来要挟军人,成为其软肋。若军人违反军令,依据情状不同,军人家属所受牵连也不尽相同。而军人阵亡后,尽管朝廷间或对其家属进行优赏抚恤,但是缺少家庭劳动力以及感情慰藉,家属配偶仍可能陷入困顿之中。从守家到随军,唐代军人家属配偶命运的变化实际反映出唐代

军事制度乃至唐代国家与社会的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唐代府兵制时期,军人家属配偶要在家中担负起农事耕种,募兵制推广后随军家属亦往往从事屯田。她们不仅要与军人一同开垦屯田,有时还需面对严峻残酷的战事。随军家属也常被作为人质,用于挟制军人,极端情况下军人家属配偶甚至往往被抛弃。不难看出,唐代军人家属配偶处于弱势地位,她们只是作为军人的“附庸”而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女性地位在唐代社会中的真实反映。

参考文献:

[1]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胡三省, 音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2] 毛汉光. 中国中古政治史论[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370-371.

[3] 谷霁光. 府兵制度考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28-129.

[4] 白居易. 白居易文集校注[M]. 谢思炜,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417.

[5]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 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7] 淮利平. 唐代女性的社会经济活动研究[D]. 西安: 陕西

师范大学, 2007: 10-11.

[8] 高世瑜. 唐代妇女[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8.

[9] 李林甫. 唐六典[M]. 陈仲夫,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156-157.

[10] 刘子凡. 于阕镇守军与当地社会[J]. 西域研究, 2014(1): 16-28.

[11] 刘玉峰. 唐后期五代诸军州镇屯田营田的若干变化: 土地私有与国家基层政治体制的重建[J]. 文史哲, 2016(3): 156-164.

[12] 董浩.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3] 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徐无党,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620.

[14]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5] 唐律疏议[M]. 岳纯之,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6] 李昉.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17] 李蓉. 论唐代士兵亡故的善后处置[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5): 101-106.

[18] 盛会莲. 唐五代时期政府对死亡将士的抚恤[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99-104.

[19]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2.

[20] 张国刚. 唐代寡居妇女的生活世界[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3): 307-324.

[21] 戴孚. 广异记[M]. 方诗铭, 辑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71.

(责任编辑:李智萍)

On the Servicemen’s Dependents and Wives in the Tang Dynasty

LIU Xiaohu, JIAO Ye

(Biquan Academy &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fubing system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servicemen’s dependents and wives stayed in their native places and were not allowed to move with the army. After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zong, the servicemen’s dependents and wives were allowed to follow the army, but they would face certain problems. Whether the dependents and wives were with the army or not, they would be punished once the servicemen violated the laws. The government would compensate his dependents and wife after the serviceman died in battle. With the military identity as a link, the servicemen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closely related in the living conditions at that time. After the death of a serviceman, his wife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surroundings and choose to widow or remarry, which we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servicemen; dependents; wives

《帝王略论》中的先秦及秦朝帝王论

刘治立

(陇东学院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庆阳 745099)

摘 要:中国古代史论著作《帝王略论》卷一记录了李世民与虞世南对先秦至秦朝夏禹、秦始皇等帝王得失荣辱的讨论,在后四卷中也多次论及这些帝王的功过是非。这些论断对于贞观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玄武门之变被比作周公诛管放蔡的义举,贞观盛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先秦治世的悠长回响。

关键词:《帝王略论》;先秦;秦朝;虞世南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60-06

《帝王略论》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史论著作,书中虞世南与秦王李世民^①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探讨历代帝王的政治得失。卷一集中讨论了先秦及秦朝统治者的事迹,涉及夏朝三位君王(夏禹、太康、桀),商朝四王(成汤、太戊、武丁、纣),周朝七王(文王、武王、成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以及秦朝二皇(秦始皇、秦二世)。卷二至卷五在讨论汉朝至隋朝人物时,也多次论及先秦和秦朝帝王,并在人物品评范围上有所延伸,连带讨论了夏少康、周康王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鲁庄公、吴王夫差、楚怀王、赵武灵王等。本文结合相关材料,对《帝王略论》中关于先秦及秦朝君王的论断作一些探讨。

一、评断帝王的个人功过

先秦乃至秦朝是中华制度文明的肇始时期,从部落联盟到天下一统,从公天下到家天下,从禅让制到宗法世袭制,众多历史人物在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探寻他们的政治轨迹、分析他们的成败得失是《帝王略论》卷一的主题,也是后四卷中频频出现的话题。

(一)肯定圣君的功业

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后世推崇和膜拜的理想明君贤主辈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更是在层叠演绎和美化下,成为被仰视和仿效的对象。在《帝王略

论》中,李世民发问时屡次提及先秦和秦朝帝王的历史贡献,如称商汤“以武平乱,功施天下”^{[1]12},周武王“率八百之师称兵而灭纣”^{[1]29},秦始皇“并吞天下,平一字内,其规摹功业亦已大矣”^{[1]48}。

针对李世民的这些评断,虞世南一一做了回复。例如,他认为少康能在“夏氏之灭已二代”的绝境下“成配天之业”^{[1]78},光复夏朝,“中兴之君,斯为称首”^{[1]78},其功业在历代中兴之君中十分突出。结合商汤“解三面之网则翔飞被其泽,剪发为牺牲则黔首蒙其惠”^{[1]11}的行为,虞世南认为商汤是个“仁人”,不强调他开创商朝基业的武功,而赞赏他的仁德:“汤救焚拯溺以安天下,是故东征西怨,此非仁人之效欤?”^{[1]12}对于周成王和周康王时期的社会政治,虞世南以为“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逾”^{[1]55},从而予以肯定。另,卷五在分析北魏孝文帝的历史贡献时,认为其改制“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较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不亦优乎”^{[1]180};若论其“威仪技艺”,则为“鲁庄公之匹也”^{[1]180}。此处虽然主要讨论孝文帝的功绩,但也捎带品评了赵武灵王和鲁庄公。

(二)指摘君王的瑕疵

对于先秦和秦朝君王特别是历来受到赞颂的君王,虞世南以独特的眼光重新审视之,并予以客观的分析,不虚张其政治智慧,也不掩饰其理政过

收稿日期:2023-03-23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22YB118);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项目(QYYJC2305)

作者简介:刘治立(1965—),男,河南省洛阳市人,历史学博士,陇东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①《帝王略论》撰写于李世民即位之前,当时虞世南是李世民的“参军”,书中二人分别称“先生”“公子”。详参虞世南:《帝王略论》,陈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前言第1—2页。

失。例如,虞世南以为,周成王“有累世圣人之资,其聪睿不足怪也”^{[1]62},即其在前辈的基础上创造功业,要相对容易一些,但成王“疑周公以流言”^{[1]62},说明他还做不到用人不疑。再有,李世民询问周宣王能否称作“令主”,虞世南回答说,周宣王“为诗人所咏,其词甚美”^{[1]37},而“观夫人之事迹,殆不充乎雅、颂”^{[1]37},实际上其美名很不副实。随后虞世南还“详而论之”,分析周宣王即位时的社会状况、即位之初的各项举措,以及所谓“至治”背后的隐患、宣王晚年丧师千亩和料民太原之弊等,并引用《诗经》“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之语,认为他有始无终,犯了成为“令主”的大忌^{[1]37}。

(三) 批评暴君的恶政

先秦和秦朝的暴君昏主也不绝于书,夏桀、商纣、周厉王、周幽王都是众矢之的,秦始皇与秦二世更以其暴虐之君的形象长期受到口诛笔伐。如《帝王略论》批评桀、纣“恶被生民,害加百姓”^{[1]65},夏桀“狂暴,失道之君也”^{[1]12},纣王“刚猛暴虐,饰非拒谏”^{[1]25},周厉王“暴虐,毒流境内”^{[1]37},周幽、厉二王“暴虐无道”^{[1]41},秦始皇“贪暴”^{[1]48}成性,秦二世才不如秦始皇却遵其“贪暴之迹”^{[1]48}。

虞世南认为,帝王“无礼则乱,无道则虐,乱虐之主,害及生民”^{[1]12},对诸暴君昏主的败绩予以不同程度的批评。他还以桀、纣为代表,探究君主暴虐的根源:“彼二人者,非布衣草创之君,拨乱匡时之主,皆以承平继业,渐渍膏腴,外无师傅之严,内阙自然之质;不知稼穡之艰难,罔识前代之成败。及身居南面,血气方刚,富有区中,制御万物,威若雷霆,势逾风火。”^{[1]20}

二、比较帝王的治国得失

陈虎说:“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帝王略论》在对人物的评价中,广泛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1]前言5}卷一开篇伊始,《帝王略论》就借李世民“夏禹之德,何以不逮于尧、舜”^{[1]12}的疑问,从比较的角度将问题摆出来,而虞世南的回答也围绕着纵横比较展开。

(一) 比较仁德之优劣

如上所述,《帝王略论》所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帝王德业的比较。虞世南分别列举了尧、舜和夏禹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施政方针、仁德体现方式、社会评价等,认为尧、舜“为而不宰”,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而夏禹则亲力亲为,“敷九土,乘四载,达万国,定九州,刊木导川,其勤至矣”^{[1]2}。尧、

舜无为而治,百姓感觉不到生产和生活的干扰;夏禹身体力行,治理水患,确立社会秩序。尧、舜至圣之德“无迹可寻”,以致百姓说:“帝何力于我哉?”^{[1]2}夏禹不辞艰辛,东奔西走,人们切身感受到他的功绩,因此《左传》说:“微禹之功,吾其鱼乎!”^{[1]2}虞世南没有简单地将二者分出高下,他既赞扬尧、舜“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政治品德和境界,也肯定了三代德衰的大背景下夏禹勤政为民的政治品德,认为“帝王之功,莫此为盛”^{[1]2}。

另,舜之弟象曾经多次谋害他,舜即位后不仅没有打击迫害象,还将其封于庠地;而周初管叔、蔡叔勾连武庚作乱,周公将这两个兄弟或诛杀或流放。李世民据此发问道,周公“不赦管、蔡之罪而诛放之”,是否有惭德之嫌。虞世南分析说,表面上看两者都是兄弟之争,但性质是不一样的。象谋害舜的时候,舜还只是普通百姓,这种争斗属于一般的家庭矛盾,危害范围有限,仅是“一身之祸”^{[1]33},并不关涉国家大局。管叔、蔡叔等人的叛乱“则谋危社稷”^{[1]33},破坏周朝社会政治的稳定。周公诛放兄弟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盖以救率主之命而存宗周之祀。大义灭亲,斯此之谓”^{[1]33}。如果说舜宽宥弟弟象是“圣人之教”^{[1]33},那么周公诛放兄弟则是“爱王室”^{[1]33}的行为。

再有,班固曾言“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2],李世民询问此言是否恰当,虞世南一一点评四位帝王的德业,并予以高下之分:周成王和周康王“承文、武遗迹”,受周公和召公的辅佐,“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1]55};汉文帝“体兹仁恕,式尊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其行“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1]55},汉景帝等而下之。

(二) 比较功业之高下

在《帝王略论》中,李世民和虞世南多次比较先秦和秦朝帝王的功业,以更加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历史地位。例如,由于受到外族的威胁,周平王捐弃丰镐旧地而毅然迁都洛邑,受到一些人的讥刺。李世民也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布纲治纪”的准则,虞世南则说,迁都洛邑使周祚得以传延二十余世,“子孙勿替将三百年,此与大王居岐山其义一也”^{[1]45}。将周平王迁都与先周时期古公亶父因被外族侵扰而从豳地迁居岐山相比,会发现二者都是针对外部势力的避让行为,但《诗经》赞颂古公亶父“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3]537},孟子以古公亶父为“仁人”^[4],周平王迁

都却多受讥评。“度德量力,何所讥焉”^{[1]45},虞世南不赞成这种厚此薄彼的评断,认为两者对于周王朝的创基和延祚分别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虞世南还将他与东晋晋元帝作比较:周平王时周室衰微,政由方伯,而晋元帝“仁恕为怀,刚毅情少”,故“蹙国舒祸,其周平之匹乎”^{[1]111}。

虞世南比较少康中兴与光武中兴,认为此二帝“皆兴复先绪,光启王业”,但由于各自所具备的条件不同,“其名则同,其实则异”^{[1]78}。相比而言,少康“生于他国,不及过庭之训,曾无强近之亲,遭离乱之难,庇身非所”^{[1]78},通往中兴之路更加艰难曲折。虞世南还运用比较法,将多位帝王的政治得失更好地呈现出来。周成王家庭背景良好,“有累世圣人之资,其聪睿不足怪也”^{[1]62},汉昭帝则“父非武王,祖非文王,叔非周公;而卓然不群,风智如此”,这样看来,其优劣“相去远矣”^{[1]62},汉昭帝要高于周成王。秦始皇与汉武帝都在开疆拓土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其“骄奢暴虐”亦“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是在“开学校,盛文词,制度宪章,焕焉可述”等方面,汉武帝“方于始皇,则为优矣”^{[1]59}。

虞世南进行历史比较论证,是以历史人物在功业、品格乃至作恶方面具有可比性为前提的。例如他认为,在魏晋时期,只有诸葛亮这样的旷世奇才可以与伊尹、吕尚相媲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吕之俦匹。”^{[1]90}他反对不符合实际的强拉乱比。司马昭在杀害高贵乡公之后上书太后说:“欲遵伊、周之权,以安社稷之难。”^[5]曹奂诏封司马昭为相国,违心地称赞其功绩:“虽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劳王家,罔以加焉。”^{[6]40}“昔在周、召,并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鄴侯萧何,实以相国,光尹汉朝。随时之制,礼亦宜之。今进公位为相国,加绿綬绶。”^{[6]41}司马昭假意辞让,司空郑冲率群官以伊尹、吕尚的事迹为例劝进,“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周公借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奄有龟蒙。吕尚,磻溪之渔者也,一朝指麾,乃封营丘”,奉劝司马昭何必勤勤于小让,“宜承奉圣旨,受兹介福,允当天人”^{[6]42}。虞世南对于这样的历史比附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司马昭的篡弑行为与周文王、周武王、伊尹、周公不可同日而语:“方之文、武,不能竭忠叶赞;拟迹伊、周,遂乃伪杀彦士(高贵乡公字);委罪成济,自贻逆节,终享恶名。”^{[1]99}他进而指出,“斯言之玷,不可为也”^{[1]99},严厉抨击司马昭的自

拟和谀臣们的谄媚之词。

(三) 比较用人之得失

伊尹、傅说、吕尚均“擢自草莱”,虞世南在肯定他们是“命世大贤”的同时,也强调商汤、武丁、周文王慧眼识人。在讨论中,虞世南多次以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发现和使用人才的事实,来分析君王们的政治得失。例如,他将齐桓公和晋文公成就霸业归因为善于用人:“昔小白有鲍叔、隰朋,重耳有赵衰、子范,然克清宗国,遂伯诸侯。”^{[1]187}李世民问道,北齐文宣帝高洋狂妄悖逆至极,为什么却“国富人丰,不至于乱亡”?虞世南较之以齐桓公,来解答这个问题:齐桓公“奢淫无礼,人伦所弃”,将重大国事交付给管仲,因此能够称霸诸侯;文宣帝“鄙秽忍虐,古今无匹”,将政事委托给杨愔,因此得以“保全宗国”^{[1]194}。虞世南还总结道,即便自身有严重过失,但他们用人得当,“所以社稷犹存者也”^{[1]194}。

“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7]114}这里强调的是选取贤才与贤明政治的关系问题。李世民问道,太康的五个兄弟“竭忠尽智”,以辅其君,“上可以追尧、舜之迹,下可以安民尊位”,为什么却不能使夏朝免于危亡的厄运?虞世南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列举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和伍子胥的遭遇来说明鄙弃贤才的严重后果:“屈原非不智也,见放于楚。子胥非不忠也。流尸于吴。”^{[1]7}虞世南还做出历史假设,“使二主能用两贤,则楚为七国之雄,吴作九州之伯矣”^{[1]7},两国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通过这样的历史类比,虞世南揭示了太康失国的原因,进而总结出任用贤才、接受箴规的重要性。

(四) 比较昏暴之危害

先秦暴君数量较多,不仅经常被后人数落,而且如贤君尧、舜和文、武一样往往被后人频频并提,如桀、纣和幽、厉等。李世民问曰:“视桀、纣二主,亦同稟五常之性,并有过人之处,何为昏乱以致于此?”虞世南答曰:作为帝王,他们“不知稼穡之艰难,罔识前代之成败”,对尧、舜、禹、汤的事迹嗤之以鼻,不关心百姓死活,凭个人好恶施政,“怒则伏尸百万,喜则赏逾千室”,如此“安得不绝亡者哉”^{[1]20}。虞世南还提供了—个可资比较的对象:“彼始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贻训子孙,贪暴而已。胡亥,才不如秦政;赵高,智不及李斯,以暗主而御奸臣,遵始皇贪暴之迹,三载而亡,已为晚矣。”^{[1]48}

《帝王略论》在讨论后代暴君昏主时,也多次将其与先秦暴君作比较,如西汉昌邑王刘贺与桀、纣^{[1]65}以及北齐文宣帝与桀、纣^{[1]194},对不同时代的暴君一起进行挾伐。

三、概括帝王的理政启示

在评断先秦和秦朝帝王功过是非以及比较其治国得失的同时,《帝王略论》还注重分析总结其理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一) 弃仁用威,无以守成

虞世南以历史箴言来说明仁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易》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1]11}“仲尼云:‘骥不称其力而称其德。’”^{[1]12}李世民间问商汤最突出的道德品格,虞世南答以“仁人也”^{[1]11}。史书有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8]95}虞世南以该故事作为例证,来说明“仁人之利不亦远乎”^{[1]11}。

虞世南认为,与商汤相反,秦始皇“起秦陇之地,蚕食列国,遂灭二周而迁九鼎”,其成就可谓显赫,势力可谓威猛,但是他“弃仁义而用威力”,一味地推行高压政策,“贻训子孙,贪暴而已”^{[1]48}。秦始皇的治国方法“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1]48},而刘邦“信诚好谋,达于礼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赴”^{[1]51},不仅夺取秦朝政权,而且奠定汉朝四百年基业。

(二) 何代无贤,用与不用

历史证明,君主的明智是贤才得以展示才华的前提:“遴选大臣,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7]110}虞世南认为,各个时期都会有贤才,关键是看能否被发现和起用。他以“文王卜而遇太公,武丁梦而求傅说”^{[1]16}的故事,来说明贤臣对于君王成就事业的巨大作用;又以屈原和伍子胥的遭遇为例,来论证“何代无贤,用与不用”的问题,提出“人主若能观五子之诵以为鉴戒,欲求危哉,其可得乎?箴规要切,极于此矣”^{[1]17}。

一个君王的成长需要有贤人的诱导,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培养品格良好的帝位继承者,造就明智的君主。周成王在襁褓之中时,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9],后来出现成

康之治也就不足为奇了。同理,虞世南亦从秦二世的生活环境及幼年所受影响探索其昏暴的根源。“秦使赵高傅胡亥,教之讼狱,所习者无非斩、劓、肘足、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谣言,视杀人如刈草菅。”^{[1]145}不能将胡亥的昏暴简单地归咎于其个性,“彼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故也”^{[1]145},而与他所处环境、所受熏陶关系密切。“故选左右弼教之最急”,且具体人选不能仅“以位升”,更要“由德进”^{[1]145}。

(三) 见机而作,圣知时也

虞世南认为,“夫机者动之征也,非圣人弗能见也”^{[1]25}。他还举例说,周文王屈身事纣与周武王武力伐纣,都是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定。周文王时期,纣王的恶迹还没有完全显露,国力亦强,比干、箕子和太师疵三位大臣尚在,周文王还没有力量撼动殷商,只能“屈道事之,盖时宜也,龙蛇之蛰是其义乎”^{[1]25}。虞世南还援引《左传》“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圣知时也”^{[1]25}之语,来说明周文王的抉择是正确的。到了周武王时期,形势有所变化,主要是其自身力量的强大,“周公佐之,太公为将”,但周武王仍“曰纣未可伐”^{[1]25}。直至数年之后,纣王“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周武王于是以“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遍告诸侯^{[8]121},然后于牧野之战中一举击败纣王,完成翦商大业。虞世南由此强调指出,“圣人见机而动,动必万全,不疑滞于物以失机也”^{[1]25}。

当代学者许倬云认为,“周以蕞尔小国而能克商,既不能由经济力强弱作理由,又不能由军事力量的优劣来分高低,周之胜利只能由战略的运用以寻求解释了”^[10]。这种推论也是在强调抓住战机是武王克商的关键,与虞世南的认识是一致的。

(四) 修文允武,期于至公

周人灭商不仅有时机的问题,还有是非(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如上所论,周文王和周武王在对待纣王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前者“屈道以事殷”,后者“称兵而灭纣”^{[1]29}。李世民就此质疑道,如果周文王屈居美里含垢忍辱为是,那么周武王牧野伐纣就不恰当了;反之,如果周武王兴兵翦商为是,那么周文王屈服于暴君就不对了^{[1]29}。对于这样的质疑,虞世南以一年四季的更替和五行的运演作比喻,来揭示事物的是非不可一概而论:周文王很睿智,“晦迹藏用,所以显仁”,而周武王果敢勇毅,“发扬龚行,所以静乱”;周文王“修文”即修治文教,周武王则“允武”即修治武备^{[1]29}。两人的做法

异曲同工,不存在德业的优劣和运数的穷通。虽然他们的行为方式不相同,但是在济世庇民的目标上则是一致的,即“期于至公而已矣”^{[1]29},都是以苍生为怀,以公义公利为出发点。

四、帝王伟业在初唐政治中的回响

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以史为鉴的思想,《尚书》“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11]205}以及“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11]224}的鉴戒主张影响深远,《诗经·大雅·荡》也强调“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3]453}。唐朝以史为鉴的治国思想与先秦时期的鉴戒主张有很大联系。虞世南与李世民在秦王府共观经史,商榷古今,“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12]82},解决了李世民的许多疑惑。这些笃论深深影响了稍后的贞观政治。贞观七年(633),唐太宗与魏征等“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魏征以商周易代为例,说明大乱之后可致太平:“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12]39-40}贞观十一年(637),魏征给唐太宗上书说,要吸取“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12]12}的教训。先秦及秦朝君主的政治智慧被唐太宗所汲取,成为开创盛世的重要参照,而贞观盛世则是对先秦美好治世的悠长回响。

在讨论梁武帝的得失时,李世民问道,“人君修道,与匹庶殊乎?”虞世南答曰:人君者“君尊高之地,知生杀之权。势挟风云,力摧山岳,其威德大矣,其运行远矣”,其道德修养“以宏济为怀,仁恕为体”,且要“推此一心,以及万类”,而“区区一介之善,亦何取焉”^{[1]153}。以上述周公诛杀管叔、流放蔡叔为例,虞世南对周公做法的肯定就是在强调政治道德要高于一般的家庭伦理道德。而“诛管放蔡”行为在唐朝得以重演,也是以这一道德准则为行动依据。玄武门之变的前夕,房玄龄曾对长孙无忌说:“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13]2460}李世民因“同气之情,终所未忍”而犹豫不决^{[13]2498},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苦谏曰:“事急矣!若不行权道,社稷必危。周公圣人,岂无情于骨肉?为存社稷,大义灭亲。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成?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草泽,不得居王左右。”^{[13]2418}李世民终于放下了骨肉相残乃古今大恶的思想包袱,以周公为榜样,大义灭亲,将其兄弟李建成、李元吉诛杀。

《旧唐书》赞曰:“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13]63}“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文皇,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13]2438}诛除管、蔡成就了成康之治,而玄武门之变也确立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新唐书》对贞观社会的赞扬亦广泛征引先秦时代的圣君政治,将贞观之治与少康中兴、成康之治、宣王中兴相提并论。“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号称三宗。武王有天下,传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呜呼,可谓难得也!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14]欧阳修等认为,唐太宗李世民在翦除隋末群雄、恢复社会稳定方面的功劳堪比商汤、周武王,而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则可以与三代盛世相媲美;李世民“功德兼隆”,只能在前秦时期找到先例,汉朝以降再没有帝王可与其比肩。苏辙认为唐太宗是汉代以来最突出的贤君,“唐太宗之贤,自西汉以来,一人而已……自三代已下,未见其比也”^[15]。王夫之对李世民的品德颇有微词,但是对于其功业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读太宗论治之言,我不敢知曰尧、舜之止此也,以视成汤、武王,其相去无几矣。”^[16]王夫之的观点与《新唐书》很相近,认为唐太宗与商汤、周武王不相上下。

玄武门之变在历史上不仅很少受到指摘,还被称作“义举”,对此范祖禹持不同意见。他从究明义理的角度出发,对“论者或以太宗杀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昔者象日以杀舜为事,舜为天子也,则封之;管、蔡启商以叛周,周公为相也,则诛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将杀己也,故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尽其诚以亲爱之而已矣。象得罪于舜,故封之。管、蔡流言于国,将危周公,以间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诛之。非周公诛之,天下之所当诛也,周公岂得而私之哉?后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则当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乱天下之兄如管、蔡,则当如周公诛杀之是也。舜处其常,周公处其变,此圣人所以同归于道也。”^{[17]21-22}简言之,范氏以为李建成、李元吉“得罪于”李世民而非“天下”,不应当被诛杀,故“太宗之罪著矣”^{[17]22}。

事实上,封建时代的政治斗争是无情的,骨肉之情“在残酷的政争中不免显得苍白无力,世民此

举势在必行,未可厚非”^{[18]77}。虽然范祖禹以道德本位的理学准则对唐太宗李世民予以严厉抨击,但还是没有改变肯定玄武门之变的声音。当代学者认为,“是不是李世民就要因残害骨肉、夺嫡篡位而被视为历史罪人呢?不是的。在分析历史上这类武力夺权斗争时,人们不免囿于礼法或杀戮是非。正是这一点,使李世民似乎也洗不清不孝不悌之名。但是若从政权转移的合理性而言,违礼与杀戮并不是评判的惟(唯)一标准,商汤放桀、武王伐纣之类,也是以武力夺权,所谓以有道诛无道者也。所以李世民在被动情势下,主动发动玄武门之变,亦有其历史选择的合理性,‘遵周公之事’者,即(就)是此种合理性之历史根据也。”^[19]抛开具有或不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胡如雷亦直言“对这次事件持肯定的态度”^{[18]77}。

五、结语

正如陈虎所言,《帝王略论》“完全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统治集团的要求。所以,‘览前王之得失’‘以古为镜’,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和治国方略,就构成了《帝王略论》撰写的指导思想”^{[1]前言5}。贞观之治以及诸史家乃至当今学界对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评价就是明证。总之,虽然不乏一些微词,但虞世南与李世民在《帝王略论》中的探讨是符合传统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他们的某些主张在现代社会也有一定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虞世南. 帝王略论[M]. 陈虎,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2]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53.
[3]周振甫. 诗经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4]孟子注疏[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2.
[5]陈寿. 三国志[M]. 陈乃乾,校点. 北京:中华书局,1959:146.
[6]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7]马基雅维里. 君主论[M]. 潘汉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8]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9]贾谊. 贾太傅新书[M]//贾谊集. 何孟春,订注. 彭昊,赵勛,校点. 长沙:岳麓书社,2010:57.
[10]许倬云. 西周史:增补本[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88.
[11]尚书[M].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
[12]吴兢. 贞观政要[M]. 骈宇騫,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8.
[15]苏辙. 栾城集[M]. 曾枣庄,马德富,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261.
[16]王夫之. 读通鉴论[M]. 舒士彦,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3:575.
[17]范祖禹. 唐鉴[M]. 白林鹏,陆三强,校注.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18]胡如雷. 李世民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9]郑学稼,卢华语,张宇,等. 李世民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

(责任编辑:李智萍)

O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Qin Dynasty Emperors
i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Emperors

LIU Zhil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Long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Gansu 745099,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rst volume of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Emperors*, a work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Li Shimin and Yu Shinan discussed the honor or disgrace of the emperors of Xia Yu and Qin Shi Huang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Qin Dynasty. In the later four volumes, they had also been discussing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se emperors. These arguments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politics of Zhenguan Age and the Incident at Xuanwu Gate was compared to the righteous act of Duke Zhou’s killing Guanshu and exiling Caishu. To some extent, the prosperity of Zhenguan Age was also a long echo of the time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Pre-Qin period.

Key word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Emperors*; the Pre-Qin period; the Qin Dynasty; Yu Shinan

再论中晚唐五代都虞候城市治安权

——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

肖雷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2488)

摘 要:安史之乱后,都虞候巡警军营及军城的职责扩大至整个城市空间。对城市治安的接管是都虞候对军营散于城中的现实适应,也是保卫城市的必然要求。中唐以来,地方城市普遍修筑城墙,形成多重城或分城的结构,城市空间的分割导致新的都虞候职任的出现,都虞候职责的空间特征再次凸显。五代十国时期,某些地方城市升级为皇城,虞候转化为金吾,继续管理城市治安,这是唐宋之际权力之空间变化在虞候制度上的反映。

关 键 词:都虞候;城市治安权;子城;权力空间

中图分类号:K242;K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66-05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都虞候^①的职责,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最早开始研究,其以张自勉授官敕中所记“职在刺奸,威属整旅,齐军令之进退,明师律之否臧”作为都虞候之职的“扼要”描述^{[1]221},搜集了不少史料并总结道:“虞候职在整军纪、刺奸滑”“其职即在督察兵马故也”^{[1]236}。张国刚继承严文观点,同时指出藩镇职官的行军体制渊源^②,颇有启发性。其他涉及都虞候职责的文章主要在史料上多有补充^③,整体上超越严、张两文者不多。

安史之乱后,藩镇逐步扩展至整个唐王朝境内,虞候也由于整军刺奸的职责及其在藩镇节度使下的地位,开始插手刑狱。至晚唐五代,掌握马步院的马步都虞候(或称马步使)以置马步狱的形式

逐步侵夺了州县的司法权。马步院是北宋司理(司寇)参军的前身,因此很早就受到法制史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以室永芳三《五代时代の军巡院と马步院の裁判》^④一文为代表,其后国内学者陆续有成果面世,并集中于五代马步院刑狱形态、功能等方面^⑤。近年来,有学者梳理相关史料,将马步院的源头追溯至前代军候狱^⑥,丰富了认识。

总体来看,关于唐五代虞候的讨论大致从上文所述的两个方面展开,即维持军队纲纪的职责、侵夺地方司法权的马步院(狱)^⑦。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两种职责是前后相继的(前者并未随着后者的出现而消失),本质上它们都是以“人”作为说明虞候职责的落脚点(对象),前者为管理军人,后者为管理平民,那么关于虞候的权责是如何由管理军人纲纪发展到管理地方司法,相关研究或语焉不详,或

收稿日期:2023-02-17

作者简介:肖雷鸣(1998—),男,河南省光山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史研究。

①本文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虞候”“都虞候”,未特别说明时,可认为二词互通。

②详参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见《学术月刊》,1989年第5期,第71—76+81页。

③如王永兴:《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76页;荣新江:《唐五代归义军武职军将考》,见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91页;金建锋:《唐代都虞候的若干补充》,见《兰台世界》,2008年第14期,第44—45页。

④详参室永芳三:《五代时代の军巡院と马步院の裁判》,见《东洋史研究》,1966年第24卷第4号,第16—38页。

⑤如杜文玉、李洪涛:《五代立法与司法制度初探》,见《思想战线》,1986年第4期,第58—63页;刘琴丽:《五代司法制度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4—15页;张少利:《五代司法体制研究》,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1—33页;陈宇超:《中晚唐五代军人主狱论析》,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4—15页。

⑥详参张玉兴:《关于五代马步狱的起源及演变》,见《齐鲁学刊》,2019年第3期,第44—48页。

⑦有研究综合整理学界成果,将唐五代都虞候的职权概括为“整顿军旅,执行军法”“领军作战,接替藩帅”“缉贼捕盗,系狱理囚”。详参马龙祥:《唐五代都虞候的职权与地位演变》,见《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22—26页。

有意无意地忽略,截至目前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虞候在宋代城市管理中的作用,梁克敏将虞候放入唐宋时期城市治安的范畴中讨论其职能的变革^①。立足空间审视虞候职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个有益的尝试;但仅仅指出虞候在城市管理中的重要性是不够的,梁氏的这条路并未走得很远,其相关结论有再商讨的必要。强调都虞候职责的空间特征,对于理解都虞候的治安权与中晚唐五代以来的城市管理变迁很有必要。

二、“谁何”“警巡”:虞候职责的空间视角

学界在描述虞候的职责时,常以某个虞候的具体任务为例,抑或借助文本中的概括性论述。

(一)文献记载

关于虞候,《卫公李靖兵法》(《通典》引)、《太白阴经》的记载最为详备。虞候的职责大致可分为行军与下营两部分。据《通典》引《卫公李靖兵法》,行军时虞候的主要任务如下:“右虞候既先安营,踏行道路,修理泥溺、桥津,检行水草;左虞候排窄路、桥津,捍后,收拾阑遗,排比队仗,整齐军次,使不交杂。”^{[2]4028}下营时,虞候的任务则随之转变,其中有夜巡军营一项:“诸军营队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声唱号,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槊三下,方掷军号,以相应会。当营界探,周而复始。掷号错失,便即决罚。当军折冲、果毅,并押铺宿,尽更巡探,递相分付;虞候及中军官人,通探都巡。”^{[2]4031-4032}《卫公李靖兵法》记载的是唐前期的制度,府兵制还属健全,折冲、果毅之官仍行使着职权(“并押铺宿”),不过,虞候与中军官人“通探都巡”,掌握着整个军营的通盘巡视。

关于虞候巡视制度,约成书于唐代宗年间的《太白阴经》^[3]记载得更为详细且有条理。据《太白阴经》预备卷,“每日戌时,严警鼓角初动,虞候领甲士十二队,建旗帜,立号头,巡军营及城上”,巡夜过程中按规定“坐喝”“行答”^{[4]264},亦即《卫公李靖兵法》所记“方掷军号,以相应会”一事,不过此时已由虞候独掌。另外,在巡夜之前虞候判官持簿于大将军幕前取号,以供“坐喝”“行答”之

用^{[4]266-267},至次日五更左右虞候向大将军“报平安”^{[4]260}。每晚取号、巡视喝答,次日早报告平安,虞候“巡军营及城上”的整个流程显而易见,关键是其中的“城”应该作何理解。笔者以为,其狭义上指军城,广义上则蕴含着地方城市这种普遍意义。虞候巡视军城并无疑问,那么虞候巡视地方城市呢?安史之乱后,战争硝烟远未散去,安史余党拥兵擅地,藩镇由边疆逐步遍于内地,并逐渐形成“大都通邑,无不有兵”^{[5]4157}的局面。随着内地城市的军事化,虞候的巡视范围从军营及军城扩大至整个城市空间,拥有管理城市治安的权力。中晚唐虞候参与城市管理是节度使权势扩张的反映,也是地方城市军事化的结果之一。

两书中记录的差异反映了唐前期与中期军制的变化,而相形之下,后者更加详细地专门介绍了虞候的工作任务,且多为他书所无,极有价值。仔细考察李筌的文本,虞候管理城市治安职能的核心可概括为“巡营及城”“坐喝行答”,这在其他史料中则被省略为另外两个词语。据阎好问墓志,咸通(860—874)年间,幽州卢龙节度张允伸^②“试其巡警,授节度都虞候,有谁何之誉”^{[6]11239}。“谁何”,问之也,指稽查盘问,如此则幽州节度都虞候的职责可以称作“谁何”“警巡”。这两个词也见于他处,如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谁何、徼巡”之任^{[6]2448}、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左街使刘础“官奉谁何,力勤巡徼”^{[6]7501},与上述都虞候的职责基本一致。日本学者田头贤太朗的观点隋唐金吾卫的具体职责直接继承自北魏的虞候制^③也印证了这一点。虽然名称有所改换,但是都虞候城内治安之权责与长安城的金吾京城治安之任一脉相承,以军人管理城市治安可谓早有先例。

(二)具体事例

从现有事例来看,早在代宗时,安史之乱方告終了,虞候便已开始掌握城市的治安权。郑玉自大历(766—779)以来,前任莫州唐兴军左虞候,“以屏盗贼”,在任时“擒奸摘伏,抚弱遏强,井邑肃然”^{[6]10294},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升任该军都虞

①详参梁克敏:《变革与出路:唐宋之际虞候与城市治安管理体制的演变》,见《史林》,2020年第5期,第77—83页。

②阎好问墓志仅称燕国公,查咸通(860—874)年间在位的节度使,封燕国公者为张允伸。详参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79页。

③详参田头贤太朗:《金吾卫の职掌とその特质:行军制度との关系を中心に》,见《东洋学报》,2006年第88卷第3号,第1—31页;《唐皇帝的军事指挥权与金吾卫》,见《东洋学报》,2020年第101卷第4号,第61—91页。

候^[7]，“闻里怀其仁，乡党服其义，犬不夜吠，衣锦昼行”^[6]¹⁰²⁹⁴。加之他出身文职^[6]¹⁰²⁹⁴，转任武职后也是一副亲民面孔，不似军人作风。

至宪宗元和（806—820）时期重塑朝廷权威，分藩帅兵权给管下刺史^①，虞候管理城市之制在州郡层面普及开来。正因为如此，虞候巡警城市职能在中晚唐史料中大量出现。如在扬州地区，文宗大和（827—835）年间，杜牧入淮南牛僧孺幕府，“夜即游妓舍”，被厢虞候^②所察，“常以榜子申僧孺”^[8]；懿宗咸通（860—874）年间，温庭筠“醉而犯夜，为虞候所击”^[5]⁵⁰⁷⁹。两位著名诗人都曾在扬州与管理治安的虞候有过交集。《景德传灯录》则记载了名僧镇州普化和尚的故事：“师见马步使出喝道，师亦喝道，及作相扑势。马步使令人打五棒。”^[9]马步使（马步都虞候）“出喝道”是其职责，普化和尚冲撞之被棒打则是其警巡城市权的体现。这一记载生动再现了马步使（马步都虞候）维持城市治安的场景。

总之，以往的研究多注重虞候对人（军人）的纲纪刑杀，而忽略了虞候对地（城）的谁何警巡职能。当虞候对平民执法时，若从军民身份讨论无疑会得出军权侵夺民政的结论，然而从空间角度来讲，无论当事人身份如何，只要其犯禁，虞候就有权进行捉拿处理，这则是虞候的本职，并非越权之举。另，梁克敏认为“骄横跋扈的兵卒成为城市治安的主要破坏者”，导致“原来负责维护军纪的虞候逐渐参与到城市治安管理中”^[10]，而根据前文的考论，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在藩镇逐渐摆脱唐中央管制的背景下，自军队入驻城市起，城市就被打上军事的烙印，虞候自然获得对城市的管理权，即管理驻军城市是虞候原有职责的扩展，并不需要以士兵作乱为前提。

三、多重城市空间与都虞候一职的分化

虞候的警巡对象由单纯的军营扩大为军队所

驻的城市，这时由城墙围合为一个巡视单位，完全贴合其“巡军营及城上”之规定。然而当城市内部出现多城现象，虞候的警巡空间被分割，那么其职责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种分隔是会被无视，虞候仍以整个城市为职责对象，又或是在虞候制度框架之下衍生出具体对应的职任？“某城都虞候”职任为我们讨论虞候与多重城市空间的互动提供了线索。

（一）子城都虞候

晚唐五代时期，子城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大规模营建，这为子城都虞候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子城位于外郭城内，又称衙城、牙城、内城，以子城城墙可将大城分割开来，并为统治者提供了区别于控制外郭城权力的空间。中唐以来，藩镇遍布内地，骄兵问题突出，军人变乱频繁，且绝大多数发生在藩镇内部。为了防范这种内部威胁，修筑子城成为藩帅的当务之急。子城本已是城中之城，其内部甚至存在牙城^③，如此则形成了拥有两重至三重城墙的城市格局。

子城都虞候依附于子城，由于子城建设在时间上的滞后性^④，该职也出现得较晚。依目前笔者所见，唐宣宗大中（847—860）年间忠武军设有子城都虞候^[11]，五代后晋时期魏州亦设之^[12]。史书中所见实例不多，记载并不清晰，但北宋初年的一则诏书为我们了解子城都虞候的职能提供了窗口。开宝五年（972），宋太祖诏曰：“颇闻诸州州司马步院置狱，外置子城司狱，诸司亦辄禁系人，甚无谓也。自今并严禁之，违者重议其罪，募告者赏钱十万。”^⑤马步院长官为马步都虞候，子城司长官则为子城都虞候，子城都虞候与马步都虞候一样掌管刑狱治安事务（权限应在子城内）。

子城中多为官方建筑，以衙署为主体，包括仓库、军营等^⑥，军政属性突出。子城以虞候管理子城治安与稍早期的虞候管理军城性质几乎一致，由其派生出子城都虞候并不令人意外。与其他管理治安的虞候相比，子城都虞候管理子城治安更加名

①张达志认为，归还刺史兵权是宪宗“元和中兴”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另其文引述了多位学者关于唐后期刺史军权之讨论。详参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第二章《藩镇与州之军力强弱》，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77—104页。

②唐代军队在安史之乱前已分左右厢，都虞候下当有分管各厢的虞候，或由于该职地位太低，早期未被史书记录；或由于原无“厢虞候”三字连称一职，其后在唐晚期方出现。总之，应在军队中的虞候之制产生之初，便存在执掌此任的角色。

③如唐宪宗时鄂州有子城，内更有一牙城。详参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764页。

④经过大量分析，成一农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古代地方城市中的子城萌芽于汉，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普及于唐，在宋代开始衰落，最终在元末消失。”详参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⑤详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6—287页。另，点校本断句有误，此处已改。

⑥成一农对子城所下的定义为：“中国古代地方城市中围绕以衙署为主体，包括仓库、军营等在内的官方建筑修筑的城墙。”他还指出，百姓一般不在子城内居住。详参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副其实,这表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虞候一职出现了随空间命名的具化(或称分化)现象。

(二)其他“某城都虞候”

上文以子城作为典型说明城市空间格局对虞候治安管理职责产生着关键性的影响,我们还可通过其他城市格局验证这一点。唐宋时期,夏州在城市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东、西两城并立并环以外郭城的布局^[13],深受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重用的夏州军将康成此曾“补充东城都虞候,昼警夜巡”^[14],负责维持夏州东城治安。同时,夏州亦应设有西城都虞候及管辖整个夏州治安的都虞候等职司。

中晚唐五代还出现了府城都虞候与军城都虞候。依笔者所见,府城都虞候最早出现于元和(806—820)年间的昭义军^[15],时孟元阳为节度使^{[16]7676}。河东地区所见较多:乾符(874—879)年间,河东发生一系列军乱,相继有郭咄^{[16]8214-8215}、张彦球^{[5]4170}任府城都虞候;李存勖灭梁前,又有王某任北京(即太原)府城都虞候^[17];唐末,孟迁^{[16]8398}、孟知祥^[18]叔侄皆曾任河东军城都虞候。另外,河东府城都虞候郭咄(及马步都虞候张锴)辖下有捕盗司^{[16]8215},则直接证明这类都虞候是由都虞候制度发展而来的。目前来看,府城与军城的性质并不明朗,是否代指由城墙构成的空间还有待商榷,但都虞候前特地加上府城(军城)一词,既是对其权责的进一步确认,也规范了特定虞候所管理的特定区域,并不失为子城以外虞候治安职责与城市空间复杂化的另一互动产物。

再有,唐僖宗广明二年(881),由满城县令王悚所撰的《开元寺陇西公经幢赞》保留了易州高阳军的武职体系。刻文共载七人姓名,由高阳军使起列,前三人官兼军事、民政,后四人全为高阳军的武职。武职四人中,有三人任都虞候一职,自上而下分别是:马步都虞候石彦昭(都押衙兼)、军城都虞候张审言(讨击副使充)、衙城都虞候王景芳(兼右厢兵马使)^[19]。三者按地位及管辖范围排列,既依次包含,又互有分工,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易州高阳军虞候城防与治安管理体系。易州高阳军的实例为都虞候之职随空间变化而变化做了最贴切的说明。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空间的分割与城市格局的复杂化,虞候“巡军营及城上”职责依附于空间的

特性清晰展现出来,并导致虞候一职的分化,出现如上文所述的形形色色的虞候任职。无独有偶,原有作为军队编制的“厢”在唐宋时期也产生了地域上的词义,且分区警巡治安亦是核心的推动因素^[20]。

四、余论:从地方到皇城——虞候向金吾的转化

前文已介绍了田头贤太朗关于虞候与金吾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其论述集中于北朝隋唐时期,且未对空间问题进行讨论,唐末五代时期从虞候到金吾的转化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五代十国各政权皆以方镇立国,更改诸司名号是地方藩帅称帝建号的首要任务之一,故此由方镇虞候到王朝金吾的演化轨迹得以留存下来。兹以两例简论之。

(一)前蜀

在西南地区,前蜀建国前后的史实反映了虞候到金吾的发展。据前蜀开国功臣、魏王王宗侃墓志,其乾宁四年(897)正月至光化元年(898)五月任左厢马步使,撰志者段融描述此职曰,“昔时都候,今实执金,式遏奸邪,颇著威令”;天复元年(901)五月至当年九月任右厢马步使,段融又称王氏“累陟金吾之任,频司缇骑之荣”^[21]。“昔时都候,今实执金”之语将虞候与金吾等量齐观,段融立足于前蜀政权的这一追述或许存在疑问,幸而史籍中同时保留了虞候向金吾转换的直接材料。天祐四年(907)九月,王建于成都称帝,国号大蜀^{[16]8685},随之“颁分”台省府寺诸职司名号,“以正观瞻”^{[22]84}。其中,两马步使(马步都虞候)为“左右街使”,辖下厢虞候为“街巡使”^{[22]85}。街使自唐玄宗以来由金吾大将军兼领^①,马步使(马步都虞候)则自都虞候发展而来,即虞候与金吾名称虽异,而实际执掌为一。随着王建称帝,成都升为蜀国都城,虞候作为管理城市的长官也需要提高层级,故转以街使之名,以与皇城地位相匹配。

藩镇制下的虞候(马步使)制与皇权下的金吾(街使)制分别是地方与中央的象征,二者管理的地理空间本身或许没有大的区别,但府城与皇城之间、虞候与金吾之间,不同名号所代表的含义迥然不同。无论是就地理空间而言,还是就管理这个空间的职司而言,这种名号的变化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质变。

①关于金吾卫与街使的综合研究,可参考杨月君:《唐代京畿地区治安管理研究》第一章第二节《街使》,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46—62页。

(二)后唐

至稍晚一些的后唐明宗时期,天成三年(928)六月的一则敕书再次揭示了虞候与金吾的关联:“金吾卫每奏‘左右厢内外并平安’,有类藩方,宜改云‘军国内外并平安’。”^[23]“奏平安”是虞候与金吾卫的共通职能^①,五代十国各政权立国后更改诸职司名号,细节之处仍不免带有藩镇的痕迹。后唐时期金吾卫所奏左右厢代表着整个国都洛阳城,那么地方(即“藩方”)奏平安制度可以推测为“虞候每奏左右厢内外并平安”。尽管金吾卫的实际权限不会超出国都,但后唐君主改国都“左右厢”为“军国”的用意昭然,即彰显其一国之君的身份。

后唐明宗区别中央与地方“奏平安”的用词,以示尊卑之别,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权力与空间之互动。这种空间地域概念被定义为领地(或领土、地域),以表征不同的社会群体及其机构试图控制及主导竞争、冲突、合作等过程的空间产物^[24]。五代十国时期,从地方城市转变为帝都皇城者并不鲜见,虽然城市仍是那个城市,地理空间并未发生多大改变,但二者的政治意义悬殊。具体而微之,都虞候向具有相同管理空间职能的金吾的转化,充分诠释了十世纪前后藩帅领地到皇帝领地之蜕变。

总之,五代十国时期,从虞候到金吾的嬗变是各割据政权并立之局势在城市治安管理上的反映,是藩帅称帝后对其权力空间予以改造的产物。这为唐宋之际城市发生的深刻变化写下了生动注脚。

参考文献:

- [1]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M]//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
- [2]杜佑.通典[M].王文锦,王永生,刘俊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 [3]孙继民.李筌《太白阴经》琐见[M]//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期.[内部编印],1985:56-57.
- [4]李筌.太白阴经全解[M].张文才,王陇,译注.长沙:岳

麓书社,2004.

- [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7](乾隆)任丘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534.
- [8]王澐.唐语林校证[M].周勋初,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621.
- [9]道原.景德传灯录译注[M].顾宏义,译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704.
- [10]梁克敏.变革与出路:唐宋之际虞候与城市治安管理制度演变[J].史林,2020(5):77-83.
- [11]吴钢.全唐文补遗:第1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357.
- [12]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582.
- [13]袁怡雅.统万城遗址的空间格局研究[D].北京: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2017:65-85.
- [14]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政权的真实记录:记《故大宋国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J].宁夏社会科学,1999(2):68-71.
- [15]吴钢.全唐文补遗:第4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114.
- [16]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7]檀志慧,赵李菲.后唐安国军节度副使太原王公墓志考释[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5):18-21.
- [18]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404.
- [19]陆耀遒.金石续编[M]//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历代碑志丛书:第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71.
- [20]鲁西奇.唐宋城市的“厢”[J].文史,2013(3):191-246.
- [21]朱祎.前蜀王宗侃夫妇墓志校读及相关问题探讨[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21(1):195-215.
- [22]张唐英.蜀梼杌校笺[M].王文才,王炎,校笺.成都:巴蜀书社,1999.
- [23]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04.
- [24]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M].柴彦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21.

(责任编辑:李智萍)

①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田头贤太郎已作讨论,可参考其文中《从奏平安看皇帝与金吾卫》(笔者拟译名)一节,详见田头贤太郎:《唐皇帝的军事指挥权与金吾卫》,见《东洋学报》,2020年第101卷第4号,第71—72页。

晚清福建学政沈源深《劝学浅语》刍议

王夏刚,赵聪聪

(大连大学 历史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摘 要:福建学政沈源深在任职期间,曾经撰写《劝学浅语》,拟用以训导士子。该书主要包括做人准则、读书法则、作文应试方法等三部分内容,是对士子的全面告诫。该书反映了传统教育资源的近代转变,但其劝学特点迂缓,在近代社会隐而不显。

关 键 词:沈源深;《劝学浅语》;读书法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71-07

沈源深,字叔眉,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后移居河南祥符(今开封),咸丰十年(1860)恩科进士,光绪十六年(1890)十二月任福建学政,光绪十九年(1893)卒于福建,年五十一^{[1]289-290}。他在京任职时就“一意讲求”程朱理学^{[1]290},担任福建学政期间严守考试规矩,既不为达官子弟谋进取,也不以地方官的标准而徇情,更不因朱子后裔被黜而予以宽免^{[1]291}。他深得士心,“疾时上疏请开缺,诸生闻之,麇集使署,求勿去”^{[1]292}。其逝世后,“輿槨发,白衣冠送者数百人,咸太息曰:‘百年来无此好学使’”^{[1]292}。

任福建学政期间,沈源深曾编辑《士林模范》一书,颁行福建各学,同时又撰写《劝学浅语》一书以教导士子,惜该书在其任职期间未及刊行。俞廉三在序中称,该书“大指议论”一以朱子为依归,能够“持汉、宋学之平”,融贯古今,明体达用,可与曾国藩及张之洞的劝学言论相印证^{[2]俞序1}。陈宝琛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当时训勉士子的书籍以《教谕语》最为精粹,《辍轩语》最为通博,而《劝学浅语》则“内外交勖、体用兼赅”,可与二书并立,如果福建士人在学习过程中能够遵循该书的要求,发挥书中所讲的道理,就不会有“人亡政息”的遗

憾^{[2]陈序1}。胡廷干则称该书为“士林之圭臬,诸生之楷模”^{[3]胡序2}。本文拟依据沈源深所撰《劝学浅语》^①,考察其关于士子为学和为人的观点,以了解传统教育资源在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一、士子的做人准则

为学需先做人。在《劝学浅语》一书中,沈源深教导士子从立志、居心、敦品、尽伦等四个方面学习做人。

(一)立志

“人之有志,犹水之有源,木之有根。”^{[2]1}沈源深指出,为学必先立志,志向不同,成就不同。他将当时的士人分为三等,志向较高的致力于考据或治辞章,以纂述为其志向;其次则习帖括、工小楷,以获取科名为其志向;最下者则孜孜为利而已。孜孜货利与专事科举者不必论,即使是考据或治辞章时,如果不以义理为本,返诸身心,也不免会成为装点门面、不关身心修养的“务外之学”^{[2]2}。

沈源深不仅鼓励士人立志,而且教导士人“见得真、信得定”^{[2]2},立志做圣贤。“我之学圣贤,即我之所以为人,能如此,方尽人之道,不如此,即于人道有亏。”^{[2]2}立志以后,还要采取措施,以辅助志

收稿日期:2023-02-20

作者简介:王夏刚(1969—),男,山西省芮城县人,历史学博士,大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赵聪聪(1997—),女,山东省青岛市人,大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①华东师范大学王应宪认为该书虽署名“沈源深”,但实际上为王舟瑶代撰。详参王应宪:《〈劝学浅语〉作者考析》,见《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1期,第77—80页。此说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一是因为王氏稿本与刊本内容存在差异,二是因为该书刊布于沈氏逝后,而多人将此书的编撰归于沈源深,自有其理由。从该书的内容来看,理学气息比较浓厚,这与沈源深本人的经历接近,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该书是沈源深任福建学政时的作品,当然不排除其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幕友的襄助。

向的实现。例如多读经史及先儒格言,多交益友,“开卷与古人比较,出门与正人亲接”^{[2]3},这样就会胸襟开阔,见识不凡,志向更加坚定。

沈源深引述朱熹的话,勉励士子立定志向后,埋头去做,不可半途而废。“圣贤千言万语,无非说此事,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如两边擂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卷将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沈半浮,济得甚事!”^{[2]3}

(二)居心

沈源深指出,“人第一须将心地洗涤,洁净如青天白日,无可见人处,然后可言学问”^{[2]4},强调心地洁净、光明磊落在为学过程中的重要性。具体来说,“人居心须厚”,即“作一事,出一言,常恐有伤于人,严于责己,宽于责人”^{[2]5}。“居心又须平”,即“作事则恕以量人,为政则推己及人,论古则设身处地”^{[2]5},以及“论今则舍短取长”^{[2]5}。“居心又须虚”,即做虚心之人,“非第学养粹”,亦要“志量广”^{[2]5}。反之,如果“俯视一切,目中无人”,则“虽颇有志于学,而所学必至无成”^{[2]6}。

(三)敦品

沈源深指出,“士如良金美玉,其品最贵”,宜知自爱^{[2]6}。具体来说,自爱之道为重气节、严操守、养廉耻。

士农工商四民中,士最贵、商最贱,而自从科举取士以来,士子“挟孔孟之业,以博青紫之荣,口《诗》《书》而心富贵”,名义上虽为士,“实则皆市道也”^{[2]6}。商贩明白交易,取财无愧,但是不肖之士却“恃刀笔为长技,借衣顶为护符”,行“顶替、枪冒、包揽词讼”等不端之事,“有玷儒冠”,连商贾也不如^{[2]6}。

士人失去操守,做出如此劣行,大半是由于贫穷所致,因此,“欲立品,宜先安贫”^{[2]6}。安贫之道,“莫善于随遇而安,勿循俗见”^{[2]7}。如果遭遇困苦之境,不善排遣,便会很容易失去操守,但如果善于处理,也容易使道德精进。为学必先治生,“读而能耕,固为至善”,然而“近世士人,自幼不解稼穡,遽责以耕,亦人所难”,因此,他建议“学者治生,终以教授为本务”^{[2]7}。如若“游幕佣书,依人作活,终非自立之道”^{[2]7-8}。至于“萦情货利,别事经营,则

孜孜为利,不足谓之士矣”^{[2]8}。即如“闽省士人或托食盐商,此乃市井之事,非学者所当为”^{[2]8}。

沈源深告诫士子说,“处士犹处女”^{[2]8},不可轻易与人相见。“身不可轻见,文尤不可轻投。”^{[2]8}座主、门生之名自唐代以来已经存在,“主司之于士子,虽无道德之钩陶,犹为文章之知己”,而“最无谓者莫如世俗投拜之师”,不问道德,不论文章,“以势位为重,声气为事,货利为媒”,导致士习的颓靡、师道的败坏^{[2]8-9}。凡“稍知羞耻”的士子,“断不可轻拜人为师,亦不可轻受人之拜”^{[2]9}。另外,士子平日举动当以厚重为本,以轻浮为戒,尤戒“冶游”^{[2]10}。

(四)尽伦

沈源深倡导士子要行孝悌:“学者舍孝悌何学乎?讲学不本于孝悌,其学不足言矣。”^{[2]11}他批评世人“专以文辞为重,而置孝悌不讲”,导致“天下无佳子弟,而人才坏矣”^{[2]11}。五伦之中,父子之外,兄弟最亲,但当时人“视夫妇重于兄弟,以出妻为家室之变,而以兄弟分居为常事”^{[2]11}。如能体会父母之心,以之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则各种难题均会迎刃而解。“处家庭之道,惟自尽其职,最不可责报。”^{[2]12}因为“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见报则辍,故恩不能终”^{[2]12}。“戚党往来、宾朋交际”亦是如此,“施人不求报,受施慎勿忘,则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自然更不必担心家庭关系难以处理了^{[2]12}。

沈源深认为,与“世人之待兄弟,患在于寡恩”不同,“父之于子,夫之于妻”本应“以严为主”,实际“则又病溺爱”^{[2]12}。他以“近世之恶俗”争嗣为例说明之:“窃谓出后于人,人子所不忍言。盖为他人子而轻弃其父母,是不忍诸父之无子,而忍己之无父母。诸父之无子,是天绝之,己之无父母,是己弃之,于心安乎?”^{[2]13}如果“艳羨资财,群起纷争,是以资财而弃其父母也”,如此为人后者“是不孝且不廉也”^{[2]13}。

在沈源深看来,另一更为恶劣的陋俗是火葬,且“闽中此风最甚”^{[2]13}。“俗谓火葬为热葬,热葬之家,其兴必骤。夫停柩以图风水,使父母不得安于窀穸,其罪已不胜诛,今乃焚棺以求利益,且使父母不得保其尸骸,其人直同化外。”^{[2]13-14}据沈源深讲,其听闻“新死之尸,火烈筋缩,手足动摇,甚则

欻然起坐火中”,这种情形令“闻者心惊,谈者色变”,但“为之子者乃悍然不顾”^{[2]14}。“夫父母之于子也,抱之抚之,唯恐其不存”,而“其子之于父母也,烧之剔之,唯恐其不灭”,实不啻以“焚如之惨”报“罔极之恩”^{[2]14}。“如此得福,是无天道矣。”^{[2]14}沈源深还讲到这样的传闻:“山僻之人,虽不火葬,而既葬十数年,其家或不吉利,则归咎于坟墓,于是开坟检骨,藏之瓦器,名曰‘金瓮’,择地更葬。葬后或数月,或年余,辄复开验其骨色,以为红白则吉,黝黑则凶。假令黝黑,则又移葬他处。如是数四,至于财尽力疲,遂乃置之不问,狗啮狐搯,不几时,而瓮无余骨矣。”^{[2]14}针对这样的陋习,沈源深感慨曰:“欲求福田,须培心地,本心已亡,福于何有?”^{[2]14}最后,他还特别指出,士子读书明理,非“无知小民”可比,应不会做出如此“丧心昧良”之事^{[2]14}。

二、士子的读书法则

从性理部分开始,沈源深教导士子如何读书,其他三个方面分别是经学、史学、经济。

(一)性理

沈源深以“朱子精微”,主张“学者必当以朱子为宗”^{[2]15-16}。具体而言,“当以朱子《小学》为《近思录》之阶梯”^{[2]16},先读小学,次读《近思录》,但“近世《小学》不讲,自幼即以文辞为教,根基未立,遽令其读《近思录》”^{[2]16},则难以深入了解。读完《小学》《近思录》后,应读朱熹所注诸经。明儒语录方面,宜读薛瑄《读书录》、胡居仁《居业录》、罗钦顺《困知录》,以及吕坤《呻吟语》。清儒以二陆(陆世仪、陆陇其)、二张(张履祥、张伯行)为“正宗”,《思辨录》《杨园集》《三鱼堂集》“皆不可不读”,而《思辨录》“尤切实用”,《正谊堂全书》亦搜罗颇富,“皆宜究心也”^{[2]17}。如“欲知源流派别”,则必须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国朝学案小识》三书^{[2]17}。

沈源深告诫学者不可须臾脱离持敬之法,要“外正容貌,内整思虑”^{[2]17},且朱熹教人持敬之法“甚是简易,学者可无虑其太拘太苦也”^{[2]18}。沈源

深强调,“提醒此心”是为了做事,而不是空谈论道,无所作为。他指出,朱熹早已论及儒家和佛家在唤醒此心问题上的区别,即“其唤醒此心同,而其道则异”^{[2]18}。简言之,“吾儒唤醒此心,欲他照管许多道理,佛氏则空唤醒此心,无所作为”^{[2]18}。

至于静坐之说,“攻宋儒者亦以为禅学”,而不知“静坐是求放心之一法”^{[2]18}。人如果思虑纷挠、憧憧扰扰,怎能读书穷理!“必须静坐,以收其放心,始可为学。”^{[2]18}另,静坐即持敬,“并非虚寂之谓”^{[2]18}。沈源深还讲道,朱熹论静坐的方法“最为无弊”,学者“可以知所从事矣”^{[2]19}。

至于讲学,沈源深认为,不可“为过高之论”^{[2]19},而应“教人平实”^{[2]20}。讲学贵在“讲明性理,实见之于行事也”,最不可“空谈心性,冒居讲学之名”^{[2]20}。

(二)经学

沈源深指出,“欲为学必宜穷经”^{[2]20}。穷经之道,宜“先读古注、明家法、正音读、通训诂,而后义理可得而明”^{[2]21}。他强调,清朝诸儒治经方法之源“实开于朱子”,故不可数典忘祖、鄙薄朱熹^{[2]21}。

1. 治经顺序

沈源深主张,学者治经要循序渐进,先《毛诗》,次三礼,次《尚书》,次《春秋》,次《周易》。

第一,《毛诗》。沈源深认为,“毛传训诂最古,郑笺善言礼制,孔疏亦详核可据”^{[2]22},清儒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也可参考。学者“宜先读传注,以求名物训诂,然后用程子读诗法,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以求诗人之意”^{[2]22-23}。

第二,三礼。沈源深指出,学者宜先治《仪礼》,且以注疏为主,而以《钦定义疏》辅之。他强调,清儒胡培翬所撰正义^①采辑略备,“远出贾疏之上,尤为最要”^{[2]23}。另,读《仪礼》不可无图,图以张惠言所撰“为胜”^{[2]23}。

读《仪礼》时,可兼读《礼记》,如读《冠礼》可接读《冠义》。依朱熹《经传通解例》求之,读《礼记》亦当以注疏为主,而以义疏辅之。卫湜《礼记集说》、杭世骏《续集说》网罗众家,孙希旦《集解》采择最精,贯串三礼,均为读《仪礼》者不可少

^①胡培翬所撰《仪礼正义》四十卷,成书于道光(1821—1850)中后期,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仪礼》研究的权威之作。

之书。

《大戴礼》虽然“未立学官,然足与小戴并行”^{[2]23},宋时曾列为十四经,其注解唯有卢辩一家传世,清人孔广森、汪照俱有补注,学者对此二书以及王聘珍解诂均“宜究心也”^{[2]23}。

读《周官》亦应以注疏为主、以义疏为辅,“兼及近儒诸说”^{[2]23}。沈源深还特别指出,“此经晚出,中多可疑”,比其他经难读^{[2]23}。

分读上述各经后,学者还要“贯串三礼”,读陈氏《礼书》、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诸书。沈源深极其重视秦氏之书,言其“尤足包括诸家,急宜致力也”^{[2]24}。

第三,《尚书》。沈源深指出,对于晚出的《古文尚书》,虽然宋人吴棫、朱熹已经怀疑其伪,清人阎若璩又“尽发其覆”,但“圣贤之微言大义多在其中”,实不可废,且“其书无一字无来历,是魏晋儒者采辑而成,并非向壁虚造者可比”^{[2]24}。他还进一步言道,“欲识晚书源流”,需读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欲识今、古文之别”,需读段玉裁《尚书撰异》;“欲识古注”,需读王鸣盛《尚书后案》、孙星衍《今古文注疏》、刘逢禄《今古文集解》^{[2]24}。不过沈源深也提及这些书的不足,即其“皆偏于考据,而义理尚少发明”^{[2]24}。

第四,《春秋》。沈源深认为,《春秋》“三传之中,互有短长”^{[2]24}。除古注外,清儒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李贻德《左传贾服注辑述》、孔广森《公羊通义》、庄存与《春秋正辞》、陈立《公羊义疏》、柳兴恩《谷梁大义述》、钟文烝《谷梁补注》,“皆专门名家之书,不可不读”^{[2]24-25}。

第五,易学。沈源深主张,“学者读《易》,宜以程传为主”^{[2]25}。他对程传评价很高:此书“发挥人事,最切身心”,与“夫子学《易》寡过之旨相当”,且“自来《易》注,无过于此矣”^{[2]25}。同时,沈源深反驳清儒推崇汉易虞氏,认为虞氏之说“最为破碎,汉魏易家,今尚有遗说可考者,当以荀氏为胜,郑氏次之”^{[2]25}。

第六,其他。沈源深认为,学者欲读他经,“宜先致力四书”^{[2]26}。四书为“群经之总会”,理应先读,但不读他经的话,亦“无以尽四书之理”,故“四书者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2]26}。阅读四书应以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以《四书或问》为辅,“兼及宋元诸家说古注”^{[2]26}。清儒“于四书中名物训诂”虽有所补正,但“大义则不能易朱注”^{[2]26}。例如,沈源深批评毛奇龄《四书改错》中,“实多以不错为错,未足为训”^{[2]26}。他也指出,“近儒之说”并非全不可取,“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二书,采辑略备”^{[2]26}。关于四书,沈源深还强调,读四书前要打下一定的基础:“幼学读朱子《小学》毕后,当读《孝经》,然后可读《四书》。”^{[2]26}

沈源深以《尔雅》为“训诂之总会,群经之铃键”^{[2]26},主张读《毛诗》时先读此书,则容易了解诗中的名物训诂。他还提及清儒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二书,认为其“最为精详”,读《尔雅》宜以它们为主^{[2]26}。

沈源深指出,“读书宜先识字”^{[2]26}。他还主张,“识字宜治《说文》”,清人段玉裁、严可均、桂馥、钱大昕、王筠均精于此,学者宜先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及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三书,“然后及诸家说”^{[2]26-27}。

此外,沈源深认为,“欲通《小学》,宜及音韵”^{[2]27}。具体而言,宜先读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永《古韵标准》、龙启瑞《古韵通说》三书,“然后及诸家说”^{[2]27}。

2. 治经方法

治经不仅讲求顺序,而且讲求方法。沈源深认为,“治经宜守家法,最不可轻驳传注”^{[2]27}。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即使成说未必全部正确,“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2]27}。他批评当时的治经者“好自立新说,而于先儒之说每加轻驳”,认为这不仅悖于传统,而且实际危害颇大:“好立新说,而轻驳传注,非第有害于经术,亦且有害于心术,学者所宜戒也。”^{[2]27-28}

在治经问题上,沈源深并非一味墨守成规:“先儒传注固不可轻驳,然其说有误,不妨订正。”^{[2]28}他还提出,解经自当以经为主,“经有未明,始求诸注,注不合经,固未可从”^{[2]28}。同时,针对“今之言汉学者,则攻宋学,言宋学者,则攻汉学,言郑学者,于郑说不论是非,无不信从,而于王肃说,不论是非,一概驳斥”,沈源深特别强调,说

经“最不可有门户之见”,而宜“平心论断”^{[2]28-29}。

综上所述,沈源深明确了士子通经的目的,即“讲明圣贤之训,以为终身践履之资”^{[2]29}。他还一再指出,“分章析句不足为通经”,治经者“其知之”,进而“践言以实之”^{[2]29}。

(三)史学

沈源深认为,读史需先读经,经是体,史是用,读史不先读经则“无以为根柢”,读经而不读史则“无以扩识见”^{[2]30}。他以读志为读史的关键:“一代之制度、典礼、政刑、疆域,俱存于志。若不读志,而遽读纪、传,凡遇职官迁转、地理形势等,俱觉茫然。”^{[2]30}史表“视志为轻”,但“可补纪传之阙,而兼编年之长,便于寻检”^{[2]31}。他主张读史还需“识地理”,否则便“无以知战守之形势,识郡国之利病”^{[2]31}。

具体来讲,沈源深指出,学者欲知历朝大势,需“读《通鉴》,而以朱子《纲目》辅之”,至于“《通鉴》以前,则读刘恕《外纪》、金履祥《前编》,后则读李焘《续长编》、毕沅《续编》”^{[2]31-32}。他又以司马光《稽古录》一书“于治乱兴衰之故,言之了然”,向学者推荐之^{[2]32}。他还讲道,《通鉴》编年而不分类,“欲究一事之始终”,需读《通鉴纪事本末》及宋元明纪事本末^{[2]32}。此外,沈源深指出,学者欲识史法,需“读刘知几《史通》”^{[2]32}。

至于如何读史,沈源深着重阐述了以下两点:“读史贵有识,最不可以成败论人。”^{[2]33}“读史宜设身处地,遇到时事艰难处,当掩卷细思,若使我当此任,如何设施,如此方于身心有益,足以增长学力。”^{[2]33}而在他看来,时人在读史问题上的毛病正是“毫不动心,只作文字看过也”^{[2]34}。

接下来,沈源深还将“自来为史学者”分为数家:议论家“辨古今之成败,别人物之贤愚”,但或“未明时势,妄事苛求,其失也妄”;考订家“详年月之异同,证制度之沿革”,但或“徒矜记诵,无当闳深,其失也琐”;辞章家“摹龙门之鸿文,撷兰台之古藻”,但或“浮华是猎,大义无关,其失也泛”^{[2]34}。他指出,“大抵宋以来之为史学,多偏于议论,近之学者,又专为考订而已”,二者“实相资为用,不能偏废”^{[2]34}。

(四)经济

经济,即经国济世。沈源深指出,读书需“求

有用”,故“通经之士,必以致用为贵”^{[2]35}。他还援引朱熹的观点,主张“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2]34}。

沈源深不惜笔墨,分门别类地向士子推荐学习书目,乃至如何选书:

在阐述“体用之学”的书籍中,真德秀《大学衍义》、丘濬《大学衍义补》最为完备,学者不可不读^{[2]35}。

对于“当代之礼”,如《大清会典》《通礼》《礼器图式》诸书,学者均不可不读^{[2]35}。

学者欲识历代之典礼,需“读三通”;欲识清代之典礼,需“读皇朝三通”^{[2]35}。实录不易见,可读《东华录》以代替^{[2]35}。清代历朝所撰方略或亦不易得见,则可先读赵翼《皇朝武功纪盛》、魏源《圣武记》^{[2]36}。

学者讲求“治体”,需“多读诏令奏议”^{[2]36}。《雍正朱批谕旨》一书“最为切要”,前代奏议中明人黄淮等所编《历代名臣奏议》及乾隆敕编《明臣奏议》“采辑略备”,清代名臣奏议则可读名臣文集以及《切问斋文钞》《皇朝经世文编》《续经世文编》等所收奏议^{[2]36}。沈源深还特别指出,林则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的奏议“时代尤近,切用尤多,俱当留意”^{[2]36}。

对于历代名臣,“不第当读其奏议,兼当考其事实”^{[2]36},故“学者于昭代人物,必当留心”^{[2]37}。

“城乡学馆中,俱当看邸报”,其“为文策之用犹小,有益于经世之学实大”,学者不可不览也^{[2]37}。

士子还要究心律令。欲识清代律令,需读《大清律例》;欲考古律源流,需读《唐律疏议》^{[2]38}。

舆地之学“最切实用”,学者要读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识形势,知要害,为经世之用”^{[2]38}。

沈源深认为,洋务是当时“最要之学”,学者自宜究心,且要重点关注各国疆域、政教、风俗、兵法等“大端”^{[2]38}。电学、化学、矿学等虽亦有用,但“究属工匠之事,非经世之学”^{[2]38-39}。不过,若只是留心此类学问,则并非真通洋务,他还指出,“今日中国之病”在于上下蒙蔽、诸事敷衍、人心浮薄,而铁路未开、制造不精则在其次^{[2]39}。

接下来,沈源深还提醒士子们在学习经世济用之道时,要注意方法:经济之学“门类浩繁”,学者必须“专精一门,而后可及其余”^{[2]39};经济“虽由学问”,但需“加阅历,未可轻言”^{[2]39};学者有志经世,需“从本原上用力”,最不可有“虚僇气”^{[2]40}。

三、作文应试的方法

在作文应试方面,沈源深着重谈到作文的方法,并告诫士子作文最不可存得失之心。具体包括辞章和时艺两个方面。

(一) 辞章

沈源深认为,“无论道德、经济,非文则无以阐发而传后”,故学者“不可自命为文人,然亦不可不能文”^{[2]40-41}。作文的关键是“修辞立其诚”,修辞而不立诚则为“文胜质之史”,立诚而不修辞则为“质胜文之野”^{[2]41}。

作文始于学文。沈源深指出,文章“一代有一代之派别,一家有一家之渊源”,要博观历代文章之总集,识其派别源流,然后视性之相近、力之能及者而学之,方为有益^{[2]41}。他进而谈道,初学为文,“须读大家中深醇博厚之文”,以增长识力、激发志气,反之则易使人“气靡骨柔,文未工而志先坏”,为害匪浅^{[2]42}。他还提出,学者不可不致力于“诗古文辞”,如果有余力的话还可学“骈体及词”,才短者则不必学^{[2]43}。

至于实际作文时,沈源深指出,“诗、文无论工拙”,需“有真性情、真议论方佳”^{[2]43}。真性情即“直抒一己之怀抱”,真议论即“本诸一己之识见”^{[2]43}。如果没有真性情、真议论,则是自欺欺人,“不第文章不能成家,亦其人决非志士”^{[2]44}。

沈源深还特别强调,学习诗文“须从根柢上用力”^{[2]44}。他认为,道是文之根本,文是道之枝叶,学者需“先积理而后作文也”^{[2]44}。他还主张,“学者固不可不能文,而要不可苟作”^{[2]44},尤宜慎作“轻薄之文”^{[2]45}。

(二) 时艺

时艺专门针对科举考试而言,也叫时文、制艺、八股文等。沈源深告诫士子,“学作时文,不可专读时文、专作时文”,需“读经史以为根柢,学作古文以长笔力,读《楚辞》《文选》诸书以助才情”,否

则,“其文必不能佳”^{[2]46}。他还指出,如同治经需识家法,文章亦需“识宗派”,学为时文者必须将明清“诸大家集,一一寓目,分其派别”,而《钦定四书文》一书尤宜究心^{[2]46}。

沈源深认为,即使是时文,亦需“有性情,有骨力,有议论,有才情”^{[2]46}。他指出,“近日一种圆熟墨卷”,毫无性情、骨力、议论、才情,“貌为清真雅正,实则恶滥平庸”;另“或矫平庸之弊,因为偏锋侧调,或创奇格,自矜别解,自负心裁”^{[2]46-47}。在沈源深看来,两者皆不可取,“时文必从朱注,功令所在,尤不可忽”^{[2]47}。至于时文“体格”,他举例说,“或学古文,运以散体,亦足擅场,若楚骚诸体,断不可拟”,即“但不令合掌,不袭滥调,自不生厌”^{[2]47}。沈源深进而强调,时文“虽小道,然足觐人品”,故学文需“从大家入手,不第学其文,兼可师其人”^{[2]47}。

作为学政,沈源深还告诫士子,“作文最不可存得失之见”^{[2]48}。其意如下:“盖文若工,投无不利,倘又不利,自有命在”,并非人力所能为,而若存得失之见,“揣摩风气,迎合时尚”,可能文章未工、心术先坏^{[2]48}。

除了着重教导士子学作时文,沈源深专门论及应试态度。沈源深指出,“士生今日”,不得不学时文等,但需“读书为主,而分余功学此等足矣”^{[2]48}。在他看来,时文等仅“为进身之具,若学问、经济向未讲求,侥幸进身,何所设施?达则为庸臣,为俗吏,不达则为陋儒”,而无益于世,为人所轻^{[2]48}。为了增强说服力,在该书的结尾,沈源深引用朱熹的话,不仅告诫士子在读书上多用功、在科举上少用力,而且详细列举了时文不关身心、消磨士子气骨之弊病^{[2]48-50},兹不赘述。他指出,朱熹所言“皆极痛切”,恰中当时学者之病,提醒“诸生省之”^{[2]50}。

四、沈源深《劝学浅语》的劝学特点及效果

在《劝学浅语》中,沈源深鼓励士人立志,树立上进的信心。他注意培养士人的廉耻心,让其自爱,能够安贫乐道、随遇而安,能够体会父母的爱子之情,处理好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且要抱着施恩于人、不求回报的心理处理宗族关系。他抨击了福建

当时存在的争嗣恶习、火葬陋俗,以及迁葬的迷信。对于士子应该读哪些书、读书的顺序、读书的方法,他均进行了详细的教导。他反复强调读书要对身心有所触动,要增长识见,提高修养,不能光在文字上讨生活。至于如何做好时文,他和其他学政一样,均提出了以经史为基础,不可仅仅阅读时文、揣摩风气、迎合时尚。

沈源深作《劝学浅语》,希望士子能够希圣作贤,内外兼修,体用兼备,是对士子的全面告诫。相较而言,其告诫不如张之洞在《轩语》中所列举的那么全面,那么详细。在语行篇中,张之洞提出八要十戒,规范士子的言行^{[3]1-27}。在语学篇中,张之洞分别讲了阅读经、史、诸子和古人文集的方法,并通论读书方法^{[3]29-221}。在语文篇中,张之洞详细地讲解了写作时文的方法、时文学习和写作中的注意事项,以及试律诗、赋、经解、经文、策、古今体诗、古文、骈体文甚至字体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3]223-305}。他还另外列举了二十四条告诫教授初学者^{[3]307-315}。

陈宝琛、俞廉三均给予此书很高的评价,认为其可以与《轩语》《教谕语》并立,但是在晚清,《轩语》风行,《教谕语》也受到多位学政的重视,《劝学浅语》则隐而不显。究其原因,一是该书在

沈源深逝后刊行,未能产生在其学政任内刊行劝学书籍的效果;二是他在教导士子如何做人方面循循善诱,在指导士子读书方面也具体入微,但对于士人密切关注的内容即如何作文应试方面则着墨不多,具体的建议偏少。立志希圣作贤的目标显然过高,非一般士人所能企及,他们更关注能够改变其出身的具体规条,实践性强、对应试更具有指导意义的《轩语》可能更切合其需要。相形之下,沈源深所倡导的读书、做人、作文方法更加迂缓一些,因此,该书虽然可称得上是全面指导士子求学的书籍,被时人称为“士林之圭臬,诸生之楷模”,但在刊行后却未能引起较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闵尔昌. 碑传集补[M]//周骏富. 清代传记丛刊:第120册. 台北:明文书局,1985.
[2] 沈源深. 劝学浅语[M]. 1900(光绪二十六年)求实书院(长沙)刻本.
[3] 张之洞. 轩语详注[M]. 司马朝军,点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李智萍)

A Study About *Advice on Young Learners* Written by Shen Yuanshen, a Provincial Education Commissioner of Fuji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NG Xiagang, ZHAO Congcong

(School of History,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22, China)

Abstract: Shen Yuanshen, a provincial education commissioner of Fujian, wrote a book of *Advice on Young Learners*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which was intended to instruct young learners. The book mainly includes three parts: principles of conduct, reading rules, composition test methods, which was regarded as the caution for young intellectuals in all aspects. The book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modern times, but the effects are hidden and inapparent because of its slow and rigid style of exhortation.

Key words: Shen Yuanshen; *Advice on Young Learners*; reading methods

近代废止中医案破产缘由探析

曾 浩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 要: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意图废止中医,但是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此议案最终破产。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医药赓续悠久,底蕴深厚,形成了一定的社会信仰与依赖。无论是从患者及整个社会对医药卫生的现实需求出发,还是为广大医者及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考虑,当局不得不权衡废止中医所带来的民生问题。在政治博弈中,中医药界获得党政要人的支持,成功以权制权。西药大量输入所造成的经济漏卮也引发工商界对国家利权的考量。

关 键 词:废止中医案;中医药;西医;利权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78-06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医学的渗透和中医群体形象的负面化,晚清民初时期中国社会内部产生废医存药的思潮并影响了当局。1929年时,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审议余岩等人提出的中医案,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认同废止中医的提议。该事件被称为“废止中医案”。尽管该提案得以通过,但最终却在中医药界的抗争之下被撤销,并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出台了《中医条例》,使彻底废止中医的意图破产。从既有的线索来看,废止中医案起源于中西医学的碰撞,产生于西医对医学体系改进的要求和对中医药的简单化理解。该案破产的直接因素是中医药界的积极抗争^①,更深层的缘由在于中医历史赓续中的文化张力、医疗两大主体的现实需求以及国家层面的利权考量。当前对于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的研究多集中于中西医之间的学术论争和政治角力^②,对于废止中医案的破产缘由尚有探讨的余地,新史料有待发掘、新角度有待拓展。医疗问题涉及民生、经济、政治、舆

论等范畴以及医学本身,因而进一步探讨废止中医案破产根源有助于深化医疗社会史研究,亦能为当下中西医学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一、中医历史赓续中的文化张力

中国传统医学在民国之前一直是正统医学。它起自原始社会一种既通鬼神又兼医药的职业——巫医,而后随着巫与医的分离,中国传统医学的专业化走向开始显现。秦汉时期,医学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阴阳五行理论体系,并出现《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医经。东汉至西晋时期,内外诸科医学发展起来。医经和经方学在南北朝时期得到极大的丰富,本草学在这一时期也趋向分类发展,临床医学分科更加细化——出现妇科医生“带下医”^[1]。隋唐到两宋时期,药典学和医经经方大量集结纂注,诊法也在原有的基础上丰富起来。金元之后,医学中出现了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的论争,明清医家的论争则是其延续。

收稿日期:2023-03-01

作者简介:曾 浩(2000—),男,河南省周口市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①中医药界的抗争可分为政治上以权制权、组织上团结工商界、舆论上辩驳,并对内革新以求上进。详参曾浩:《变革与妥协——废医存药论下的民国废止中医案》,见《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29—36页。

②相关研究有陈珞珈:《解放前“废止中医”的前因后果与反思》,见《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1年第8期,第10—14页;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77—90页;郝先中:《中医缘何废而不止——近代“废止中医案”破产根源之分析》,见《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5期,第88—93+83页;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刘理想:《中医存废之争》,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版;皮国立:《近代中西医的博弈》,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近代废止中医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废止中医案的过程分析、中西医论争的性质判别等方面,多数成果侧重于对这个事件的详细解读和从宏观或微观角度对近代中医发展问题的讨论。

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始终具有连贯性,尽管其后出现了学派之间的论争,但都是在学理上的辨析——理论大多不出《黄帝内经》等书。这种情况就使得“中医传世,历数千年,其间学术之进退或殊,而社会之信仰如一”^[2]。中医药的影响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断绝,民众对于中医药始终是信任、依赖的。在民国东西文化激荡、欧化思潮与反传统主义涌动的格局下,医学处于守旧与革新之间,但力图变古法今的主体多为新知识分子,他们的变动意图与基层的传统积淀之间存在迟缓的反应期,仅仅依靠宣传教育和医学的实绩尚无法撼动国人的固有观念。

废医派往往将日本明治维新废止汉医作为仿效的对象。日本受西方医学影响,在明治维新时采取废止汉方医、全盘欧化的政治措施,取缔汉医学学校和汉方医生的执业资格,提用西医掌管医政,最终历经30余年基本废弃汉医不用。经过明治维新,近代日本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诸多留日学生和知识分子受西方医学和日本废汉医的影响,主张仿效日本,采取政治措施以革新中国医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西医界试图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借助政治力量废止中医。而当时日本之所以能够废止汉医转而移植西方医学体系,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旧医家不曾懂得《内经》真髓……他们所长的是训诂考据之学”^[3],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的汉医学问是从中国学来,并无自身的历史传统基础^①。中国近代西医界的本意是通过科学来救国,却忽视了中日两国医药界的差异性,忽视了中国与日本国情、民情和历史渊源的不同,事实上落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陷阱。中国沿革千年的中医信仰与依赖不会因为一纸政令而彻底泯灭,所以,尽管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的提案,却在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左右下难以真正落实和奏效。

二、医者与患者的现实需求

不同于其他方面,医学与民生的关系切实涉及两个群体——医者与患者。医学是一门职业,它拥

有自身的道德传统和行为准则,作为其主体之一的医者具备临床知识和技能,构成了全体卫生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以此为业,获得经济收入,实现生存延续。同时,医学也是一种社会建制、一种利于公众的事业,为患者的健康利益而存在,迎合着患者以及整个社会的卫生需求。

(一) 医者的生存要求

民生的关切自然包括来自中医药从业者的考量。这一时期中医药与西医药的从业人数相当悬殊。《科学世界》1935年4月期转载《申报》所统计的获国家行政管理部门颁发证书的全国医师人数,得出中国西医药师共9 727人^[4]。据《申报年鉴》,截至1935年底,中国登记在册的西医师共计7 881人,药师、助产士和药剂师总计4 431人^[5]。而1937年《药报》刊登的数据显示,全国西医登记人数仅为6 551,即使加上药师和药剂生,这一数字也仅为9 298^[6]。中医药从业者则远超此数。1936年《申报》刊文称,据“中央国医馆的印刷物”,“全国中医数量,约有十余万,其中成立职业团体的,至少二三万人”^[7]。另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有中医80万人^[8]。再以部分地区的中西医人数为例。1939年时,仅在册的江西省中医数量就有3 306人,这一数字尚且是来自省卫生处的统计资料^[9],基层中医的数量估计远超此数。相形之下,1941年江西全省在册西医药卫生人员一共才1 219人^[10]。1940年时,福建省各县区登记医师护士及药剂师总计635人^[11],同年各县区中医师人数为1 478人,且福州等25县区未呈报计入^[12]。

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部分地区来看,中医从业者都远多于西医。这些数字牵扯到的是无数医者的营生,因此在争论之中,废医派将两方争斗的矛盾焦点视为“饭碗”之争。一旦废止中医案真正施行,不仅会出现大量的无业人员,更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中医药界也以此为理由向政府陈情:“夫中医中药,销售至广,托生计于其中者何啻千万人。此种以中医药为生计之人,其父兄妻子兄弟之借以

①郝先中曾探讨受日本明治维新废止汉医影响的学界、政界和医界主要人物及其在废止中医案中的作用,本文则通过日本明治维新废止汉医的成功,反证西医在进入国情不同的中日两国后产生不同结果的内在缘由。详参郝先中:《日本废除汉医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影响》,见《皖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69—72页。

衣食者,又何啻倍蓰其数。即此一端以论,则中医中药之存废问题,固一绝大之民生问题也。”^[13]尽管实际上可能不及千万人,但是整个中医药行业群体之大也相当可观,政府在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废止中医带来的严重后果。

总之,从广大医药界从业人员的角度考虑,打破其“饭碗”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其无法承受的。民生问题事关重大,短时间内西医又无法替代中医,废医案的破产就成了必然走向。

(二) 患者的医疗需求

卫生事业维系着社会的正常运转,当国家卫生体系不够完善时,灾荒的出现往往造成大面积的疫病流行。在历时数千年的发展,中医作为官方医学,发挥着治病救人的巨大功用。近代以来,从城市到乡镇,其推行区域遍及中国各个地方以及世界上有华人之处,影响的民众数目累有亿万。在这种情形下,废止中医势必造成巨大的医疗事业缺口,如何予以填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当时,中国的西医人数远远达不到能够满足卫生行政需求的比例,且相关医疗资源配置呈现出区域分布严重不均的问题。对于这两点情况,西医界自身也十分明了。1929 年余岩在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另一议案认为,当下急需设法增加全国西医师人数,以推动卫生行政之进展。“大约医师一人,支配人口二千以上,已觉应接不暇,我国人口号称四万万,即以三万万人计算,须有医师十五万人,方可足用。”^{[14]71}而据余岩讲,上海实有医师“只有四百人左右”,以此推之全国,西医“至多不过五千人”,不足之数“实为十四万五千”^{[14]71}。即使西医教育机构“每年能出产毕业生一千四百五十人,则须一百年之后,方能满十四万五千人之数”^{[14]71}。另一提案人陈方之也谈道,“吾人欲谋医药之科学化,非造就十万人新医不可”^[15]。同时,西医资源的区域分布也存在巨大差异性。在中国近代社会,西医多分布在大城市,中小城市的相关资源则显得格外匮乏。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表示:“现在全国约有二千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

十之一二,其他十之八九县分,率皆受中医药之支配。在盛行西医地方,固应听人民之自由信仰,在绝无西医处所,亦决不能令人民坐以待毙。”^[16]如果废止中医,则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尤其是乡镇,医疗资源就成了空白。

求医的效用和资费也是病家关注的问题。医生的诊疗是否有效及其效用的强弱影响着基层群体对于中西医的整体看法。尽管近代中医界常有庸医害人的消息传出,西医负面消息也多见于报刊,并被中医引为反驳西医的口实。如梁启超“患尿血病”,寻协和名医诊疗,割肾、拔牙、绝食,“而病卒不解”^{[17]6}。还有,黄克强、蔡松坡、胡景翼、岑春煊和林修梅等知名人士均曾被西医误诊。中医对此嘲讽道,协和医院自称世界一流,其诊疗技术尚且如此,“下此可知矣”^{[17]6}。这一时期西医的还原策略思想虽然先进,对致病因素以及治疗方案等均有独到之处,但是临床医疗技术与之并不完全匹配,加之很多药物尚未发明,面对经验良方颇多的中医,西医的诊疗效用无法产生压倒性优势。此外,西医的部分技术虽然先进,但是其诊疗资费也相当高。以透视技术为例,20 世纪 20 年代,购置一台 X 光机的费用约为 5 万元^[18]。医疗器械的价格如此昂贵,医院的诊疗收费亦自不菲。1932 年上海东南医院的广告称,透视每次 4 元,肺部摄影 12 元,四肢 8 元(另有价目表)^{[19]3}。这还是“定价特别从廉”^{[19]3}下的状况。根据相关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某企业科员月收入 16~48 元,助理员 12~16 元^[20]。当时照射一次 X 线的费用在 10 元上下,并不是普通民众所能够承受的。

中国人口多,医疗资源比较紧张^①,得益于中医的深厚积淀,医患供需关系达到微弱的平衡状态。在短时期内全面废止中医、由西医承担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责任,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所不允许的。在近代中国,西医不仅人数少、资源分布不均,医疗的效用和资费也并不比中医更有优势。事实上,这不仅成为中医界进行抗争的底气,而且是决策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总之,以西医完全取代中医这种脱离了现实需求的行为无法真正撼动中医

① 西医人才缺乏的状况在废医案后的数十年内依旧严峻。按照湖南省教育会的估计,需 20 年方可培养足够的西医人才,实际上这一估计仍过于乐观。详参郝先中:《中医缘何废而不止——近代“废止中医案”破产根源之分析》,见《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 年第 5 期,第 89 页。

的根基。

三、政治与经济的深层考量

废止中医的提案通过之后,中西医药界之间的论争已经从学理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中医界对废医派的驳斥逐渐占据舆论阵地的上风,并借助政治力量实现反制。同时,鉴于中医药在国家经济层面的重要地位,中医药界与工商界联合起来,在利权之争中取得良好成效。

(一) 废与不废的政治博弈

废医派认为中国传统医药不合科学原理,不能承担卫生行政的诸多职责,在防控传染病等公共卫生方面缺乏有效手段。中医药界则直指废医派“僭越”先总理孙中山:“总理虽习西医,然生平著作未尝一言中医不合科学,谆谆以为‘知之为难’,是以病后尝屡延中医,时服中药。果中医不合科学,总理曾经研究科学医学,宁肯以身为试,而自冒不科学之名耶?然今之不革命份子,未暇一读总理遗书,未究中医药学,竟轻下断语曰,不合科学应即废止。举总理所不敢言者,贸然言之,此岂近人推翻总理革命之思想立场,抑总理之遗著,虽积四十余年之经验,尚不及近人之经验否耶?”^[21]¹⁶此言显然是从政治立场上为废医派扣上“帽子”。中医药界还揭起三民主义的旗帜,申斥废医派假公济私,违背三民主义,攻击废医派的行为是卖国阴谋,表示“中国民族与中国医药,实有共存共荣,不可消灭的理由在”^[22]。中医药界又进一步言道,“我国医学,肇自黄农,兴于汉季……至若天产药材之利于土人也,制炼药品之利于工人也,则又关于人民之生计,亦当注重者也”^[23],抨击西医界“诋毁排斥”中医,并“假政治力量以摧残,纯出私心,何处尚存公道”,甚至指斥其此行“不解自由平等,间接剥夺人权”^[24]。1929年3月,中医药界也在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明示,要以践行三民主义为己任,“改进学说,发挥民族之光荣,推广药材,用解民生之疾苦”,且“端赖运用民权,作正当之组织”^[25]。

中西医论争中还掺杂着政治势力的互相倾轧。在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支持废止中医药的背后势力是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当时,中医药自然也不乏支持者,如国民党元老派谭延闿、焦易堂、于右任

等人,因而中医药界代表进京请愿时,逐一拜访各党政要人,以求政治上的援助。在1929年首次进京请愿时,行政院长谭延闿即称此案“断无实行之可能”,并请请愿团成员谢利恒诊脉拟方;其他政要也给出了相当肯定的答复,如张静江、李石曾和陈果夫都表示会极力援助之^[26]。另,时任卫生部部长薛笃弼本是冯玉祥的部下,由他执掌卫生部是国民政府拉拢冯玉祥的政治举措。冯玉祥素来信奉中医,废止中医的提案通过后,他致电薛笃弼,就此事表明反对立场^[27]。由上述政要的表态可以看出,在国民政府内部,支持中医中药者占据了上风。在此次中西医的论争中,西医界意图借助政治势力废止中医,中医药界亦借用政治势力进行反抗,并成功以权制权,迫使废医派让步。

(二) 中西医之争与利权之争

除了政治斗争上处于下风,另一个让废医派颇为头疼的问题是利权外溢。近代以来,中国门户开放致使列国纷纷向我国出口其商品,全国工商行业普遍陷入困境。光绪(1875—1908)初年提倡国货已有微声,民国政府成立后大势为之一变,内政外交各项虽有千差万别,但提倡国货之政纲仍相因不改。中药一向是中国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海外输出,其课税等对政府收入贡献颇大。与此同时,西药的输入也在逐年增加,大大冲击了中药的产销,为中医药界提倡国货、反对废止中医提供了口实。

中国天然药材良多,在行销国内各地的同时,还常作为原料远销海外。以甘草为例。“奉天向产甘草”,其原产地分别以“古蒙之白音太拉及开鲁”“小库伦”“赤峰”为中心,1920年前后约有750万斤进入销售市场^[28]³⁵。因种类不同,奉天甘草的价格每百斤从40元到20元不等^[28]³⁵。“近年则交易渐多”,仅1919年的成交量就达200万斤,且大多向日本出口,小部分“由华商收买”^[28]³⁵。麝香因有特殊香气,常被用作香水的重要原料。我国川滇和西藏等地均有产出,当地所产麝香除了自用外,还装运出口。1911至1920年出口麝香量累计达3430公斤,“而以装赴法国为最多”^[29]。麝香价格自每斤310余两至330两不等^[30],尽管其间受到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年出口量仍为数颇巨,利益不菲。据中央国医馆统计,1933年中国出口

鹿茸、虎骨、桂皮、甘草、良姜、大黄等数十种药材，价值国币共计 900 余万元^[31]。另，川渝地区出口的药材以石斛、当归、党参、白芍、墨冬、黄连等居多，1933 至 1935 年仅重庆一地出口药材总价值就超过 1 480 万元^[32]。

除了用作原料，中药材加工后制成的丸散片剂价格更高，其利益于国家亦可谓相当重要。正如全国商会联合会致卫生部电中所说，“中医不提倡，中药无从提倡”^[33]，中医药本为一体，废中医则中药必受影响，中医不兴则中药难盛，而中药被进口西药所替代的话，又必然会损害国家利权。中医药界也正是从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抨击废医派的主张：“至言中医中药关系国计民生之巨，或为国人所不及料。统计药业职工达四百六十万人，药田面积达六十万亩，种药农工达二百万人，每年中药贸易达九千六百万万元之巨。然自西医侵入以来，虽国内西医不出一千人，而西药销数已达一万万元以上。果中医不合科学，总理之学说可以推翻，则今后西药销数，当十、百倍于一万万元之数。中国虽富，恐不胜此大漏卮也。”^{[21]6}1934 年 4 月，中央国医馆致湖南省政府公函中也提到，“今西医不足百分之一之用药入销，已年达数百万万元，假令中医药业一一代以西医药业，不特千数百万直接或间接从事于中医药业之工人农民陷于失业，巨量之西药入销，亦且不堪设想”^[34]。西药的大量输入致使中药的市场份额明显下降，这对中国工商业者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情况。有鉴于此，中医药界借助国货运动，以捍卫民族经济利益为名对抗西医药，且使废医派无从反驳。

四、结语

在近代革新的大势之下，部分西医界人士提出全盘废止中医，改植西医体系。这一论调在 1929 年首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以《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提案的形式通过，但是该案废止中医的企图并未得逞，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之下最终破产。

尽管中西医学的对抗有其必然性，废止中医案确实给中国医药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面对外来事物，中医药界不再故步自封，转而以积极的态度对内改进，寻找发展方略。西医药界攻讦中医“非科学”，理应废止，恰恰忽视了中医发展所缺乏

的正是政府的充分关注和有效管理。虽然传统中医药无法用现有的科学理论来一一解释，但是传统医学中具有相当丰富的待发掘内容，不能简单地以科学或不科学来判定一个医学体系的价值。中医药学中辨证施治的治疗模式、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医学思想以及因势利导、祛邪扶正的治疗思想均有很突出的借鉴意义。总体来说，在废与不废的论争中，两种医学作为关于“人”的学问都试图以理论与实践证明自身价值。当前中国正大力发展医疗事业、弘扬中医药文化，如何恰当地引导发展和利用中西医价值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范行准. 中国医学史略[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6: 112-113.
- [2] 仁. 中医之命运[J]. 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月刊, 1925 (41): 1.
- [3] 恽铁樵. 中医与日医[J]. 医界春秋汇选, 1927 (1): 46-47.
- [4] 中国医药师人数[J]. 科学世界(南京), 1935 (4): 377.
- [5] 全国医药人员登记人数(至二十四年底为止)[J]. 申报年鉴, 1936 (1): 1296.
- [6] 全国登记医药师人数[J]. 药报, 1937 (47): 122.
- [7] 汪企张. 对于国民大会医师代表选举上的疑义和研究[N]. 申报, 1936-08-11 (15).
- [8] 黎崇裕. 一个青年中医之路: 从经方庙堂到民间江湖[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283.
- [9] 江西省中医人数统计[J]. 江西统计月刊, 1939 (3): 38-40.
- [10] 江西全省医药卫生人员人数统计(三十年三月)[J]. 江西统计月刊, 1941 (9): 33.
- [11] 各县区登记医师护士及药剂生(民国二十九年)[J]. 新福建, 1942 (2): 108-109.
- [12] 各县区中医人数(民国二十九年)[J]. 新福建, 1942 (2): 107.
- [13] 是人. 中医药存废与国计民生之关系[J]. 医药学报, 1930 (4): 15-16.
- [14] 余岩. 中宇第一二号: 急须设法增加全国医师人数, 以利卫生行政之进展案[J]. 医药学, 1929 (3).
- [15] 陈方之. 中宇第一三号: 医药教育大纲[J]. 医药学, 1929 (3): 74-80.
- [16] 薛长部对于中医药存废问题之谈话[J]. 医界春秋,

1929(34):50-51.

[17]吴汉仙.力驳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废止旧医畸形式之议决案宣言[J].医药指导录,1929(1).

[18]关立深.X线诊断技术在中国的传播[M]//张大庆,陈琦.近代西医技术的引入和传播.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69.

[19]上海东南医院.技术精良取费最廉之东南医院X光线室[J].东南医刊,1932(3).

[20]关永强.近代中国的收入分配:一个定量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0-171.

[21]陈存仁.以孙中山先生行易知难为根据论中医是否合于科学应否加以提倡[J].医界春秋,1929(34).

[22]云溥.三民主义和国医药的关系[J].医林一隅,1934(5):7-9.

[23]宋觉之.民生与医学之关系[J].世界医报,1930(9):65.

[24]王一仁.三民主义与中国医药[J].医界春秋,1927(13):1-2.

[25]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第一日之盛况[J].医界春秋,

1929(34):40-43.

[26]废止中医案,经绝大努力以后搁置不提,并奉蒋主席谕撤销禁錮法令[J].中医药情报,1947(6):6.

[27]刘理想.中医存废之争[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97.

[28]奉天之甘草贸易[J].医药杂志,1920(6).

[29]中国出口之麝香[J].医药杂志,1921(5):52.

[30]中国出口之麝香[J].实业杂志,1921(41):22.

[31]药材出口指数表[J].中华医药,1937(4):57-59.

[32]廿二至廿四年,渝市药材出口统计:共值洋千四百八十余万元[J].蜀曦,1936(3):9.

[33]全国商联会与卫生部再论中医电[J].医界春秋,1929(34):23.

[34]函湖南省政府案据长沙市国医药公会常德县国医公会暨医士易南坡等函电以湖南省政府公布十年卫生计划侵袭中医药业用特函请复议解放学术利济民生文[J].国医公报,1935(3):17-18.

(责任编辑:李智萍)

A Probe into the Cause of the Failure to Abolis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ZENG Hao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In 1929, the Central Health Committee Meeting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ssed a bill which was intended to abolis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wever, it turned out to be a fail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ontext, with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d formed some social beliefs and dependence. The authorities had to weigh the livelihood issues caused by the aboli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sidering from the practical needs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for patients and the entire society, and from the livelihood of many doctors and relevant practitioners. Thus, in the political gam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industry won the support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and successfully controlled power with power.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loss caused by the massive import of western medicine, the business community had to tak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rights into account.

Key words:the bill of abolish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stern medicine; interests and rights

论庄子生命观的三重维度

陈健^{1,2}, 张宗明²

(1. 皖南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2.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文化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对生命的思考和探寻是庄子思想的鹄的,其生命观包含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个维度的内容。其自然生命观倡导保身、全生、养亲、重生而不惧死,社会生命观主张事亲、事君、均调天下、退仁义、宾礼乐,精神生命观强调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立鲲鹏之志。庄子生命观体系完备、内涵丰富,体现着对自然生命的呵护、社会生命的关注和精神生命的高扬。

关键词:庄子;生命观;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84-05

人是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集合,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交织影响,并存于个体生命之中。首先,人是自然性存在,自然生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和前提。再者,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拥有社会生命,是一个社会性存在。最为核心的是,人是具有意识、思维的精神性存在。故而,人之生命存在兼具三重维度,即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

庄子哲学的本质是生命之学。《庄子》一书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命智慧,对人之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及精神生命给予翔实且充足的阐释,形成了见解独特、内涵博大、体系完备的生命观。当前,源于激烈的社会竞争、膨胀的物欲需求、多元的价值判断等,自然生命淡化、社会生命弱化、精神生命虚化等生命乱象与危机日益加重。因此,本文从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三个维度系统剖析庄子生命观,以期有助于世人认识生命的本质、审视生命的价值、提升生命的境界。

一、自然生命观

关注与捍卫自然生命是生命存在的第一要旨,人拥有了自然生命,才可以谈及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自然性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根本属性,是人作为社会生命与精神生命存在的先决条件。固然,过于强调生命的自然性,人便沦为一般存在物。关于人的自然生命,庄子有着十分深刻且辩证的论述。

(一)保身、全生、养亲、尽年

《庄子·养生主》篇^①论述养生的要旨,开篇便阐明了“保身”“全生”“养亲”“尽年”^{[1]108}的观点。保身就是保护身体,避免自然生命受到损伤。全生就是“全其生道”^{[1]110},确保自然生命的完备。“‘亲’或为‘身’的借字”^[2],养亲即养身,也就是对身体的养护。尽年是说通过上述方式与手段,使得自然生命最大限度地享尽天年。

那么,如何做到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呢?庄子提出“常因自然而不益生”^{[1]202}的主张。他认为养护自然生命的要义在于“常因自然”,反之则为“益生”。在他看来,违背自然刻意养生便是“益生”,就会出现“养过其极,以养伤生”^{[1]108}的情况。因此,在《养生主》篇,庄子指出真正的养生者应“依乎天理”^{[1]111}、“因其固然”^{[1]111-112};在《达生》篇,他提出“与齐俱入,与汨偕出,从水之道”^{[1]583}的因循自然之人才是真正的达生者;在《刻意》篇,他则批判了“道引”之士“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

收稿日期:2023-02-21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AHSKQ2020D97)

作者简介:陈健(1987—),男,安徽省定远县人,法学博士,皖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从事先秦道家哲学与中医文化研究;张宗明(1966—),男,江苏省南京市人,哲学博士,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中医文化研究。

①下引此书,只出篇名。

经鸟申”^{[1]476}的益生行为,认为他们违背自然规律,在刻意地延寿。

庄子关注自然生命的存在,不仅倡导“常因自然”的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而且通过辨明外物与生命的关系,希冀人们能够辩证地对待名闻利养,不要因此而伤身害性。在他看来,财富、名望、权力均为外物,对于生命而言它们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然而,现实情况是从尧舜禹三代开始,小人为利而殉身,士、大夫、圣人为名与事业而殉身:“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1]293}尽管他们所追逐的外物名号各不相同,但均是以残生为代价。可见,庄子清晰地认识到,财富、名望、权力只是体现生命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生命本身。一旦人们执着于这些外物,舍身忘我地去奋力角逐时,便会遗忘生命本身,置身体于不顾,伤身害性、沦为外物奴隶。所以,他有感而发:“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1]851}

(二)重生而不惧死

死亡是人生无法避免的,如何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勇敢地直面死亡是诸多哲学家思考的核心命题。作为道家重要代表人物,庄子对于生与死有着深刻而辩证的见解。他在珍视自然生命存在的同时,并不回避死亡,而是秉持直面死亡的态度,显现了哲人的豁达与超脱。为帮助人们摆脱对死亡的困惑与畏怯,更好地完成生命的历程,他提出生死一体、死生无惧、向死而生等主张,引导人们树立重生而不惧死的生死观。

关于生死关系,庄子认为生死一体、同根同源。“道”是生命的本体与本源,生命由“道”而生,最终复归于“道”。生与死均在“道”中运行,是“道”在大化流行中两种不同的表现样态。故而,他提出了“死生存亡之一体”^{[1]235}、“以死生为一条”^{[1]189}、“万物一府,死生同状”^{[1]368}等主张。这里的“一体”“一条”“一府”就是“道”。既然无论是生还是死都寓于“道”中,那么生死便是客观规律。进而,他提出生死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1]220}正是因为既有生又有死,整个宇宙才会新陈代谢、生生不已、畅然不滞。在生死一体、生死自然的基础上,老子又指出生死循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1]65}“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1]647}其意即生命由

生入死、由死转生,生是迈向死亡的起点,死亡则孕育着新的生机,生死在“道”域之中循环往复。

在阐述了生死一体、生死自然、生死循环的观点后,庄子表达了死生无惧的生命态度。在他看来,既然生死是在“道”涵摄下的自然流变,那么人应坦然面对生死,无执于生、不惧于死。在文本中,他列举了圣贤大德之人面对生死的立场。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1]210};至人“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1]91};圣人“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1]175}。无论是面对生的喜悦还是面对死的危机,圣贤大德之人总是淡然若水,绝不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庄子借由真人、至人、圣人面对生死的态度,开悟世人窥破生死之变,坦然、乐观、豁达地面对生死,更加关注生命的历程。此外,他还在文本中通过秦失吊唁老子^{[1]118-121}、丽姬出嫁^{[1]98}、骷髅之乐^{[1]548-550}、鼓盆而歌^{[1]545-546}等直面死亡甚至歌颂死亡的案例或者寓言,来消解人们对死亡的畏惧,希冀人们由死观生、向死而生,更好地活在当下。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大都畏惧死亡,然而当生命无恙之时往往不知珍惜,身为物役而不知返,当死神逼近之时才幡然醒悟,却悔之莫及。庄子一方面倡导呵护自然生命存在,另一方面主张生死一体、死生无惧、向死而生,其重生而不惧死的生死观不落两端,既不偏执于世俗的生,也不畏惧将来的死,有助于消解死亡对人们的困扰,引导人们面向生命本身,聚焦于体验丰富多彩的人生旅程。

二、社会生命观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成长、发展于社会之中,具有社会属性。庄子生命观不仅关注人的自然生命,而且关注人的社会生命。他提出爱亲、事亲、事君、均调天下,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同时对规范社会关系的仁义礼乐等伦理道德予以深刻反思,彰显出其社会生命观的独特视角。

(一)爱亲、事亲、事君、均调天下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有一定社会角色,要遵守相应的社会规范,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庄子倡导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批判世

人为争名逐利而危身弃生的行为,许多人据此片面地认为其生命观是为我哲学,强调贵身、为己,对社会缺乏使命感和担当意识。这类认识是失之偏颇的,庄子对生命的感知与理解并不局限在个体层面或者是生命的自然属性维度,在自然生命之外,他深刻地认识到人还拥有社会生命。在他看来,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不仅要对我负责,而且对家、国、天下也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在《人间世》篇,庄子描写了孔子对即将出使齐国的叶公子高所说的一段话:“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1]144}在这段话中,庄子是借孔子之口,表达“爱亲”“事亲”“事君”的观点。其中,“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是指对未成年子女的抚育与关爱是为人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是说子女赡养和孝敬父母是无条件的。关于事君,文中指出,“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且“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作为社会、国家的一分子,爱国敬业是理所应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由此可见,庄子清晰地认识到人作为社会存在应当担负的家庭与社会方面的责任。

在强调爱亲、事亲、事君之外,庄子还提出了“均调天下”的思想。人既是家庭、社会、国家的一分子,从更高的维度来看,更是宇宙自然的一分子。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77},天地万物与人是在“道”统摄下的统一体,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国家、宇宙自然间休戚与共、共生共荣。可见,庄子认识到天地万物是普遍联系的,人对他人、社会、国家、自然万物负责其实是对自己负责。因此,在强调人们对于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的同时,他希冀世人能够拥有均调天下的生命情怀。“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1]412}庄子均调天下的主张意在号召人们具备博大的胸襟,关注人类社会、宇宙自然的前途命运,在维护天地万物的平衡、稳定、和谐中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 退仁义, 宾礼乐

人不是独立的存在,具有社会生命,总是处于

各类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体需要伦理道德、礼仪法度来规范自身言行,保障社会运行发展平稳有序。因而,儒家强调伦理道德、礼仪法度,积极倡导以仁义礼乐法等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孟子道德观的核心是仁义,“仁,人心也;义,人路也”^{[4]333};荀子则隆礼重法,认为礼以定伦、法能定分,提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5]。不同于儒家对仁义礼乐的高扬,道家对此持否定态度,并予以强烈批驳。老子提出:“大道废,有仁义。”^[6]仁义应该是发自生命的本真,无需大肆宣扬,刻意地推崇仁义表明了“道”的堕落。庄子继承这一思想,认为高扬仁义礼乐显现出人类社会的衰败:“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1]307}进而,他还主张“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1]435}。

那么,为什么老庄对儒家倡导仁义礼乐等道德规范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呢?庄子就此予以阐释。在他看来,仁义礼乐是发自人心人性的一部分,儒家的大肆宣扬却使其逐渐演变为投机者拉拢人心、谋取利益的手段。正所谓:“夫屈曲折旋,行礼乐以正形体;高县仁义,令企慕以慰心灵;于是始踉跄自矜,好知而兴矫诈;经营利禄,争归而不知止。噫!圣迹之过者也。”^{[1]312}就是说,圣人们高扬仁义礼乐,使其成为衡量人们道德高下的标尺,于是,讲仁义礼乐、行仁义礼乐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反之则会遭受唾弃。长此以往,人们因为贪图讲行仁义礼乐带来的好处而对其竞相追逐,仁义礼乐也最终沦为投机者邀名射利的工具。一旦“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1]757},“愤愤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1]244},仁义礼乐便开始形式化、工具化、虚伪化。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庄子对仁义礼乐进行了猛烈抨击,但其本意并不是否定仁义礼乐等道德规范。事实上,在文本中他也对仁义礼乐存在的必要性做出了阐释:“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1]214}就是说,人行走于世间,就得遵照着礼法做事,要守国法、知荣辱,明辨大是大非。并且他还指出,仁义礼乐等要由专人去推行:“法律之士广治,礼教之士敬容,仁义之士贵际。”^{[1]734}由此可见,庄子对仁义礼乐的批判并不是否定仁义礼乐本身,他评判与否定的是儒家高扬仁

义礼乐所带来的副作用和反作用。尊崇与奉行仁义礼乐可有效地调节和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确保社会生活井然有序、人际关系和谐融洽,然而,经过儒家的大肆鼓吹和宣扬,仁义礼乐成为判断是非好坏的道德准绳,人们对其不再是发自本心地恪守,投机者甚至将其视为欺世盗名的手段。因此,庄子提出的“退仁义,宾礼乐”并不是排斥仁义礼乐本身,而是警醒世人不能将道德伦理、社会规范形式化、工具化和虚伪化,遮蔽它们存在的本来意义。

三、精神生命观

缺失了情感、意识、思维等精神性,人就等同于一般存在物。“世界总是精神性的世界。动物没有世界,也没有周围世界的环境。”^[7]作为“万物之灵”,人是一个精神存在,具有精神生命。庄子肯定并高扬人的精神属性,提出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1]631}、立鲲鹏之志^{[1]2}等主张,希望人们保持健康平和的精神状态,树立远大的生命理想,面对挫折、困苦时依然昂扬向上、矢志不渝。

(一) 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

人作为自然性与社会性存在,总是受到自然或社会的限制、束缚。庄子将生老病死这些源自自然规律的约束称为“天刑”,将来自社会层面的吉凶悔吝所造成的压力称为“外刑”。两者均会导致人内心发生喜怒哀乐等情绪上的起伏波动,从而对人的精神生命状态造成影响甚至是伤害。庄子将天刑与外刑对人精神生命所造成的二次损伤称为“内刑”：“为内刑者，动与过也。”^{[1]924}“离内刑者，阴阳食之。”^{[1]924}在他看来，内刑是由天刑与外刑引发的情绪激烈变化、内在阴阳失衡的精神刑罚。中医学认为，保持平和与稳定的情绪有利于气血运行畅达以及身心健康，反之，当情绪产生剧烈变化、跌宕起伏时，气血则容易瘀堵凝滞，进而影响身心健康。《黄帝内经》就指出了失控的情绪对五脏六腑的伤害：“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8]庄子也曾指出情绪过激的危害：“夫忿滯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1]578}

天刑源于自然规律的限制，外刑来自社会法则的制约，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均是人之一生所无法

逃避的。那么，面对自然层面的生老病死与社会层面的悔吝吉凶，人们就应当坦然豁达，不要因患得患失而劳心伤神。如果斤斤于悲喜祸福、得失成败，人之精神生命将遭受天刑与外刑所触发的内刑之二次伤害。正因为如此，庄子提出了“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1]631}的主张。他希望人们面对天刑与外刑时，能安于时运、顺应变化、宠辱不惊，保持情绪的平稳与内心的祥和，避免精神生命受到伤害。诚如《大宗师》篇所说的那样：“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1]237}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天化生万物，人之喜怒哀乐等感情就如天之所悬系之物，如果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则天之所悬系之物便可解散，人便脱离了内刑的困扰。

需要阐明的是，庄子所说的“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并不是否认正常的情感表达、情绪宣泄，其意在提醒人们避免情绪与情感的跌宕起伏，保持平和稳定的精神状态。在《德充符》篇，庄子通过其与惠子的一段对话表达了这一观点。惠子质问庄子，人怎么可能没有喜怒哀乐这些情绪情感呢？庄子回答说：“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1]202}就是说，他所指的“无情”并不是否定真情实感的流露，而是否定过度的好恶憎嫌、嬉笑怒骂对精神生命所引发的伤害。正如《中庸》所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4]18}喜怒哀乐是人人都有感情，但是这些感情的迸发要适度，否则就违背了中庸之道，给内心带来不谐、不宁。

(二) 立鲲鹏之志

庄子生活于战国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剧烈变革、极为动荡的一个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新经济生产方式的出现与实施，新旧两股力量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与冲突，于是战争成为解决矛盾的终极方式。诸侯之间旷日持久的相互混战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残暴专制使民众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普通百姓承受着繁重的劳役和兵役，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生活，家破人亡、战死疆场的悲剧时有发生。正如《在宥》篇所描绘的那样，“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1]344}。面对战火纷飞

的时局、残酷无道的统治,人的生命如草芥蝼蚁一般,随时会遭遇死亡、疾病、迫害等无妄之灾。

在如此残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应当如何自处呢?庄子以为“哀莫大于心死”^{[1]625},尽管世事艰难,苦难与坎坷无时无刻不在,但对于生命而言最悲哀的莫过于在精神层面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和与命运抗争的勇气。生命的历程跌宕起伏、荆棘丛生是必然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1]195}。人之一生万事难料,但无论生命经历怎样的变故,绝不能丧失战胜挫折的意志力。只要人的精神生命不被击垮,未来就有转机,就有希望。基于此,《庄子》文本中描述了许多身有残疾却依然乐观向上、拥有强大意志力的人物,如支离疏^{[1]165-166}、王骀^{[1]173-174}、哀骀它^{[1]189-192}、闾跂支离无脤^{[1]198-199}等。庄子详细描写上述人物身残志坚的事迹,意在向世人传达这样的信息:相较于他们遭遇的不幸,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坚强地活下去呢?

庄子高扬精神生命,不仅指出哀莫大于心死,鼓舞人们勇敢面对生命逆境,而且提出立鲲鹏之志^{[1]2},希望人们树立远大理想,实现生命的飞跃。他在《庄子》开篇《逍遥游》中,讲述了一个由鲲化鹏,然后鹏飞南冥的寓言故事。鲲是一种大鱼,“不知其几千里也”^{[1]2},但是始终局限在幽暗寒冷的北海之中;鹏是一种大鸟,“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1]15-16},翱翔于万里长空,活动空间无限广大,不再局限于北冥。这里由鲲化鹏描绘了一幅生命冲破有限、趋向无限的画卷。那么,由鲲化鹏之后,为什么鹏要不辞辛苦地从北冥飞向南冥呢?北冥是极寒之地,也寓意现实之地,南冥则是极光明之地,寓意理想之地。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那么,从北冥飞往南冥实际上是为了实现理想对现实的超越。因而,庄子借由这个寓言故事向人们揭示了精神的巨大作用,他

希望人们树立鲲鹏之志,以理想观照现实,不断突破有限、超越现实,趋向无限、实现理想。

四、结语

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共同构筑了具体而鲜活的人之存在,三者之间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依存,突显或是忽视其中任何一种生命形态都是失之偏颇的。庄子生命观体系完备、内涵丰富,对三类不同的生命形态展开深刻且辩证的思考,体现着对自然生命的呵护、对社会生命的关注、对精神生命的高扬。当前,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来自社会、家庭等方面的压力也与日俱增,部分人群表现出的生命意识淡薄、生命价值模糊、生命理想缺失等状态堪忧。为此,系统阐释与弘扬庄子生命观将有助于人们思考生命本质、探寻生命价值、提升生命境界,促进生命健康、自由、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95.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荀子[M].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404.
- [6]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修订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132.
- [7]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5.
- [8]崔为.黄帝内经·素问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12.

(责任编辑:李智萍)

论元结表状公文的写作特色及价值

周贤斌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摘 要:作为古文运动的先驱,元结较早在公文写作领域进行了改革探索。他所写作的表、状体公文在古代公文史上极具典型意义,在内容上切中时弊,真实记录了社会生活;在形式上打破了骈体公文的壁垒,为公文写作带来新的气象;在论证方法上注重实证,极具说服力。作为一位被后世所称道的官员,元结为官理政中的民本思想、人才思想、孝德思想等也集中体现在其公文之中。元结公文在当代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启发意义,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关 键 词:元结;表;状;公文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89-06

元结,字次山,河南鲁山人,唐代著名文学家、古文运动先驱。孙昌武先生在《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中充分肯定了元结为古文运动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认为“元结在唐代散文发展史上占据着某种里程碑的地位。在他的创作中,总结了前此散文革新所取得的成就;他又用自己的收获巨大的实践,预示着文体改革和散文创作新局面的开始”^[1]。近几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元结在文体革新上的成就获得赵殷尚、胡燕、吕双伟、肖献军等多位学者的重视。目前对元结表文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两篇,分别为韩国赵殷尚《“表文”的形成与定位——兼论元结、贾至的革新》^[2]和吕双伟《论元结的表文创新及其文学的政治化》^[3]。以上学者对元结表文进行研究时,大多是从文学角度分析其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等,对元结表文中的公程式、行政思想等公文属性关注不多。至于元结作品中“状”这一文体,目前还鲜有学者触及。本文从公文史等角度出发,对元结表状公文的写作背景进行分析,探究其写作特征,挖掘其思想内涵,进而彰显其当代价值。

一、元结表状公文写作的时代背景及分类

霍蕴夫教授在论及公文的产生时指出,现今有物可考的公文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并认为阶级和国家是公文产生的背景和前提,文字则是公文产生的条件^[4]。可见,公文的创作与作者

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等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地方官员,元结创作的公文以表状体上行公文为主,根据孙望先生点校的《元次山集》进行统计,元结现存的上奏类表文有12篇、状文有8篇,这些公文既有典型的时代特色也有其创新的一面。

(一) 表状公文的制度化

表和状作为上行公文文体是国家政治制度发展到相对稳定阶段的产物。从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来看,秦朝虽已有李斯《上书谏逐客》、零陵令信《上始皇帝书》等上行文书传世,但是未见表、状这两种公文文体,直至汉代才有赵充国《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刘歆《上山海经表》等表状文出现^[5]。民国时期,徐望之先生在充分总结前代文献的基础上,在《公牒通论》中将表、状二者皆归入“公文名称始于汉代者”^[6]之列,这一观点为学界广泛接受和引用。可见,在汉代政治管理更加精细、官吏制度更加完善的背景之下,原来臣子向皇上进言奏事的“上书”也出现了细分,按公务事由分化为章、表、状、奏、议等上行公文文体。在汉至隋期间,表状文稳步发展,一方面,表状公文在行政中的使用次数逐渐频繁,据陈曦统计,仅《文苑英华》中便选录了表类公文74卷1143篇,状类公文17卷305篇^[7];另一方面,随着表状文写作数量的增加,表状文也逐渐沉淀出以骈体文为主的创作风格,并涌现出李密《陈情表》等

家喻户晓的名篇。

表状类公文发展至唐代则开始出现制度化的特点。杨剑宇在《中国秘书史》中将唐代称为我国文书档案工作的法律化时期,唐王朝对公文的拟制、传递、用印、保密各个阶段都有了细致的规定和严密的奖惩制度^[8]。唐代的行政法典《唐六典》亦记载“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9],在行文对象上对表状公文做了明确的规定。元结在担任地方刺史等职位期间,向上级进言时,依照礼法制度选择了表和状两类文体。在写作格式上,元结表文都为三段式格式:起首谦辞(臣某言等)+事由+结尾(谨奉表以闻等);状文则为:状头(简述事由)+正文(具体论述)+状尾(谨录状上等),严格遵循公文的写作规范。

(二)元结表状公文创作的背景

元结虽然出仕较晚,但由于其卓越的政治才能,皇帝对他十分赏识并屡次委以重任,公文写作也贯穿他整个仕宦生涯。在不同的任职背景下,元结的公文也呈现出不同特点,大致来看,元结的公文写作背景可分为“初入为官”“荆南幕府”“道州任上”“容州任上”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初入为官时期。元结年轻时不为禄仕,隐居于河南商余山,安史之乱后,元结才正式走入官场。《时论》前表是元结这一时期表文创作的代表,在该文中,元结开篇便以两个反问句“陛下岂不以凶逆未除,盗贼屡起,百姓劳苦,力用不足,将社稷大计与天下图之者乎?荒野贱臣,始见轩陛,又拘限忌讳,不能悉下情以上闻,则陛下又安用烦劳车乘,招礼贤异”^{[10]92}来劝诫天子要勤于理政、安定动乱,并且要广开言路,体察下情。这一时期元结的文章创作指陈时务,表现出其为官初期积极远大的政治抱负。

第二个阶段为荆南幕府时期。乾元三年(760),元结先后入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及荆南节度使吕湮幕府。入幕期间,元结表文创作以代笔公文为主,其中以《为吕荆南谢病表》为代表。在这篇文章中,元结以幕主的口吻为吕湮道出了重病不能理政的实情。同时,这一时期元结的状文创作也较为活跃,元结在幕府期间,所在州县连年遭受战乱,元结亲睹战士家庭离散,心生怜悯,向幕主来瑱上《请给将士父母粮状》《请收养孤弱状》,请求侍养战士父母,收养烈士遗孤。这一时期,元结的公文创作开始走向成熟。

第三个阶段为道州任上。广德元年(763)九月,元结被任命为道州刺史。在道州任职期间是元结政绩最为卓越的时期,其事迹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宋代王次翁曾评价:“次山尝节度荆南,又经略容管等八州矣,然世必曰元道州,而独道州祠堂在焉。”^[11]在道州任内元结多次撰文为辖区内百姓申请减租减赋,在《谢上表》中,元结向皇上写明了道州民生疮痍的实况,之后又写作《奏免科率状》申请为百姓减免赋税。在元结的一系列治理举措下,原来从道州出走的百姓纷纷回归家乡,安养生息。这段时间,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元结表状文创作都达到高峰。

第四个阶段为容州任上。大历三年(768)元结被授容管经略使,这也是元结仕宦生涯的最后一站。此时元结在经历了社会动乱和朝廷纷争之后,其思想已经有了寻求退隐的一面,在容州任内的公文亦是以辞解为主题。这一时期,元结一方面勤于理政、安抚动乱,另一方面则反复向朝廷请求辞官退隐。大历三年(768),元结刚接到任命时便写作了《让容州表》,对所授予的职位辞让不受,乞求辞官归养老母。在老母去世之后,元结又作《再让容州表》,申请为母守孝,方得以辞官。这期间,元结所作表文言辞恳切,在抒情上具有较高成就。

(三)元结表状公文的分类

清代方熊在《文章缘起注》中认为,从用途来看,表文可分为“论谏、请劝、陈乞、进献、推荐、庆贺、慰安、辞解、陈谢、讼理、弹劾”等类^[12]。元结所作表状公文亦可按此标准进行区分,如表1。

二、元结表状公文的写作特色

前面已经提到,作为公务文书,表状公文发展至唐朝已经有了严格的标准和程式。尽管如此,元结却依旧力求破除前朝文风积弊,在内容与形式上对表状类公文进行变革,其作品也极具特色。

(一)信笔直书,良史精神

“良史”一词早见于《左传》之中,孔子在评价董狐时认为其“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3],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14],可见“良史”与“信笔直书”是分不开的。范成大在评价元结《大唐中兴颂》时称元结“鲁史笔法婉辞含讥”^[15],但是在公文写作中,元结更多信笔直书,几无讳饰,其公文也是其所处时代历史的真实记录。

表 1 元结表状公文分类			
文体	类别	题目	内容主题
表	辞解之表	《为董江夏自陈表》	元结代董江夏作。朝廷将永王璘定为叛臣,董江夏作为永王璘的下属,亦受到牵连。后朝廷再授董江夏官职,元结为之代作此表,辞让不受
		《为吕荆南谢病表》	元结代荆南节度使吕諲作。吕諲以病重,不能起止,庶事不理,请辞荆南节度使官职
		《辞监察御史表》	上元元年(760),元结除监察御史,元结以愧无才能、老母多病求退
		《乞免官归养表》	元结以自己才不称任,老于儒家却迹在军旅,日预戎事是过其才分,请求辞官,归养老母
		《让容州表》	大历三年(768),敕授元结容州刺史等官职,元结以自身多病,且老母气力限于远行,辞让不受
		《再让容州表》	大历四年(769),元结老母去世,元结再次以孝礼为据辞官,请求归葬老母,为母守孝
	陈谢之表	《谢上表》	广德二年(764),元结到任道州刺史后作《谢上表》,表明到任时间等,同时也具陈道州百姓背井离乡之实况
		《再谢上表》	永泰二年(766),元结又一次被授予道州刺史,元结作谢表,批评了地方政府选人不当,百姓赋税负担过重的情况
	论谏之表	《时议》前表	乾元二年(759),皇帝召见元结,元结上《时议》三篇,陈述天下时势,前有此表
		《请节度使表》	宝应元年(762),荆南节度使吕諲病逝,荆南节度使一职空缺,元结上此表,建议朝廷尽快选用有才德之人补缺
状	庆贺之表	《广德二年贺赦表》	广德二年(764),朝廷大赦,依制,元结上贺表
		《永泰元年贺赦表》	永泰元年(765),朝廷大赦,依制,元结上贺表
	请劝之状	《请省官状》	乾元三年(760),元结以唐、邓等州,百姓流亡,人口稀少,而官吏人浮于事,上表劝来填裁撤冗官
		《请给将士父母粮状》	上元元年(760),元结上书,请求官府供养作战将士父母
		《请收养孤弱状》	上元元年(760),元结上书,请求官府收养烈士遗孤
		《奏免科率状》	广德二年(764),元结以道州为贼所屠,无力承担赋税,上书朝廷申请对赋税进行减免
		《奏免科率等状》	广德二年(764),元结再次上书,申请减免道州赋税钱物九万余文
		《论舜庙状》	永泰二年(766),元结以舜庙残破,向朝廷申请对舜庙进行重新修整
	推荐之状	《举吕著作状》	宝应元年(762),元结以吕諲之侄季重为人聪敏仁孝且有理政经验,故向朝廷举荐其为官
		《举处士张季秀状》	永泰二年(766),元结以张季秀不贪货贿,以文学为业,但却寒馁切身,故申请朝廷为其建造草屋,给予田地

元结在道州上任之后,按照惯例需要向皇上进呈谢表以表达感激之情,而其在道州所作《谢上表》中,除题目和结尾有“谢”字以外,正文中无一感恩颂德之词。相反,元结还在谢表中直陈道州在经历了西原蛮掠夺后的民生状况:“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岭南数州,与臣接近,余寇蚁聚,尚未归降。臣见招辑流亡,率劝贫弱,保守城邑,畚种山林,冀望秋后少可全活。”^{[10]123}用词直白,毫无含蓄。在《再谢上表》中,元结依旧保持自己的写作风格,还更进一步借谢表指出了底层政治贪腐、基层官吏选用不当的情况:“今四方兵革未宁,赋敛未息,百姓流亡转甚,官吏

侵尅日多,实不合使凶庸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类,以货赂权势而为州县长官。”并自言:“所言狂直,朝夕待罪。”^{[10]132}

元结的公文真实可信地记录了社会底层疾苦,并且敢于刺喻君主,即使是前代用于歌功颂德的谢表,元结也敢于用狂直之言来进行创作。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他切中时弊、信笔直书的良史精神。这也使得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元结表文给出了“观次山表语,但因谢上,而能极论民穷吏恶,劝天子以精择长吏,有谢表以来,未之见也”^{[16]188}的极高评价。

(二) 骈散相间,融情于理

在中国古代,骈文与散文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的状态,在古代公文中,章、表、奏、状等公文大多以骈体文为主,散体甚至受到了排斥。如明代胡松所编表文选集《唐宋元名表》便以四六为选文标准,对元结和其他作者的非骈体表文则一篇未选。但公文发展到魏晋六朝时,却出现了过于注重对偶、用典等表面形式而忽略实质内容的极端现象,这就与公文的实用性质有所背离。元结是较早察觉到这一风气的作家,在《刘侍御月夜宴会序》中,元结提到了自己对时下文章的看法,认为:“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耶?”在此背景下元结开始了“变时俗之淫靡”^{[10]37}的文体变革探索,将散体文引入表状类公文写作中来。

以《让容州表》为例,在叙述自己的到任经过时,元结采用散体来进行讲述:“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敕,授臣使持节都督容州诸军事、守容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管经略守捉使。四月十六日敕到,二十一日发付本道行营。”^{[10]155}这样平白的散句打破了四六的桎梏,使得叙事更加清楚明了。但是讲述自己的老母时,元结则又使用了排列工整的四字骈句:“时方大暑,南逾火山,举家漂泊,寄在湖上,单车将命,赴于贼庭。臣将就路,老母悲泣,闻者凄怆,臣心可知。”^{[10]156}这样的文字极富感染力,读来感人至深,仿佛母子惜别之景就在眼前。这样融情于理的申请,在做到气势十足的同时又能避免让人产生被咄咄相逼的不适感,自然也就容易被人所接受。

吕鑫在《唐代公文文风转变的原因》一文中提出:“安史之乱后,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给骈俪文体与浮艳文风带来重创。”^[17]其实在韩愈之前,元结便已经开始对公文骈俪的文体进行变革,元结在公文创作中,充分利用散体便于叙事说理、

骈体便于抒情陈情的特点,十分灵活地将这一对看似相互排斥的文体运用得和谐融洽,真正做到了骈散相间,情理相融。可见,宋代吴子良在《陈元为杜韩之先驱》中“唐之古诗,未有杜子美,先有陈子昂。唐之古文,未有韩退之,先有元次山。陈、元盖杜、韩之先驱也”^[18]的论断亦绝非溢美之词。

(三) 论述有据,注重实证

上元元年(760),元结两次上状书申请优抚战士家属;广德二年(764),又两次向朝廷上状文,申请减免税收。如此频繁的申请,不仅没让上级对元结感到厌烦,反而其申请还被屡次批准,这与元结高超的论证技巧是分不开的。在元结的公文中,注重实证是一大特点。以广德二年(764)《奏免科率等状》为例,元结开篇便在状头中点明了朝廷所下达赋税任务的具体数额、已征得的税收数额以及申请减免的数额,并将数字精确到了个位,如此精准有据的数据自然而然就增加了公文的可信度。紧接着元结又摆出了申请减免的条条论据,一是举出了道州百姓在与乱贼抗战中倾尽民力的事实,在战争中,壮丁皆投身军伍,剩下的妇孺老幼实在无力承担赋税;二是点明了道州地势的重要性,若不能以税收减免的方式来保全道州,则整个湖南都将沦为不守之地;三是直接指出了本年度征税数额较去年增加一倍的不合理事实。三条论据,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极富说服力。

元结在公文创作中,作风扎实,善于将自己在地方所见的一手材料作为论据。这既有利于朝廷了解社会状况,也有利于提高公文的说服力,更好地达到公文写作的目的。

三、元结表状公文的思想

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谈到元结状文时,对元结的政绩也做出了评价,他认为“唐诗人政绩著者,无如元次山”^[19],元结的政治生活真实完整地体现在其所作的表文和状文当中,表状公文也是其思想的高度结晶。

(一) 为民争利的民本思想

杨承祖先生曾通过数据分析统计得出元结是《全唐文》中使用“人民”一词最多的作家这一结论^[20],无可否认元结是一名心系人民疾苦的良吏,在我国古代,税收一直是官员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在自己的官位与百姓利益的抉择中,元结却选择了后者。元结刚到道州还不到五十天,就收到了二百余封催缴税收的文书,并受到了不能按期

交税就要被降职处理的警告,但是对于这些元结却不以为意,反而还拿起笔写下状文,直接向皇帝上书道州人民生活困苦的状况,矛头直指不合理的赋税制度,为道州百姓申请减免赋税。元结敢于为民争利,自然也受到了百姓的爱戴,《新唐书·元结传》就曾记载百姓为元结立石颂德一事。时至今日,元结重视民生、为民谋利的政治理念与现代政府工作理念仍有较多契合之处,可见其思想在当时的进步性。

(二)精选谨择的人才思想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元结在谢表中向皇帝进言“精择长吏”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新^{[16]188}。在元结的公文中,精选谨择的人才思想亦是随处可见的,在《谢上表》中,元结认为刺史是地方政治治理的关键,同时向皇帝提出了刺史要从严考核的建议,提议朝廷应该每年度从人口、田垦、畜养等方面对刺史进行课考,并且要制定严格的奖惩制度。至于何为理想的人才,元结则在《请节度史表》中有所提及:“陛下若独任武臣,则州县不理;若独任文吏,则戎事多阙。”^{[10]110}元结认为选用地方官员,偏文偏武都不妥当,在动荡的时局中唯有选任文武兼备,既能守备城池又能绥化百姓的全才,方能使社会恢复稳定。从公文可以看出,元结在人才选举、考核等各个方面都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人才思想已成体系。

(三)侍母尊亲的孝道思想

在元结公文作品中,“孝”亦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高频率词。在向朝廷请求辞官的表文中,元结以孝理为依据,请求为母亲侍奉汤药,并劝诫天子要以孝理万姓,慈育生民;在荐举人才的《举吕著作状》等状文中,元结将“孝”作为评价人才的主要依据,举荐吕季重时,元结便着重讲述了他为叔父侍奉汤药、分忧解难的事迹。同时元结也将这种孝道精神运用到他的政治实践当中,元结入幕府时期,在目睹战士家庭离散、父母孤苦无依之后,便上《请给将士父母粮状》和《请收养孤弱状》,向上级请求给予战士父母粮食供养,收养烈士遗孤。在道州任职期间,元结对路边所见的孤寡老人心生怜悯的同时也对他们十分尊重,在《春陵行》中“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10]34}的句子便可见他对老弱十分爱护。元结的孝心、孝行至今都让人为之动容,值得我们大力弘扬倡导。

四、元结表状公文的当代价值

元结的公文在内容上针砭时弊,在形式上敢于

打破骈俪的枷锁,可谓我国古代公文史上的一面旗帜。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表状公文在当代已经不再使用,但是元结公文鲜明的创作特征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在现代社会仍具有价值。

(一)有利于弘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调查研究是我国历代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一项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21]

对元结公文进行研究学习有利于弘扬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元结在任监察御史时,与战士同起同居;在道州任刺史期间,走民间,感受百姓疾苦;在容州任职期间,更是深入蛮侗,亲身抚慰。这些活动都使得元结对人民的真实生活有更为清楚的认知,也为其公文写作提供了材料来源。这种做法值得后人借鉴,在起草公文时,写作者不应该只是坐在办公室中照搬现成的文字材料,而是应该深入到基层中去,实地调查民情民意,只有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能真实准确地记录实际情况,避免出现言之无物的弊病。

(二)有利于纠正过于浮饰的文风

元结的公文是对六朝以来绮靡公文风气的一次变革,在叙事说理时皆平铺直叙,不追求辞藻装饰。在现代公文中,依然要避免过于艳丽、浮饰的写作风格。公文是社会治理的工具,在行政体系中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但是如果公文变得过于追求辞藻形式,那么文章反而变得让人不好理解,甚至会产生歧义,公文的作用也就难以发挥出来。

元结的表状类公文皆主题突出,所陈事项让人一目了然,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在公文写作时要考虑到公文大众化的阅读需求,要让读者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取到所需要的信息,因此叙事清楚是对公文最基本的要求。公文写作人员在写作中切忌拖泥带水,更不应该刻意掉书袋、卖弄文采,否则可能使受文对象对文意无法理解,反而弄巧成拙。

(三)树立了正直敢言的典范

吕双伟教授认为元结有着“绝不阿谀奉承、奴颜婢膝”^{[3]136}的个性。这样的性格也直接影响了元结的谢表、奏状等上行公文创作。谢表作为一种上行公文文体,是臣子被授予官职后向皇帝谢恩时使用的,这一类文章有固定的格式,内容上往往也

大多只是讲明到任时间等琐事之后再加上对天子歌功颂德的语句。但是元结写作谢表非但不歌功颂德,还直陈民生疾苦,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上行文是下级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申请时所用的文体,是一条由下达上的信息纽带,但也正是如此,上行文中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阿谀奉承的文章,能像元结一样在上行文写作中不卑不亢、不趋炎附势的可谓是少数。元结的公文依然可以为现代公文写作提供一些思考,在公文写作中写作者要敢于直面社会问题,敢于为基层民众发声进言,而不是一味只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表面文章。

在公文创作中,元结在遵守公文写作规范的前提下,敢于革新,破除了六朝以来公文过于追求骈俪的绮靡之风,将骈体与散体完美融合,创造了说理与抒情兼备的公文写作模式。在公文写作内容上,元结关注社会民生,将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写入公文之中,表现出对弱势民众深深的怜悯,通过公文为百姓争取了福利,打破了以往上行公文阿谀粉饰的积弊,其公文中的思想内涵和行政经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时至今日,元结注重实证、崇尚平简、不卑不亢的公文写作风格依然能对我们有所启发,使我们大受裨益。

参考文献:

- [1]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9:65-66.
- [2]赵殷尚.“表文”的形成与定位:兼论元结、贾至的革新[J].唐都学刊,2010(5):41-44.

- [3]吕双伟.论元结的表文创新及其文学的政治化[J].湖湘论坛,2019(5):130-137.
- [4]霍蕴夫.中国古代公文的起源和发展[J].宁夏社会科学,1989(4):99-102,40.
- [5]中华书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6]徐望之.公牍通论[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7-18.
- [7]陈曦.《文苑英华》表状类公文谦词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9.
- [8]杨剑宇.中国秘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3.
- [9]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11.
- [10]元结.元次山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1]祝尚书.宋集序跋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0:44.
- [12]方熊.文章缘起注[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7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210.
- [13]洪亮吉.春秋左传诂[M].北京:中华书局,1960:399.
- [14]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207.
- [15]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865.
- [16]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7]吕鑫.唐代公文文风转变的原因[J].应用写作,2017(3):6-9.
- [18]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M].北京:中华书局,2017:1514.
- [19]许同莘.公牍学史[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94.
- [20]杨承祖.元结作品反映的政治认知[J].唐代文学研究,2002(1):322-332.
- [21]臧安民.大力弘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N].人民日报,2021-11-17(9).

(责任编辑:雷 鸣)

On the Writing Features and Value of Yuan Jie's Official Documents

ZHOU Xianbin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6, China)

Abstract: As a pione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 movement, Yuan Jie explored the reform in the field of official document writing. The official documents he wrote are of typ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official documents, truly recording the social life in content, breaking the barriers of official documents of parallel style in form, bringing about new atmosphere to the official document writing, and putting emphasis on the convincing demonstration. As a renowned official among the later generations, his people-oriented thought, talent thought and filial piety thought are also reflected in his official documents. The official documents still have profound practical enlightening for its enduring value.

Key words: Yuan Jie; Biao; Zhuang; official documents writing

中原城市群的早期形成探究

张 勇

(平顶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36)

摘 要:中原城市群发展战略是国家以及河南省坚持的一项重要的长期发展战略。1952年9月19日郑州被确定为河南新省会,同时国家为了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恢复大省制,决定撤销平原省使豫北回归河南,这初步决定了中原城市群的框架。1954年10月30日河南省直机关正式迁郑后,省会郑州的核心地位形成,并带动了中原城市群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如平顶山、鹤壁、焦作、三门峡四市的兴起,基本形成了今天中原城市群的雏形。探讨中原城市群的早期形成对当今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 键 词:中原城市群;郑州;洛阳;平顶山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095-06

2003年8月15日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的发展思路^[1]。自此,中原城市群这一概念正式提出,河南省开始了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建设,2016年12月28日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发改委报送的《中原城市群》规划,自此中原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略^[2]。可见,中原城市群发展战略无论是对于国家抑或是河南省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前学界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大多是从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开展研究,侧重于对中原城市群发展的对策与应用研究。而从历史学角度对中原城市群的形成进行溯源,探究中原城市群的早期形成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少见^①,长期被学界所忽视。事实上,中原城市群的形成要远早于2003年,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即1952年9月郑州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新省会、平原省被撤销使豫北回归河南,中原城市群的框架就已经被确定下来了。1954年河南省直机关正式由汴迁郑后,郑州的核心城市地位正式形成,此时由于“一五”计划以及苏联援建项目的落实,使得新省会郑州市的核心城市地位极大地带动了河南城市整体的发展,

以郑州市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基本形成。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开展研究,以增强人们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认知。

一、郑州核心地位形成的历史动因

1948年11月开封解放成立特别市后,由于历史惯性的因素,开封仍然是河南省的省会,此时的郑州是郑县,虽然由于其地理位置处于陇海与京汉铁路枢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开封^[3]。同时由于1949年8月成立了平原省,豫北地区此时属于平原省,和河南省处于分离状态。

1951年,河南省为了本省经济建设的需要,加强对全省各项工作的领导,省委有关领导就向中央政务院请求“决定把省会迁到郑州”,这个请求因为当时的“三反”运动等因素耽误了一段时间,河南省委于1952年8月5日再次向中南军政委员会提出省会由汴迁郑建议,认为河南省会“原驻开封”,但是开封的位置“偏于全省东部”,这在指导全省的工作上存在着“多方不便”,而郑州市由于处在“中原交通中枢”的位置,同时经济的发展前景也非常好,如果省会能够由开封迁往郑州,不仅

收稿日期:2022-11-22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项目(2022ZSZ085);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2021SJGLX975)

作者简介:张 勇(1980—),男,河南省汝南县人,历史学博士,平顶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研究。

①关于中原城市群的早期形成,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中有所涉及,至今还未见其他专门研究中原城市群早期形成的研究成果。

在指导河南全省工作以及全省各地的“上下联系”方面“均甚便利”,对郑州市的长远发展也“大有裨益”^[4]。这次河南省的迁省会建议获批较为顺利,8月21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即复函表示“同意”该建议^[5],9月19日河南省委又得到了中央政务院的复函,表示对“河南省会拟于1953年迁移郑州”的建议“经核同意”^[6]。但河南省委由于省直工程建设工期延误等原因,在取得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最终于1954年开始搬迁^[7]。郑州被确定为河南新省会,使河南省有了郑州这样一个核心城市,为中原城市群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河南省有了核心城市郑州后,由于此时豫北即黄河以北还属于平原省管辖范围,此时的河南省还是不完整的。如果豫北不能回归河南,那么中原城市群的框架仍然是不能形成的。

平原省的成立是有一段缘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了完成彻底肃清敌特、土匪、反动会道门等反革命势力,完成土改以及治理黄河等任务,该省于1949年8月1日建立,省会设在新乡市^{[8]1}。平原省北临河北省,南靠黄河与河南省隔河相望,东临山东省,西及西北与山西省接壤,基本上是以冀鲁豫边区为基础,加上太行、太岳解放区原属河南省的部分县市以及冀南解放区的部分县组成。全省共划为新乡(专署驻焦作)、安阳、濮阳、聊城、菏泽、湖西(专署驻单县)6个专区,辖56个县和2个直辖市,人口为1776万^[9]。1952年11月14日,该省根据政务院第一五八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的文件精神予以撤销,其“所辖区域并入山东、河南”^{[10]421-422},即将原为河南省旧辖之林县、邺县、内黄、浚县、汤阴、滑县、汲县、淇县、辉县、延津、封丘、获嘉、原阳、修武、博爱、武陟、温县、孟县、沁阳、济源等22县,以及焦作矿区与新乡、安阳两市,全部划回河南省管辖,同时为治理黄河以及建设工作方便,原为河北省管辖的南乐、濮阳、清丰、东明、长垣5县亦划归河南省属^{[8]194}。自此,河南省不仅恢复了历史上的完整建制,面积还稍有扩大,中原城市群的框架也基本形成。

从现有资料看,豫北的回归和郑州被确定为河南省会是中共中央为了迎接1953年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通盘考虑的结果,其理由如下:

第一,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这是因为1953年即将开始全国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与文化建设工作,以便使我国尽快地走上工业化的道路^{[10]376}。而此时的大行政区与部分小省的存在已经不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自1952年起中央已经开始对大行政区的职能和权力进行弱化,开始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的机构与任务”,并着手开始裁撤以前建立的小省而恢复大省制。为了适应这种全国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新形势”,中央人民政府“应该更加统一与集中”地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不仅应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建设,而且地方省、市人民政府的组织与责任均应加强^{[10]373}。因此当时像平原省这样分散的小省的存在显然不利于中央加强领导,同时过于分散的小省的存在也不利于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因而恢复大省制,加强中央的领导,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

第二,确定郑州为河南新省会与撤销平原省使豫北回归河南,进而使郑州成为完整河南的核心城市,并形成中原城市群的基本框架,显然是中央通盘考虑的结果。郑州被中央于1952年9月19日确定为河南新省会,而在中央人民政府决议未公开前,平原省委已经接到中央和华北局关于撤销平原省建制的指示。于是从9月上旬开始,平原省委即开始在“省直各部委主要负责干部中传达中央关于省区调整的指示,进行动员,着手准备。并以潘复生为主组成六个领导小组……考虑各种移交方案”^{[8]189}。由此可以推定,中央显然是把确定郑州为河南新省会与撤销平原省使豫北回归河南放在一起考虑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小省的存在也确实不利于经济建设,从平原省方面来说,由于省的规模较小,在建设上也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困难,1952年11月24日《平原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府机关结束、移交工作方案》指出:“全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际……(平原省)缺乏经济中心的城市,就其经济的联结上说,实有其不可克服的困难。”^[11]可见,平原省属于典型的小省,由于省的面积小,人口少,关键是省会新乡经济实力弱,不能担负起经济中心带动全省发展的任务,在经济建设上

确实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此时的河南省确实又需要豫北城市的回归,“河南、山东两省在建设上有与其原属豫北、鲁西结合的必要”^[11]。河南缺少豫北是不完整的,对于新省会郑州市来说,缺少经济发展的腹地,这将极大地限制其核心城市地位的作用,因而豫北回归河南就成为当时形势发展的必需了。故使豫北回归河南,郑州成为河南省的核心城市,成为中央通盘考虑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中原城市群的框架是在郑州市被确定为河南新省会以及平原省被撤销之后形成的,1954年河南省直机关正式由汴迁郑后,此时的豫北已经回归,郑州市正式成为河南的核心城市,而郑州这个核心的地位显然也是由于河南省会由汴迁郑以及平原省撤销而使豫北回归河南促成的。

二、“一五”计划的落实助推中原城市群的形成

在郑州成为河南省的核心城市后,国家自1953年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由于此时河南省地处中原,并且平原广阔、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同时矿产资源与农产品资源均较为丰富,具备建设大型工厂的有利条件,国家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把河南省确定为“一五计划”时期全国的重点建设地区之一。因而在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中,安排在河南的就达10项。这些工程项目为“矿山机械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滚珠轴承厂、柴油机厂、有色金属加工厂、洛阳热电厂、郑州热电厂、平顶山二号矿井、焦作中马村煤矿、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同时郑州和洛阳成为国家确定新建的煤矿基地,并“扩建和新建焦作、鹤壁、平顶山、宜洛4个煤矿区”^{[12]10}。从当时国家确定的河南的“一五”计划的任务看,河南的重点建设城市为郑州、洛阳,苏联援建的项目大多落实到这两市,且它们作为河南历史悠久的传统城市,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基础,同时这两市又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矿资源,这也为两市成为河南省的中心以及副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对焦作、平顶山、鹤壁这三个煤矿基地的新建和扩建,以及落实苏联援建的三门峡水利工程,为平顶山、焦作、鹤壁、三门峡四个省辖市的兴起打下了基础。这四个新兴的省辖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助推了中原城市群的形成。下面本文将对河

南“一五”期间形成的这四个省辖市进行简单介绍:

平顶山市位于河南省的中南部,郑州市的西南部,距离郑州市约153公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兴的工业城市^{[13]1}。平顶山地区原位于叶县、郏县、宝丰、襄县四县交界的边沿山区,解放初期该地区还是一个地瘠民贫的单纯的以农业为主的偏僻山村,整个地区仅有的工业也只有两个小煤窑。1953年,原中南地质局401队来平顶山地区进行地质勘探,发现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此后,平顶山煤田的开发被列为国家“一五”重点项目之一^{[13]1}。河南省为了完成“一五”计划,落实苏联援建项目,1954年6月建立了煤矿筹备处。1955年9月8日平顶山的第一口矿井开始建设,为了搞好地方支援,随着矿区的发展,1956年1月许昌专署平顶山办事处成立。同年3月,许昌专署平顶山办事处被撤销,平顶山矿区政府成立。为了更好地对这个新的煤矿工业基地进行建设,1957年3月,国务院第43次会议决定建立平顶山市,级别为河南省直辖市,1957年底该市人口达到70742人,其中城市人口为36229人,同时期该市的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均发展较快,如该市1956年9月已经有中学1所,到1958年6月底已有大型综合医院2所等^{[14]68-75}。可见,平顶山市完全是一座因煤炭工业而兴起的省辖市。

焦作市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距离郑州市约98公里。该市北依太行,南望黄河,东与获嘉、辉县相临,西同沁阳毗连^[15]。该市在清末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即西焦作村,在全民族抗战时期被日寇侵占后改名为焦作镇。焦作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据当时统计,煤炭的蕴藏量达20亿吨,且煤炭质量极好。在“一五”计划时期,为了落实苏联援建项目,1954年燃料工业部邀请苏联专家到焦作矿区进行调查研究,选定中马村矿井,经由苏联列宁格勒煤矿设计院设计建设方案,于1955年9月开工建设;再加上其他扩建以及新建的矿井,整个“一五”计划时期,焦作煤矿基本建设总投资达到7393.50万元,居全省各矿投资之冠^[16]。随着煤矿的开采,焦作人口逐年增加,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均发展较快,1956年7月9日焦作矿区改为河南省辖市^{[14]79-84}。

鹤壁市位于河南省北部,郑州市的东北部,距郑州市约 195 公里。该市东与汤阴县、西与林县、南与淇县、北与安阳相毗邻^[17]。鹤壁的前身是安阳专员公署鹤壁办事处,在 1956 年底以前是汤阴二区政府所在地。为了建设煤炭工业基地,1957 年 8 月 26 日,国务院第四十三次会议批准成立鹤壁市,该市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机关设在鹤壁集。鹤壁有十分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在该市建市以前,只有极少量的煤炭得到了开采,鹤壁市建立后,其他各项工业以及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均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4]85-88}。

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的西部,郑州市的西北部,距离郑州市约 220 公里。三门峡市的前身是陕县会兴镇,“一五”期间为了开发黄河的水利资源,使之更好地为当时的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也是为了落实苏联的援建项目,中央决定对三门峡水利工程进行建设,由于工程量巨大,为了做好对该工程的各项准备与支援工作,1956 年 3 月份在原洛阳陕县会兴区的基础上成立了工区政府,此时该工区政府仍归属洛阳专署领导。1957 年 4 月 13 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始施工,为了进一步支持该工程的建设,1957 年 6 月三门峡市正式成立,该市是经国务院批准并在原工区政府的基础上建立的,归属河南省政府直接领导,为省辖市。在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这座城市也逐步兴起,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里以前是农民种植各种庄稼的广阔的“田野”,三门峡工程开建后,大批“建成或正建设着的楼房”在这片田野上纷纷拔地而起,同时邮电局、新华书店、旅社、电影院、饮食、照相、理发、缝纫等服务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18]。三门峡市的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也发展很快,到 1957 年底该市已有各类学校 79 所,较大的医疗机构达 24 个^{[14]76-79}。

综上所述,平顶山、焦作、鹤壁、三门峡四个省辖工业城市的兴起,极大地助推了中原城市群的形成。这四个市是“一五”期间国家为发展煤炭工业与建设水利工程的需要而兴起的四个工业城市。这四个省辖市的形成和河南其他省辖市一起奠定了今天中原城市群的雏形。

同时,除这四个新兴省辖市的崛起外,郑州市周边其他城市在这一时期发展也较快,如洛阳、新

乡、许昌、漯河等城市。首先是洛阳市,“一五”期间洛阳市的建设受到国家的重视,苏联首批援建项目中的 4 个大型厂矿,即拖拉机厂、轴承厂、热电厂以及矿山机械厂均落户洛阳市,该市也成为当时全国八个重点建设城市之一。之后,国家又把铜加工厂以及高速柴油机厂这两个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厂址选在洛阳,为这些工业配套服务的玻璃厂、棉纺织厂、耐火材料厂、水泥厂等大批工厂随之建立。因而在“一五”期间,洛阳成为河南工业基本建设中的重点城市^{[12]11}。这也为洛阳成为河南省发展的副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其次新乡、许昌、漯河等与郑州市同处京汉铁路线上的城市也发展较快。如新乡市是原平原省省会,以及许昌、漯河等城市受郑州经济发展带动影响,在“一五”期间均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综上所述,河南省在落实“一五”计划的过程中,促进了省会郑州周边资源型城市的崛起,助推了中原城市群的形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计划投资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成为城市集聚资源的重要源泉,如前述平顶山、三门峡在之前没有任何基础,完全是白手起家的城市;而焦作和鹤壁虽有一定的基础,但基础也很薄弱。这四个城市的兴起正是河南工业化背景下计划经济推动的结果。而郑州、洛阳市由于落实了较多的苏联援建项目,成为河南的重点建设城市,也分别奠定了其河南省中心与副中心城市地位。由于郑州核心城市地位的辐射作用,也带动了处于京汉铁路沿线的新乡、许昌、漯河等城市的发展。同时由于核心城市郑州相比以前的省会开封具有较为明显的地理与交通优势,也使得河南省委、省政府对这些新兴工业城市的领导与支持更为便利,如平顶山市正是有了“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及时的大力支持,该地区的厂矿才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工兴建并建成投产”^{[12]313},这充分体现了核心城市地理与交通优势对群内城市的巨大带动作用。

三、以郑州为核心推动城市群发展

“一五”期间,以郑州为核心的群内城市在经济建设方面积极互动,推动了中原城市群的发展。由于郑州市具有便利的交通优势,且处于交通枢纽的地位,也就便于其领导与协调各个工业城市的建

设,从而使这些工业城市在建设中相互支援,发挥出整体效应。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由于郑州市处于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的交通枢纽位置,便于河南省的城市以郑州为中心形成铁路网络。在河南,由于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在郑州形成了交叉,因此十分便于修建支线把河南的主要工业城市连接起来,如郑州、洛阳、安阳、平顶山、鹤壁等城市铁路的连接。1956年,为加大运力,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分别动工修建“郑(州)安(阳)复线”和“郑(州)洛(阳)复线”,这极大地加强了洛阳、安阳两座工业城市与省会郑州的联系,同时以京汉铁路为中心,修建了连接平顶山和鹤壁这两个重要煤矿区的铁路支线,并修筑了“郑州枢纽站”等^[19]。这些铁路复线和支线的建设,使河南的主要工业城市和工矿区都汇聚到京汉与陇海这两条主要铁路线上,并与交通枢纽郑州市紧密连接。这种交通互联的方式不仅促进了工矿区的建设,同时也更有利于工矿区的物资调运,进而促进整个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如从平顶山矿区来说,在连接京汉铁路的支线建成后,各地支援平顶山建设的物资可以通过铁路直接运到建筑工地,使得这个新矿区的建设“大大加速”,同时平顶山矿区产的优质煤炭也可以通过京汉铁路大动脉运送到各地支援建设^[20]。可见,以郑州为枢纽中心,以京汉、陇海两条国家主干铁路线为主轴,通过修建支线把河南省的主要工业城市与工矿区连接起来,进而形成了一个内部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这极大地便利了省会郑州市领导和协调职能的发挥,使中原城市群各城市在建设中互相支援,从而发挥出整体效应。

其二,主要工业城市在建设方面合理布局,积极互动。如在电力能源方面,郑州、洛阳、三门峡三地输电线的建设工程。三地的“电网”于1957年开始建设,线路全长达到230公里,建成后,郑州、洛阳两市已经建成的热电站可以把电力输送到三门峡工程工地,保证该项目的用电;同时三门峡工程完工开始发电后,可以通过该电网把大量电力输送到郑州、洛阳以及中原城市群内其他各城市,进而满足“这些城市的工矿用电”^[21]。这样的建设工程使整个城市群在建设上合理规划布局,城市群内能够积极互动,资源能够互享,进而促进了整个中

原城市群的发展。

其三,以郑州为核心的主要工业城市支援新工业区和新兴城市的建设。在中原城市群内,河南的主要工业城市对新兴工业城市的建设进行支援,极大地加快了它们的发展进程。如郑州市支援平顶山市建筑用瓦60万片,而这些瓦将由中南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河南省建筑材料供应处等五个部门提供;洛阳市支援三门峡建筑用砖500万块,除专责洛阳窑厂提供130万块机砖外,并组织市郊区的群众生产其余部分;新乡市则对三门峡和平顶山两地都进行了支援,支援平顶山机砖200万块,支援三门峡瓦30万片以及砖400万块,而这些支援物资“正从各建设单位抽调”^[22]。可见,河南省主要工业城市对新兴工业区和新兴城市的支援不仅使中原城市群内部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新兴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总之,“一五”期间以郑州为核心的群内城市互动进一步加强了中原城市群的内部联系,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城市群整体的发展。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以铁路为纽带,交通便利,矿产资源丰富,人口稠密,教育文化等事业也较为发达,这极易形成集聚效应,对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创建现代工业区位论的德国科学家韦伯认为:工业的地区分布应遵循“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基本原则^[23]。中原城市群内的这些互动正体现了这种优势。

四、中原城市群早期形成的意义

通过前述梳理可以看出,中原城市群是在河南省会由汴迁郑后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中原城市群的早期形成与发展对河南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通过历史的追溯,使中原城市群具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有利于当前中原城市群的发展。自从2003年河南省委提出中原城市群概念后,中原城市群的形成历史始终缺乏追溯。事实上,中原城市群的基本框架确定于1952年9月份的郑州被确定为河南新省会,以及平原省被撤销而使豫北回归河南。当1954年河南省会由汴迁郑后,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平顶山、鹤壁、焦作、三门峡等四个新兴城市的崛起,

以及洛阳、新乡等老工业城市的发展,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原城市群的雏形。

其二,对今天的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一些历史的经验。今天的中原城市群是由昨天的城市群发展起来的,因此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如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的核心城市,存在着首位度过低问题,其首位度在 1990 年代仅为 1.5,与湖北武汉、陕西西安等相邻的省会城市相比较,其首位度是比较低的^[24]。当前随着郑州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情况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郑州首位度较低,经济实力不强,辐射能力较弱,对全省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25]。造成这种现实情况的原因显然是与郑州市的发展历史极大相关的,相比武汉、西安等邻省省会城市,郑州市是从小城市发展的,起步较晚,历史基础较为薄弱,经济文化发展自然需要时间的积淀。洛阳作为今天的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也是与“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对洛阳的投资建设分不开的。同时由于省会由汴迁郑,开封的大量资源迁移郑州市,而当时对开封的建设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导致开封发展滞缓,而当前河南省提出郑开同城化战略,也正是要使开封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原城市群中重放异彩。

总之,通过对历史的追溯与回顾,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原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并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而更好地促进当前中原城市群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刘跃进.新农村工作手册[M].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2003:46.
- [2]国务院关于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EB/OL].(2016-12-30)[2022-11-15].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30/content_5154781.htm.
- [3]张勇.迁出与迁入:河南开封由省会到专区的转变:1954年郑州专区由荥阳迁汴经过及其影响[J].社科纵横,2019(4):127-131.
- [4]关于河南省迁往郑州市的决议[A].河南省档案馆:J78-700.
- [5]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复[A].河南省档案馆:J78-700.
- [6]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同意河南省省会迁移郑州市致中南军政委员会函[A].河南省档案馆:J78-700.
- [7]关于省会迁郑问题的报告[A].河南省档案馆:J78-700.
- [8]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平原省简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 [9]河南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平原省邮电史料[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1.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11]平原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府机关结束、移交工作方案[A].河南省档案馆:J35-109.
- [12]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南省“一五”计划和国家重点工程建设[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 [13]平顶山市政府办公室.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志[M].广州:海潮出版社,1994.
- [14]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省各专市县经济文化情况志要:上集[M].郑州:河南省统计局,1958.
- [15]赵尚兴.焦作市建筑工程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
- [16]徐星桥.焦作煤矿志(1898—1985)[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4.
- [17]《鹤壁市城市建设志》编辑室.鹤壁市城市建设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1.
- [18]三门峡市已具雏形[N].河南日报,1957-10-18(2).
- [19]机械、煤炭和纺织工业基地日渐形成[N].河南日报,1957-01-01(1).
- [20]平顶山铁路支线全面施工[N].河南日报,1956-05-10(1).
- [21]三门峡变电站建成[N].河南日报,1957-10-04(2).
- [22]郑州、洛阳、新乡市抽调砖瓦支援三门峡和平顶山的建设[N].河南日报,1956-10-25(1).
- [23]熊义杰.区域经济学[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2.
- [24]朱友文.河南省黄河经济带研究[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1:130.
- [25]郭小燕.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模式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92.

(责任编辑:雷 鸣)

空间正义视角下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高 灿, 黄爱教

(天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84)

摘 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价值诉求。教育公平的关键在于空间资源分配的公平,而“城”“乡”作为两个不同的空间概念,在教育政策实施、教育资源配置、信息技术使用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呈现为诸多不公正形态。空间正义理论为推进城乡教育公平发展提供新视角,有助于城乡教育公平发展政策的制定、推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及教育信息透明化。

关 键 词:空间正义;城乡;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101-07

教育公平保障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公正地享有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到本世纪末,基本扫除青壮文盲,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1]。2000 年,我国已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发展目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不均衡状况正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实践领域,为解决这一问题,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以保证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提出“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及“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等^[2]。2012 年 10 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3]。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又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4]。

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从不同学科维度关注了教育公平及其问题。在伦理学角度,学者们则将教育

公平视为一种人格的平等。例如,学者认为教育公平涉及人与人之间与价值相关的公平性问题,反映教育发展的价值诉求,并重点从人的价值理念出发探讨教育公平问题^[5]。在教育学角度,教育公平则与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紧密相关。学者认为,我国教育资源短缺的现状下应从调整收入分配和财政结构上力求达到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平衡^[6]。在政治学角度,学者从政治制度的角度阐述了教育公平的政治价值和影响,并从制度上保障教育公平^[7]。综观当前研究,都是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进行研究,很少将“城”与“乡”作为两个不同的空间概念进行研究。实际上,“城”与“乡”属于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分的空间上的概念,城乡教育发展则应然地涵盖“城”的教育发展与“乡”的教育发展两个维度。当前,“城”的教育发展与“乡”的教育发展呈现的显著空间差异性,实质为城乡教育发展的空间正义性问题。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何推进“城”的教育与“乡”的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借助空间正义理论,分析我国城乡教育发展的空间差异性,提出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进一步缩小教育空间差距,推动我国

收稿日期:2023-05-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2YJAZH029)

作者简介:高 灿(1997—),女,山东省菏泽市人,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黄爱教(1979—),男,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哲学博士,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人权理论研究。

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一、空间正义:推进城乡教育公平的新视角

空间正义,指的是对空间利益的获取不能损害其他群体的空间利益,并为其提供普遍的发展机会,实现公正的空间效益。在城乡教育发展中,“城”与“乡”作为两个空间概念,为用空间正义理论分析城乡教育空间差异性提供了可能。

(一)城乡教育公平及其意义

城乡教育公平,简单地说就是城与乡之间教育发展的公平。就概念而言,城乡教育公平由“城乡”与“教育公平”两个核心概念结合而成。首先,“城乡”是一个空间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在对“城乡教育”概念的理解中,往往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对“城”与“乡”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城乡教育公平概念下,实际上蕴含着“城”与“乡”在教育发展中的比较,必然要求对“城”与“乡”进行空间上的区分。本文将“城”界定为“城市”,而“乡”则界定为“乡村”。所以,城乡教育发展,必然涵盖了“城”的教育发展与“乡”的教育发展两个维度,而这两个维度的发展,它的速度、效果及影响则具有明显差异,就形成了均衡问题、正义问题。其次,“教育公平”是教育领域的价值追求,是教育领域的“价值”概念。教育公平是人们的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其本质是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教育公平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基础。基于此,城乡教育公平是指在城乡空间范围内对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能够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壁垒,满足城乡居民人人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城乡教育发展,由追求“均衡”转变为对“公平”的追求,党和国家也制定了诸多政策推进城乡教育公平。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教育公平”概念。201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等文件。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了“教育公平”。

城乡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在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第一,城乡教育公平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现代社会的教育差距往往加大贫富差距甚至出现代际贫困传递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切断贫困代际传递”^[8]。只有补齐农村教育发展的短板,让农村学生接受高质量教育,通过教育提高生活质量,才能有效减少贫困代际的发生。第二,城乡教育公平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助推器。社会是由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群体组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很大程度上要靠人的素质提高,教育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能力素质,城乡教育公平的实现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第三,城乡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前提。城乡教育的发展代表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只有将城乡教育的利益关系处理好,才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协调。

(二)空间正义与城乡教育发展

在中国,“正义”一词最早见于《荀子》:“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9]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正义独有的范畴和地位。在西方,正义观念源于古希腊时期。梭伦是最早将正义概念运用于“给一个人以其应得”这个观念的人。在伦理学角度,“应得”观念是正义概念的核心,指能够按照统一标准对待相似的人和物^[10]。在社会学角度,正义则是指按照平等自由的原则分配政治和经济中的利益^[11]。正如埃德加·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12],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解与阐释。就空间正义而言,由空间与正义创造性地构成,其最初源于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一体化理论”。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正义是能让更多弱势群体获得更大社会权利和更多社会资源,实现空间生产的公平与公正^[13]。而后,大卫·哈维和爱德华·苏贾深受亨利·列斐伏尔的影响,也从不同角度对空间正义进行研究。大卫·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中将社会正义纳入空间理论的研究范围,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辩证法,深入阐述社会正义与城镇化的复杂关系^[14]。爱德华·苏贾则提出“第三空间”理

论,强调文化在社会空间中的作用,从宏观的角度对空间和正义进行考量^[15]。综合学者关于空间正义的讨论可知,空间正义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蕴:一是空间正义是基于空间差异性的正义。差异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差异性的空间正义能够寻求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交叉共识,从而达到社会群体的多样化发展。二是空间正义的本质为社会正义的空间化。空间正义所突出的空间属性和空间价值凸显了人的生存发展的空间维度,人的存在及其行为的正义能够规范社会秩序,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三是空间正义追求的目标是公正的空间效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协调好社会各类主体之间的空间利益关系,提供普遍的发展机会,提高空间生产的效率,达到公正的空间效益。

空间正义理论对解释诸多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诸如城市建设、乡村旅游等。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社会空间存在着城市和农村两种空间样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空间正义开始向城市化方面应用,各种城市发展的问題逐渐暴露出来,演变成对农村部分群体空间权益和农村教育资源的剥夺,引起人们对城乡空间的重新思考,尤其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及引发的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一般来说,城市相比于农村,生活环境好、交通便利、生活品质高、社会保障较为完善、教育资源丰富且水平较高。而过去更加偏向城市的城乡义务教育体制,使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公平性呈现失衡状态,城乡教育不公平问题尤为凸显,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城乡差距拉大。如何协调与推进“城”与“乡”两个空间的教育公平,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此情况下,空间正义理论成为推进城乡教育公平的新视角和可以利用的新资源。

(三)走向空间正义的城乡教育融合发展

当前,我国人口众多,人口质量和数量参差不齐;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使教育公平成为一个难题。因此,走向空间正义的城乡教育融合发展,是城乡教育的必然价值诉求^[16]。城乡空间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是城市与乡村在经济、文化、教育、城乡建设、政策体制等方面逐渐协

调与融合发展的过程,更是城乡空间关系发展的理想状态。空间正义是促进城乡教育融合的价值诉求,强调资源分配效率要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兼顾公平与效率。城乡教育融合发展,需要加强对农村和西部不发达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形成城乡教育融合体制。需要在空间正义逻辑下重塑城乡教育关系,推动城乡教育要素流动和功能整合,形成优势互补、全面融合的城乡教育发展生态。需要厘清城乡教育之间的现实差距,着眼于“城”的教育发展的优势,补齐“乡”的教育发展短板,达到城乡教育融合发展,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实现。

二、城乡教育发展的空间不公正形态及其成因

近年来我国乡村教育取得了巨大发展,城乡教育差距逐步缩小;但是,乡村教育仍是教育发展的短板,在办学条件、教师队伍、经费保证、教育水平等方面与城市教育相比仍存有一定差距,形成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公正形态,影响了城乡教育的公平发展。

(一)城乡教育政策差异

城乡义务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策部署,二者之间的政策差距也是空间非正义的表现之一。目前,仍有一些教育政策向城市倾斜,不利于乡村学校教育的发展。第一,城镇学校大班额现象较为严重。从城乡区域看,大班额问题主要集中在城镇区域。近年来,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虽然逐步在完善,但仍较薄弱,主要表现在待遇低,性别、年龄以及专业教师比例配备不合理,编制名额缺少,“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问题依然突出^[17],使得乡村的一部分教师和学生纷纷“进城”。在此情况下,城市学校不堪重负,不得不采取大班额制度合并班级,导致乡村生源缺失,城镇教育资源紧张。第二,城乡中小学教师职级职称评聘制度差距。职称评聘制度是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制度影响因素,也是乡村教师队伍确保积极性的重要屏障。但城乡教师在职级晋升标准和职称评聘办法方面存在差异。相对城市而言,乡村教师存在职称评聘数量少、职级晋升难度大、教师编制名额少等问题,这势必会影响乡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性,对于补齐乡村教育的短板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进程非

常不利。第三,城市偏向性政策。教育政策制定和实行的根本目的是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而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却常常会将重点放在城市教育方面,而忽略农村教育发展与教育政策实施的协调性。以上现象实质上则归结于最初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和农村教育落后的客观条件,使得一开始在发展目标上就降低了对农村教育的要求,表现出教育政策对弱势地区不利的一面,将城乡教育差距拉大,造成城乡教育公平偏差的恶性循环^[18]。

(二)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正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导致了我国不同空间区域及不同教育层次的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尤其城乡区域之间的财政投入不均衡、师资质量方面及农村学校的发展趋势上的差异。

1. 城乡财政投入方面存在差距。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目的就是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学生群体之间的差距。全国大部分的县已实现了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但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增速下降,城乡和地区之间生均经费有所差异。“十三五”时期,相对于其他教育阶段,我国义务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的年均增长率从“十二五”时期的 15.2% 和 16.3%,下降到 7.2% 和 8.3%,生均经费支出水平增速放缓。而同期城市义务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率为 8.8% 和 10.5%,已超过农村^[19]。城乡财政投入方面的差异影响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2. 师资投入方面存在差距。长期以来,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严重失衡,农村教育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教育质量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20],最主要的表现是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少,这是城乡教育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差距。比如,在年龄结构上,城镇中年轻教师占比较大,相反在农村只有少部分中青年教师,这对于教学知识和教育观念的更新产生阻碍作用。在教师学历层次上,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专科以上学历教师农村占比达 47.49%,

比城市低 31 个百分点^[21]。可以看出,城市教师学历普遍比农村高,这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水平等方面产生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不可否认,城乡教师待遇的差距严重打击了乡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大城市更容易吸引优质人才,因此城市对招聘教师的要求会比较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优秀教师,而乡村有能力的教师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教师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也会想尽办法进城执教。以上种种原因都将使城乡师资力量处在不平衡的位置。

3. 乡村学校萎缩现象。影响城乡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城乡教育质量差异。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使得乡村学校因生源少出现萎缩。乡村经济发展相对迟缓,造成整个乡村处于相对劣势的状态,即使通过乡村教育也很难快速改变当前已有的局面。一些乡村学校地理位置偏僻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不能满足师生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条件稍好的都力求去城市求学,这也造成城市学校竞争力越来越大,学生生源饱和,而农村地区生源不足,教育财政投入和经费紧张,学生的正常上课和教学所需的开支都成为难题。从图 1 中国乡村学校数量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到,截至 2019 年中国乡村共有 740 所高中、14 477 所初中、8.9 万所小学,乡村小学和初中这种义务教育学校数量呈现逐年递减的态势,不容乐观。学龄人口从农村不断向城镇聚集,乡村学校学龄人口越来越少,出现了“城挤乡空”的城乡教育发展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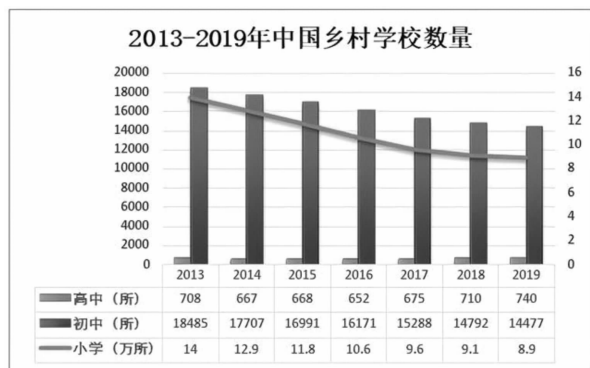


图 1 2013—2019 年中国乡村学校数量

(三)城乡教育信息技术不对称

城乡教育信息技术的不对称影响城乡信息资源的双向流动,成为城乡教育公平发展的阻碍。在乡村,学校互联网的普及率较低,不能熟练运用网

络资源,因此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也成为城乡教育差距的问题之一。

城乡之间教育信息技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第一,城乡接入鸿沟。接入鸿沟一方面表现为城乡教师在教学中使用的新媒体技术设备代际差异。农村教学设备不完善,在网络速度、网络覆盖率方面会面临一些问题。网络接入速度不同会使城乡教育在网络教学方面存在差距。一些新技术、新手段也会因农村地区网络不发达、信号弱等客观因素无法及时利用。第二,城乡使用鸿沟。“使用鸿沟”是指对于信息技术、设备在使用频率和时间上存在差异。^[22]城市学校会定期对教师在技术方面进行培训,而乡村因经费不足不能及时提供教师培训,乡村教师在使用计算机以及电子教学设备方面的熟练程度不容乐观,使学生在接收新知识方面也要落后于城市学生。在数据化、信息化时代除了教师的教学质量以外,教师对新媒体技术的使用也成为通向教育公平道路的绊脚石。第三,城乡能力鸿沟。“能力鸿沟”指不同人群由于个人天赋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在获取、处理和创造数字资源方面存在的能力差距^[23]。在城乡教育之间主要体现在教师获取数字资源的能力差别。城乡教师因受教育程度差异和自身能力的不同,对所开发的信息资源种类和数量有所差别,从而影响学生接受多元化信息教育的机会。

三、空间正义视角下推进城乡教育公平的对策

城乡区域的协同发展首先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公平问题。这就要求以空间正义视角有针对性地从事教育发展公平政策建构、资源的公平配置、教育信息的透明化方面实现教育的公平正义,推动城乡教育公平。

(一)教育发展公平政策建构

促进教育公平最重要的是在教育政策上下功夫,进行教育政策的公平建构。对城乡之间教育政策的建构措施必须是保质保量的,在稳定生源、教师职称评聘、政策倾斜力度方面都不可或缺。第一,消除“大班额”现象,做到招生规范化。一方面国家需严格规范城镇学校的招生行为、办学行为,对班级人数超标的学校采取一定的惩戒措施。通

过把控好城市与乡村生源数量的稳定性,达到招生人数的平衡,在实现城乡教育公平上才有可能取得一定突破。另一方面,保证乡村教师的工作稳定性是确保乡村教学质量的前提。多为乡村教师争取发展机会,提高工资待遇,加大经费投入改善乡村学校环境,留住人才,保证乡村生源不会外流。第二,完善乡村教师职称评聘制度,促进城乡教师协同发展。城市与乡村学校在客观物质条件上存有一定差距,要想留住乡村优秀教师,就需要准确把握乡村教师的内在需求。应突破乡村教师职称评聘名额限制,将晋升机制向贫困、偏远地区适当倾斜,适当提高乡村教师中、高级职称岗位比例,提高乡村教师工作积极性。消除乡村教师存在的工作落差感,促进城乡教师的协同发展。第三,从城市偏向转变为重心向下的义务教育政策。教育政策不仅要惠及城市也要兼顾乡村,适度向下倾斜。针对家庭条件贫困的学生进行适当的政府教育补贴。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落实好农村薄弱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注重乡村义务教育的发展,防止学生出现辍学现象。同时,加大乡村大学生支教力度,解决乡村教师短缺的燃眉之急。总之,教育公平发展政策建构是目前在国家层面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

(二)教育资源公平配置

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为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水平,需要建立完善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24],在财政投入、提高教师待遇和学校布局方面作出一系列改善。第一,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力度,重点向农村薄弱学校倾斜,注重将资金投入在改善校园设施条件、提高教师待遇、扩大普惠性资源、配齐教师等方面。完善乡村中小学教学设备的改造投入机制,保障教学设备的正常运转;经费投入保障教师的基本福利待遇水平以及家庭贫困学生上学资助等多方面的需求,缩小城乡教育经费投入差距。第二,完善农村教师编制名额。农村教师工资低和待遇差是阻碍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要想将人才引入乡村、留住人才,就必须将有利于教师发展的福利政策偏向农村。

比如,满足乡村教师编制名额缺少的需求,给予乡村教师一定的补贴政策。新增教师要优先满足农村学校的需求,足额配备各学科教师数量。修建教师公寓,创造安心教育、服务农村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第三,引导教育资源整合,优化乡村学校布局。乡村学校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优秀教师。以扶持农村中小学教育为工作重点,在农村加大引进优质教师资源,将学生人数少的乡村学校科学撤并,打造科学合理的学校布局。建立城乡教师交流合作制度,定期举办教师经验分享交流会,促进城乡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

(三)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

一根网线连接城乡。在信息化无远弗届的今天,信息技术正逐步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信息技术能够打破时空的界限,实现信息资源的集成化和共享化,进而缓解城乡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实现城乡教育信息透明化能够减少信息差,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相互融合,进一步形成加快城乡教育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第一,推进乡村教育资源信息化建设。在乡村建立一整套统一的信息平台,不仅让乡村学校师生满足上网需求,而且保证师生的上网速度,推进“同步课堂”“专递课堂”和全国及区域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普及开放等服务,通过网络平台向乡村薄弱学校传送优质教学资源,让乡村每一个孩子和城市孩子一样都能接受最优质的教育,学习到最先进的文化知识。第二,加强乡村教师信息技术培训。师资力量薄弱、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是乡村信息化教育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信息技术匮乏制约乡村学校信息资源的开发。通过远程网络对城乡教师开展多渠道信息技能培训,缩小城乡教师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差异。建立城乡教育信息一体化,提高乡村教师的专业化素养,形成更大的教育网络资源圈。第三,开发符合当地学校特色的信息资源。不同教师对于信息资源的搜集和掌握有所不同,城乡教师可根据学生自身特点和当地特色开发符合学生课堂需求的网络资源,加大教育资源开发和整合力度,促进义务教育优质资源特色化应用。综上,教育信息透明化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力抓手,借助信息技术提高乡村教师教学质量和专业技能,促进城乡

教育均衡发展。

四、结语

教育的公平与否影响着社会公正与国家的发展,实现城乡教育公平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重点工程。追求城乡教育公平发展,就需要立足于“城”与“乡”的社会空间,借助空间正义理论资源,推进教育发展公平政策建构、教育资源公平配置和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增强城乡资源有机结合,促进城乡师生的沟通与互动,推动城乡教育不公平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使学生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良好的受教育环境,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

参考文献:

- [1] 谢延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探索进程: 基于党代会政治报告教育论述的分析[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5): 70-81.
- [2] 胡映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25.
- [3] 许长青, 梅国帅. 教育公平、社会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研究述评[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6): 102-111.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5] 项贤明. 论教育目的的公平转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7(2): 24-32, 116.
- [6] 谈松华. “短缺教育”条件下的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 公平与效率[J]. 教育研究, 2001(8): 3-7.
- [7] 刘海霞, 李贵有. 政治学视野中的教育公平[J].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 35-37.
- [8] 庞丽娟. 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J]. 教育研究, 2020(5): 16-19.
- [9] 冯留建.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94.
- [10] 廖申白. 西方正义概念: 嬗变中的综合[J]. 哲学研究, 2002(11): 60-67, 80.
- [11]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56.

[12]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52.

[13]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4.

[14]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70.

[15]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6.

[16]杜骏飞.公正传播论(1):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J].当代传播,2022(1):44-50.

[1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4.

[18]魏易,朱蕾娜,季楚煊.我国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支出水平城乡差距分析报告[R]//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教育财政政策咨询报告2022年.北京: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3:106-121.

[19]周晔,袁桂林.教育的公正的发展与城乡教育差距问题:兼论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J].教育科学研究,2009(8):5-9,13.

[20]林红明.雷州市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问题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7.

[21]陈鹏.乡村教育多项指标进步明显[N].光明日报,2022-12-26(8).

[22]谢家玲.“数字鸿沟”视域下的城乡教育公平研究[J].求知导刊,2021(39):2-3.

[23]马黄龙,屈小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农村人力资本和数字鸿沟视角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1(10):173-190.

[24]陈蓉晖,赖晓倩.我国农村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及优化策略[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56-164.

(责任编辑:翟卫青)

Research on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al Equity from the View of Spatial Justice

GAO Can, HUANG Aijiao

(School of Marxism,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al equ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equity and the value appeal of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The critical factor for educational equity hinges on the fairness of spatial resource allocation. As two different spatial concepts, “city” and “township” hav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aspects, showing many forms of injustice. The theory of spatial justic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promoting the fair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ulation of the fair development policy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fairnes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transparency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Key words: spatial justice; urban and rural areas; educational equity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 现状调查与分析

林娜,康雅莹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202)

摘 要:自我关怀是一种能够让个体关爱自己的积极心理品质。研究采用整群取样法,抽取1 028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探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中等偏上;大四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高,大二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低;自我关怀能力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自我关怀能力越强的学生,其生活满意度也越高。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培养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策略。

关 键 词:自我关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心理健康;积极心理品质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108-06

自我关怀(Self-Compassion)是美国心理学家Kristin Neff在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背景下提出的关于自我的新概念,是指个体在面对痛苦或失败的情况下,能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善待自己,给自己温暖和不带偏见的理解,是一种能保护个体远离自我批评、反刍思维的积极心理品质^{[1]86-87}。

Kristin Neff的研究表明,自我关怀能力越强,个体的幸福感指数越高^{[1]95-96}。Adams等人研究发现,自我关怀可以缓解消极事件给个体带来的消极影响^[2]。Diedrich等人研究发现,自我关怀能力较强的个体,能够更好地进行情绪的调节,巧妙地处理消极情绪^[3]。Cunha M等人指出,自我关怀能力的培养是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种有效技能^[4]。国内近几年的研究同样表明,培养自我关怀能力,可以有效缓解焦虑症状。姚森研究表明,自我关怀水平高的个体,更不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症状^[5]。赵波研究发现,自我关怀是一种有效的情绪调节手段^[6]。张志华研究表明,自我关怀能力较强的来华留学生能够直面挫折,尽可能减少危机事件带来的负面情绪^[7]。梁凯欣通过对疫情期间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抑郁症状的发展轨迹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提高自我关怀水平可预防和缓解抑郁症状的发生^[8]。综上可见,自我关怀可以有效改善

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幼儿教育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预备阶段。”^[9]幼儿期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人格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幼儿。幼儿教师不仅是幼儿身体健康的守护者,更是其心理健康的引导者。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作为今后幼儿教育实施的主要负责人,拥有积极的心理品质、保持积极的精神状态对促进幼儿身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来了解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的总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如何制定相关策略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关怀能力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以实现我国学前教育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升。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个体网络施测的方式,随机抽取福建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集美大学等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由辅导员或任课教师通知学生,学生自愿参与,通过网络问卷平台在规定时间内作答。获得有效问卷1 028份,问卷有效率86.6%,见表1。

收稿日期:2023-04-19

基金项目:教育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重点项目(22YH07B)

作者简介:林娜(1993—),女,福建省莆田市人,教育学硕士,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教育学院助教,主要从事心理与行为研究。

表 1 样本的人口学变量分布表(n=1 028)					
变量	类别	人数/人	比例/%	变量	类别 人数/人比例/%
性别	男	218	20.2	年级	大一 360 35.0
	女	820	79.8		大二 214 20.8
单亲	是	116	11.3		大三 254 24.7
家庭	否	912	88.7		大四 200 19.5
独生	是	284	27.6		
子女	否	744	72.4		

(二)研究工具

1.自我关怀量表。采用自我关怀简版量表(Self-Compassion Scale Short Form,简称SCS-SF)。该量表分为六个维度:自我友善、静观当下、普遍人性、自我批判、自我隔绝、过度沉迷。共12道题,采用五点量表计分方法。自我友善、正念与普遍人性的条目采用正向计分;自我批判、自我隔绝、过度沉迷的条目采用反向计分。

2.生活满意度量表。采用生活满意感量表(SWLS)考察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感量表(SWLS)包含五个条目,量表的α系数为0.78,折半信度为0.70,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采用七点量表计分方法。总分“31~35”表示非常满意;“26~30”表示满意;“21~25”表示基本满意;“20”介于满意与不满意之间;“15~19”表示基本不满意;“10~14”表示不满意;“5~9”表示极不满意。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1.0 进行数据处理。使用平均数(M)和标准差(SD)描述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自我关怀的基本状况,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One-Way ANOVA)比较不同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以及单亲家庭与否的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自我关怀得分的差异。采用Pearson 相关分析法探讨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自我关怀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研究结果

(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整体情况

研究表明(见表2):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自我关怀总平均分为3.34,说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关怀能力中等偏上。自我友善、静观当下、普遍人性三个维度的均分位于3.5~4的得分区间,说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友善、静观当

下、普遍人性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表 2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各维度情况表(n=1 028)							
维度	自我友善	静观当下	普遍人性	自我批判	自我隔绝	过度沉迷	自我关怀
M	3.54	3.74	3.57	3.20	3.00	2.99	3.34
SD	0.76	0.74	0.76	0.88	0.95	0.95	0.52

(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的性别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3):男生在静观当下、普遍人性这两个积极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女生,在自我批判这一消极维度上的得分低于女生。说明女生更容易产生自我批判。

表 3 男、女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的差异比较(M±SD)			
维度	男生(n=218)	女生(n=820)	t
自我友善	3.57±0.85	3.53±0.72	0.86
静观当下	3.80±0.81	3.71±0.70	2.53**
普遍人性	3.65±0.82	3.53±0.72	3.23***
自我批判	3.05±0.95	3.27±0.84	-5.34***
自我隔绝	2.98±0.96	3.01±0.93	-0.60
过度沉迷	2.98±1.02	2.99±0.92	-0.32
自我关怀	3.34±0.53	3.34±0.51	-0.13

注:*P<0.05,**P<0.01,***P<0.001(下同)

(三)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的年级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4):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关怀能力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大四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高,大二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低。

(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在是否单亲家庭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5):单亲家庭学生在自我批判这一消极维度上的得分低于非单亲家庭学生,说明非单亲家庭的孩子自我批判的更多。

(五)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在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6):独生子女在自我友善、静观当下、普遍人性三个积极维度上的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在自我批判上这一消极维度上的得分低于非独生子女。说明非独生子女更容易进行自我批判。

(六)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7):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自我关怀得分越高的学生其生活满意度越高。

表 4 不同年级学生自我关怀差异比较(M ± SD)

维度	大一(n = 360)	大二(n = 214)	大三(n = 254)	大四(n = 200)	F	事后检验 (LSD)
	I	II	III	IV		
自我友善	3.49 ± 0.78	3.54 ± 0.74	3.61 ± 0.73	3.71 ± 0.78	4.40 **	I < III; I、II < IV
静观当下	3.71 ± 0.78	3.72 ± 0.72	3.76 ± 0.69	4.00 ± 0.69	5.13 **	I、II、III < IV
普遍人性	3.56 ± 0.77	3.56 ± 0.77	3.58 ± 0.72	3.74 ± 0.80	2.22	I、II、III < IV
自我批判	3.26 ± 0.88	3.08 ± 0.87	3.17 ± 0.89	3.30 ± 0.89	4.89 **	II < I < IV
自我隔绝	3.07 ± 0.95	2.86 ± 0.95	2.97 ± 0.95	3.04 ± 0.96	5.28 **	II < I
过度沉迷	3.06 ± 0.94	2.86 ± 0.98	2.95 ± 0.94	3.04 ± 0.98	5.10 **	II < I; III < I
自我关怀	3.36 ± 0.52	3.27 ± 0.51	3.34 ± 0.51	3.47 ± 0.57	5.24 **	II < III < I < IV

表 5 单亲与非单亲家庭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差异比较(M ± SD)

维度	单亲家庭(n = 116)	非单亲家庭(n = 912)	t
自我友善	3.56 ± 0.84	3.54 ± 0.75	0.32
静观当下	3.75 ± 0.74	3.74 ± 0.74	0.17
普遍人性	3.61 ± 0.82	3.56 ± 0.75	0.70
自我批判	3.08 ± 0.92	3.21 ± 0.88	-2.04 *
自我隔绝	2.92 ± 1.02	3.01 ± 0.94	-1.15
过度沉迷	2.91 ± 0.98	3.00 ± 0.95	-1.29
自我关怀	3.30 ± 0.56	3.34 ± 0.52	-1.04

表 6 独生与非独生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差异比较(M ± SD)

维度	独生子女(n = 284)	非独生子女(n = 744)	t
自我友善	3.64 ± 0.79	3.51 ± 0.75	3.35 ** *
静观当下	3.83 ± 0.72	3.71 ± 0.75	3.44 ** *
普遍人性	3.67 ± 0.76	3.53 ± 0.75	3.82 ** *
自我批判	3.12 ± 0.89	3.24 ± 0.88	-3.01 **
自我隔绝	2.95 ± 0.96	3.02 ± 0.95	-1.63
过度沉迷	2.96 ± 0.99	3.00 ± 0.94	-0.94
自我关怀	3.36 ± 0.51	3.33 ± 0.52	0.94

表 7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各维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表

维度	自我友善	静观当下	普遍人性	自我批判	自我隔绝	过度沉迷	自我关怀	生活满意度
自我友善	1							
静观当下	0.65 **	1						
普遍人性	0.48 **	0.54 **	1					
自我批判	-0.02	0.04	-0.11 **	1				
自我隔绝	-0.05 *	-0.08 **	-0.06 **	0.59 **	1			
过度沉迷	-0.06 **	-0.12 **	-0.04	0.60 **	0.75 **	1		
自我关怀	0.54 **	0.60 **	0.43 **	0.62 **	0.72 **	0.74 **	1	
生活满意度	0.21 **	0.19 **	0.14 **	-0.22 **	-0.38 **	-0.38 **	0.43 **	1

三、讨论

(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的整体状况

研究采用整群取样法,探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的现状。结果表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处于中等偏上水平(M = 3.34)。这说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能够用一种包容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关爱自己。这或许和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机制有关。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除专业理论课程之外,还需要学习绘画、声乐、舞蹈、钢琴等艺术课程,这些艺术课程的设置对学

生的心理健康有着疗愈的作用^[10]。另外,在学习这些技能课的过程中,学生们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承担更多的压力,这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提高了学生的抗压能力,因此在面对困难与挫折的时候,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有了更强的自我关怀能力。

(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研究表明:不同年级的学生自我关怀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大四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高(M = 3.47),大二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低(M = 3.27)。这或许是由于大四学生随着知识经

验及阅历的丰富、思维辩证性的增强,在面对消极事件发生时,能够给予自己更多的关怀,能够更理智、更成熟地去面对学习与生活;在感受到自己的消极情绪和情感时,没有去沉溺其中做出好坏判断,而是用一种更为平衡的心态去对待^[11]。大二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低,这或许是跟“大二低潮”现象相关。“大二低潮(sophomore slump)”是西方高等教育系统首先发现的一种发生在大二年级的“持续性感情的失望或沮丧”的现象。调查表明,大二的学生相比大一的学生有更多的消极表现,他们更经常迟到早退、旷课,学业成绩更差、挂科补考比例较高,人际关系当中的摩擦更为频繁。因此大二学生更少关怀自我,在遇到困难挫折时更容易沉溺于消极情绪当中^[12]。对此,教师、辅导员应更多关注大二学生,结合各个学校实际情况,设计有针对性的举措帮助大二学生度过低潮期,更好地进行自我关怀,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学前教育专业男生在自我批评维度上的得分低于女生,这说明女生更容易进行自我批判。分析原因,或许与固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家庭教养方式、社会文化传统等都存在相关,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整个社会层面,都更多鼓励男生坚强、探索、勇于展示自我,对女生则更多的是强调安静、乖巧、懂事,这种性别差异对待潜移默化地影响男女生自我认知与情感素质,使得女生在遇见消极事件时更容易将原因归于自身。

单亲家庭的学生较非单亲家庭学生,其自我批判维度上得分更高,说明单亲家庭的孩子在面对消极事件时更容易进行自我批判,这或许跟从小的家庭环境相关。单亲家庭的父母在面对困难时,或许会将自己的疲惫归因于子女,让子女背负了很深的愧疚感。如黄丽所述,单亲家庭的孩子更为敏感无助,他们缺少陪伴,在挫折产生时更多强调独自面对,在人生态度上存在悲观、颓废倾向^[13]。这种被迫成熟、被迫独立的背后是对自我关怀的牺牲。因此,在经历消极事件时,单亲家庭的子女们更多存在自我批判。

独生子女在自我友善、静观当下、普遍人性3个积极维度上的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这说明独生子女在经历困难、挫折,产生痛苦、失望等消极情

绪时,能够用一种开放和友善的态度安抚和关心自己,这或许是由于独生子女所处家庭环境更为优越。首先,独生子女在家庭中体验更多的关怀与热爱,这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安全感;其次,独生子女能够享受更为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父母总会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再次,更多的陪伴与付出,独生子女父母会给予孩子更多的精力与陪伴,他们投身于儿童的认知发展、个性发展、社会性发展等。王会会调查研究发现,主观努力与家庭环境都会影响奥运冠军的成长成才,在分析所有的奥运冠军后他们发现,绝大多数的奥运冠军是来自家庭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都更为优越的家庭,他们多是独生子女且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14]。因而相对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环境影响偏正面,成才效率较高。在面对消极事件消极情绪时,独生子女能够关怀自我,父母也能够给予其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三)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了解自我关怀的重要性,以及自我关怀水平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生活满意度是否产生影响,研究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度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自我关怀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说明自我关怀会影响个体的生活幸福感,自我关怀能力越强的个体越会采用积极主动和好奇的状态去探索生活享受生活^[15]。自我关怀可以降低面对日常生活中消极事件的消极情绪和消极反应,可以缓解压力事件中人们消极的自我批评和由此引发的痛苦情绪,让人们不被消极情绪所控制。因此,当个体用一种积极的认知去对待自己、看待周围的环境时,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也会随之提升。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中等偏上;其自我关怀水平在性别、专业、家庭结构(单亲与否、独生与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在个别维度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大学生自我关怀存在显著差异,大四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显著地高

于大一、大二和大三,大二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低。

2.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自我关怀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

(二) 建议

1. 家校携手,以爱共育。积极心理学强调:积极的系统支持是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形成的重要保障。学校、家庭要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形成“学生自知自助、朋辈互助、校内协同、家校共育”的工作合力。学校要指导家长树立民主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观念,了解和掌握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方法,注重自身良好心理素质的养成,以自身积极的品格和行为影响孩子。以上观点为学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指明了方向、路径,学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不能让心理教师“单打独斗”,而是要提醒心理教师携手家长,实行家校共育。另外,学校方面可以根据学生需求开展相关主题讲座,在学习方法、时间管理、人际交往、情绪调节、生涯规划等方面给予学生适当的引导;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应该在新生入学时为每位新生建立一个心理健康档案,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辅导员要善于观察,根据学生的个性特质因材施教,给予学生更多的积极鼓励与正向引导;教师可将心理保健知识融入课程中,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积极表现及时肯定;班级导师们定期与学生进行谈话,给予相应的生活、学业、人际关系处理上的帮助,引导学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上树立信心,发掘自身的价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家长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精神港湾,给予孩子适时的关怀与支持,及时有效地进行心理疏导。家庭成员之间要注重情感交流,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氛围。单亲家庭在教育孩子时,应避免将负向情绪宣泄在孩子身上;多子女家庭应尽可能公平公正地关注每个孩子的情绪状态。家校携手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提高自我关怀能力。

2. 学会调适,积极自助。《“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心理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引导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营造积极心态,预防不良心态,学会调适情绪困扰与心

理压力,积极自助^[16]。因此,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一是要积极了解相关的心理知识进行心理保健,当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可以通过适当的途径释放消极情绪,如选修舞蹈、音乐、绘画等技能课程,在艺术教育中达到心理的疗愈;二是善于发现与培养个人兴趣与爱好,广泛的兴趣爱好以及技能让个体更有自信的同时,也可增强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总而言之,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们要注重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提高自我关怀能力,做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参考文献:

- [1] NEFF K. Self-compassion: an alterna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a healthy attitude toward oneself[J]. Self and Identity, 2003(2): 85-101.
- [2] ADAMS C E, LEARY M R. Promoting self-compassionate attitudes toward eating among restrictive and guilty eaters[J].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7(10): 120-144.
- [3] DIEDRICH A, GRANT M, HOFMANN S G, et al. Self-compassion as a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J]. Behaviour Research & Therapy, 2014, 58: 43-51.
- [4] CUNHA M, XAVIER A, CASTILHO P. Understanding self-compassion in adolescents: validation study of the self-compassion scale[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6, 93: 56-62.
- [5] 姚森. 大学生正念、自我同情水平与抑郁焦虑相关探究[D]. 昆明: 昆明医科大学, 2020.
- [6] 赵波, 蔡特金, 张志华. 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学生情绪状态的呈现与调适: 基于自我关怀的视角[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4): 49-54.
- [7] 张志华, 蔡特金, 吴圣宸. 重大疫情下高校来华留学生的自我关怀与情绪状态研究[J]. 当代青年研究, 2020(4): 11-17.
- [8] 梁凯欣, 黄柳玥, 屈笛扬, 等. COVID-19 疫情期间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发展轨迹: 自我关怀和心理韧性的保护作用[C]//中国心理学会. 第二十三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 下. 北京: 中国心理学会, 2021: 676-677.

[9]教育部办公厅. 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EB/OL]. (2001-07-02)[2023-04-03].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459.htm.

[10]王丽. 艺术教育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J]. 大舞台,2012(5):181-182.

[11]罗琴. 论艺术疗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运用[J]. 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4(5):43-46.

[12]杜嘉庆,王春义,李忆妍. 浅析“大二低潮”现象的成因及对策[J]. 北京教育(高教),2021(8):91-92.

[13]黄丽. 城市单亲家庭对青少年人生观影响研究[D]. 哈尔滨:哈尔滨理工大学,2015.

[14]王会会,李彬. 伦敦奥运会中国冠军的成长及分布特征研究[J]. 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2(23):93-96.

[15]Neff K D; Kirkpatrick K L; Rude S S. Self-compassion and adaptive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7(1):139-154.

[16]国务院办公厅.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EB/OL]. (2016-10-25)[2023-04-03].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责任编辑:翟卫青)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Self-Compa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LIN Na, KANG Yaying

(School of Education,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Fujian 350202, China)

Abstract:Self-Compassion is a kind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that enables individuals to care for themselve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status quo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lf-compa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level of self-compassion of the students is above average; seniors have the highest ability of self-compassion, while sophomores have the lowest ability.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Students with stronger self-compassion have higher life satisfac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cultivate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Key words:self-compassion; college stud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mental health;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版权声明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超星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收录,并通过其对外提供无偿或有偿信息服务。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稿酬本刊一次性给付,本刊编辑部对来稿在内容和排版形式上有删改权。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否则将被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个体中心的视角

王童谣, 吴航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已成为我国家庭中普遍的育儿模式。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三孩时代的到来, 了解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对改进祖辈-父辈共同养育质量尤为重要。本研究从我国南、北方6个城市中筛选出317名有效的家长样本, 并使用潜在剖面、多元 Logistic 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显示,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包括低参与冲突型(51个, 占16.1%)、高参与和谐型(112个, 占35.3%)、高参与冲突型(29个, 占9.2%)、低参与和谐型(125个, 占39.4%)四种类型。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部分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受母亲教养效能感、养育压力、家庭收入、幼儿年龄多重因素的影响。为改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应提高幼儿母亲的家庭教育胜任力, 分担养育任务, 祖辈适度参与共同养育, 关注低收入家庭。

关 键 词: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影响因素; 幼儿; 潜在剖面分析

中图分类号:G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114-09

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中指出“鼓励地方采取积极措施, 支持隔代照料”^[1]。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预计在“十四五”期间, 我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 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随着老龄化和“三孩”时代的到来,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的现象已成为我国家庭中普遍存在的育儿模式^[3]。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对全国城乡20 083位老人的调查显示, 目前我国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的祖辈比例达66.47%, 隔代育儿的女性老人占比超过70.00%^[4]。其中, 由祖父母参与养育的3~5岁儿童超过50.00%^[5]。在这种模式中, 由于生活经验、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在共同养育过程中不同家庭养育双方的关系可能存在矛盾。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以往研究多采用变量中心的方法探究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这些研究对于探究祖辈-父

辈共同养育关系固然重要, 但该方法假定所有样本都是同质的, 其研究结论忽视了个体间差异。尽管有部分学者基于个体中心的路径探究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类型, 如有实证研究基于潜在剖面分析将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分为高参与和谐型、高参与冲突型、中间型、低参与型四种类型, 但该研究仅以某市幼儿园幼儿为研究对象^[6], 其地域多样性存在局限性, 且该研究未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共同养育关系的影响因素。因此, 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LPA的分析思路识别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类型, 以客观地了解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特点, 并在家庭系统理论指导下, 分析各因素对不同潜在剖面的影响。

一、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假设

幼儿母亲是抚养孩子的主要力量, 母亲教养效能感作为母亲对自己育儿能力的感知与评估, 会影

收稿日期: 2023-04-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基金项目(22YJA880060)

作者简介: 王童谣(1998—), 女, 河南省许昌市人,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家庭教育、幼儿教育研究。

通信作者: 吴航(1974—), 女, 浙江省嵊州市人, 教育学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家庭教育、学前儿童游戏研究。

响母亲教养行为的发起及坚持。尽管一些研究对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中养育支持、养育亲密度和矛盾暴露等维度进行探究,如 Chen Yirong 等一项针对自闭症儿童的研究发现育儿能力感强的母亲常有较高的干预意愿和动机,能促进家庭成员积极参与育儿^[7];还有研究发现高教养效能感的母亲会表现出移情、倾听等亲社会行为^[8],这种亲社会行为有利于减少祖辈-父辈之间的矛盾暴露。然而,少有学者关注母亲教养效能感对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1:母亲教养效能感影响不同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养育压力是养育者自身的养育能力或可获得的支持不满足、不匹配养育需求时所产生的压力感^[9]。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如 Sivak 等认为幼儿母亲的养育压力越大,母亲在祖辈参与共同养育时越焦虑,这种焦虑会体现在家庭关系中^[10]。我国学者也对此话题展开探讨,王英杰等认为父母较高的养育压力,会导致不良的家庭关系^[11]。但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养育压力对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影响,故需基于我国国情进一步论证。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养育压力影响不同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在家庭中,家庭收入是研究者们长期关注的因素,大多研究仅关注低收入家庭对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中矛盾暴露这一维度的影响,如 Yancura 等通过访谈发现在低收入家庭中会发生更多的代际冲突^[12]。Poblete 等认为家庭经济压力大时,可能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养育压力并会进一步增加祖辈-父辈之间的冲突^[13]。尽管有少量研究关注家庭收入对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中养育一致性这一维度的影响,如 Brody 等通过访谈发现家庭收入低的父母为了维持生计会同时做几份与体力劳动有关的工作,工作与育儿的疲惫会减少父辈之间的合作与支持,进而导致父辈共同养育理念的不一致^[14]。但这些研究多基于国外的文化土壤,且少有研究关注家庭收入对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影响,故需进一步论证。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3:家庭收入影响不同类型的祖辈-

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针对幼儿性别,以往研究仅关注幼儿性别对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中养育支持这一维度的影响,如 Coall 等认为祖辈倾向于优先为孙子提供支持而非孙女^[15]。刘畅等认为相较于女性幼儿母亲,男性幼儿母亲会更多地沿袭原生家庭的支持性协同教养行为^[16]。但少有研究关注幼儿性别对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影响。结合我国文化背景来看,中国传统有着男性才能成为传宗接代的历史偏见^[17],祖辈更易受传统偏见的影响,注重自己血脉的延续以传宗接代,男性幼儿的祖辈可能会在共同养育过程中提供出更多的养育支持,并有可能表现出更和谐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4:幼儿性别影响不同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总之,虽然有研究针对家庭系统中的预测变量对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展开了探讨,但母亲教养效能感、养育压力、家庭收入、幼儿年龄及性别对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仍然需要结合我国文化背景展开实证研究进行说明。为此本研究采用 LPA 的方法探索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剖面类型,并结合家庭系统理论相关变量,探究这些要素对不同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类型的预测作用,从而为改进祖辈-父辈共同养育质量、促进家庭关系和谐发展提供实证的参考。

(二)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本研究以南、北方各三所幼儿园的幼儿家长为研究对象,由教师向家长说明本次调查的内容与目的,家长知情后使用网上问卷平台自愿参与问卷调查,研究者参与此次研究的家长提供一对一的育儿反馈报告。本次研究共收集32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317份,问卷有效率为97.24%。此次研究共有男孩167名,女孩150名。被调查儿童的平均月龄为59.64月,其中小班幼儿占比26.18%;中班幼儿占比38.49%;大班幼儿占比35.33%。

(三) 研究工具

1.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采用 Feinberg 编制,李晓巍等人修订的共同养

育关系量表 (The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Scale, CRS)测量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18-19]。该量表共 38 个项目,经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后,其因子载荷较低,故保留 36 道题目。采用 7 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记为 1~7 分。量表中养育一致性、养育亲密度、养育支持、养育认可和劳动分工共五个维度为积极维度,矛盾暴露和养育破坏两个维度为消极维度;本研究中对两个消极维度进行反向计分后得到整体养育关系总分和均分,消极维度得分越高表示矛盾暴露和养育破坏越少。在本研究中,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七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55、0.760、0.897、0.888、0.814、0.817、0.801。

2. 养育压力量表

采用 Abidin 编制的养育压力量表简版(Parenting Stress Index-short form, PSI-SF)测量养育压力。该量表共 36 个条目,包括育儿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和困难儿童三个维度。该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 1~5 分,得分越高,养育压力越大。该量表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有较高的信效度^[20]。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三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01、0.914、0.913。

3. 母亲教养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主要采用刘淑玲编制的《幼儿母亲教养效能感量表》测量母亲的照顾效能、情感沟通效能和教养信心三个维度^[21]。该量表共 19 个题目,采用里克特 5 点量表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记 1~5 分,得分越高代表其教养效能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三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依次为 0.894、0.868、0.912。

(四) 分析方法

首先,借助 SPSS 对数据进行清理,并进行变量

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其次,利用 Mplus8.3 统计软件对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判断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类别及其分布情况,并使用 SPSS26.0 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最后,采用 SPSS26.0 统计软件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不同影响因素对多种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预测作用。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

本研究借助 Mplus8.3 对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将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潜在剖面依次设置为 1 类别、2 类别、3 类别、4 类别、5 类别进行分析,模型拟合指数见表 1。结果显示,4 类别和 5 类别的 AIC、BIC、ABIC 和 Entropy 拟合程度显著优于其他类别,但 4 类别的 LMR-LPR 的 P 值显著优于 5 类别模型。此外,个体中心的研究路径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剖面数量的确定,根据决定剖面数量的关键因素来看^[22]: (1)分析出来的每个剖面在分类指标均有差异性。(2)每个剖面有足够的个体,4 类别的潜在剖面符合 Nagin(2005)提出的剖面占总体样本的比重大于等于 5% 的标准^[23]。(3)符合以往有关研究剖面数量的期望与假定。因此本研究选定 4 类型为最终潜在剖面模型。

根据 4 类别的结果,Ⅰ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51 个,占 16.1%;Ⅱ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112 个,占 35.3%;Ⅲ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29 个,占 9.2%;Ⅳ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125 个,占 39.4%。四个类别所包含的家庭占比及各类别在七个维度上的得分如图 1 所示。

表 1 不同祖辈-父辈共同养育类型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信息

类别	AIC	BIC	ABIC	Entropy	LMR-LPR(p)	类别概率
1	7 093.165	7 145.790	7 101.385	--	--	1.00
2	6 583.753	6 666.448	6 596.670	0.828	0.029 1	0.344/0.656
3	6 376.069	6 488.836	6 393.683	0.843	0.073 1	0.174/0.435/0.391
4	6 226.181	6 369.020	6 248.493	0.866	0.037 6	0.161/0.353/0.092/0.394
5	6 105.381	6 278.291	6 132.390	0.879	0.351 0	0.171/0.044/0.088/0.325/0.372

注:矛盾暴露、养育破坏为反向计分题目,得分越低表示家庭中矛盾暴露、养育破坏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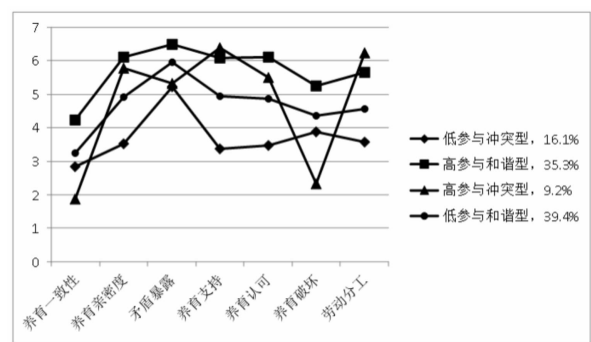


图1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4种潜在剖面分析

以七个维度的得分为依据,对四类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进行命名。第Ⅰ类的养育亲密度、矛盾暴露、养育支持、养育认可、劳动分工在四类家庭中得分最低(矛盾暴露为反向计分题目,得分最低表示家庭中矛盾暴露最多),养育一致性和养育破坏得分较低(养育破坏为反向计分题目,即家庭中养育破坏较多),故命名为低参与冲突型。第Ⅱ类的养育一致性、养育亲密度、矛盾暴露、养育认可、养育破坏在四类家庭中得分最高(矛盾暴露、养育破坏为反向计分题目,得分最高表示家庭中矛盾暴露、养育破坏最少),养育支持、劳动分工得分较高,故命名为高参与和谐型。第Ⅲ类的养育一致

性、养育破坏在四类家庭中得分最低(养育破坏为反向计分题目,即家庭中养育破坏最多),矛盾暴露得分较低(矛盾暴露为反向计分题目,得分较低表示家庭中矛盾暴露较多),养育亲密度、养育认可得分较高,养育支持、劳动分工得分最高,故命名为高参与冲突型。第Ⅳ类的养育亲密度、养育支持、养育认可、劳动分工在四类家庭中得分较低,养育一致性、矛盾暴露、养育破坏得分较高(矛盾暴露、养育破坏为反向计分题目,得分较高表示家庭中矛盾暴露、养育破坏较少),故命名为低参与和谐型。

为了对潜在剖面分类结果的准确性进行检验,以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七个维度为指标进行判别分析。结果表明,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类型的预测正确率均高于90%,说明潜在剖面分析结果较为可靠。方差分析发现,低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在七个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高参与和谐型和低参与和谐型家庭,且低参与和谐型在七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高参与和谐型家庭,表明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潜在剖面存在异质性(见表2)。

表2 不同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在七个维度上的均值(标准差)差异比较

	养育一致性	养育亲密度	矛盾暴露	养育支持	养育认可	养育破坏	劳动分工
低参与冲突型(Ⅰ)	2.841(1.052)	3.523(0.838)	5.223(1.126)	3.369(0.841)	3.472(0.804)	3.875(0.978)	3.570(1.060)
高参与和谐型(Ⅱ)	4.232(1.418)	6.116(0.508)	6.482(0.723)	6.088(0.619)	6.120(0.530)	5.240(0.842)	5.646(0.962)
高参与冲突型(Ⅲ)	1.873(0.721)	5.775(0.589)	5.320(1.861)	6.392(0.501)	5.493(0.614)	2.342(0.847)	6.233(0.811)
低参与和谐型(Ⅳ)	3.237(0.868)	4.907(0.548)	5.959(0.861)	4.933(0.695)	4.862(0.597)	4.356(0.943)	4.576(1.128)
F	43.730***	248.573***	23.187***	224.160***	233.120***	92.469***	67.347***
LSD	c<a<d<b	a<d<c<b	a<c<d<b	a<d<b<c	a<d<c<b	c<a<d<b	a<d<b<c

注: * $P<0.05$, ** $P<0.01$, *** $P<0.001$ (下同)

(二)不同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类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将母亲教养效能感、养育压力、家庭人均月收入、幼儿的性别和年龄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探讨其对不同类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影响。分别以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为参照组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包含所有的比较结果(见表3)。

以低参与冲突型家庭为参照时,母亲教养效能感显著正向预测其他三类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其中母亲教养效能感越高越可能归入高参与和谐型家庭,归入高参与冲突型家庭的概率次之,归入低参与和谐型家庭的概率较低。以低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为参照时,养育压力显著负向预测高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即相较于低参与冲突型家庭,养育压力越大越

不太可能归于高参与和谐型家庭。

以低参与冲突型和高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为参照时,家庭收入负向显著预测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以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为参照时,家庭收入显著正向预测低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即相较于低参与冲突型和高参与和谐型家庭,

家庭收入越高,越不太可能归于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相较于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家庭收入越高越可能归于低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简言之,相较于其他三类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家庭收入越高,越不太可能归于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表3 母亲教养效能感、养育压力等对潜在剖面的多元逻辑回归

	II vs. I			III vs. I		
	β	OR	95% CI	β	OR	95% CI
教养效能	1.541 ***	4.671	2.396,9.106	1.455 **	4.284	1.784,10.287
养育压力	-1.107 ***	0.331	0.182,0.601	0.637	1.890	0.953,3.749
收入	-0.003	0.997	0.820,1.212	-0.342 *	0.710	0.540,0.934
性别	-0.111	1.117	0.576,2.166	-0.532	1.702	0.672,4.311
年龄	0.171	1.186	0.902,1.561	0.593 **	1.810	1.224,2.677
	IV vs. I			III vs. II		
	β	OR	95% CI	β	OR	95% CI
教养效能	0.732 *	2.080	1.114,3.883	-0.086	0.917	0.436,1.930
养育压力	-0.338	0.713	0.413,1.231	1.743 ***	5.715	2.855,11.444
收入	-0.097	0.908	0.749,1.100	-0.339 **	0.712	0.556,0.912
性别	-0.151	1.163	0.606,2.232	-0.421	1.524	0.660,3.517
年龄	0.128	1.136	0.869,1.487	0.423 *	1.526	1.076,2.163
	IV vs. II			IV vs. III		
	β	OR	95% CI	β	OR	95% CI
教养效能	-0.809 **	0.445	0.275,0.722	-0.723	0.485	0.230,1.025
养育压力	0.768 **	2.156	1.342,3.463	-0.975 **	0.377	0.201,0.707
收入	-0.094	0.910	0.784,1.058	0.245 *	1.278	1.003,1.629
性别	-0.041	1.041	0.625,1.735	0.380	0.684	0.299,1.565
年龄	-0.043	0.958	0.774,1.185	-0.465 **	0.628	0.444,0.888

注:OR 即 Odd-Ration 系数,CI(Confidence Interval)即 OR 的置信区间。性别:女生为参照组。“vs. 后的组”为多元回归的参照组。

以低参与冲突型和高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为参照时,幼儿年龄显著正向预测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以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为参照时,幼儿年龄显著负向预测低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即相较于低参与冲突型和高参与和谐型家庭,幼儿年龄越大,越有可能归于高参与冲突型家庭;相较于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幼儿年龄越大越不太可能归于低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简言之,相较于其他三类祖辈-

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幼儿年龄越大,越有可能归于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儿童性别对不同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无显著影响。

三、讨论

(一)母亲教养效能感正向预测高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以低参与冲突型家庭为参照时,幼儿母亲的教养效能感正向预测其他三类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

系,其中母亲教养效能感越高,归入高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可能性越大。原因如下:首先,母亲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取得的育儿效果越好^[24]。这时养育者可能会把养育成果归功于祖辈参与,从而使这类家庭更有可能形成高参与和谐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其次,教养效能能够正向预测父母支持性养育行为^[25],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幼儿母亲更能够支持祖辈完成繁重的育儿任务,与祖辈之间的养育支持、养育亲密度、养育分工及养育认可也更高。反之,母亲的教养效能感越低,发起与坚持的教养行为就越少,祖辈会抱怨幼儿母亲的育儿疏忽,从而使得双方的矛盾暴露加剧,最终导致双方感受到较少的养育支持和养育认可。

(二) 养育压力正向预测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相较于低参与冲突型家庭,养育压力越大越不太可能归于高参与和谐型家庭。究其原因可能是:首先,现代社会“内卷”现象突出,社会竞争加剧,父母在幼儿教养方面存在较大压力。但由于养育者缺乏“职前”培训,导致养育过程中困难重重,问题频出。巨大的养育压力与不理想的养育效果形成鲜明对比,祖辈、父辈可能会把养育效果不理想归因于彼此,进而导致更多的家庭矛盾。此外,目前大多数家庭为“双职工家庭”,父辈劳累一天回到家中还面临繁重的育儿负担,在育儿过程中又出现“新观念”与“老路子”发生碰撞的问题,祖辈固执己见,父辈难以领情,这也加剧了矛盾暴露的可能性。最后,我国逐步放开的人口政策,家庭中子女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也给父辈带来更大的养育压力。为了弥补多子女家庭资源不足、养育压力大的问题,父辈很有可能邀请祖辈参与到幼儿照料中,但如果祖辈在养育过程中过度干预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代际矛盾。

(三) 幼儿年龄、家庭收入影响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

尽管在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家庭中祖辈积极参与育儿过程,但祖辈、父辈双

方却有着较高的矛盾,这与 Greenfield 的研究结果一致^[26]。可能是因为隔代教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模式,中国隔代教育由来已久,古时候家中所有事情都由年长的人决定。现代社会沿袭了这种传统,而祖辈的过度参与会限制父母在家庭中的活动,进而导致更多的家庭矛盾。多元 Logistic 回归的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类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存在的原因。一方面,相较于其他三类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家庭收入越高越不太可能归于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可能因为家庭收入的增加能够带来更大的幸福值,反之,家庭收入的减少也会产生更多的家庭矛盾。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三类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幼儿年龄越大,越有可能归于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可能因为随着幼儿年龄增大支出费用也在不断增加,这也加剧了父辈在经济方面对祖辈的需求,但祖辈能够提供的资金支持有限,进而导致祖辈-父辈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性别对四种类型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都没有影响。这可能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性别歧视、男性才能传宗接代的历史偏见在不断淡化。

四、教育建议

(一) 多方合力提高母亲家庭教育胜任力

班杜拉指出,个体的教养效能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源于迄今取得的成就;二是源于对他人活动效能的观察比较。因此,增加幼儿母亲的成功体验、转换观察比较对象是提高幼儿母亲教养效能感的有效措施。鉴于此,一方面幼儿母亲可以通过参加专家讲座、线上课程等方式,提高自身育儿能力,为幼儿提供更科学、更专业的指导,从而增加成功的育儿体验。另一方面,家庭成员要鼓励幼儿母亲科学的育儿行为,协助幼儿母亲确定符合其最近发展区的榜样。此外,社区、幼儿园要履行其社会责任,通过多种形式支持与引导幼儿母亲科学育儿,帮助养育者形成正确的幼儿观、教育观和发展观。如幼儿园可以通过家长沙龙、专家讲座等方式为家

庭提供更科学的育儿指导。还可以家庭为单位,依托社区建立干预支持平台,形成家、园、社协同育人新模式,将祖辈-父辈共同养育打造为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模式。

(二) 分担养育任务,养育者注重自我调适

养育压力越小,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越和谐。为了打造更和谐的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在养育过程中,养育者自身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会调节自身养育压力,如可以通过放松训练、压力管理和态度改变等方式调节自身养育压力;其次,祖辈-父辈的育儿观念越不一致,母亲的养育压力越大^[27],因此家庭成员要合理分工、保持养育双方养育观念的一致性,如可以通过沟通、交流的方式主动了解养育者需要的支持与帮助。家庭成员也可以通过鼓励、支持的方式,帮助养育者缓解养育压力;最后,有研究显示家庭经济因素、幼儿教养是影响父辈养育压力的重要因素^[28],政府也可以通过减免税收、开设社区玩具图书馆、为双职工父母提供托育服务等方式减轻幼儿家长的养育负担,缓解养育压力。

(三) 祖辈适度参与共同养育,避免高强度照料

隔代教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模式,中国隔代教育由来已久,古时候家中所有事情都由年长的人决定。现代社会沿袭了这种传统,祖辈参与共同养育能够帮助父辈缓解养育压力,使父辈有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工作中,但祖辈高强度的照料也会带来更多的代际矛盾。且亲子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基础,隔代教育是亲子教育的补充。为避免祖辈高强度照料带来的消极影响,首先,祖辈要明确自己“协助者”的角色,而父辈才是育儿的“主教练”。祖辈要意识到不论父辈多忙,都要承担育儿的主要责任与义务,而自己要尽力辅助,与父辈取长补短、各司其职。其次,对于祖辈介入幼儿的成长,父辈要心怀感恩,主动帮助祖辈分担养育任务,但也要明确自己“主教练”的角色定位,与祖辈在孩子教养问题上明确分工。最后,祖辈明确自己“辅助者”角色定位后,不能“越权”,也要避免“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让孩

子觉得有空可钻,要保持教养行为的一致性和持续性。

(四) 关注低收入家庭,增加学前教育经费投入

相较于其他三种类型,高参与冲突型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的家庭月收入最低,尽管在这类家庭中养育支持得分最高,但仍会受家庭收入影响产生诸多家庭矛盾。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支持不仅能为幼儿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开端,也能缓解低收入家庭的育儿压力、改善其生存状况,对促进我国家庭教育发展极为重要,是促进教育公平、克服贫困代际循环的有效手段。鉴于此,首先,中国可以吸取各国优秀经验,并结合我国现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多种服务与支持。其次,佩里教育法案显示,学前教育是一种最省钱的、回报率最高的公共投入^[29],而我国学前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完全有必要秉承公益性原则,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如国家可以通过单设教育彩票的方式为学前教育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最后,要加强学前教育资金管理的规范、透明与公正,保证教育资金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多种支持。

五、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有以下几点不足:首先,在研究对象上,本研究主要选取城市幼儿为研究对象,仅选取了少量农村地区儿童。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按均衡比例选取城市和农村的幼儿家庭为研究对象,也可对比城市和农村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类型的差异。其次,本次研究中高参与和谐型家庭占 35.3%,仅次于低参与和谐型家庭,这可能会受中国传统“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影响,参与此次研究的幼儿家长会隐瞒部分真实情况。未来研究可将问卷法与观察法、访谈法相结合,对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最后,此次研究仅探究了父辈对祖辈-父辈对共同养育关系的看法。理想状态下,未来研究可分别探究祖辈和父辈对共同养育关系的看法,并将其进行对比、分析差异,从而为祖辈-父辈共同养育的家庭提

供更多支持。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EB/OL]. (2022-08-16) [2023-04-21]. <http://www.nhc.gov.cn/rkjcyjtfzs/s7785/202208/9247dd64744c42df9522c4fa2cb78e42.shtml>.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养老托育连迎政策利好聚焦“一老一小”[EB/OL]. (2022-08-24) [2023-04-21]. <http://www.scio.gov.cn/32344/32345/47674/48975/48982/Document/1729637/1729637.htm>.

[3] 郭媛芳, 李晓巍.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与幼儿气质的相互作用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1(4): 783-788.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家卫计委举行全面两孩政策工作进展情况发布会[EB/OL]. (2017-01-22) [2023-04-21]. <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sb/Document/1541106/1541106.htm>.

[5] 崔荣荣, 国晓虹. 对家庭隔代教育利弊的分析[J]. 教育实践与研究(C), 2016(1): 63-66.

[6] 徐维曼. 祖辈参与幼儿教养的现状 & 类型划分[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7] CHEN Y R, CHENG T Y, LV F Y. Sense of parenting efficacy, perceived family interactions, and parenting stress among mothers of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13): 878158-878158.

[8] JUNTILA N, VAURAS M, LAAKKONEN E. The role of parenting self-efficacy in children's social and academic behavior[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007(22): 41-61.

[9] 蔡迎旗, 刘庆. 城市0~6岁婴幼儿父母养育压力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一孩家庭与两孩家庭的对比[J]. 南方人口, 2021(4): 26-36.

[10] SIVAK E. Managing grandparental involvement in child-rearing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ve parenting[J].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018(23): 830-846.

[11] 王英杰, 张美霞, 李燕. 儿童早期同伴接纳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一项交叉滞后分析[J]. 心理科学, 2020(3): 622-628.

[12] YANCURA L A, BARNETT M A, SANO Y, et al. Context matters: nonresident grandparent contributions to low-income rural families[J].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2020(25): 267-276.

[13] POBLETE A T, GEE C B. Partner support and grandparent support as predictors of change in coparenting quality[J]. *Journal of Child & Family Studies*, 2018(27): 2295-2304.

[14] BRODY G H, STONEMAN Z, FLOR D, et al. Financial resources, parent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parent co-parenting, and early adolescent competence in rural two-parent african-american families[J]. *Child Development*, 2010(65): 590-605.

[15] COALL D A, HERTWIG R. Grandparental invest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10(33): 1-19.

[16] 刘畅, 伍新春, 陈玲玲, 等. 幼儿父母的原生家庭对其协同教养的影响: 人际间变量及性别一致性的调节作用[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 74-80, 162.

[17] 谷文康. 以男性为传宗接代的象征是历史产生的一种偏见[J]. 中州学刊, 1985(2): 53-55.

[18] FEINBERG M 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context of coparenting: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J]. *Science and Practice*, 2003(3): 95-131.

[19] 李晓巍, 魏晓宇.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关系量表的初步修订[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5): 882-886.

[20] YE H C H, CHEN M L, LI W, et al.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arenting stress index: a psychometric study[J]. *Acta Pdiatrica*, 2001(90): 1470-1477.

[21] 刘淑玲. 托育机构服务品质、教养效能与亲师沟通之相关研究[D].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 2014.

[22] 尹奎, 彭坚, 张君. 潜在剖面分析在组织行为领域中的应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20(7): 1056-1070.

[23] NAGIN D S. Group-based modeling of developmen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4] JONES T L, PRINZ R J. Potential roles of parental self-efficacy in parent and child adjustment: a review[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04(25): 341-363.

[25] 李晓巍, 刘倩倩. 教养效能与父母参与的相互作用关系: 一项追踪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19(2):74-83.

[26] GREENFIELD E A. Grandparent involvement and parenting stress among nonmarried mothers of young children[J]. Social Service Review, 2011(85):135-157.

[27] SIVAK E. Managing grandparental involvement in child-rearing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ve parenting[J]. Sociologi-

cal Research Online, 2018(23):830-846.

[28] 刘庆, 蔡迎旗. 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青年探索, 2022(1):71-81.

[29] 蔡迎旗. 学前教育原理[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责任编辑: 翟卫青)

On the Type and Related Factors of Co-parenting Children
by Parent-grandparent among Chinese Famil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center

WANG Tongyao, WU Hang

(Faculty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Co-parenting children by Parent-grandparent has become a common pattern of upbringing in Chinese families. With the advent of aging population and three children, the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types of the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parenting. In this study, a valid sample of 317 parents was screened from six cities in the south and north of China,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and processed by using latent profiles an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sults of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show that the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includes four types: low involvement conflict type (51, or 16.1%), high involvement harmony type (112, or 35.3%), high involvement conflict type (29, or 9.2%), and low involvement harmony type (125, or 39.4%).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that some types of the relationship were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mothers' sense of parenting efficacy, parenting stress, family income, and children's age.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mothers' compet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share parenting tasks, moderate participation of grandparents in co-parenting, and focus on low-income families.

Key words: parent-grandparent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influencing factors; young children;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孔令丽

(黄冈师范学院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湖北 黄冈 438000)

摘 要: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的关系。方法:选取高校546名大学生(男生284人,女生262人),运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负性生活事件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评估被试的手机成瘾倾向、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水平。结果:1.在手机成瘾倾向及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会抚慰维度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不同年级学生在手机成瘾倾向总分及戒断症状、社会抚慰、心境改变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突显行为上大二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P=0.008, P<0.05$)。2.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相关;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在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 键 词: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社会支持;负性生活事件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3)04-0123-06

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比例达99.7%^[1]。此外,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应用,其开放性、便捷性、实用性得到广大群众尤其是大学生的青睐。大学生随时随地查看手机信息,通过聊天软件交流互动,浏览社交网站并实时更新属于自己的网页内容,发布各种动态、手游、观看视频等行为非常普遍。这种行为已经影响到课堂教学和日常生活,手机依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校园问题。与此同时,手机成瘾现象也引起了研究者不断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迄今为止,研究者对引起手机成瘾的原因还未达成一致。有研究者认为在大学生中普及较高的智能手机丰富的功能模块是导致手机成瘾的主要诱因。智能手机的娱乐功能、上网功能等模块提供了各种诱惑,使大学生沉湎其中,进而影响其正常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引起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等的各种问题与困扰。但也有研究认为,在引起手机成瘾的各种原因中,负性生活事件是主要的原因。何安明等的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影响越大,越容易成为手机成瘾者,且心理健康程度也会

越低^[2]。

负性生活事件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重大变化,对个体产生不良影响,且在心理上产生不安、消沉、焦虑等消极情绪情感体验的生活事件,是影响大学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心理咨询案例和危机事件多是由生活中的负性事件所引发。人际关系障碍、学业压力、异性交往受挫等是大学生普遍经历最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在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下,大学生容易出现孤独感、成就感缺失、自信心缺乏等不良心理体验。与此相对应,智能手机的游戏模块、上网功能、社交模块等以其方便、快捷、隐秘等特点成为大学生寻求安慰、扩大交往空间、发泄不良情绪的最好选择,进而最终导致手机成瘾行为的发生。具体来说,手机成瘾行为的发生原因在于那些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大学生利用手机的各种功能模块来实现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实现的心理诉求。如果大学生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手机成瘾行为会相应地减少。

社会支持指的是个体获得的来自他人或集体的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不少研究证实良

收稿日期:2023-04-10

基金项目:湖北省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研究会一般项目(P1314D022)

作者简介:孔令丽(1986—),女,河南省开封市人,心理学硕士,黄冈师范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讲师,主要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研究。

好的社会支持关系有益于身心健康,而恶劣的社会支持关系则会有损身心健康。强大的社会支持关系网可以为个体提供物质和心理援助以及信息的帮助,增加个体应对各种环境挑战的能力与信心,获得喜悦感、归属感,提高个体的自信心和自尊水平。当面临应激生活事件时,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缓解甚至阻止应激反应,稳定神经内分泌系统,提高社会适应力,形成健康的行为模式,从而增加积极情感体验并抑制消极情感体验。

近年来,手机成瘾已高度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目前有关大学生手机成瘾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关系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实证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黄冈市部分高校理工类、文史类、艺术类、经济类等在校本科生大一 190 人,大二 189 人,大三 167 人,共 546 名;其中男生 284 人,女生 262 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主要采用三个问卷:大学生手机成瘾量表(MPATS):采用由华中师范大学周宗奎、熊婕等人根据 DSM. IV 和相关资料中对物质依赖和行为成瘾等的描述而编制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该量表包括心境改变、戒断症状、社交抚慰和突显行为 4 个因素共 16 个题目。采用五级自评计分方式,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3,总分高于 48 可认定为手机依赖。

负性生活事件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该问卷涉及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及其他等六个方面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每项事件的刺激强度根据对被试造成的苦恼程度分为 5 级。

社会支持量表:采用肖水源、杨德森(1987)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共 10 个题目。量表重测信度为 0.92,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89 ~ 0.94 之间。根据本次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将量

表中涉及“配偶”和“同事”的题目分别修改为“恋人”和“同学”,此外还去掉了涉及“儿女”的题目。

(三)统计分析

通过 SPSS 20.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 *t*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二、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在不同性别、年级上的差异比较

由表 1 可知,在手机成瘾倾向及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会抚慰维度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心境改变维度差异不显著。不同年级学生在手机成瘾倾向及戒断症状、社会抚慰、心境改变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只有在突显行为维度上存在年级差异,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在突显行为上大二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P=0.008, P<0.05$)。大一大二与大三学生在突显行为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在不同性别、年级上的差异比较

项目	人数/ 人	戒断 症状	突显 行为	社会 抚慰	心境 改变	手机 依赖
男	284	14.15	8.52	6.69	6.87	36.24
女	262	15.25	9.31	7.12	7.06	38.74
<i>t</i>		-2.664	-2.914	-1.990	-1.052	-2.574
<i>P</i>		0.008	0.004	0.047	0.293	0.010
大一	190	14.200 0	8.536 8	6.563 2	6.736 8	36.036 8
大二	189	15.116 4	9.439 2	7.158 7	7.238 1	38.952 4
大三	167	14.814 4	8.766 5	7.029 9	6.958 1	37.568 9
<i>F</i>		1.598	3.797	2.510	1.911	2.748
<i>P</i>		0.203	0.023	0.082	0.149	0.065

(二)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及各维度得分与社会支持均呈显著负相关,与负性生活事件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负性生活事件及各维度均呈负相关(见表 2),仅丧失因子相关程度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三)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方杰、张敏强和邱皓政提出的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探究社会支持在大学生负性生

活事件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效应,抽取 5 000 个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使用 Hayes 编制的检验中介和调节效应作用的 Process 分析插件进行检验。

表 2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得分的相关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戒断症状	-														
2 突显行为	0.743 **	-													
3 社会抚慰	0.751 **	0.657 **	-												
4 心境改变	0.746 **	0.712 **	0.626 **	-											
5 手机依赖	0.943 **	0.878 **	0.847 **	0.853 **	-										
6 客观支持	-0.174 **	-0.182 **	-0.170 **	-0.158 **	-0.193 **	-									
7 主观支持	-0.129 **	-0.210 **	-0.102 *	-0.167 **	-0.169 **	0.483 **	-								
8 支持利用度	-0.072	-0.110 **	-0.105 *	-0.089 *	-0.102 *	0.310 **	0.405 **	-							
9 社会支持	-0.167 **	-0.225 **	-0.161 **	-0.185 **	-0.206 **	0.794 **	0.862 **	0.646 **	-						
10 人际关系	0.262 **	0.232 **	0.217 **	0.265 **	0.276 **	-0.145 **	-0.135 **	-0.170 **	-0.186 **	-					
11 学习压力	0.250 **	0.199 **	0.235 **	0.246 **	0.263 **	-0.150 **	-0.109 *	-0.151 **	-0.169 **	0.741 **	-				
12 受惩罚因子	0.286 **	0.309 **	0.314 **	0.350 **	0.347 **	-0.143 **	-0.089 *	-0.165 **	-0.159 **	0.676 **	0.751 **	-			
13 丧失因子	0.234 **	0.266 **	0.186 **	0.278 **	0.270 **	-0.015	0.044	-0.083	-0.008	0.516 **	0.543 **	0.648 **	-		
14 健康适应因子	0.247 **	0.301 **	0.223 **	0.245 **	0.286 **	-0.115 **	-0.061	-0.103 *	-0.114 **	0.518 **	0.558 **	0.615 **	0.653 **	-	
15 其他因子	0.341 **	0.399 **	0.321 **	0.385 **	0.403 **	-0.093 *	-0.072	-0.147 **	-0.123 **	0.657 **	0.638 **	0.794 **	0.590 **	0.654 **	-
16 负性生活事件	0.322 **	0.337 **	0.304 **	0.357 **	0.368 **	-0.136 **	-0.088 *	-0.167 **	-0.156 **	0.821 **	0.851 **	0.923 **	0.775 **	0.763 **	0.863 **

注: * $P<0.05$, ** $P<0.01$ (下同)。

对社会支持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见表 3)表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社会支持;当社会支持和负性生活事件同时预测手机成瘾倾向时,社会支持显著负性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性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表 4 数

据显示负性生活事件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间接效应。社会支持产生的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不含 0 值,说明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之间存在显著中介效应。

表 3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社会支持	负性生活事件	0.16	0.02	15.03 **	-0.16	-3.88 **
手机成瘾倾向	负性生活事件	0.40	0.16	46.27 **	0.34	8.60 **
	社会支持				-0.15	-3.99 **
手机成瘾倾向	负性生活事件	0.37	0.14	81.12 **	0.37	9.01 **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代入回归方程,所有数据通过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表 4 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间接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R^2_{med}	0.02	0.01	0.04	6.43%
K^2	0.03	0.01	0.05	

三、讨论

(一)手机成瘾倾向在性别和年级上的比较

本研究发现在大学生中女生手机成瘾倾向总

分和突显行为、戒断症状、社会抚慰三个因素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心境改变维度尽管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女生得分依然高于男生。许多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谢贝^[3]等研究发现女大学生手机

依赖水平显著高于男大学生。原因有两个,一是在生活中女生比男生情感更加细腻、敏感,当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情绪低落时,女生更渴望通过表达和交流,寻求他人的支持、安慰和帮助。而在当下手机已成为我们与他人保持及时联系不可或缺的通信工具,女性更容易使用手机来建立和维护社会关系。二是在业余活动上,男生业余活动丰富,各种球类竞技性活动较多,而女生更热衷于室内活动,比如购物、刷剧、拍照等。但金莹莹、徐海^[4]、黄凯、陈思凡等^[5]研究发现男生的手机依赖比女生严重。熊婕^[6]等采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对武汉市大学生进行调查显示: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在性别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目前国内研究对手机依赖在性别上的差异并无统一的结论,这可能与手机依赖程度的测量与评定标准缺乏统一性、计分方式和样本选取存在差异有关。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总分及戒断症状、社会抚慰、心境改变维度得分在年级上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了手机成瘾在大学生中的普遍性。在手机成瘾倾向各维度上,只有突显行为在年级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大二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大一与大三、大二与大三学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大一学生刚步入大学,对新环境和新同学充满了好奇,而大二的学生已经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一部分学生出现无目标,无动力的生活状态,大三学生开始准备考研或为自己的未来做规划,手机成瘾程度会有所下降。韩永佳^[7]也发现手机依赖总分在年级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大三在戒断性上得分要高于大二和大一。谢贝的研究正好与本研究结论相反,他发现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总分以及戒断症状、社会抚慰、心境改变三个分维度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只在突显行为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随着年级增加对手机依赖的程度越低。刘鹏^[8]研究也发现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且手机依赖总分及各维度均值在年级上呈倒V型,手机依赖程度在大三达到顶点。

(二)手机成瘾倾向与社会支持和负性生活事件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及各维度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相关。该结论与高

杉^[9]、何安明等研究结论相同。负性生活事件会导致个体出现较多不良情绪,显著提高个体的焦虑和抑郁程度^[10-11]。大学生面对人际冲突、学业压力、恋爱受挫等负性生活事件时,容易通过手机来逃避现实困难,手机的各种功能模块可以使其获得暂时的满足和安慰。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及各维度与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这与谢贝、高杉等研究结论一致。何安明等^[12]研究发现与低手机依赖的个体相比,社会支持更容易对高手机依赖的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支持是人们感受到的来自外界的关心和帮助,有助于个体克服不良心境,促进身心健康。当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时,容易借助手机来调节焦虑、抑郁、孤独等负面情绪。社会支持系统不健全的个体,更容易养成手机依赖。

社会支持及各维度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相关,这与高杉、杨巧冬^[13]研究结论一致。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为个体提供丰富的信息和物质帮助;在情感上给予支持和安慰;减轻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还可以提高个体应对负性生活事件的能力,获得自信和安全感,维护个体心理健康。

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负性生活事件既可以正向预测手机成瘾倾向,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手机成瘾倾向。负性生活事件使人产生焦虑、不安、沮丧、消沉、不自信等不良的心理体验。与此相对应,手机功能中的娱乐模块、上网模块、社交模块等以其方便、快捷、隐秘等特点成为大学生寻求安慰、扩大交往空间、发泄不良情绪的最好选择,进而最终导致手机成瘾行为的发生。大学生大多背井离乡在外求学,难以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联网方便、功能丰富的智能手机的使用,可以使大学生获得支持和满足。社会支持作为个体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环境资源,影响负性生活事件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在校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主要源于寝室同学、班级同学、不同专业与学院的同学间人际交往,以及对学校各类团体活动的参与,比如学生会、自律委员会、各类社团等有组织的活动。因此可以通过组织和开展内容

丰富多彩、具有独特价值和有意义的活动,使多数学生能积极参与到各类活动中去,在活动中体验快乐、结交朋友、锻炼能力、增强归属感,从而引导大学生把较少的精力放在手机上,减少手机依赖行为的发生。

四、建议

根据此次研究结果,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在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针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干预,从个体和环境两方面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首先,在个体方面,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引导大学生掌握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运用灵活、理性、积极乐观的眼光看待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法,从而跳出由负性生活事件引发的情绪漩涡。可通过开展认知情绪调节的团体辅导、正念认知训练、手机依赖行为系统脱敏训练等,增强大学生抗挫折能力,改善情绪失控和逃避现实的行为,进而减少手机依赖行为。

其次,在学校环境方面,学校可通过时间管理、生命意义、自我价值等主题教育提高学生在手机使用上的自我修养,形成正确的娱乐观和社会价值观,增强对课堂手机使用的严格监管,培养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可设计内容丰富、体验性和参与性强的班级活动,增进学生间的交流与互动,增强情感联结和归属感,构建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提高社会适应能力,避免沉迷于手机游戏或虚拟社交。

最后,在家庭干预环境方面,家庭是孩子生活最基础和持久的环境,会对个体的身心发展产生漫长且深刻的影响。个体手机依赖程度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14]。父母可通过温暖的教养和情感的支持,增强个体主观幸福感。积极的教养方式有助于个体养成乐观、自信、自尊的良好心理品质,而这些良好的心理品质有助于个体形成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能合理安排学习和生活,拥有自控力,减少手机成瘾倾向。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选取了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两个变量来验证其与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发现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手机成瘾倾向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为深入探讨改善大学生手机依赖提出新思路,在应对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时,需及时干预。由于负性生活事件所引发的焦虑、恐惧、沮丧等不良的情绪,避免学生过度使用手机寻求心理安慰、发泄不良情绪。同时引导大学生积极构建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增强大学生应对各类风险与挑战的能力,提高适应力。目前国内关于手机依赖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但在研究设计、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还存在不足,研究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统一的研究范式,这些不足也为未来手机依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首先,在研究内容与设计方面,需进一步优化,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性。为明确各变量与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后续需进一步探索各变量和层级之间的因果关系、中介或调解机制,完善手机依赖的因果研究链条。其次,在研究工具方面,需进一步完善手机依赖的理论结构,编制更具有信效度的测量工具。最后,在研究对象方面,目前关于手机依赖的研究多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代表性有限,研究结论推广性不强。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手机依赖趋向低龄化或成人化,年龄界限不明显,后续可扩大研究对象范围。此外,对手机依赖的干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今后的研究可探索通过团体辅导对大学生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社会支持进行干预,达到提高大学生社会支持水平、减少手机依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北京: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21.

[2] 何安明, 万娇娇, 惠秋平. 青少年手机依赖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及与生活事件、学业倦怠的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2): 410-413.

[3] 谢贝. 大学生社交焦虑对手机依赖的影响: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7.

[4]金莹莹,徐海,邹森,等.医学生手机依赖与儿童期性虐待的相关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15(12):1903-1905.

[5]黄凯,陈思凡,欧阳乐,等.大学生手机依赖影响因素及心理韧性预测作用[J].中国学校卫生,2019(7):1050-1052,1057.

[6]熊婕,涂勤建,周宗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C]//中国心理学会.第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北京:中国心理学会,2012:88-89.

[7]韩永佳.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自尊、社会支持的关系及干预研究[D].漳州:漳州师范学院,2012.

[8]刘鹏.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社会支持及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9]高杉.中职幼师生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的关系及干预研究:以亳州幼儿师范学校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9.

[10]滕姗,赵久波,张小远,等.大学生正念和睡眠质量在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情绪间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7(9):815-819.

[11]杨艳慧,李素萍,杜巧荣,等.抑郁症患者负性生活事件与焦虑症状的关系:神经质的调节作用[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7(3):371-374.

[12]何安明,包灿灿,惠秋平.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手机依赖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0(4):494-501.

[13]杨冬巧.高中生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与感恩的关系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7.

[14]邓兆杰,黄海,桂娅菲,等.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父母教养方式、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5(1):68-73.

(责任编辑:翟卫青)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Social Support

KONG Lingli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Center for College Students,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Hubei 43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social support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546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284 males and 262 females.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MPATS)for college students,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 and 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SSR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the relationship. Results: 1. The MPATS, withdrawal symptoms, salience, social comfort score were higher in female students than male students;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nd the dimensions withdrawal symptoms, social comfort, and mood change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the salience scores were higher in the sophomores than the freshmen. 2.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s in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in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ocial support; social support plays the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ocial support; negative life events

平 顶 山 学 院 学 报

(双月刊 1986 年创刊)

第38卷第4期(总第196期)2023年8月25日出版

JOURNAL OF PINGDINGSHAN UNIVERSITY

(Bimonthly Started in 1986)

Vol. 38, No. 4 (Cumul. No. 196) Aug. 25, 2023

主管单位:河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平顶山学院

编辑出版:平顶山学院学报编辑部

邮编:467036 电话:(0375)2657672

地 址:河南省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未来路南段

主 编:郑东丽

印 刷:郑州豫兴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本刊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电子信箱:pdsz@chinajournal.net.cn

网 址:http://pdsz.cbpt.cnki.net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Henan Province

Sponsor: Pingdingshan University

Editor&Publisher: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Pingdingshan University

Address: Weilai Road(S), Demonstration Area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ingdingshan, Henan
467036, China, Tel: 0375-2657672

Chief Editor: ZHENG Dongli

E-mail: pdsz@chinajournal.net.cn

Website: http://pdsz.cbpt.cnki.net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3-167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1-1377/Z

国内定价:10.00 元